古籍目录学

周少川 著



周少川 著

古籍目录学

刘家和先生指正
学生：周少川
九六、三、二十

中州古籍出版社

(豫)新登字 05 号

内 容 提 要

作为古籍专科目录学，本书是第一部。比之其它目录学专著，它的特点是系统总结了古籍目录学的发展规律，既评说了各朝各代古籍目录工作的成就和缺欠，又全面介绍了近现代产生的各种古籍目录和索引。其中许多观点不乏新见，尤其是近现代部分，乃是前人没有作过的工作。文笔流畅，分析透彻，适于广大文科大专师生、古代文史研究工作者阅读。

古籍目录学
周少川 著

责任编辑 陈协琴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粮食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8 印张 201 千字
1996 年元月第 1 版 1996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 册

ISBN7—5348—1432—4/K·511 定价：15.00 元

《古籍目录学》序

刘　乃　和

目录学是读书治学的入门之学，是个基础学科，读文史、文献和进行古籍整理与研究者，应研读这门学问。可以说它是该书的向导，治学的门径，学习了目录学，无异于打开了一座文化宝库。历代学者多重视之，清代学者尤其如此。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无不得力于目录学，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一书中就曾多次谈到目录学的重要，他在该书第一卷第一条就指出："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就是说，必须从目录学中才能找到读书的门径。他这话时常被人引用，已为人所熟知。卷二中，他又引当时学者金榜的话说："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有了眉目，即有了头绪，有了条理，才有进入门户的条件。在卷七中，他更强调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乱读则必然会事倍功半。有些学者虽不一定曾明确说过类似的话，但从他们治学之路来看，也都是掌握熟悉目录学的。

现代目录学专家余嘉锡师的学术成就，就是得自目录学，他在《四库提要辨证》序录中说："余之略知学问门径，实受《提要》之赐。"他曾对史学大师陈垣师说他的学问"是从《书目答问》入手"，这话记载在陈垣师为他的《论学杂著》所写的序文中。陈垣师自己也是非常重视目录学的学习，他上课时经常教导我们说，读目录学

走入治学之道，是个捷径。他自己从青少年起就是由目录学打开了自己对书籍的视野，走入史学专业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论文专著，总是引据宏富，左右逢源，能得出精确的结论。

这些学者的话，主要是自己的经验之谈，是来自他们的治学实践，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因此很值得重视。

我国治目录之学，在学术史上是基础深厚的，有传统，有发展。自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别录》、《七略》问世，二千年来，历代相承，从未间断。各种目录、提要、索引，层出不穷，专门论述目录学的专著，也逐渐增多，但是对专科目录学的阐述，尚是有待于各个学科的目录学研究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课题。

周少川同志这部《古籍目录学》，是一部专论古籍的专科目录学。它是普通目录学的一个分支，是在古典目录学研究的基础上，为配合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而撰写的。书中包括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应用方法三部分内容。此书特点很多，主要是比以前类似的著作，提出了作者的新见解，增加了新内容。

首先，作者注意了理论与实践结合，注意在古籍整理和研究中的应用性，凡是为古籍而作的书目索引，不论是古代的还是近现代的书目、索引，都包括在本书研究范围之内，这是本书较为突出的特点。包括近现代不但丰富了研究内容，且也可看出作者的眼光和他对近现代目录学的重视。

其次，这部书对本学科做了理论的阐述和体系的建立。这是他首次提出的，因此填补了前人著作的不足和缺憾。

再者，他在分析评价古代重要书目时，能深入论证，或者考辨前人之说，或者补充自己见解，又能在论述各代目录学史时，分析其书目产生的时代背景，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更加强了深度。

又如，他在书中特别注重应用性，在介绍古代书目时，不但使读者对书目能了解、认识，且又引导读者能够利用。

此外，他首次按书目的外部形式和组织特征，提出目录体裁的

新观点；并对古籍目录学的发展，提出不少中肯的设想和建议，对今后研究目录之学，都可作为借鉴。

我与少川同志交往已十几年，年年看他成长进步。他聪颖过人，才思敏捷，读书刻苦，勤于写作。在本科学习期间，即已注意文献目录，读研究生时，更颇致力于目录学的钻研，已崭然露头角。毕业后，每年都有文章发表，担任课程，认真负责，教学效果良好，近年更有突飞猛进之势。回忆起与他能仁灯下夜读（我当时住能仁寺胡同），四合共同探讨（我曾在师大住过"四合院"楼），每有所得，辄心领神会，彼此探索，至今令人难忘。

这部《古籍目录学》，是他在教学讲义基础上经过删改增补而成。内容较丰富，征引亦翔实，能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继承，有创新，可以说此书具有理论性、知识性和实用性。

除了有关目录学的论文外，他还写了其他方面的史学论文，都有一定水平。从他学术进展上，也正可看到目录学在他科学研究上所起的作用。

少川同志风华正茂，前途无限，相信他会不断有更新更大的成就。

1993 年 12 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中国的古籍以"浩如烟海"、"汗牛充栋"而著称，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发展中，创造积累的各种知识体系的结晶，浩瀚的古籍代表了中华古代文明的精神成果，而记载这些典籍的状况与传统，则在很大程度上倚靠了古籍目录。

古籍目录学是以目录学原理为指导，研究古籍目录及其发展史的专科目录学，它是整理研究古籍的基础知识，是古籍整理基本理论的组成部分。

本章主要解决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分析古籍目录学的渊源，介绍这门学科研究的对象、范围。

第一节　目录的起源与目录学的形成

各门科学都有自己的产生渊源与形成过程。了解学科的产生渊源与形成过程对认识这一学科的研究目的及其知识范畴有重要的作用。目录学是在积累保存了一定数量的历史文献和典籍以后产生的。

一、目录的起源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代。商代的文字是甲骨文，这是迄今我们所知道的最早文字，已发表的甲骨文字，约有4500余个。由于科学程度的落后及对自然界诸多现象的迷惑，殷人依靠占卜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问题，并把占卜的事情和

结果，用文字记录，刻在甲骨上，这便是今天所见的甲骨卜辞。根据近几十年来对河南安阳小屯村甲骨的发掘与研究，可以看到，甲骨上所刻的卜辞内容相当广泛，诸如对自然现象、生产状况、社会人事等等，都有所记载；另外，每一个窖穴中的甲骨卜辞，都有一定的年代，这些甲骨的收藏，也有一定的顺序、记号和编排。虽然，当时还谈不上有一定数量的文献与典籍的积累，对于甲骨排列的方法也谈不上是著录文献的简单目录，但是它们与后来目录的起源是有密切联系的。

我国古代目录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生产力发展，学术思想也空前活跃，昔日"学在官府"的限制被逐渐打破，诸子百家学派各自著书立说，大力宣传自己学派的学说和思想，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以金石、简牍为载体的文献资料大大增加。为了按照一定的思想目的保存当时的文献典籍，孔子开始了他的文献整理工作，他修《春秋》，删《诗》、《书》，订《礼》、《乐》，纂《易经》，在这些整理过程中，他采取了一些目录方法，例如对六经篇目的编次，对《诗经》风、雅、颂的分类，对《书经》、《诗经》的内容、背景"为之作序"、"言其作意"(《汉书·艺文志序》)等等。

孔子及其学生整理图书，为《诗》、《书》等经典作序，起到内容提要的作用，这种方法，影响了诸子百家，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以自序的形式，来宣传和介绍自己的著述内容，这些工作，都是目录事业的雏形。

六经中，《易经》的《序卦》编次汇总了六十四卦的卦名，是说明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和内在联系的目录，有的学者认为，古代一书目录的出现，就是从它开始的(清·卢文弨《钟山札记》卷四、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第七，《目录学源流考》)。此外，如《吕氏春秋》中的《序意》，《淮南子》中的《要略》，西汉前期司马迁《史记》的《太史公自序》等，都具有一书目录的性质。当然，这种一书目录只是我国古代目录的雏形，其性质与内容是和当今图书正文之前的目录完全

不同的。

二、目录书的产生

阐述我国古代目录书籍的产生之前，必须先弄清楚“目录”名称的由来。

“目”的本义是人的眼睛。甲骨文中是[illegible]（刘鹗《铁云藏龟》16页），[illegible]（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卷四，32页）[illegible]（董作宾《小屯殷墟文字甲编》215页）等，都以象形造字，画的是人的眼睛。金文也有目字，“㚔目父癸爵”上有铭文[illegible]（容庚《金文编》183页），也是人眼之状，外框内珠。久而久之演化为楷书“目”。《管子·宙合》曰：“目司视。”《礼记·郊特牲》曰：“目，气之清明者也。”古人认为“目”管视觉，是清明之物，于是“目”含有清楚、明瞭这么一层意义。后来它的含义有了发展。《论语·颜渊》说：“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其中“请问其目”，就是要求得到关于“仁”更清楚、更明瞭的纲领、要点，来了解“仁”的具体内容。这里的“目”，便有了“条目”、“细目”的意义。把这种意义用在篇名和书名上，就叫“篇目”、“书目”。一书之中有若干篇章，列出具体的条目，就是篇目；一批藏书中有若干部书，列出具体的条目，就是书目。如《汉书·刘向传》曰：“校中秘书，各有条目。”《汉书·艺文志》曰：“向辄条其篇目。”这里的“目”指的就是篇目和书目。

“录”字在甲骨文中作[illegible]（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卷六十一），在金文中作“[illegible]”（容庚《金文编》396页芇伯簋）。《说文解字》金部曰：“録，金色也。”录部曰：“录，刻木录录也。”章炳麟在《小学答问》中解释说：“録，金色。凡若记录者，借为‘刻木录录’之录，古者书契，本刻木为之。”古代刻木记事，而刻木要用刀，因而后来转用带金字旁的“録”字来表达记载含义。《公羊传》成公十年曰：“此何以书，录伯姬也。”便有记录的意思。“録”还有详备之义。《广雅·

释诂》曰："錄·具也。"王念孙《广雅疏证》曰："錄者，记之具也。"《公羊传》隐公十年曰，"《春秋》录内而略外。"录有详记之义。"录"字含有"书录"的意义，开始于汉武帝杨仆整理而成的目录书《兵录》。到了汉成帝河平年间，刘向整理图书时，"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由于他录的内容是撮取某书或某篇章的旨意，所以录就成为对某书或某篇章旨意、要点的说明。

目录是目与录的合称，将书的书名、篇名与说明合在一起就是目录。把"目"、"录"二字联系起来的，是西汉成帝时奉命整理图书的刘向、刘歆父子。刘向的《别录》中有"《列于目录》"（见《文选》，王康琚《反招隐诗》，李善注引），刘歆的《七略》中说："《尚书》有青丝编目录。"（见《文选》任彦升《为范始兴求立太宰碑表》，李善注引）《汉书·叙传》也记载："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这些都是刘向父子始称"目录"的例证。

我国古代第一部目录书产生于西汉汉武帝时期，《汉书·艺文志》的《兵书略》说："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这是一部服务于当时军事需要的，专门著录兵书的专科目录。由于这部目录早已散佚，如今再无其它材料可以深入了解它的基本情况。根据现有的资料，对图书进行大规模的、全面的整理并编制群书目录的工作，仍应以刘向等人的校书编目活动为最早。

汉成帝河平三年（前 26 年），刘向奉旨校勘各类图书，他每校完一书之后，就整理出这部书的篇目，再写一段说明整理经过、书的作者、书的内容、价值等情况的叙录。例如流传至今的《列子目录》曰：

《列子》八卷

天瑞第一，黄帝第二，周穆王第三，仲尼第四，汤问第五，力命第六，杨朱第七，说符第八

右新书定著八篇。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参书二篇，内外书共二十篇，以校除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及在中书有栈，校雠从中书已定，皆以杀青书可缮写。列子者，郑人也。与郑缪公同时，盖有道者也。其学术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持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而《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杨子之篇惟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书，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观者。孝景皇帝时贵黄老术，此书颇行于世。及后遗落，散在民间，未有传者。且多寓言，与庄周相类，故太史公司马迁不为列传。谨第录，臣向昧死上。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列子》书录。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引自《师石山房丛书》，开明书店，1936年）。

这段介绍文字前半部分是我们所说的"目"，即篇目；后半部分是我们所说的"录"。合起来就是完整的一书目录了。刘向整理群书时，每书都有目录，最后，他又将各书的目录合起来，成为一部介绍群书的目录著作，称为《别录》，这是一部群书目录。群书目录不但有各书书目，还包括各书的叙录，有的还有各书的篇目，它比一书目录的功用要大得多，它是目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刘向经过20年左右的辛勤工作，创立了一整套编制群书目录的程序，校勘了大量书籍，撰写了许多叙录，并将各篇叙录集合成了综合性群书目录《别录》，在这项工作即将完成时去世。他的儿子刘歆继承父业，在《别录》的基础上，以较快的速度撰成了一部更为正规的群书分类目录《七略》。这两部目录都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可惜原书久佚，目前仅有清人的辑本。所幸的是，东汉班固把《七略》改写成《艺文志》，列入《汉书》，使我们可以看见《七略》的大致

体例与规模。《汉书·艺文志》便是现存最早的综合性群书目录。

如上所述,《兵录》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目录,《别录》是综合性群书目录的开创著作,《七略》是第一部群书分类目录,《汉书·艺文志》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群书目录。这些目录著作为我国古代目录学的形成,奠定了第一块基石。我国古代目录学正是伴随着这几部著名的群书目录而兴起的,因为它们的作者在目录工作中,并不局限于登录图书、编制书目,而是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工作。从刘向《别录》残存的几篇书录及《汉书·艺文志》的内容来看,刘向父子用广搜异本,校雠异同来确立定本,勘定篇次;以分类立目来分析和辨明学术流派;以撰写书录来详论书籍,表达学术观点,指导读书门径。这套编制目录的程序,为后代许多目录学家所仿效,成为古代目录事业的优良传统,对目录学的形成,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目录学的形成

魏晋时期,随着书籍的增多,目录事业也在不断地向前发展。根据史书记载,三国、西晋时期,都有类似刘向整理书籍的校书活动,并且编制了目录。南北朝时,目录书在典籍中已成为独立的部类,阮孝绪编《七录》时,已将目录书列为专项,附于"簿录部"之下,收书30部,214卷。到了《旧唐书·经籍志》,则以"目录类"列于史部,收录了大批的目录著作。目录书的增多,目录方法的进步,促使古代许多目录学家对目录活动的实践经验进行思维加工,形成了一批单篇的目录学理论文献,例如《汉书·艺文志》各序,《七录序》、《隋书·经籍志》各序,《古今书目序》,以及《众经目录序》、《出三藏记集序》、《开元释教录》卷一及类序、牛弘的《请开献书之路表》等等。这些目录学理论文献论述了目录的功用,提出了群书目录概念与实质的认识,以及目录对书籍整序控制的思想,初步探讨了目录活动的某些规律,分析了类例沿革,比较了类目设立的得

失。从西汉到隋唐时期，是我国古代目录学知识的积累时期。

正是在汉唐目录著作、目录工作经验、目录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北宋初年出现了“目录学”的概念。北宋苏象先为述其祖父苏颂遗训遗事的《苏魏公谭训》，在卷四中说：

> 祖父谒王原叔，因论政事。仲至侍侧，原叔令检书史。指之曰：此儿有目录之学。

这段话中的祖父指北宋宰相苏颂，王原叔指宋初侍读学士王洙，仲至是王洙之子，名王钦臣。三人在《宋史》中皆有传。王洙是一个博学多闻的学问家，目录学家，他参加过宋代大型目录《崇文总目》的修订。王钦臣跟他学习了有关目录方面的知识，以后也成为一个有名的文献学家，曾主持过北宋大型类书《册府元龟》的编纂。王洙称王钦臣“此儿有目录之学”，可见目录学在北宋初已经作为一个学科的专词。姚名达先生认为“目录学”一词的提出，始见于清代乾隆间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见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这一说法似乎过晚。

目录学形成于宋代，还有另一重要标志，就是南宋时目录学家郑樵撰写了目录学理论专著《通志·校雠略》。在这一专著中，郑樵论述了图书的搜求、整理、编目过程，分析了目录工作的编目、分类、小序、叙录等理论问题，较为系统地总结了西汉至宋的目录工作经验和方法，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目录学的形成，大大促进了目录事业的发展，由宋至清，大批官私目录不断出现，到了清代，目录学几乎成为一时的“显学”，在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

四、目录学能否称为专学

我国古代目录学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对于目录学是否称为一门专学，却有不同意见。从宋代以来，就有一些学者认为，目录编制和研究的学问，不应称目录学，应称校雠学，因为本无目

录之学。或者认为目录学不能独立成为一个学科，而应该是隶属于校雠学之下的一个分支。持这些看法的学者有宋代的郑樵、清代的全祖望、章学诚，当代学者张舜徽教授也是这么认为的。当然，更多的学者还是以为应该将目录学确立为独立的学科并进行研究。把这种独立学科的意见加以归纳，有这么两点主要的理由：

其一，所谓"校雠"，刘向《别录》曰："一人读书，较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引自《文选》，《魏都赋》李善注)这段文字说明古人最早的"校雠"指的是校对、校勘文字篇卷的错误。因此，所谓的"校雠学"并不能包括"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的目录工作。

其二，编撰目录的工作虽然常常带有校书活动，但是目录工作除了整理篇次，校正文字之外，还有辨明学术、介绍梗概、撰写书录等过程，因此，将达成最后成果的各个研究环节总称为目录学是应该的。

事实上，中国封建社会的目录工作，有着悠久的历史，创造和积累了不少经验，撰著了大量的目录书和目录学著作，涌现出大批这方面的专家学者。因此，将目录学作为一门专学深入进行研究和探讨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科学文化的渗透，近代图书馆运动的兴起，我国目录学在总结传统目录学成就的基础上，介绍引进西方目录学理论方法而形成了更加完整、更为科学的目录学体系。因而，目录学在今天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无庸置疑的了。

至于，古代目录学是否应隶属于校雠学的范畴呢？我们认为这倒不必强求一致，各家可以有各家的看法，这并不影响当今目录学及其它专科目录学本身的发展。

第二节　古籍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古籍目录学是目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因此它的内容体系与当代目录学研究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五四"以后，随着我国目录学者对中外目录学理论方法的消化和总结，目录学新著不断问世，初步形成了我国现代目录学的学科体系。新中国成立后 40 多年，由于经济、生产、科学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世界性知识信息高度增长，推动了我国目录学研究的迅速发展，学科体系也在逐步完善。纵观"五四"以来，我国目录学专著的撰述，大致经过这么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运用科学方法的建立新型的目录学学科体系进行探索。例如刘纪泽在 1931 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目录学概论》，集中从目录学的起源、定义、体例、派别、功用及史学位置等几方面，探讨目录学的基础理论问题。1934 年又出版了容肇祖的《中国目录学大纲》和刘咸炘的《目录学》，三者皆对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及基本内容进行了介绍。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以上三书虽然在内容体系上有不够完善和准确之处，但作为现代目录学著作的先锋，则为建立这一学科的崭新体系，作出了可喜的探索。

第二阶段的目录学专著，在总结与阐述中国目录学史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主要著作如汪辟畺在 1934 年出版的《目录学研究》，此书对古代目录学史、古代目录书的分类、丛书与索引等专题论述，比较系统深入。还有余嘉锡三四十年代在北京讲学所用的《目录学发微》，此书 1963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作者引用大量古籍资料，条分缕析，注明出处，对目录学的意义、功用与源流、古代目录的类例和体制等问题论述颇详，是研究使用古籍目录的重要参考书。这一阶段较有影响的著作是姚名达 1933 年出版的《目录学》和 1937 年出版的《中国目录学史》。前者分原理、历史、方法三

篇二十章，虽然内容比较简要，但是涉及范围广泛，全书初步构建了我国现代目录学的知识体系，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后者集中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全面总结了古代至抗战之前中国目录学的成就。内容非常丰富，尽管有些材料失于考订，但仍是研究目录学史的重要著作。

第三阶段的目录学专著是解放以后，我国目录学专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开展学科研究，不断完善学科体系的成果。此期重要的著作如 1957 年王重民先生编写的讲义《普通目录学》；1962 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合编的《目录学讲义》；1981 年，武大、北大在原讲义的基础上，经过修订，又出版了《目录学概论》一书。以上三书基本上奠定了目前我国目录学基础理论、目录学史和书目方法三部分内容的大体框架。此期目录学界对于我国古代目录学史的研究继续深入，王重民先生的《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吕绍虞先生的《中国目录学史稿》是这方面研究的力作。自 1981 年，中央号召重视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以来，我国古典目录学研究又有长足的进展，例如来新夏先生在 1981 年初出版的《古典目录学浅说》，及在此基础上于 1991 年修订出版的《古典目录学》，罗孟祯先生在 1982 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简编》，曹慕樊先生在 1988 年出版的《目录学纲要》等，这些著作为促进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发挥了作用。其中又以来新夏先生的著作体例更为严谨，论列更为精当。

本书正是在古典目录学研究的基础上，为配合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而形成的专科目录学，它既要以一般目录学的理论与体系为指导，但又要对其论、史、法三大部分进行改造，特别是要删节应用于图书馆工作的书目方法内容。古籍目录学与古典目录学的研究都要涉及古代目录及其发展历史，但是古籍目录学要突出其在古籍整理研究中的应用性，因此，凡是为古籍而作的书目索引都应在它的研究范围之内，这就是说，其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古代书目，而且包括近现代编写的各种古籍目录和索引。

建国以来，目录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目录学定义及目录学研究对象两大问题上。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它的研究范围和内容，因而这一问题也是我们讨论古籍目录学研究范围不可回避的问题。近十年对于目录学研究对象的讨论有如下六种说法：

第一种观点是“图书说”，认为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

第二种观点是“目录说”，认为目录学是目录工作的总结和概括，目录是整个目录工作的中心，所以目录学的对象应该是目录。

第三种观点是“图书和目录说”，这是以上两种观点的合成。

第四种观点是“目录工作说”，认为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一切书目活动。

第五种观点是“矛盾说”，认为揭示、报导图书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的矛盾，是目录学的研究对象。

第六种观点是“关系说”，认为目录学的对象是记录图书与利用图书的关系。（以上各说参见武大、北大《目录学概念》83、84 页；刘先翔《近年来目录学对象研究述评》，载《贵图学刊》1987、3。）

古籍目录学的对象就是研究著录古籍的书目。推而广之，就是研究这些书目的体制，发展历史，及其应用。古籍目录学的对象决定了它的研究范围和内容，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学科理论的认识。要了解目录学的起源，学科的建立，古籍目录学与一般目录学的关系，古籍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及范围等基本问题，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目录学的理论和体系。

第二，研究古籍目录的编撰体制。古籍目录以古代目录为主体，因此，要分析古代目录的组织结构、体裁和种类，分析古代目录对古籍的分类方法，从而认识古代目录的总面貌和一般特点。

古代目录有一定的组织结构。不同的结构从不同的角度对古籍的外部状况和内容进行著录、揭示。目录具备不同的结构，就形成了组织方法各异的体裁，对编撰结构和体裁的分析，是我们认识古籍目录的一条途径。

我国古代目录事业非常发达，积累了大批目录著作，据初步统计有 300 余种（汪辟畺《目录学研究》统计汉魏至明末目录书 151 种，孙殿起《贩书偶记》著录清以后目录书 155 种），而实际数量远不止此。这些目录，可以根据编撰者的目的和目录的社会职能来区分，又可根据目录的收录内容来区分，或可按目录反映的收藏情况或著录的文献类型来区分，只有分析古籍的种类，才能根据目录书本身的性质来寻检古籍，认识古籍，从而发挥古籍目录的功用。

分析古代目录对古籍的分类方法，不仅是研究古籍目录编撰体制的主要内容，也是古籍目录学研究古典文献源流、类型，反映古代学本渊源流派的重要内容。古代目录采用的分类编排法是根据古籍所反映的知识内容和特点，分门别类地组成一个有逻辑联系的目录编排体系。这种方法的特点能够将同一个学科内容的古籍集中在一起，使学科性质相近的古籍排在相近的位置，有利于系统地揭示古籍最本质的学术属性和内容上的相互关系，便于学者综观全貌，触类旁通，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分类法是目录编排上最基本、也是最有学术价值的方法。我国古代学者在世界文明史上最早把分类思想运用于图书目录的编排，历代目录学者继承这一优良传统，依据文献发展的特征，不断深入研究书籍的分类，提出各种不同的分类主张，并把这些主张反映在各自的目录著作上，为揭示古代文献发展特征，为部类归属典籍发挥了重大作用，推动了古代目录学的发展。因而，古籍目录学必须重视古代目录中图书分类的研究。

第三，研究古籍目录学的发展历史。中国古代的目录工作，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创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产生了大量的目录，涌现了许多优秀的目录学家。研究古籍目录学发展史主要是对古代目录工作的经验和成就进行概括和总结，具体阐明古代目录工作的方法和思想。要结合历史的文化发展等背景，研究古代目录工作产生及其发展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意义，要通过各个时期目录工作

的研究，著名目录学家的介绍、尤其是通过对一些重要目录著作的分析，来探讨古代目录工作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工作方法，以及理论思想。从而对古代目录工作及其产生的古籍目录作出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探讨古籍目录工作的规律性。

第四，评介当代一些重要的古籍目录、索引的编制特点和使用价值。自"五四"运动以来，随着对国外新思想及科学方法的吸收，随着对中外目录学经验的总结，许多学者运用新方法编制古籍目录的索引，这些目录和索引相比古代目录，收录更为全面，编排更为科学，对文献的揭示更为准确，检索更为方便。重点评介这些目录索引的使用价值和优缺点，不仅会扩大古籍目录的社会效用，同时，也是对古籍目录编制现状的总结。

第五，阐述古籍目录学的实践运用。学习研究古籍目录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掌握古籍目录去了解古籍，开展学术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掌握古籍目录，要能利用它们了解我国历代典籍的发展状况，揭示历代典籍的类型、特点和流传，利用古籍目录分析我国现存古籍的总面貌乃至具体的作者、卷数、内容、版本、流传等一般情况。要借鉴以往古籍目录的编制经验，掌握简单的古籍编目方法。

要认识古籍目录学与版本学的密切关系，利用古籍目录考察、辨别古籍的版本状况。

古籍整理的重要工作是考辨、校勘古籍，要认识古籍目录学与校勘学的关系，掌握如何运用古籍目录开展考辨古籍的工作。

掌握目录学知识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必要条件之一。要了解如何利用古籍目录辨章学术，摸清已有的研究成果，并详细准确地占有材料。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与学术文化的发展，古籍目录学在实践中也要考虑本身的改造和提高，要探索如何完善学科体系，如果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改进书目工作以及如何吸收其他学科知识，采用新的研究方法等等，以利于推动古籍目录学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章　古代目录的体制

中国古代的目录工作，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历代目录学家通过辛勤的劳动，撰著了大量目录书，并且在揭示古代典籍的内容状况、分门别类、编制成目的程序和方法上，创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要认识古代目录，要掌握古代目录如何揭示反映古籍，就必须了解古代目录的体裁结构，了解古代目录对古籍的分类，了解古代目录的各种类型。

第一节　古代目录的内容结构

古代目录的结构是由组成目录书的基本要素决定的，大致有名目、小序、解题和附注四个部分。这几个部分既互相联系，构成不同体裁的目录书，又是各自独立的内容，具有不同的编撰方法。

一、名　目

名目是任何目录要著录的一项内容，也是每位读者了解书籍时最先接触的。名目项包括书名、篇卷数、作者三方面。

先秦时代，学者著书不都是先有题目再作文章的，往往是将自己的思想或要表达的意见写出来，文章多了，为了便于使用和记忆，这才逐渐有了书名和篇名，这种先有内容后有题目的情况，到了西汉初期还常有发生。例如，当时刘邦初定天下，吩咐谋臣陆贾为他写一部讲历史经验教训的书，《史记》卷九十七《陆贾列传》中记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

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由此可见，当时陆贾写成的书本来没有书名，刘邦看了以后很高兴，认为里边讲的东西，都是他前所未闻的新鲜话，所以才定名《新语》。在当时，就是著名的史学著作《史记》，原本也是没有书名的。西汉末年的学者桓谭，在他的《新论》中提到这件事，说："太史公造书成，示东方朔，朔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东方朔所加也。"（见《史记·孝武本纪》索隐引）据此，可知司马迁的著作写成以后，并没有《史记》之称。清末学者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经过多方考证，也认为司马迁原著仅有篇名，没有书名。由于东方朔最先看到这部书，并替他题上了"太史公"三字，于是"太史公"便成了这部著作的书名。《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可知这一名称在汉代是流行着的，汉代学者说到这部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后来省略"太史公记"的书名，才简称为《史记》。

当然，我们举上面的两个例子，并不是说到了汉代一般著述都没有书名，只是想说明先秦到汉初存在着一书写成还没有书名的古朴风气，而许多的书籍，在流传的过程中，由于传授识别的需要，是逐步有了书名的，如《尚书》、《春秋》、《论语》、《诗经》等等。先秦汉初存在部分作者著书不定书名的状况，引起了图书流传的一些混乱，于是需要辨明、整理图书，确定书名，这便是促使目录工作产生的原因之一。因此，书名的辨明、著录，是目录工作的重要任务，是目录书的根本内容。

古书除了书目外还有篇目。古代典籍，是书写在简策上面的，简策以竹木作书写材料，用细皮带或丝带串连起来，"孔子晚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这里的"韦"，便是细皮带。"《孙子》书以杀青，简编以缥丝绳。"（《北堂书钞》引刘向《别录》）这里的简策便是以丝带连接。简策又厚又重，一部书需要好多的简策，携带、阅读都很不方便，所以只好把一部书分成若干部分，各部分独立编连，称之为"篇"。篇有篇名，题在篇首，以便于

识别、查检。篇名的确定，也同书名一样，许多是后人加上去的。有的篇名确实能够反映一篇之旨意。如《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尔雅》中的《释诂》、《释言》等；有的只是为了便于识认，就摘取篇首的文字作为篇名，如《论语》的《学而篇》，便是从首句"学而时习之"摘取的；此外，像《诗经》、《墨子》中的许多篇名的选定也都是如此。

古代早期的目录书在著录书名之下，还要著录篇名的。刘向编《别录》，在书名之下还要条列篇目，以《别录·列子目录》为例，在书名《列子》之下，又著录了《天瑞》第一、《黄帝》第二、《周穆王》第三、《仲尼》第四、《汤问》第五、《力命》第六、《杨朱》第七、《说符》第八等八篇的篇目，以后才是全书的叙录。再如东汉经学家郑玄，在整理、校注礼书的基础上，编写了《三礼目录》，也是在书名之下叙次篇目的，共记《周礼》六篇、《仪礼》十七篇，《礼记》四十九篇。应该说，在书目下条列篇目，这是最初的古籍目录书的编制。但是随着书籍的增多，篇目的繁杂，目录书容纳不下太多内容，便将篇目省去，在书名之下直接标题书的篇数或卷数。篇与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反映了我国古代书籍材料发展的不同阶段。篇用于简策，前边已提过，全书分为几部分编连，一部分则称一"篇"。卷用于缣帛书，战国至汉代书籍材料开始以缣帛代用，书写在丝帛上，放置时一幅卷为一卷，故称"卷"。西汉时，简策、帛书并用，因此在著录上也是篇、卷并用，《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便是如此，如著"《易经》十二篇"，"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但大抵称篇的多，称卷的少。隋以后的书目，一般只称卷而不用篇，因为简策书越来越少，除了丢失的，大多已转抄在丝帛或纸张上了。

名目项除了著录书名、篇卷之外，还著录编撰者姓名，在接触这部分内容时，要注意分清著者、编者、注者的不同。

综上所述，古籍目录最基本的内容——名目项，大致要包括：书的名称，篇卷数，撰述者（有时还标上版本和收藏者）这几个部

分，它反映了书籍外部的基本特征。

二、序

序是伴随目录书开始编纂就出现的一种体式。序有总序、大序、小序之分。

总序：它是目录书全书的纲领，类似一般书籍的“前言”。各种古籍目录书大致都有这么一个总序，总叙古今学术发展的大概线索，古今书籍流传存亡的大概情况，以及作者编撰这部目录书的原由、目的、体例等等。

大序：它是目录书中各大部类的纲领，对大部类中各种类、各家、各派的学术源流，优劣得失作一个综合的论述，对于掌握这个大部类的学术状况，起到鸟瞰大局的作用。

小序：小序的作用是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它对各类书籍的学术渊源、流派、演变、流传和得失特点加以论述。我们讲古籍目录中“序”的内容结构，主要是讲小序，它是古籍目录中特别重要的内容，也是一部目录书中最难撰写的部分。因为总序、大序毕竟是一些概括性的论述，而小序却要对某一具体学术流派作出较为准确的分析，难度就大了。相对于目录书中的其它内容结构来说，小序也是最难组织和撰述的。余嘉锡先生曾说：“目录之书莫难于叙录，而小序则尤难之难者。”(《目录学发微·目录书之体制之三·小序》)清代目录学家章学诚在总结刘向、刘歆以后，古代目录学家对小序的撰写时，也深有感触地说：“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能求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故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校雠通义》叙)这段话不仅指出了撰述小序的难度，而且点明了小序在学术上“求阐大义，条别异同，由委溯源”的重要意义。

西汉刘歆所撰《七略》中的《辑略》是小序编写的开端。刘歆部

次群书，分为六略后，又阐述了各家各派的学术源流、利弊，然后集为一篇，称之《辑略》。东汉班固写《汉书·艺文志》时，将《辑略》拆散，把各有关内容，编入各家各类书籍之后，更便于学者参读。在此之后出现的古代目录书中，有一些是继承了刘歆撰写小序内容这一优良传统的。

如刘宋时期的王俭，他编写的目录书《七志》，在首卷有《条例》九篇，这是《七志》中九个部类的小序。

隋朝许善心撰《七林》，除在卷首有总序外，部类之下又有"类例"，以"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这也是各部类的小序。

唐代官修的《隋书·经籍志》和唐代目录学家毋煚的《古今书录》都有小序，从现存的《隋书·经籍志》来看，书序包括总序、大序、小序，小序的体例非常严谨，是继《汉书·艺文志》之后，在小序体制上有继承、有进步的优秀目录书。

五代编制的《旧唐书·经籍志》，主要取材于毋煚的《古今书录》，并在总序中保存毋煚书序的内容，但是没有采用小序体制，破坏了目录学的这一优良传统，开后世史志目录不立小序的恶例。宋代的官修大型目录《崇文总目》，继承了在目录书中的撰写小序、辨别学术源流的传统，可惜《崇文总目》在后世流传中散佚，在现存辑佚本中已很难看到其小序的内容概貌了。宋代有两部著名的私修目录，《郡斋读书志》只有大序，没有小序，《直斋书录解题》四部皆有大序，四部以下各小类则只在语孟、起居注、时令、农家、阴阳家、音乐、诗集、章奏等类撰写小序，其它大部分门类仍付阙如。因此，小序的体制在这两部私修目录中也是不完整的。宋代具备小序体式的目录还有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但其小序内容则是辑录它书形成的。

直到清代的《四库总目》，才又恢复和发展了小序这种体式的撰述，为后人研究封建社会的学术源流和利弊提供了基本资料。

总的来说，现在古籍目录中，全面具备小序这种体式的，只有

《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和《四库总目》这几部目录书。

那么，小序这种体式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写法又是如何呢？我们可以从最早的目录小序中得到启示。例如《汉书·艺文志》中“六艺略·诗经类”的小序是这么写的：“《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而、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诗经类》小序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考镜《诗经》的学术渊源，从诗歌的出现，谈到对诗歌有目的地采集、考察。二是叙诗学的产生，指出诗学真正地产生和确立，功在孔子。三是分析《诗经》的流传，特别说明为何能历秦火而犹存。四是辨明诗学流派，指出汉初有鲁地申公、齐地辕固、燕地韩生三家，后又有毛亨的《诗经》诂训。五是评论各家得失，虽言简意赅，但点到实处。这是一例。

此外，如“诸子”、“数术”、“方技”等略中的小序，也都大致有这几方面的分析，总是先言学之所出，再言学之所传，然后明其所长，最后言其所短。如《诸子略·儒学类》的小序就曰：“儒学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子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善其言，子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渐衰，此辟儒之患。”这则小序，指出儒学源于古时司徒这一官职的司掌；其义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后来逐渐形成一种学问。这种学说秉承孔子的思想，崇尚尧舜、周文周武的礼治；然后说明了儒学在流传过

程中的变异，指出儒学之“有所誉”，如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及其出现的弊端。

要言之，古籍目录中的小序，是辨章学术源流的指南。好的小序，往往是一段简明的学术文化史，往往会涉及学术研究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各小序指出的“诸子出于王官论”，就成为后世研究古史议论纷纷的一大课题。

三、解　题

解题也称叙录、提要，它向读者简明地介绍所著录的书籍，其目的在于揭示书籍的中心思想、内容梗概、作者生平事迹、书籍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作用等，帮助读者鉴别和选择书籍，指示读书门径。

（一）解题的起源和创立

解题这一形式，在我国古代出现很早，它起源于书的传叙。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很早就有简单叙述作品的主题旨意所在，“言其作意”的传叙。《汉书·淮南王传》曰：“初，安入朝，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颜师古注曰：“传谓解说之，若《毛诗》传。”在这段材料中，淮南王刘安奉诏所作的《离骚传叙》，可看作是一种目录解题的雏形。

解题作为我国古籍目录学的优良传统，是由西汉时期著名的目录学家刘向创制的，当时称为“叙录”。西汉末，刘向奉诏整理图籍，他在整理校勘书籍之后，给所校的每部书都写一篇叙录，阐述校勘经过，简述作者生平，叙述书籍的学术源流和价值。他的这种作法，开创了我国目录学史上解题体式的先例，对于我国目录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可惜刘向的《别录》没有流传到后世，但从现存的《列子》、《孙卿书》、《晏子春秋》等书的叙录，尚可略窥《别录》中各书叙录的概貌。

（二）解题的主要内容

刘向创立解题的先例，对后代古籍目录影响极大，后世出现的目录解题虽在内容取材、撰写方法上有所变动或改进，但总的来说出入不多。因此，我们下面以刘向《别录》中的叙录，来分析古籍目录中解题这一体式所包括的内容。

以《列子目录》为例，解题的内容大体包括六个部分：

(1)说明书籍的流传情况　　刘向校书是在广采异本的基础上，进行校勘、删定的。叙录中记述了当时见到的《列子》有五种传本，如"秘中书"、"太常书"、"太史书"、"向书"、"参书"。叙录曰："孝景皇帝时，贵黄老之术，此书颇行于世，及后遗落，散在民间，未有传者。"这一段话，是对《列子》一书流传情况总的说明。

(2)介绍书籍的文字增删与篇帙分合　　叙录中介绍了书籍文字的情况，如有的本子"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同时也介绍了各种本子篇帙的不同，有六篇、五篇、四篇不等，于是删除重复的十二篇，《列子》一书定著为八篇。

(3)叙述作者的生平和时代　　《列子目录》叙述作者的情况说："列子者，郑人也。与郑缪公同时，盖有道者也。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这段话内容虽不多，但对作者的名氏、出生地、时代、学行都作了简要的交待，读者可藉此了解作者的时代与学术背景。

(4)探究学术源流　　《列子》叙录曰："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持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是对《列子》一书学术源流的探讨，指出列子及其著作是师承黄帝一派学术的。并对道家的学术要旨作了简明的评介，使解题的内容也起到"辨章学术"的作用。

(5)分析书籍的内容　　《列子》叙录从对《穆王》、《汤问》、《力命》、《杨朱》等四篇文章的内容分析入手，指出前两篇内容"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而《力命》、《杨朱》二篇，又其义相悖，"不似一家之书"等问题。

(6)对书籍的评价　　叙录指出《列子》中某些篇章的不足后，对全书作了一个总的评价，认为“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观者。”《别录》的解题内容中，常有“皆可观”、“亦有可观者”或“可常置旁御览”等评价和建议。当然，这些建议是专为当时的封建统治者而作的。但是，对于后来的读者来说，这些评价和建议也就有了参考的意义。

以上便是刘向《别录》叙录的内容范围，后世目录书的解题，基本不出此藩篱。

（三）解题形式的发展变化

自刘向的《别录》叙录之后，许多目录书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宋代陈振孙撰《直斋书录解题》时，将这一内容结构称为“解题”；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把这部分内容称为“提要”。千余年来，随着古籍目录书的增多和发展进步，解题的编写也有所发展变化。由于取材内容和撰写方法的不同，解题体式又可分为三种类型。

叙录体：这是解题目录最早，也是数量最多的类型，基本上仿照刘向《别录》的取材内容和撰写方法，对书籍的作者、篇卷、内容、源流、价值、流传等状况进行揭示。这一类型的解题目录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传录体：这是比叙录体内容简略的一种解题类型。由于采用这种类型的古籍目录书多已亡佚，只能通过其他的记载了解情况。传录体解题始于刘宋王俭的《七志》，《隋书·经籍志》说它是“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可见《七志》的解题比较偏重于作者的生平事迹，而对于学术思想则少有发明揭示。据余嘉锡先生考证，不仅王俭《七志》运用传录体解题，梁朝阮孝绪《七录》的解题也属于传录体类型。《七志》、《七录》虽已亡佚，但从现存一些古籍中引用以上两部目录的原文，可以看出这两部目录的解题内容确

实偏重著者事迹，类如列传。例如李善注《文选·枣道彦杂诗》，引《七志》原文曰：

枣璩，字道彦。颍川人，弱冠，辟大将军府。迁尚书郎，太尉贾充为伐吴都督，请为从事中郎，迁中庶子，卒。

又如《论语序》正义引《七录》原文曰：

周生烈，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

《史记·天官书》正义引《七录》原文曰：

甘公，楚人，战国时，作《天文星台》八卷。

以上所引原文，都是有关人物的传记材料，藉此可以略窥《七志》、《七录》传录体解题的形式。传录体解题为何如此专注于作者时代与生平的介绍呢？因为深入了解作者，能够更准确、更深刻地理解书籍的内容旨意。对这一点，余嘉锡先生有过专门的论述。他认为："凡其身世之所接触，怀抱之所寄托，学者观叙录而已得其大概，而后考之于其书，则其意志之所在，出于语言文字之表者，有以窥见其深。斯附会之说，影响之谈，无自而生，然后可与知人论世矣。"(《目录学发微·目录书之体制二·叙录》)这就是说，要通过认识作者的生平经历和思想抱负，正确把握作品的意蕴，以免穿凿附会，片面理解或歪曲作者的思想。同时，了解作者生活的时代也很必要。因为"人不能脱离时代，斯其动于中而发于外者，无不与时事相为因缘。著作之时代明，则凡政治之情况，社会之环境，文章之风气，思想之潮流，皆可以推导想象得之。然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乃有所凭藉，而得以着手。"(同上)认识作者生活的时代也即作品产生的时代，了解其社会文化背景，对于考辨著作的思想倾向及学术源流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传录体解题的作法，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实际意义。这种解题方法为佛经目录所仿效，例如梁代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便有《列传》，专载译经人的传记。唐代道宣、智升所作的目录也是如此。此外，后代学者编辑的许多诗文总集，也常在作品之前附上作者的小传，以加深读者对于作品的理解。

辑录体：这是广泛辑录与某书相关的资料，来揭示这部书籍的内容和进行评论的一种解题类型。它以宋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为代表。《文献通考·经籍考》辑录的材料除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为主要依据外，还收集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代各朝《国史艺文志》、《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以及原书的序跋、正史列传和文集、语录中的有关文字。将这些材料分别罗列于相关的书名之下，有的地方再加上马端临自己的按语，就成了一书的解题。由于这种解题是博采众说，汇聚群文，加以排比辑列的，所以称为"辑录体"。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和谢启昆的《小学考》两部目录解题，也采用了这种辑录体形式。后世对目录书进行辑佚、考证、拾补的工作，也多采用这种方法，如清季姚振宗的《隋书经籍志考证》。辑录体解题运用会注的形式，使有关材料汇集一编，对于参证考索某一书籍的相关材料，对于某一专题的研究极为方便。

解题的内容和形式如此丰富，这就决定了解题体式在古籍目录书中的重要地位。我国古代学者非常重视这一体式，往往把目录是否具有解题，以及解题撰写的水平高低，作为衡量一部目录质量的标志之一。今天我们整理和研究各类古籍，也要重视古籍目录中的解题，把它作为认识、熟悉和利用古籍的宝贵资料。

四、附　注

古籍目录中的附注是介绍、评价书籍比较灵活、自由的一种体式，从严格的意义说，附注不能算是目录书结构的独立部分，它是目录基本著录的补充。附注往往以脚注形式出现，它能补充说明有关书籍的各种情况，这些情况是读者必须了解而又是书目基本著录中没有反映的。很多既无解题又无小序，只是著录书目的目录书，为了简单、容易地让读者了解一些有关书籍的情况，就采用了这种特殊的体式。其实，附注是一种简化了的解题。我国的古籍目

录中，采用附注这种体式比较普遍，一般来说，没有解题的目录都采用了附注，许多史志目录，例如《汉志》、《隋志》就运用了附注这种形式。甚至有些解题目录，也另加附注来介绍某种情况，如《四库全书总目》就单用附注来说明书籍的来源。如曰“浙江巡抚采进本”、“大学士于敏中家藏本”等。

古籍目录中附注的文字一般比较简略，少则三五字，多至几十字至数百字，不拘一格。附注的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大致有：

1. 注撰人。

2. 注内容。

3. 注篇目。

4. 注真伪。如《汉书·艺文志》著录《伊尹说》二十七篇，注称：“其意浅薄，似依托也。”

5. 注附录。说明某书之后还附有图成附有表。

6. 注亡佚残缺。

7. 注成书年代。如《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太一金镜式经》十卷，注曰：“开元中诏撰。”

8. 注成书背景。如《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西域国志》六十卷，注曰：“高宗遣使分往康国、吐火罗，访其风俗物产，画图以闻。诏史官撰次，许敬宗领之，显庆三年上。”

9. 注版本。

10、注书籍的用途。如《书目答问》就常在书名下注上一两句按语，如曰：“此书最便。”“此类各书为读正史资料。”等，说明书的用途，以指示读书门径。

附注这一体式涉及的内容范围虽很广泛，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却不面面俱到，往往只是注较重要、较突出的一点，为读者了解书籍提供一些线索。

第二节　古代目录的体裁

古籍目录书的体裁，虽然在以往的目录学著作中没有明确地提出来，但是，不少学者在其目录学论著或论文中从不同角度上有所涉及。例如汪辟疆先生在初版于 1934 年的《目录学研究》一书中，曾在论述目录学界说时提出四种作用不同的目录书样式：

第一种是“纲纪群籍，簿属甲乙”，就是按类记录书名，使各种图书有所归属，而对书中旨趣则不详加论列。

第二种是“辨章学术，剖析源流”，就是在部次类居以前，先说明古今学术的发展和作者的得失。

第三种是“鉴别旧椠，雠校异同”，就是要标举不同版本并加鉴定，为校勘提供方便。

第四种是“提要钩玄，治学涉径”，就是要有提要并能提出学习的方法。

以上四点虽是通过目录书的样式来说明目录学的作用，但实际上却谈到了古籍目录书中不同的体裁。如第一种是指只记书名、作者、卷数，没有解题之类的登记目录。第二种是指那些用小序来阐明学术源流的类序目录。第三种是指那些侧重于著录版本的目录。这种目录在突出版本学方面继承了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第四种则指出有提要内容的解题目录。这种目录能帮助读者读书、治学，“乃最切实用之目录”。

余嘉锡先生在《目录学发微》一书中也明确地提出了古籍目录书三种不同的类型。他说：“目录之书有三类：一曰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者；三曰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目录学发微·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在这里，余先生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三类目录是三种不同体裁的目录，但是运用这种方法，从目录书的内容结构上区分，是比较能够体现

目录书的体裁特点的。

从现存的古代目录来看，形成古代目录书多种不同体裁的原因不外两个方面。一是余先生所分析的，目录书内部结构的不同形成体裁的不同；二是有些目录书借用了其他文体形式，也即传统目录之外的变体目录，由于文体不同，体裁也不相同。以下就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分析古代目录体裁上的差异。

一、由不同的内容结构形成不同的体裁

我们在上一节讲过，古籍目录书的主要组成部分大致有四项，名目、小序、解题和附注。除了附注是补充形成外，其它三项内容非常重要，古籍目录中具备不同的组成部分，便形成不同的结构，也就有了体裁的差异。传统目录体裁有这么三种：

（一）登记目录

登记目录的体裁形式就是余先生所说的："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古代目录书中，较为典型的登记目录大致有《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书目答问》等。这些目录只记书名、作者、卷数，以登记为主，阐发的内容较少，因面称之为"登记目录"。如《旧唐书·经籍志》史部，正史类著录：

> 《史记》一百三十卷。注：司马迁作。

《新唐书·艺文志》史部，正史类著录：

> 司马迁《史记》一百三十卷。

从以上两部目录的著录，我们可以看出，登记目录对于书目的登记是方法不尽相同的。《旧唐书·经籍志》只著录书名、卷数，把作者放在注里进行说明；而《新唐书·艺文志》则将作者、书名、卷数一同著录，把附注用来说明其它更为广泛的内容。后续的几部史志目录，如《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其著录方法与《新唐书·艺文志》相同，但清代一些私家目录，如丁丙《八千卷楼

书目》，以及《书目答问》，其著录方法则与《旧唐书·经籍志》相同。如《书目答问》史部著录：

《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注：唐·温大雅，津逮本，学津本，明钟人杰《唐宋丛书》。

总之，登记目录很多，但对名目项的著录大致是这两种方法，一种是为了突出书目，一种是为了突出作者，后世各有沿习，皆不偏废。今天在利用这类古籍目录时，要注意分清它用的是哪一种登录方法，以免把作者姓名和书名混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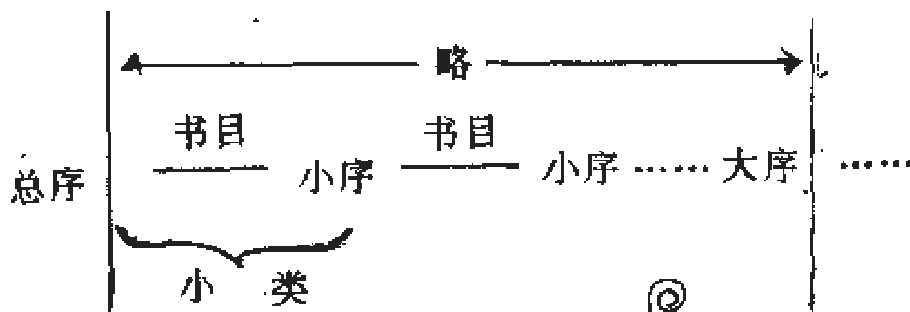
登记目录的著录虽然简单，但也不是只罗列书目，而是经过作者全盘考虑，建立分类体系，详审各书的性质，再进行归类整理的。它虽没有小序、解题这些详细的说明，但书目分门别类，条理分明，亦足以考镜源流，示初学者以读书门径，便于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按类求书。也就是说，不标辨章学术之旨，自有心领神会之功。

古代有些目录学家专门主张编制只记书名、不作小序解题的目录。例如南宋的郑樵，他认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盖经入经类，何必更言经？史入史类，何必更言史？但随凡目则其书自显。"（《通志·校雠略》）他认为有些目录书的小序解题是"泛释无义"，"强为之说，使人意怠。"郑樵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应该说，编撰书目不用小序、解题，而要达到有益于学术的功用，难度更大，编撰者和读者都需要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眼光，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以上所举的几部登记目录中，作得比较成功的只有郑樵的《通志·艺文略》和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新唐书·艺文志》作得也比较好，这是因为它利用附注这种体制，在书名之下作了不少说明，才弥补了这方而的不足。

（二）类序书目

此即余嘉锡先生所说的有小序而无解题之书目。古籍目录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类序书目是《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汉书·艺文志》中有总序一篇，六略各有大序一篇，六略之下分三

十八种，除《诗赋略》五种无序外，都有小序，全书有序四十篇。《汉书·艺文志》各序的排列是这样的：



如上图所示，总序在卷首，各类小序在各类书目之后，各略大序在本略最后。例如《诸子略》先列"儒学类"《晏子》八篇，《子思》二十三篇……等五十三部书目，然后才是"儒学类"小序，以下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各类也是如此，最后才是"诸子略"大序："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

《隋书·经籍志》有总序一篇，四部各有大序一篇，道佛录也各有大序一篇，分类小序有四十篇，全书序文共四十七篇。《隋书·经籍志》各序在志中的位置与《汉书·艺文志》相同。但以上二志序文的排列位置与《四库总目》不同，《四库总目》的大序是在各部之首，小序也放在各类书目的前边。

类序书目是充分利用小序这一目录体式，来"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从而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这种体裁的特点是能够详细阐明古今各派各家的学术隆替及其得失，在叙述学术发展史方面贡献较大。它让读者在接触书籍之前，先对这一派学术的发展得到一个概貌，了解这类书籍的性质和师承，便于进一步掌握书籍的内容。

古代目录学家对于类序书目是很推崇的。清代学者章学诚说："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史

足矣……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这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校雠通义·互著篇》)他认为只有通过小序博通古今学术，审辨源流得失，才能达到目录书的目的；如果只是排列书名，那是刀笔小吏都能干的事，谈不上作学问了。当然，他这种说法一概否定了登记目录的作用，也未免有偏颇之处。

(三)解题目录

解题目录就是余先生所说的，部类之下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这种体裁的目录有宋代官修《崇文总目》，还有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代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等。解题目录充分利用解题内容对书籍进行较全面的论述和正误，由于解题的篇幅较大，因而能对书籍的有关情况作比较详细的介绍和评论，对于读者的帮助也就更为显著。

解题形式有叙录、传录、辑录三种类型，所以解题目录的形式也有所不同。正如我们前边所讲过的，《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的解题形式就与《文献通考·经籍考》不一样。另外还要指出的是，明清两代许多学者和藏书家，自己编写目录，不少目录有解题内容，但没有小序，这些目录也应该属于解题目录的范围。如明代高儒的《百川书志》，清代钱曾的《读书敏求记》，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瞿镛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杨绍和的《楹书偶录》，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志》，丁丙的《善本书室藏书志》等。

解题目录中解题内容的范围也不是整齐划一的。我们前边在讲解题体制时，说到解题内容大致包括六个方面，但是这六个方面并不是每部解题目录或每篇解题内容都能面面俱到。应该说，《四库全书总目》是一部体例严谨、完备，内容丰富的解题目录，它的解题大部分能顾及有关书籍情况的各个方面，而其它解题目录就很

少能这样了。如宋代的《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这两部目录的解题，各篇内容则有所侧重，或叙作者生平，或论书中要旨，或评学派渊源，或表篇章之次第，并不面面俱到。

有的解题目录专重于书籍版本的鉴别审定，所以它的解题就以有关版本的情况作为重点，专门叙述书籍的刊刻源流、流传过程、藏家情况及评介各种版本的优劣等等。清代官修两部目录：一部是《四库全书总目》，另一部是《天禄琳琅书目》。后者也是解题目录，但它的解题重点在于各书版本，详细叙述各书的刊刻年月，收藏家的题识印记，并一一考其时代、爵里，叙述该书的授受源流。清代私家编写的一些解题目录，如《读书敏求记》、《楹书偶录》以及黄丕烈的《百宋一廛书录》，也是以评介书籍版本为主的。

解题目录历来为治学者所推重，因为它的解题内容确实在读书治学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汪辟疆先生在分析这种体裁的目录时说："彼其所以津逮后学，启发群蒙者，为用至宏。肩斯任者，然非殚见洽闻、疏通救远之儒，不足以膺此大业。故提要钩玄之目录，乃最切实用之目录。"（《目录学研究》）应该指出，解题目录在揭示书籍主旨和用途、指示读书门径方面较大地提高了目录学的地位，对其他学本领域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是值得重视的。但并不是所有的解题目录都作得好，有些目录的解题只是拼凑面成，作者没有突出的见解，甚至有些错误，这就起不到好的效果。

登记目录、类序书目、解题目录三种不同的体裁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无需论其短长，分其高下。因为问题关键在于编制者的本平，而不在编写体裁如何。过去有人认为三种体裁应以解题目录为最上，诚然这种体裁的目录对于初学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如果撰写解题者识见不深，那么体裁虽好也收效甚微。如果解题中有了错误，便是无利面有弊了。又如登记目录，有人"薄其浑漫，视为无足重轻"，但如果这种目录出于通人之手，则"分门别类，秩然不紊，亦足以考镜源流，示初学以读书门径"。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功用非浅，

就是一个明证。宋代学者郑樵曰:"类例既分,学术自明。"(《通志·校雠略》)他认为北宋官修《崇文总目》的小序与解题是"文繁无用",于是南宋时便有人将《崇文总目》的类序、解题全部删除。以上叙列表明,历代目录学者对于各类体裁的优劣并无定论。我们在利用古籍目录时,固然以解题目录较为方便,但主要地还应注重目录的著录内容,不应偏重于形式。同时,也要注意利用不同体裁的目录参稽互订。

二、利用其它文体形成的目录书

前文所述三种目录都属于传统的目录体裁。随着古代目录学的发展,清代出现了一些特殊体裁的目录书。这些目录书不属于传统的目录形式,而是利用其它文体编制而成的。主要有两种,一种可称为题跋集目录,一种可称为读书记目录。下而简要地介绍这两种特殊体裁的目录:

(一)题跋集目录

题跋是指写在书前的题识和写在书后的跋语。清代有不少学者、藏书家,他们既富藏书又有学识,往往在阅读和收藏古籍之后,写下题跋,对书籍的要旨及各方情况进行综述和评论。很多题跋的学术价值很高,将这些题跋汇成集子,就是一部水平较高的目录著作,因此,可将这种目录书称为题跋集目录。

清代的题跋集目录数量不少,主要有吴寿旸《拜经楼藏书题跋记》,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尾》,瞿中溶《古泉山馆题跋》,顾广圻《思适斋书跋》等。其中最著名的又数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这里可以通过对《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的分析,了解一般题跋集目录的特点。

《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是清人潘祖荫将黄丕烈平时所作的藏书题跋汇集而成的题跋集,全书分六卷,经史子集四部,所跋书籍三百四十一种。每篇题跋之前标有书名、卷数及黄丕烈所收藏的版

本，如"周礼二卷，残蜀大字本"，"史载之方二卷，宋本"等等。题跋的内容涉及面广，记述极为丰富。跋文除详述书林的要旨、目录、版本外，还记载了书籍的授受流传，书的趣闻佚事。其中对于书籍的避讳、板式、书口、纸张、字体、木记、行款、字数等记述非常详细，有关目录、版本、校勘知识的阐述学术价值很高。由于黄丕烈是清乾嘉时期著名的藏书家和目录版本学家，他的藏书多是宋元刻本和精校、精钞，所以他的题跋集中对于古籍善本的分析，在版本学的研究上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很受当时学界的重视。他在《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外的大量题跋，后来也被人收入《荛圃藏书题识》和《续录》之中。

（二）读书记目录

读书记目录一般出自学者的读书札记。这些学者并非从登录藏书入手编制目录，而是致力于学术研究，随着读书、考订，写成读书札记，以表达个人的心得与见解。这样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便成为有相当学术水平的目录学专著。清代读书记目录较著名的有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朱绪曾的《开有益斋读书记》、洪颐煊的《读书丛录》，卢文弨的《钟山札记》、《龙城札记》、孙星衍的《阅字堂集》等。其中又以《郑堂读书记》和《越缦堂读书记》水平更高。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七十一卷，是后人据他数十年读书所记的百余册读书札记刊刻而成。他的读书记体例仿照《四库总目》，分经、史、子、集四部，部之下又分四十一小类。不过小类的分类和前后排列与《总目》有所不同，这也体现了他个人对目录分类的新见解。每篇读书记首先序列书名、卷数、所读书籍版本、撰者的年代、姓名。如曰："春秋左传注疏六十卷，武英殿刊，十三经注疏本，晋·杜预注。"

其读书札记内容也仿照《四库总目》提要的体例，考辨各书的版本、真伪、评论内容与价值，对书的撰者、书的流传分合也常有论

列。全书共论述古籍四千多种，其中不少书籍是《四库总目》未收或在《四库全书总目》之后新出的。因此《郑堂读书记》被当时的学术界誉为《总目》的续编。《郑堂读书记》除了吴兴刘承幹刊刻的二函七十一卷本外，还有1959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上、中、下三册排印本。这个本子不仅阅读方便，而且还增加了《补逸》三十卷，这三十卷辑自上海李氏慈云楼藏书稿本，是周中孚零散的读书笔记，因此，商务的排印本还是一个最完整的版本。

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也是被学林所推重的读书记目录。李慈铭出身于清末"名门世族"，长于诗文，精通各种学问。他从二十岁起开始写日记，直到晚年，持续三十多年，积下六十四本《越缦堂日记》。他的日记有两方面内容，一是记所见所闻，一是记读书心得。其中论及学术的读书心得是日记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于是后人将这部分内容从日记中摘出编成《越缦堂读书记》一书。该书论述各类书籍一千余种，1959年由商务印书馆按照新的分类法将各篇读书札记进行分类排列，校订标点排印出版，共上下二册。每篇读书札记之前都标明书名、卷数、版本。其内容非常广泛，除评介书籍的作者、流传、篇目外，更多的是进行一些学术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往往有新的创见。例如，他虽然也偏爱汉学，喜欢考据，但他客观地评论乾嘉以后汉学"皆博而失之琐，密而失之晦"(《越缦堂读书记》761页，《戴氏遗书》条)，认为当时考据的通病在于"爱博之过，往往以多为贵，不肯割弃，有宁令人讥其杂，不可令人议其陋者。"(《越缦堂读书记》20页，《孔子集语》条)他对一些典籍，也多所订证，如读两唐书时发现《旧唐书·长孙无忌传》中称贞观十七年图形二十四人于凌烟阁，但书中只记二十三人，漏记高士廉；其中的柴绍，《新唐书》误作许绍，他又据《小学绀珠》、《通鉴》加以订正。

综上所述，题跋集目录和读书记目录丰富了古籍目录的体裁和形式，为古代目录学增添了内容，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是古

籍目录学研究中值得重视的目录资料。

第三节　古籍分类法的演变

图书的分类，古称“类例”。当前图书目录的编排，有几种不同的方法，如分类编排，主题编排，编年编排，地区编排，字顺编排等等。古代目录基本上采用的是分类编排法。分类编排是根据古籍所反映的知识内容和特点，分门别类地组成一个有逻辑联系的体系。它将一个学科内容的古籍集中在一起，使学科性质相近的古籍排在相近的位置，从而有利于系统地揭示书籍中本质的属性和内容上相互关系。在古代目录工作中，分类和目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古人是通过学术分类掌握书籍、编制目录的。古代目录学家非常重视目录的分类，南宋的郑樵将目录的分类比作运兵的兵法，他说：“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九流百家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又说：“类书如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通志·校雠略》）目录分类是古籍目录的纲系，有了分类，目录便有了条理，没有分类，目录就成了一堆杂乱无章的书目，无从区别和检用。近代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将目录分类称为“网之纲、裘之领”，纲举目张，穿衣提领。因此，我们只有了解和掌握古籍的分类，及其历代演变，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掌握古籍目录。

一、古籍分类的起源

我国古代很早就将分类思想运用于学术分类和书籍分类上。三千年前，我国就有了记录文字的简册，到周朝时典籍逐渐增多，简册又十分笨重，因而统治者设官分守掌管，《周礼·天官冢宰》记载了各种职官分掌各种书籍的情况，如“太史掌建邦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外史掌五令”。清代

学者章学诚指出："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校雠通义》）也就是说，分官执掌各守其书，实际上当时书籍就有了分类。当然，这些分类跟后来的书籍分类是大不相同的。当时还没能从学术上去考虑分类，只能从国家建设的实际应用出发，去分别使用典籍。所以，这只是图书分类的萌芽。

春秋时期，政治、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学术思想日益活跃。古代学者越来越注意用分类思想观察自然，考察社会。《周易·系辞》说："方以类繁，物以群分。"《周易·象辞》说："君子以族辨物。"此期形成的我国最早的文献汇编《尚书》，已有典、谟、训、诰、誓、命等不同文献的类别。典是经典，专记上古一些受人尊敬的君王的言论；谟是谋议，记录统治者讨论政治的谈话；训是教训，记上层人物之间互相教训规劝的言论；诰是告谕，统治者对下级的指示，对臣民的讲话；誓是誓词，出兵征战或交战前的誓师词；命是嘉奖令，君主赏赐或奖励某个臣子的命令。《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史倚相读过《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典籍。汉孔安国《尚书序》说，《三坟》乃三皇之书，《五典》乃五帝之书，《八索》乃八卦之义，《九丘》乃九州之志。这些典籍的名称，也近似一种书籍的分类。《左传》鲁哀公三年又记载，宫内失火，抢救藏书时按"御书"、"礼书"等分别救出，可见其时公府藏书已有分类。孔子对弟子授业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这就是一种学术分类。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学术分类之说各趋完备。墨子就曾把当时的学术分为儒、墨、杨三家，认为："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墨子·尽心》）庄子则分天下学术为七派，在《庄子·天下篇》中述其要旨，评其得失。荀子分学术百家为六派，并指出儒家又分三支（《荀子·非十二子》）。而韩非则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韩非子·显学》）这都说明了当时的学术分类，并且在大类之下还有小类的分别。此外，当时在伦理道德、习俗、教育、典籍等社会生活方面的分类，也对后来的书籍分类思想有很大的

影响。例如道德伦理方面，《周礼·地官·司徒》记载大司徒教民的行为标准有"六行"：孝、友、睦、姻、任、恤。道德标准有"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婚姻习俗方面，《礼记·昏礼》记载古代婚嫁过程有纳采（送礼求婚）、问名（询问名字和生日）、纳吉（卜吉订婚）、纳征（送聘礼）、请期（议定婚期）、亲迎（新郎迎亲）等"六礼"。学校教育方面，《周礼·地官司徒·保氏》规定学校教育内容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典制方面，《周礼·天官·太宰》记"太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分为：治典、教典、礼典、刑典、政典、事典。典籍方面，孔子删定古代书籍为"六艺"，即后来的"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此外，还有其它分类，不胜枚举，但总的来说，以六分较为突出。为什么偏爱六分呢？因为古人认为"六"代表"六合"，即东西南北和天地，所以"六"是包罗万象的。这些"六"的分类，对后来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分类目录——《七略》的分类方法，影响很深。

西汉初，对于战乱散失的书籍文献进行收集，并作了初步的整理，"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是西汉初创时期，从国家建设急需的典籍着手，进行的图书分类整理。此后，又有司马谈对于先秦诸子学说的分类和论述，他在《论六家之要指》中，将先秦学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并评论各派的优劣，指出各学派的实际价值。《论六家要指》的思想，推动了先秦学术分类的提高和发展。

先秦，汉初分类思想在学术、典籍及其它领域的运用，为书籍分类目录比较顺利地诞生奠定了基础。

二、古籍分类目录的产生及演变

（一）古籍分类的"六分法"

西汉时期，经过汉初、汉武帝和汉成帝几次全国性大规模的求书活动，使得书籍日益增多，书籍堆藏混乱，无法使用。虽然汉武帝

时，军政杨仆曾“纪奏兵录”，但那只是从大批典籍中整理出一部分兵书，编出单科的兵书目录，其它书籍仍然亟待整理归类。于是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 26 年），便组织了一些学有专长的人分门别类进行校对整理，如叫精通经传诗文的刘向校六艺、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御医李柱国校方技。他们是按学术性质分工为六个整理小组进行工作的，这种分工实际上已把学术分类的精神融贯到图书分类之中，于是也就有了比较明确的古籍“六分法”。此外，这种“六分”的意义也与先秦的分类思想有着密切联系。

刘向等人将书校完之后，又由刘向给每书作一篇“叙录”，送给皇帝阅读。刘向为校书和“叙录”辛勤工作近二十年，后来，他把这些“叙录”汇编成一部书，称为《别录》，就是“别集众录”的意思。它是当时皇家图书馆藏书的书目提要汇编，是关于上古到西汉时期我国书籍文化遗产的总结。

刘向死后，他的儿子刘歆继承父业，在《别录》的基础上，按书的性质，依次序先后，用比较短的时间，在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 6 年）撰成了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分类目录——《七略》。它比欧洲第一个正式的图书分类表——1545 年瑞士人吉士纳的《万象图书分类法》早 1500 余年。《七略》的分类依据刘向他们整理书籍时的分工，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等六大类。而以“辑略”总冠全书。由于“辑略”是刘歆写在其它六略之前的一篇学术简史，总括先秦、西汉各类学术思想的源流演变，而不是另有一类书籍，所以《七略》实际上只有六大类，这就是古籍分类的“六分法”。有人因《七略》之名而称之为七分，这是一种误解。可惜《别录》、《七略》这两部目录在唐以后散逸了，不可能对其具体情况有更详尽的了解。不过，由于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删抄《七略》而成，故仍可从《汉书・艺文志》中看到《七略》六分古籍的情况。据《汉书・艺文志》所载，其类目如下：

六艺略

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诸子略

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

诗赋略

赋一、赋二、赋三、杂赋、歌诗。

兵书略

权谋、形势、阴阳、技巧。

术数略

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

方技略

医经、经方、房中、神仙。

以上分六大类，三十八小类，可见当时的图书分类是相当完备的。

六大类的第一大类是六艺。这是符合当时封建统治者的意志的，因为自从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以后，儒家在政治上排斥了诸子百家而定于一尊，儒家的经典从这时起被安排在最突出的地位，不但在学术上，而且在政治上都要作为首要的文献。“六艺略”中，除了孔子所定的“六艺”外，为何还把《论语》、《孝经》、小学也置于“六艺略”之中？清代学者王鸣盛认为：“《论语》、《孝经》皆记夫子之言，宜附于经，而其文简易，可启童蒙，故虽别为两门，其实与文字同为小学。小学者，经之始基，故附经也。”（王鸣盛《蛾术篇》卷一）

第二大类是诸子。西汉离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很近，诸子百家的学问有丰富的遗产留传下来，这就是所谓“九流十家”。儒家等前八家都是有关思想认识的一些学派，因此举凡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法律思想、文化思想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中国的封建社会是重农抑商的，粮食问题是封建统治阶级比较重视的问题，

所以将关于农业的书籍提在第九位。第十位的小说，因为刚刚开始萌芽，所记的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还不是一种接近成熟的文学体裁，所以被安排在诸子之末。

第三大类是诗赋，即当时的文学类。赋是从诗演变出来的。“汉赋”是汉朝一种特殊发达的文学体裁。吸取了《楚辞》的词藻、荀卿《赋篇》的形体、纵横家铺张的手法而形成。分小赋和大赋。小赋多为抒情作品，大赋多描写宫观庭园的繁华和京都的富丽堂皇。

第四大类是兵书，相当于军事类。古代帝国攻城掠地、改朝换代，靠的多是军事和武力，因此自古以来的军事问题，都是君王较为重视的问题。在《七略》编撰之前，已先后派人专门整理兵书，编制目录。如汉初，韩信序次兵法；汉武帝时，军政杨仆编次《兵录》。此后，又有一大批军事家、理论家进行研究，著述很多，从数量看，当时的兵书已有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因而兵书独自成为一大类。

第五大类是术数。这一类包括数学、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的一些书籍。其次又包括占卦、星相等一些封建迷信的图书。这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也反映出科学与迷信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联系的关系。

第六大类是方技。这一类是医药卫生与巫术的混合体。医字的早期繁体字为“毉”，这多少反映了古代医术与巫术并行的实际情况。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荣华富贵最好是长期享受，生病需要医药医治，如果能有长生不老的办法，那就更好了。因此皇家图书馆中也收藏有“神仙”一类的图书。这类图书虽然有其“仙道”方面的迷信色彩，但实际上是一些讲究养生锻炼的书籍，还是有科学价值的。

诚然，《七略》的分类法在今天看来，还有些不够精密准确，但它基本能够按照当时学术发展情况和图书内容性质进行分类，已经很了不起了。它的分类方法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首先继承这种

古籍六分法的是东汉班固所作的《汉书·艺文志》。他在改编《七略》入《汉书》为《艺文志》时，除将《辑略》分散在其他各类之下，作为其它六类书籍的类序外，六略大部和小类的区分，是完全仿照《七略》编排的。

(二)“四部”分类法的诞生

东汉末年，由于军阀割据连年不断地发生战争，不但使东汉统治者的力量削弱，而且使人民蒙受了深重的苦难，终于引发了黄巾起义。自此之后，统一政权大为削弱，全国陷入混战的局面，经过三国的纷争，到晋武帝时才得到暂时的统一。在这段动乱的时期中，社会文化的发展受到一定的打击，原有的书籍遭到战争的损害，战乱也使得许多学者和专门家无心著述。所以有些书籍如术数、方技等相对减少了。另外，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诸子百家之学萧条沦落，这类书籍由于流传中的自然损害，也相对地减少了。但是，另一方面，继司马迁的《史记》之后，西汉、魏晋期间，史学著作逐渐增多了。由于经过汉魏之际的动乱，书籍有了聚散的经历，需要重加整理、编目。书籍的状况发生了变化，有些类别的书籍增多了，有些类别的书籍减少了，因此，目录学家在编制目录时，需要根据当时图书的保存情况对图书的分类调整和变动。以上的情况，导致了古籍“四部”分类法的诞生。这正如余嘉锡先生所说的：“书之有部类，犹兵之有师旅也。虽其多寡不能如卒伍之整齐划一，而要不能大相悬绝，故于可分者分之，可合者合之。《七略》之变为四部，大率因此。”(《目录学发微·目录类例之沿革》)

古籍的“四部”分类法首先表现在三国曹魏郑默的《中经》和晋代荀勗所编的《中经新簿》上。《隋书·经籍志序》说：“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勗，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由于郑默《中经》亡佚甚早，后世文献没有更多的记载确认其以四部分类；但《隋书·经籍志》将《中经》与《中经新簿》并列，又提到两者的承继

关系，所以可以认为四分法是由魏郑默开其端，晋荀勖毕其功。荀勖是西晋武帝时的秘书监，他根据三国时魏国秘书郎郑默所编的国家藏书目录《中经》，编写了《中经新簿》，这部目录标志着"四部"分类法的诞生。《中经新簿》把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部。甲部包括六艺和小学；乙部包括诸子、兵书和术数，余嘉锡先生认为，《七略》中的方技，在此已统入术数之中(《目录学发微·目录类之沿革》)；丙部包括史记、旧事、皇览簿和杂事；丁部包括诗赋、图赞和汲冢书。另外，还将佛经书籍附录在后。

应该指出的是，荀勖所编的四部分类法，特别是丙部一类，完全是适应新学术、新图书不断出现的要求，它给以后的图书分类法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所谓"汲冢书"是指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在汲郡发掘了战国魏襄王墓，从中所得的书简。有数十车，大约七十五篇，书简上漆书蝌蚪文。由于这批竹简书包括四部内容，又以蝌蚪文书写，所以没有分散入各部中，而单独归入丁部，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西晋末年，又生战乱，我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西晋皇室收藏的图书大批散亡，荀勖时著录的 29945 卷书籍到东晋时只存 3014 卷。东晋初年，又重新收集图书，命著作郎李充整理藏书，编制书目。他主持编定的《晋元帝四部书目》，基本上根据荀勖《中经新簿》的"四部"分类法类分图书，但是他作了一个重要的改动，就是把原来乙、丙两部内容互调了一下，即是：经书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等为丙部，诗赋为丁部。这就奠定了"四部"分类法的次序。《隋书·经籍志》云"秘阁以为永制"，就是说此后的国家藏书目录基本上是以这样的"四部"分类方法和次序来著录图书的。东晋李充的四部分类最后规定了"四部"分类法的次序，至此，"四部"分类法完成了其产生的全进程。这个过程可以说是由郑默创始，由荀勖建立，最后由李充确定的。"四部"分类法确定后，史书上升为乙部，这说明当时史学著作数量和地位的提高。也说明统治者对史书进

一步的重视，因为史书可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统治者提供历史经验。

(三)“四分”、“五分”、“七分”三法并行

荀勗、李充制定的“四部”分类法，成为后来官府书目的分类规制，因此《隋书·经籍志》说：“自尔因循，无所变革。”南朝宋、齐、梁、陈的国家藏书目，都是以“四部”分类的。直到隋朝开皇四年所编的《四部目录》，隋炀帝时所编的《大业正御书目》等许多目录书都采用了四分法来编目。

学者私撰的目录书，则不拘泥于四部分类，他们在原有的“六分”和“四分”的基础上，作了一些改动，形成一些新的分类体系，主要的有五分法和七分法。五分法出现于梁朝祖暅编撰的《五部目录》，从分类看是五部，实际上是对四分法稍作改造，在四部之外增加“术数”一部而已。《隋书·经籍志》说：“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这可能与祖暅是一位天文历法学家有关，因此对“术数”一类书籍较感兴趣，而特立一门。这种五分法后世并无仿行者，影响不大。

七分法是《七略》、《汉书·艺文志》六分法改进的结果。由刘宋王俭的《七志》创始。《七志》分为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诸子志：纪古今诸子；文翰志：纪诗赋；军书志：纪兵书；阴阳志：纪阴阳、图纬；术艺志：纪方技；图谱志：纪地域及图册。后又附道经录、佛经录二种。

《七志》与《七略》的分类体系大致相同，只是将类名更改而已。例如：经典志即《七略》的六艺略，诸子志即诸子略，文翰志即诗赋略，军书志即兵书略，阴阳志即术数略，术艺志即方技略。但也有不同的地方，这就是《七略》实际上只有六分，而王俭则对六分法加以改进，增加了“图谱”一志，专收记地理方面的书籍和图谱，以成七类。另外，还附加了佛教书籍和道教书籍，这也是从图书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因为东汉以后，佛教传入中国，道教也逐步兴盛，佛、道

两类书籍逐渐增多，因此，附加这两类书籍的目录是很必要的。此外，在类名的设立上，王俭也更改了《七略》一些类名，使之更符合于图书情况，这些类名有的被后来的《七录》所继承。阮孝绪在《七录序》说："王以'六艺'之称，不足标榜经目，改为'经典'，今则从之。"

继《七志》之后不久，梁朝阮孝绪又撰《七录》。他在编制《七录》时，一方面参考刘歆的《七略》和王俭的《七志》，另一方面则根据当时的学术情况和图书情况，对书籍的分类体系作了大胆的改动，《七录》与《七志》一样，已经亡佚，但是在《广弘明集》中，保存了一篇《七录》的自序，我们可以从中较详细地了解它的分类和细目。《七录》分内外篇，内篇是：

经典录　易、尚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记传录　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

子兵录　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家。

文集录　楚辞、别集、总集、杂文。

术技录　天文、谶纬、历算、五行、卜筮、杂占、形法、医经、经方、杂艺。

又有外篇，外篇分：

佛法录　戒律、禅定、智慧、疑似、论记。

仙道录　经戒、服饵、房中、符图。

全书共分七大类、五十五小类。

《七录》的分类体系，虽然也是采用七分法，但是相对王俭的《七志》来说，是有所进步的。例如，它将史传独立为一录，使史书在七分法之中正式成为一个部类，位于经典之后。这是符合当时史书大量存在的实际情况的。文集类在前人的分类目录中，有的称诗赋，有的称文翰，《七录》定为文集，于是后来的分类目录都采取了这个类名。又如，将军书志仍改为兵书，与诸子合并为子兵录；将图

谱拆开，分入有关各类，都比较合理。同时将佛教、道教典籍正式纳入分类目录中，而不作为附录，又比王俭《七志》增收道经入附录更进一步。

隋朝许善心所作的《七林》，也是采用七分法分类。《隋书·许善心传》称许善心"仿阮氏《七录》，更制《七林》"。由于该书早已散失，又无其它记载，所以其具体分类体系，已无从考查。

（四）"四部"分类法的主导地位

"四部"分类法从魏晋创始以来，得到比较广泛的流传，刚开始只有"甲、乙、丙、丁"来分称四部，后来各部有了专门的名称，甲部称经部、乙部称史部，丙部称子部，丁部称集部。据史书记载，梁元帝时，颜之推等人奉命分校经、史、子、集四部书（《北齐书·颜之推传》记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此后，经史子集的概念便渐渐被人们所使用。至唐初官修《隋书·经籍志》时，就用经、史、子、集正式标目来代替甲、乙、丙、丁了。前边已经讲过，东晋以后，四部分类成为官修目录的一种定规，宋、齐、梁、陈、隋五代出现过许多四部分类的目录。到了唐初，四部分类目录的水平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这就是官修《隋书·经籍志》的出现。《隋书·经籍志》分经、史、子、集四部，经部分 10 小类，史部分 13 小类，子部分 14 小类，集部分 3 个小类，共 40 个小类。此外，还有"道经"和"佛经"两个附录。

《隋书·经籍志》的"四部"分类法虽然是继承荀勖、李充的四分法，但是却比原来的四分法要进步得多。首先，荀、李的四分法无明确的名称，用甲、乙、丙、丁只是表示部分的次序，不能表示部次的内容。其次，荀、李的四分法在大部之下的范围并不明确，荀勖《中经新簿》虽在大部之下有若干范围，如丙部之下列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但过于简略，而且皇览簿本属类书，也不宜与史书并列。到了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甚至"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阮孝绪《七录序》），更为疏略。而《隋志》则参考采取了《七略》、《汉志》、《七录》在大类之下分列小类的遗规，在四部之下分出

四十个小类。这四十个小类的类目，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七略》、《汉志》的三十八小类、《七录》的五十五小类为依据的。因此，《隋志》名为四分法，实际上是总括六分、四分、七分诸家的成就，演变发展、推衍而成的新四分法。《隋志》的四部分类是四分法的一个进步，从荀勗的《中经新簿》到《隋志》，中间相距约三百年，是"四部"分类法从创立到提高发展的时期。由于魏晋时期的四部分类书目久已亡佚，所以《隋志》便成为现存最早的四部分类目录。从流传至今的古籍目录书来看，它仅次于《汉志》，是我国现存第二部最古老的综合目录，它对后世古籍目录书的编制有着重要的影响。

唐宋以来，《隋志》的分类编目体系一直被重视和沿用。如两唐书、《宋史》、《明史》中的经籍志、艺文志，此外，一些私撰目录也都采用了这种分类方法，如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当然，在沿用中也有改造和发展。例如，《隋书·经籍志》只是将"佛经"、"道经"作为附录，而没有纳入四部之内，北宋编撰的国家书目《崇文总目》把"道经"和"佛经"编入四部分类系统的"子部"，从而使四部分类法更加完整与合理。《崇文总目》的这个改进，为后来的四部分类目录所确认和继承。

四部分类法最后的一次改进和完备，是在清代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95）编写《四库全书总目》时完成的。《四库全书总目》进一步发展、确定了"四部"分类法，在经、史、子、集四部之下，经部分十类，史部分十五类，子部分十四类，集部分五类。共四十四小类，有些类又分出了若干子目。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四库分类法"。至此，"四部"分类法发展到最高点，稳固下来了。

综观中国古代的古籍目录，"四部"分类法是占主导地位的，因此，有必要通过四部分类法对中国古籍高度的知识概括，了解各部古籍的范围和源流。

经部：

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经典，在儒学产生的春秋战国时期，政

治上诸侯争霸，学术上百家争鸣，没有一种学说能够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西汉武帝时，中央集权统治不断加强，董仲舒为了适应当时统一思想的需要，向汉武帝提出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要求，得到汉武帝的采纳，从而奠定了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局面。西汉刘歆的《七略》以“六艺略”著录儒学经典，列于首位，南朝王俭以为“六艺”尚不能标榜经目，于是《七志》改称“经典”，以“经典志”收录儒学经典。四部分类法的经部也不例外，以儒家典籍独立一部，并放在首要位置，既符合统治者的需要，也符合古代典籍中存在大量经学典籍的实际状况。

经部典籍是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逐步扩大范围，推衍生长的。在漫长的封建时代里，孔子学说多面性的特点，使儒家学说能够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兼容并蓄，发展变化。比如，孔子删诗书时，定了六经，秦火之后，《乐经》亡逸，汉武帝时，官学只设《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唐代又把一些“传”、“记”也逐渐升格为正经，加《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共称九经。到了宋代，又加《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合称十三经。经部著作的核心《十三经注疏》是发展到宋代才最后完成的。它包括以下著作：

《周易正义》十卷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
　　　　　　　　　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二十卷　汉孔安国传
　　　　　　　　　　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七十卷　汉毛亨传、郑玄笺
　　　　　　　　　　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四十二卷　汉郑玄注
　　　　　　　　　　　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五十卷　汉郑玄注
　　　　　　　　　　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六十三卷　汉郑玄注

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　晋杜预集解

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　汉何休解诂

唐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注疏》二十卷　晋范宁集解

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二十卷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九卷　唐李隆基注

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十四卷　汉赵岐注

宋孙奭疏

《尔雅注疏》十卷　晋郭璞注

宋邢昺疏

经部典籍除包括各经正文、注疏、正义外，还包括其它对儒家经典的研究著作，也即经学著作。经学在我国学术思想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汉代的经学分古文经学派和今文经学派。西汉盛行的今文经，经文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文字书写，这个学派主张根据经文阐述微言大义；而东汉盛行的古文经，经文是用籀文书写的，这个学派主要是解释经文字义和考证名物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因受清谈和佛教的影响，盛行登坛讲经，于是讲疏、讲义和义疏一类著作增多。魏晋之后，随着音韵学的发展，对经文音注的著述大量增加。唐代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统治，唐太宗诏令孔颖达等人撰定五经义疏，定名为《五经正义》，使经书注解趋于统一。北宋仁宗之后，经学学者抛弃了汉唐旧说，自创新注，阐发义理，形成了新的儒学学派——宋学。朱熹的《四书集注》对《论语》、《孟子》、《大学》、《中

庸》进行集注和章句，在当时和后代都极有影响。明代理学是在宋学基础上的发展，一直延续到清初。在清代乾隆、嘉庆时，考据学兴盛，以恢复汉学为目的，推动了经学考证的进展，对儒学经典作了大量的疏证和辨伪工作，使经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经部著作是封建文化的主体，其中有不少糟粕，但也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材料。经书正文为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哲学、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而历代学者对经书的研究、注疏，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想、状况及学术文化，许多注疏著作对于研究古代典章制度、地理、名物都有珍贵的学术价值。此外，归于经部的小学、训诂、韵书等著作，则是古代文字学、音韵学的重要文献。

史部：

指史学著作。我国自古便有修史传统，史学文献源远流长。先秦时期，史籍与经书界限不清，史学著作尚未从经书中分离出来，因此刘歆《七略》未将史书独立部类。汉武帝时司马迁编撰了史学巨著《史记》。在《史记》影响下，大批史籍问世，到曹魏郑默的《中经》、西晋荀勗的《中经新簿》两部书目，开始为史书独立部类，确立了史书在古代典籍中应有的地位。此后，又经阮孝绪《七录》的"记传录"，《隋书·经籍志》的史部对史籍爬梳清理、条分缕析，从而奠定了史部文献源流类别的基础。清代《四库总目》史部则对古代重要史籍，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总结。

古代史籍的发展特点：一是历史悠久，从史籍萌芽状态的商代算起，古代史籍的发展历史有三千年之久；从《尚书》算起，也有二千四百年的历史。二是史官记事制度完备，史书产生于史官制度，这种制度一直存在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据《周礼》记载，周代史官可分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各司其职。到了唐代以后，国家设立史馆，国史院，直到清代沿循不改。第三个特点是史体的多样性，清代以前，古代史书体裁既有延续，又有创新变革，长期以来各种体裁的不断出现，形成了各种史体并存竞争的局面。最早出现的史体

是编年体，此后相继产生了纪传体、典志体、纪事本末体、史评体、方志体、传记体、史考体、史钞体等，体裁的多样化，使史籍能从各个角度全面地记载古代历史的发展过程。

古代史籍较突出的特点是史书编纂的连续性。一些比较重要的史籍，几乎都有接续、延伸和扩展。例如，编年体史籍《春秋》撰成以后，接踵面起的有“三传”，以及其他的仿作，训释性史籍。北宋司马光撰成《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之后，形成了《通鉴》学，诸如《通鉴纲目》、《通鉴外纪》、《通鉴前编》、《续通鉴》等补作、续作、仿作，改制者接连不断。纪传体史书《史记》出现后，便不断有断代的纪传体史书接续，直到清代，形成了一套上下贯通的历史丛书，由乾隆皇帝“钦定”为“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是史部典籍的核心，它包括以下著作：

《史记》一百三十卷　汉·司马迁
《汉书》一百二十卷　汉·班固
《后汉书》一百三十卷　刘宋·范晔
《三国志》六十五卷　晋·陈寿
《晋书》一百三十卷　唐·房玄龄
《宋书》一百卷　梁·沈约
《南齐书》五十九卷　梁·萧子显
《梁书》五十六卷　唐·姚思廉
《陈书》二十六卷　唐·姚思廉
《魏书》一百三十卷　北齐·魏收
《北齐书》五十卷　唐·李百药
《周书》五十卷　唐·令狐德棻
《隋书》八十五卷　唐·魏征
《南史》八十卷　唐·李延寿
《北史》一百卷　唐·李延寿
《旧唐书》二百卷　后晋·刘昫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　宋・欧阳修

《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宋・薛居正

《新五代史》七十四卷　宋・欧阳修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　元・托托

《辽史》一百一十六卷　元・托托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　元・托托

《元史》二百一十卷　明・宋濂

《明史》三百三十二卷　清・张廷玉

典志体史书自唐朝杜佑《通典》问世后，南宋郑樵撰《通志》，元初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习惯上称为"三通"。以"三通"为基础，清乾隆时又加入官修的《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称为"九通"。1935年商务印书馆又加入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合为"十通"进行刊印，共2768卷，博贯古今，上至远古，下至清朝灭亡，成为研究古代数千年典章文物制度发展演变的系统文献。除此之外，例如纪事本末体史书，在南宋袁枢编写《通鉴纪事本末》之后，也有近十种纪事本末体史书前后接续，自成系列。

史部典籍中，蕴藏着大量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地理、典章制度的历史资料，是我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子部：

"子"是古代男子的尊称或师称，先秦的著作，大多以"子"标名，如《荀子》、《韩非子》等，子部中的"子"起初是指思想家的著作或对思想家思想的记录。刘歆《七略》中的"诸子略"是以先秦各派学说思想体系为主的"九流十家"组成。西晋荀勗的《中经新簿》乙部，已将诸子书、兵书、术数归为一部，初步形成了四部分类中子部书的规模。至《隋书・经籍志》，便把《七略》中的"诸子略"、"术数略"、"兵书略"、"方技略"的内容合并为"子部"，奠定了分类中子部的基本范围。从北宋官修《崇文总目》在子部中纳入佛经、道藏以

后，子部的收录范围便再无大的改动，只是《四库总目》的子部的小类设立显得更为复杂而已。从四部分类法子部的发展过程来看，是以先秦诸子书为核心，随着学术的不断发展和引申，门类的逐步增并而最后形成的。四部之中，子部书最为庞杂，究其原因，大概因为最初的诸子书也是总合各派学说而成，具有"杂"的特点，因此，以后但凡经、史、文学之外的学科，都由子部兼容并蓄，统而辖之。

子部书涉及现代科学的哲学、军事、医学、科技、宗教、艺术、农、工、商等内容。先秦两汉的诸子书，主要是儒家、墨家、道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杂家等学术流派的著作，这些著作以阐发哲学思想为主，但也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文化等方面的论述。古代的子部典籍中还保存了大量科技资料和史料，以天文算法、农家、医家三类书为多，对于研究我国科技发展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医学类典籍，对于继承和发展传统的中医学，目前仍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子部中的宗教典籍，以论述佛教、道教的著作为主。虽不录佛经、道藏，但反映了佛道经典的大体状况。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之后，出现和逐步积累了大批佛经译本，总计汉译佛经有 1692 部，共 6241 卷。此外，还有由中国学者撰述的佛经续藏 5600 卷。目前我国保存的汉文大藏经有宋、辽、金、明、清等几个朝代的刻本，此外，还有一批敦煌石窟保留的魏、晋、隋、唐人手抄经卷。道教也兴起于东汉时期，早期道藏经典是东汉张道陵的《太平洞极经》一百四十四卷和于吉的《太平青领书》一百七十卷。道教经典几经兴衰，元代焚毁道藏以后，明代刊行的《正统道藏》与《万历续道藏》，收道藏 1476 种，共 5485 卷，仍流传至今。佛道经典既是研究我国宗教史的重要文献，其中也包含了古代各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料。

集部：

集部典籍主要是历代学者的文学作品。集部书大多带有汇集、综合的性质，因而称"集"。个人作品的集子称别集，诸家作品的集

子称总集。集部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其最初形式是刘歆《七略》的诗赋略，但专收诗赋；南北朝时梁朝阮孝绪《七录》有文集录，收楚辞、别集、总集、杂文，分类法中文集之名，开始出现。唐代编写《隋书·经籍志》，集部的名称与收录内容，大体上承袭了《七录》文集录，只是减去杂文一类，集部的主要收录范围至此基本确定。至《四库总目》时，也只是根据后来新文体的出现，增加了词、曲等一些内容。

中华民族素以诗文著称，我国的古典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诗文并茂，各种文体百花齐放。文体的产生繁衍，有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谈到文体产生的原因时说："《六经》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也。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主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虽然他将文体的产生原因都附会于"五经"的派生，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但是他较早地对古代的文体作了各种概括。简要地说，古代文学作品可分为两大类，即韵文和散文。韵文泛指用韵的文体，如歌、辞、赋、诗、词、曲以及有韵的骈文等；凡属韵文之外，不押韵、排偶的散体文章，皆可称为散文。散文文体又有多种多样的说法，概括起来可为论辨、序跋、赠序、书启、公牍、奏议、诏令、杂记、箴铭、颂赞、传状、碑志、哀祭、祈谢等十几类。

先秦典籍，多各成专著，单篇作品主要是诗歌辞赋。汉代，文化发达，社会上流行的单篇作品越来越多，于是开始有搜集某人生平作品而编成"别集"。《隋书·经籍志》说："别集之名，盖东京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别集有他人代编，也有作者自编。此外，别集按时代先后还有前集、后集之分；按作品体裁有诗集、文集、诗文合集之分；按范围有全集、选集之分；还有内集、外集，内编、外编，正编、续编等区分。

总集出现较早，最早的总集可追溯到《诗经》，这是一部诗歌总集。总集的编集也有许多类型，可分为历代各体总集，历代分体总集，一代文总集，一代诗总集，地方总集，氏族总集，专题总集等等，不一而足。各种文体的综合性总集以西晋挚虞的《流别集》为始。南北朝时，梁昭明太子萧统编 的《文选》，上起周代，下至梁朝，全书六十卷，收入各种重要文体三十二类，作品的选择较注重文采，《文选》对后世影响很大，许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注释，形成了"文选学"。北宋初，李昉等人奉勅编集的《文苑英华》一千卷，选录梁以后文章，以续《文选》。清代学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清嘉庆时官修《全唐文》八千四百八十八卷。以上所述总集都是较有影响的。目前，四川大学古籍所编撰的《全宋文》，北京师范大学李修生教授主持的《全元文》等，在接续前人的总集工作，总结、保存古代文化遗产方面，皆具有重要意义。

集部书的数量很多，其内容也较复杂，不可将集部书单纯理解为现代的文学作品，因为古代文人学者往往同时在文、史、哲领域中研究著述，所以文集中便可能出现既有抒情的，又有论事的、记事记人的篇章。由于集部书 内容涉及面广，资料十分丰富，因此具有多种研究价值。它不仅是多姿多采的文学宝库，还可从中考证各代历史、掌故轶闻与前哲事实，了解古代的学术流别，利用其中保存的各类学术研究成果。

综上所述，大致可以了解在四部分类法概括下，我国古籍的主要构成与演变。四部分类法之所以能够战胜六分、七分法而树立一千多年的统治地位，除了它高度地概括性这一学术基础外，更主要地还是它适应了中国封建文化"讲伦理、重政治、轻自然、斥技艺"的特点。中国古代社会本来就注重"道德文章"，至唐以后兴盛的科举制度，又把检测内容主要放在儒家经典、文章词藻以及策对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方面。于是把文化的重心倾向于经典、文史方面的知识内容，而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等，常常被认为是"雕虫小

技”、“君子不齿”。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正是反映了封建文化重心的偏差，而反过来，它又以书目的作用引导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加重了这种偏差。

因此，古代有不少目录学家曾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试图从书目分类上改变这种文化偏差，他们采用了一些新的图书分类法，试图冲破四部分类的旧框框，虽然这些尝试不一定都成功，但仍是应该重视的。例如北宋仁宗皇佑元年(公元1049)，河南李淑编的《邯郸书目》十卷，除经、史、子、集四部外，又有艺术志、道书志、书志、画志，共分八部。此目见《郡斋读书志》登载，现已亡佚。这是八分法。

南宋初，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在深入研究目录学的基础上，从当时图书和学术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又提出十二分法，他的分类体系，打破旧的传统分类，不因袭旧规，在扩充了大部类的情况下，又增加了很多小类目，这样，使得各门学科的分类更趋细密和准确，他的分类体系在许多类目的创立和区分上有新的突破。他在《通志·艺文略》中将书籍分为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五行、艺术、医方、类书、文等12大类，大类之下又分82小类，小类下分442子目。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2分类中，将医学类著作单立一门，对当时医学古籍进行总结和条理，引起人们对这一学科的重视。这是十二分法。

除八分、十二分外，明朝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605)张萱等人奉命修撰《新定内阁藏书目录》，虽然是官修目录，但却打破了四部分类法的常规，将书籍分为圣制、典制、经、史、子、集、总集、类书、金石、图经、乐律、字学、理学、奏疏、传记、技艺、志录、杂部等十八部类，这是图书的十八分法。

到了清代，各种私撰目录大量出现，分类方法也各不相同，有的目录学在目录书中径直将大部类去掉，而以小类分部。如清初版本目录学家钱曾的《读书敏求记》四卷，分四十四部类；《述古堂藏书目录》四卷，分七十八部类；《也是园书目》十二卷，分为八十五部

类。《四库全书总目》颁行后，孙星衍撰写的《孙氏祠堂书目》仍然突破“四库法”，分书籍为经学、小学、诸子、天文、地理、医律、史学、金石、类书、词赋、书画、说部等十二类。

由此可见，“四部”分类法虽然在整个封建社会的书籍分类中占了主导地位，但并不能代表各种目录的分类，更不是唯一的书籍分类法。其他不同于“四部”分类的分类方法，同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值得今天学习和参考。

三、古籍目录中的小类和子目

从古代的分类目录创制开始，就有了小类的划分。小类是在一级分类即大部类之下又细分出来的二级分类。《七略》、《汉书·艺文志》在六大部类之下创立的三十八种就是小类，如《方技略》下就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小类。古代目录分类法中的子目出现较晚，子目是在二级分类之下区分出来的三级分类。例如《四库总目》经部中礼类之下，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等六子目。自《七略》以后，随着古代目录学的发展，小类及子目的区分和设立，得到不断的改进和提高，有几部目录书对于小类的处理和改进，对于子目的设立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部是《隋书·经籍志》。

《隋书·经籍志》在四部之下分四十小类，在附录的道经中又分四小类，佛经又分十一小类，《隋志》的小类有许多是继承了《七略》、《七录》的，但有一些小类则是新创立的，特别是史部的小类名目，如正史、古史、杂史，有的名称则在前目录的基础上作了重新改动，使之更加确切，也为后世所模仿沿袭。如将《七录》“记传录”中的“注历”改为“起居注”，“土地”改为“地理”等。

唐玄宗时官修的《唐六典》卷十，曾对《隋志》四十个小类的类目分别作一简要的说明，这对深入了解《隋志》四十类目的意义，了解各类所收的图书，是很有帮助的。现附录如下：

经部

1. 易:以纪阴阳变化
2. 书:以纪帝王遗范
3. 诗:以纪兴衰诵叹
4. 礼:以纪文物体制
5. 乐:以纪声容律度
6. 春秋:以纪行事褒贬
7. 孝经:以纪天地经义
8. 论语:以纪先圣微言
9. 图纬:以纪六经谶候
10. 小学:以纪字体声韵

史部

1. 正史:以纪纪传表志
2. 古史:以纪编年系事
3. 杂史:以纪异体杂记
4. 霸史:以纪伪朝国史
5. 起居注:以纪人君动止
6. 旧事:以纪朝廷政令
7. 职官:以纪班序品秩
8. 仪注:以纪吉凶行事
9. 刑法:以纪律令格式
10. 杂传:以纪先贤人物
11. 地理:以纪山川郡国
12. 谱系:以纪世族继序
13. 略录:以纪史策条目

子部

1. 儒家:以纪仁义教化
2. 道家:以纪清净无为

3. 法家：以纪刑法典制

4. 名家：以纪循名责实

5. 墨家：以纪强本节用

6. 纵横家：以纪辨说诡诈

7. 杂学：以纪兼叙众说

8. 农家：以纪播植种艺

9. 小说家：以纪刍辞舆诵

10. 兵法：以纪权谋制变

11. 天文：以纪星辰象纬

12. 历数：以纪推步气朔

13. 五行：以纪卜筮占候

14. 医方：以纪药饵针灸

集部

1. 楚辞：以纪骚人怨刺

2. 别集：以纪辞赋杂论

3. 总集：以纪类分文章

《隋志》以后，在唐开元年间毋煚撰著的《古今书录》中，出现了三级分类的现象，就是在小类之下，又细分出子目。《古今书录》已经亡佚，但它的著录内容保存在《旧唐书·经籍志》之中，从《旧唐书·经籍志》可以看到在一些小类下区分子目的情况。如：

经部

礼类——周礼、仪礼、丧服、礼论答问

小学——尔雅、广雅、偏傍音韵杂字

史部

正史——史记、前汉、后汉、魏、晋、宋、后魏、后周、隋、齐、梁、陈、北齐、都史

杂传——先贤耆旧、孝友、忠节、列藩、良史、高逸、杂传、科录、文士、仙灵、高僧、鬼神、列女

子部

医术——本草、养生、病源单方、食经、杂经方、类聚方

集部

别集——帝王、太子诸王、赵、楚、前汉、后汉、魏、蜀、吴、西晋、东晋、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周、隋、唐、沙门、妇人

以上共计62子目。子目的设立，是对小类的深入划分，这是目录分类的进步，因为它反映出编撰者对图书的进一步认识和揭示，从而使书籍能够更加准确地归属。但在当时，这种三级分类还不能在目录体系中广泛地展开。

在图书分类体系的改进上，《通志·艺文略》是值的注意的第二部目录。它冲破了四部分类的藩篱，设立十二大类。这十二大类，除保留原四部的经、史、子、集外，其他八大部是将原四部的一些小类独立出来形成大类的，如经部的礼、乐、小学，子部的天文、五行、艺术、医方、类书。这种作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使分类体系布局更为均匀，也方便在大类之下，设立更多的小类。《通志·艺文略》的分类体系如下：

经类第一

1. 易——古易、石经、章句、传、注、集、注、义疏、论说、类例、谱、考证、数、图、音、谶纬、拟易
2. 书——古文经、古经、章句、传、注、集注、义疏、问难、义训、小学、逸篇、图、音、续书、谶纬、逸书
3. 诗——石经、故训、传、注、义疏、问辨、统说、谱、名物、图、音、纬学
4. 春秋——经、五家传注、三传义疏、传论、序、条例、图、文辞、地理、世谱、卦繇、音、谶纬
5. 春秋外传国语——注解、章句、非驳、音
6. 孝经——古文、注解、义疏、音、广义、谶纬
7. 论语——古论语、正经、注解、章句、义疏、论难、辨正、名

氏谱、音释、谶纬、续语

8. 尔雅——注解、图、义、音、广雅、杂尔雅、释言、释名、方言

9. 经解——经解、谥法

礼类第二

10. 周官——传注、义疏、论难、义类、音、图

11. 仪礼——石经、注、疏、音

12. 丧服——传注、集注、义疏、记要、问难、仪注、谱、图、五服图仪

13. 礼记——大戴、小戴、义疏、书钞、评论、名数、音义、中庸、谶纬

14. 月令——古月令、续月令、时令、岁时

15. 会礼——论钞、问难、三礼、礼图

16. 仪法——礼义、吉礼、宾礼、军礼、嘉礼、封禅、汾阴、诸礼仪注、陵庙制、家礼祭仪、东宫仪注、后仪、王国州县仪注、会朝仪、耕籍仪、车服、书仪、国玺

乐类第三

17. 乐——乐书、歌辞、题解、曲簿、声调、钟磬、管弦、舞、鼓吹、琴、谶纬

小学类第四

18. 小学——小学、文字、音韵、音释、古文、法书、蕃书、神书

史类第五

19. 正史——史记、汉、后汉、三国、晋、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后周、隋、唐、通史

20. 编年——古魏史、西汉、魏吴、晋、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周附)隋、唐、五代、运历、纪录

21. 霸史——霸史上、霸史下

22. 杂史——古杂史、西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朝

23. 起居注——起居注、实录、会要

24. 故事

25. 职官——职官上、职官下

26. 刑法——律、令、格、式、敕、总类、古制、专条、贡举、断狱、法守

27. 传记——耆旧、高隐、孝友、忠烈、名士、交游、列传、家传、列女、科第、名号、冥异、祥异

28. 地理——地理、都城宫苑、郡邑、图经、方物、川渎、名山洞府、朝聘、行役、蛮夷

29. 谱系——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

30. 食货——货宝、器用、豢养、种艺、茶、酒

31. 目录——总目、家藏总目、文章目、经史目

诸子类第六

32. 儒术

33. 道家一——老子、庄子、诸子、阴符经、黄庭经、参同契、目录

34. 道家二——传、记、论、书、经

35. 道家三——科仪、符箓、吐纳、胎息、内视、导引、辟谷、内丹

36. 道家四——外丹、金石药、服饵、房中、修养

37. 释家——传记、塔寺、论议、诠述、章钞、仪律、目录、音义、颂赞、语录

38. 法家

39. 名家

40. 墨家

41. 纵横家

42. 杂家

43. 农家

44. 小说

45. 兵家——兵书、军律、营阵、兵阴阳、边策

天文类第七

46. 天文——天象、天文总占、竺国天文、五星占、杂星占、日月占、风云气候占、宝气

47. 历数——正历、历术、七曜历、杂星历、刻漏

48. 算术——算术、竺国算法

五行类第八

49. 五行一——易占、轨革、筮占、龟卜、射复、占梦、杂占、风角、鸟情、逆刺、遁甲、太一

50. 五行二——九宫、六壬、式经、阴阳、元辰

51. 五行三——三命、行年、相法、相笏、相印、相字、勘余

52. 五行四——易图、婚嫁、产乳、登坛、宅经、葬书

艺术类第九

53. 艺术——艺术总、射、骑、画录、画图、投壶、奕棋、博塞、象经、樗蒲、弹棋、打马、双陆、打球、彩选、叶子格、杂戏

医方类第十

54. 医方上——脉经、明堂针炙、本草、本草音、本草图、本草用药、采药、炮炙、方书、单方、胡方、寒食散

55. 医方下——病源、五脏、伤寒、脚气、岭南方、杂病、疮肿、眼药、口齿、妇人、小儿、食经、香薰、粉泽

类书类第十一

56. 类书——类书上、类书下

文类第十二

57. 楚辞

58. 别集一——楚、汉、后汉、魏、蜀、吴

59. 别集二——晋

60. 别集三——宋、齐、梁

61. 别集四——后魏、北齐、后周、陈、隋、唐

62. 别集五——五代、伪朝、宋朝
63. 总集
64. 诗总集
65. 赋
66. 赞颂
67. 箴铭
68. 碑碣
69. 制诰
70. 表章
71. 启事
72. 四六
73. 军书
74. 案判
75. 刀笔
76. 俳谐
77. 奏议
78. 论
79. 策
80. 书
81. 文史
82. 诗评

以上共十二大类，82 小类，442 子目。

《通志·艺文略》对于小类子目的设立和改进有三个特点：一是小类类目大为增加，达到 82 个，这些新增的类目主要集中在由四部中小类变为大类的礼、乐、小学、天文、五行、艺术、医方等大类之下。二是确定了大批子目的名称，将三级划分推广到整个目录分类体系。《通志·艺文略》有子目 442 个，比早于它的《古今书录》的六十二子目，及晚于它的《四库总目》六十七子目都要多得多。当

然，并不是说子目越多越好，也不是说《通志·艺文略》442子目的设立都是合理、正确的，有些子目的设立也有偏滥和不合理的情况。但是，郑樵在《古今书目》出现三级分类的基础上，发展为一个三级分类的目录新体系，这是我国分类事业上的一大进步，是比任何古代目录都高明的，在这样庞大的分类体系中，出现一些错误，自然无法避免，所以不应该以今天目录学发展的成就和水平去责备他。可惜的是，郑樵在《通志·艺文略》中设立的这个完整、详细的三级分类体系，未能在古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这是古代目录学的一大遗憾。三是首次对中医古籍进行了详细分类。《通志·艺文略》第十类"医方类"分上下两小类，二十六个子目，这是继《汉书·艺文志》之后，又一次对医学古籍的详细总结。郑樵的"医方类"与《汉书·艺文志》的"方技略"相比有两大明显的进步。首先是明确地将医学类书籍作为治病强身的一个学科单独设立，而不像"方技略"那样杂收神仙、巫术类的书籍，不像"方技略"一样，认为医书"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小序)，把中医科学看作是政治的附庸。其次是"医方类"在小类的区分上从"方技略"的四种增加为二十七种，所收书籍也大大增多，这说明郑樵对于中医古籍有足够的认识，并对这一学科的体系和分类有了较为深刻的研究。当然，郑樵不是一个专门的医家，他在"医方类"对各种小类的分立不一定都是科学与合理的。比如眼药类所收书包括眼论、医眼针钩方论、耳眼方等书，并不单为眼药，也并不单为治眼，似乎应该称为"耳眼"类，与"口齿"类并列较为合适。尽管《通志·艺文略》"医方类"的分类还有其他不足之处，但是，像它如此对医古籍作详细的区分立类，在古籍综合目录中是没有的，就连明代殷仲春编制的专科目录《医藏书目》的分类类目，也不如《通志·艺文略》恰当准确。《通志·艺文略》医方类收录医书共六百六十多部，比此前的《旧唐书·经籍志》著录的136部医书要多得多，也比此后的《宋史·艺文志》录医书509部要多。《艺文略》在广泛

著录医书的基础上，对医方类类目的区分和设立作了大胆的探索，创立了医学类古籍分类体系的大体框架，这是难能可贵的。郑樵对于医古籍分类的贡献是与当时中医学的进步发展相适应的，从《通志·艺文略》"医方类"对医古籍的著录，可以反映出南宋初年，中医科学的繁荣和进步。

第三部要提到的是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它在各部小类和子目的设立和改造上，扩充、完善了四部分类法，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目录分类体系。《四库总目》的分类体系具体如下：

1. 经部
   - 易
   - 书
   - 诗
   - 礼
     - 周礼
     - 仪礼
     - 礼记
     - 三礼总义
     - 通礼
     - 杂礼书
   - 春秋
   - 孝经
   - 五经总义
   - 四书
   - 乐
   - 小学
     - 训诂
     - 字书
     - 韵书
     - 附录

2. 史部
   - 正史
   - 编年
   - 纪事本末
   - 别史
   - 杂史
   - 诏令奏议
     - 诏令
     - 奏议
   - 传记
     - 圣贤
     - 名人
     - 总录
     - 杂录
     - 别录
   - 史钞
   - 载记
   - 时令

地理

宫殿

总志

都令郡县

河渠

边防

山水

古迹

杂记

游记

外纪

职官

官职

官箴

政书

通制

仪制

邦计

军政

法令

考工

目录

经籍

金石

史评

3. 子部

儒家

兵家

法家

农家

医家

天文算法

推步

算书

术数

数学

占候

相宅相墓

占卜

命书相书

阴阳五行

杂技术

艺术

书画

琴谱

篆刻

杂技

谱录

器物

饮馔

草木禽鱼

杂家

杂学

杂考

杂说

杂品
杂纂
杂编
类书
小说
杂事
异同
琐语
释家
道家

4. 集部
楚辞
别集
汉至五代
北宋
南宋
金元
明
清
总集
诗文评
词曲
词集
词选
词话
词谱词韵
南北曲

以上共分四部，四十四小类，六十七子目。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跨越一千二百余年，在此期间，中国古代典籍有了极大的发展变化，新文体的大量出现及部分典籍在流传中的消亡，是《四库总目》增设小类、子目或改变某些小类类目的主要原因。例如：

经部中，在礼类之下出现的各子目，则是由于唐代将《礼记》、《仪礼》升格为正经，形成与《周礼》并列的"三礼"，于是逐步增加了礼类在《周礼》之外的经学著作。

史部中，由于唐代庶族地主地位的不断上升，冲击了门阀地主原有的地位，于是讲究名门望族族系的"谱牒"之学逐步消沉，谱系书流传减少，至《四库总目》时则删减了《隋志》史部的"谱系"类。相反，产生于唐代中期的著名史评著作《史通》，全面开辟了史学评论的道路，促使后代大量史评著作问世。南宋袁枢以《通鉴纪事本

末》创立了纪事本末体史书体裁。这些都是后来的目录书乃至《四库总目》设立史评类、纪事本末类的由来。

子部中,《四库总目》改变《隋志》附录佛经、道经的作法,仿效《崇文总目》,将佛教、道教类书籍纳入部类之中,也是这两大宗教日益兴盛,有关著述不断增多的结果。此外,又如《四库总目》子部中艺术类、类书类、谱录类的设立,都是《隋志》以后,有关著述不断增加,历经数代目录学家在书目分类中逐步增设而确立的。

集部类目中,最为突出的是词曲类及此类各子目的设立。诗变为词,始于中唐,兴盛于宋代;曲则是由词演变而成的,曲到了元代,成为元代文学的主要内容。元曲有南曲、北曲的区别,北曲又有杂剧和散曲之分。唐以后词曲类文体的发展变化,必然要反映到目录类例的区分。

综上所述,《四库全书总目》顺应古籍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小类和子目的设立上完善了四部分类法,作出了重大贡献,至今仍为古籍分类所借鉴和利用。

古籍目录中的大部类比较笼统,所以容易了解和掌握,但是大部类之下小类的设置与变化就相对复杂一些。为了比较古代目录中各部、各小类的演变、发展,这里选取一些较为重要的目录书,将其大部、小类的设立、变化情况作一《古籍目录图书分类沿革表》(见附表一)。从表中可以掌握主要古籍目录各部类的设立情况;可以了解到各种小类在不同目录书中的分合和类名的变化;还可以看到,随着时代的推移,社会文化的发展,小类的区分越来越细密、繁多,这反映出目录分类法的进步。总之,社会文化越发达,学术分类就越详细,书籍分类也越复杂,这是一个总的趋势。

虽然了解了目录中的小类、子目的设立与演变,但在实际使用古籍目录时还应注意到两点:

其一,有的目录书在一书中小类著录的标准并不完全一致。以《隋书·经籍志》为例,在附录道经部之下本已设有房中这一小类,

收书十三部，但在子部医方类中仍著录书籍八部。又如，《穆天子传》与《汉武内传》是性质相同的两本书，但却分入史部中两类，《穆天子传》入起居注，《汉武内传》入杂传。再如史部"谱系类"本是著录族系族谱书的，却在最后著录了《竹谱》、《钱谱》、《钱图》三种书，史部"簿录类"本为著录目录书的，却在其后附上了书法、绘画书籍。

其二，各种目录书中有的小类名称虽然相同，但所著录的范围却不尽相同。例如：自《新唐书·艺文志》后，子部中有了"艺术"或"杂艺"这一小类，收录有关骑射、书法、绘画、茶经、棋艺等项书籍，但《明史·艺文志》中，艺术类除了以上书籍外，还将医书附录在后边，所以《明史·艺文志》子部中没有医书类，医古籍要在艺术类中导检。又如，一般目录书史部·正史类，都收录纪传体史书，而《明史·艺文志》在"正史"中却包括了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体裁的史籍。

总之，不但要了解一部目录书的分类体系标目，还要了解它处理图书归属的特点，深入了解各类的著录情况，这样，才能真正掌握目录书的分类法。

四、古籍分类的现状

解放以来，对于古籍的分类是学术界关心和研讨的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加强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这一问题更是迫切需要解决。目前对于古籍分类的意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主张用新的分类法来区分古籍，将古籍和近现代人出版的新书统一分类，管理、使用。解放以后，我国出现过几种新的图书分类法，下面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1)、《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人大法")1953年正式出版使用，它是第一部新型分类法，分十七大类。

(2)、《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草案》(简称"中小型法")1958

年由文化部以草案形式发表，供中小型图书馆使用，它分二十一大类。

(3)、《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科图法")1958年正式出版使用，分二十五大类。

(4)、《武汉大学图书分类法》(简称"武大法")1959年正式出版使用，分二十六大类。

(5)、《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中图法》)1975年正式出版使用，粉碎"四人帮"后又作了修订，修订后于1980年正式出版使用。分二十二大类。

以上各新分类法的具体类目请参见《新图书分类法类目》(附录2)。用新的分类法来类分古籍，存在着诸多不便，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新分类法的列目不符合古代学术、书籍的发展源流和图书的实际情况。例如诸子九流十家是当时百家争鸣形成的各种思想流派，诸于思想包括哲学、经济、外交、文化等思想内容。如果单以"中国哲学"或"古代哲学"是难以揭示其学术渊源和流派的。另外，新分类法的类目对一些古旧书籍不恰切不适应，使这些古书在新分类中无法归属。例如，封建社会官场中有一类书籍专讲官吏道德、做官的教条，包括帝王对僚属的告诫等，称"官箴"，这些书在新分类法中便很难归类。因此，也有人主张仍旧使用"四库法"来区分古籍。但是在新的时代里，今人使用古籍的目的已跟古人大不相同了，因此照搬"四库法"，同样不合适。

于是，近年在编制全国善本总目的过程中，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等单位通力合作，在"四库法"的基础上，经过扩充、修改，制订成《全国古籍善本总目分类表》(草案)，这个分类表，是我国目前类分古籍比较合适的分类方法。其分类体系如下：

经部

总类

- 丛编
- 群经总义

- 易类
- 书类
- 诗类
- 礼类
  - 三礼总义
  - 周礼
  - 仪礼
  - 礼记
  - 通礼
  - 杂礼
- 春秋类
  - 春秋总义
  - 左传
  - 公羊传
- 孝经类
- 四书类
  - 四书总义
  - 论语
  - 孟子
  - 大学
  - 中庸
- 乐类
  - 乐制
  - 乐理
  - 乐谱
- 小学类
  - 训诂
  - 字书
  - 韵书

史部

- 纪传类
  - 丛编
  - 通代
  - 断代
- 编年类
  - 通代
  - 断代
- 纪事本末类
- 杂史类
- 传记类
  - 总传
  - 别传
  - 年谱
  - 日记
  - 家传
  - 宗谱
  - 科举
  - 职官
  - 氏姓
  - 专录
  - 杂录
- 史抄类
- 史评类
- 政书类

通制
典礼
职官
邦计
邦交
军政
兵制
防务
海防
江防
陆防
马政
诏令奏议
公牍档册
法令
考工类
时令类
地理类
总志
方志
专志
古迹
宫殿
寺观
祠堂
陵墓
园林
书院
山水志
山志
水志
（附水利）
游记
外纪
金石类
总类
金类
石类
陶类
钱币
玺印
目录类
公藏书目
家藏书目
地方书目
其他书目
子部
总类
儒家类
道家类
法家类
兵家类
农家类
医家类
丛编
医经

本草
诊法
方论
内科
外科
眼科
妇科
儿科
针灸
养生
史传
杂录
兽医
天文算法类
天文
历法
算书
艺术类
书画
篆刻
棋奕
杂技
谱录类
器物
食物
衣物
动植物
鸟兽虫鱼
花草树木
杂家类
杂学杂说
杂考
杂纂
杂品
杂记杂抄
术数类
数学
占候
占卜
阴阳五行
命书相书
相宅相墓
杂术
宗教类
佛教
经、律、
论、赞、
史传
道教
经论著作
史传
其他宗教
类书类
集部
总集类
丛编

通代
断代
地方艺文
楚辞类
别集类
汉魏六朝
唐五代
宋
金
元
明
清
词类
丛编
总集
别集
词话
词谱
词韵
曲类
诸宫调
杂剧
传奇
散曲
弹词
曲选
曲谱
曲律
曲评曲话曲目
小说类
笔话小说
杂事、异闻
琐语、谐谑
话本
公案
短篇
长篇
诗文评类
丛书
汇编类
家集类
自著类

《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分类表》分经、史、子、集、丛书五部，下分五十小类，小类下又分一百三十八子目，子目下有的又分细目，列三十个细目。这个分类表相对旧的"四库法"有几方面的改进：

一是在一级分类上增加了丛书部，这是对"四库法"的一大改造，由宋至明，我国古代已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古籍丛书，但《四库总目》碍于体例，并未著录。自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编成后，清代学者

兴起了编集、刊刻丛书的热潮，丛书数量迅速增加。50年代上海图书馆编制《中国丛书综录》，便收入丛书2797种，而现在古籍丛书种数自然还不止如此，所以有必要增设丛书部，以弥补"四库法"的缺陷，较全面地反映我国现存古籍的状况。

二是四库分类限于封建正统观念，对古代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像小说、戏剧、弹词等，视作旁支末流，不登大雅之堂，而不进行著录。分类表则增设或扩充了这些部类，如小说类，便在原笔记小说的基础上，增设了话本、公案、短篇、长篇等子目。

三是随着时代推移，学术思想领域的发展，"四库法"所定类目，不完全适应丰富的古籍，那些类目也与今天对古籍的分析、利用不适应，因此应该进行扩增。如《四库总目》史部"目录"类下分经籍、金石二小类，现直接在史部下分目录、金石为二类。子部医家类下也增加了一系列子目等。

四是"四库分类法"某些类目的设立，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现在来看，这种对古籍的分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要作改正。如改掉史部中的正史、别史、载记等类目，而以史书的体裁进行分类。

《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分类表》一方面继承了"四库分类法"，但又大大超出旧法，因此对于今后古籍的分类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第四节　古代目录的类型

我国古代的目录学有悠久的历史，历代留下的书目遗产，非常丰富。随着目录数量的增加和目录事业的发展，古代目录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类型。对于各种目录类型，应该如何进行区分呢？应该说，古代目录学家对书籍的分类作了许多工作，但是对本身的类型区分，却探索较少。最早对目录书类型进行分类的，是南宋郑樵，他在

《通志·艺文略》史类中，将目录书分为总目，下列《七略》、《晋中经簿》等国家书目；家藏总目，下列《吴氏西斋书目》、《都氏书目》等私藏目录；文章目，下列《文章志》、《群书丽藻目录》等文学书目；经史目，下列《史目》、《经史目录》等经学史学书目，共有四类。

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书之有目，体制虽同，详厥品流，实分三种：吴、尤诸氏，但录一家之藏者也；隋唐诸史，通志一代之有也；《古今书录》、《群书会记》，并收往籍之遗者也。"他的这段议论，也是在分析书目的分类问题。所谓"吴、尤"，指的是唐代吴竞的《西斋书目》，宋代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它们都是私藏书目；隋唐诸史皆有"经籍志"或"艺文志"，这是史志目录；至于毋煚《古今书录》、郑樵《群书会记》（《通志·艺文略》的前身），则是综录古今存佚的综合目录。

清代学者，也曾有人探讨过目录书类型的问题。汤纪尚说："目录之事，权舆中垒（指开始于刘向）。流派有三：曰朝庭官簿，曰私家解题，曰史家著录。"（见《槃邁文乙集》下，《周郑堂别传》）龚自珍也说："目录之学，始刘子政氏。嗣是而降，有三支：一曰朝廷官簿，……一曰私家著录，……一曰史家著录……。"（见《定庵文集》续集卷三）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将目录书分为官修的国家书目、私家书目、史志目录三类。

近现代目录学家在目录类型的问题上继续进行探讨。例如汪辟疆先生在《目录学研究》中便把古代目录分为目录家之目录、史学家之目录、藏书家之目录、读书家之目录等四类；余嘉锡先生则主要从目录的编写形式上区分目录的三种体裁，而不是从目录的内在特征来区分目录类型，这方面内容前文已提到，此处不再赘述。来新夏先生在《古典目录学浅说》中，基本上按照清人汤纪尚的方法，将古代书目分为国家书目、史志目录、私家目录三类，私家目录之下又分为综合目录和专门目录，综合与专门之下又各有所属。窃以为这种区分方法有自相矛盾之处，因为从著录内容上看，大部

分国家书目、史志目录、私家目录都是综合目录，而将综合目录隶属于私家之下似乎不妥。此外，在国家书目下面提到的西汉杨仆《兵录》，又同属于私家目录下的专科目录，不免互为抵牾。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于，将不同的分类标准杂揉混同在一个系统，这就难免要出现一些混乱。我国古代目录的类型太多，古今目录学家又从各个角度提出了不同的区分标准。从目前来看，有不少分类标准已足以统辖所有目录书，如按社会功用分为国家书目、史志目录、私人目录；但是只用一种分类标准又不足以反映古代目录内在特征的多重性。因此，最好运用多种标准反映目录类型的多重性，内容可以交叉，如一部目录可同属于不同的分类系统，如《七略》，在社会功用上看是国家书目，从著录内容上看是综合目录。但是，系统不宜混淆，如将多种标准杂揉为一个系统，必然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

50年代，王重民先生曾在《普通目录学》中提出书目分类的四个标准：按功用区分，按目录的著录内容区分，按目录内著录的图书出版年代区分，按目录内著录的图书出版地区区分。武大、北大编的《目录学概论》在此基础上，采用王先生前两个标准，加上"书目反映文献的收藏情况"这一标准，共列三条。

可以这么认为，王先生提出的前两个标准是区分书目的基本标准，其它方面皆可由其归纳，例如反映文献的收藏情况完全可以归入书目的社会功用这一标准中。因此，本节根据古代书目的内在特征，准备从以下两个系统来区分目录的类型。

一、按书目的编制目的和社会功用区分

书目的编制目的和社会功用是密切联系的，比如书目作者是为国家藏书编制书目的，那么目录的社会功用便体现为国家书目；作者是将书目作为史书的一部分内容的，那么目录的社会功用便表现为史志目录；作者从私人著述或者为私人藏书编目的，那么书

目便成为私家目录。依照这一标准，古代目录可分为以下三种：

（一）国家书目

国家书目，指国家掌握的图书目录，是由政府主持对国家藏书进行整理后编制而成的。我国古代从西汉开始，几乎每个朝代都在政府的主持下进行大规模的书籍整理工作，这在文献记载上称为“校书”。校书完毕，再将书籍的状况用各种形式记载下来，就成了国家书目。西汉武帝时杨仆奉命“纪奏《兵录》”，成帝时刘向父子编撰的《别录》、《七略》，就是这类古籍目录的开创性著作。以后，各个朝代都编有这类国家书目，现把历代重要的国家书目及主要编写人介绍如下：

汉，刘向、刘歆撰《别录》、《七略》，佚。

魏，郑默撰《中经》，佚。

西晋，荀勗撰《中经新簿》，佚。

东晋，李充撰《元帝四部书目》，佚。

刘宋，谢灵运撰《元嘉八年四部目录》，佚。

齐，王亮、谢朏撰《永明元年四部目录》，佚。

梁，刘孝标撰《文德殿四部目录》，佚。

陈，《寿安殿四部目录》，佚。

隋，柳䛒撰《大业正御书目录》，佚。

唐，元行冲撰《群书四录》，佚。

北宋，王尧臣撰《崇文总目》，残缺。

南宋，陈骙撰《中兴馆阁书目》，佚。

元代虽然短暂，不足百年，但也曾有过国家书目，据元人王士点所著《秘书监志》记载，至正时曾将秘书监内古书、古画“类编成号，置簿缮写”。可见有过国家的藏书目录，但不见流传，也不见其它文献有详文记载。

明，杨士奇撰《文渊阁书目》，存。

清，纪昀撰《四库全书总目》，存。

以上是历代一些主要的国家书目，为什么说是主要的？因为各朝往往不止编一部国家书目，有时有两部、三部，甚至更多，这里只能举一部较有代表性的作说明。以上所举的目录，绝大部分已经散失了，只是从其他文献资料的记载，了解这些目录的情况。

国家书目是记载当时当代现存书籍的目录，因而是对书籍状况较为真实、较为全面的反映。它的作用有下面几点：

(1)由于它是当时政府对国家现藏书籍的记录，因此是全面记载书籍状况的第一手材料。后世编写史志目录也常常以国家书目作为蓝本，许多史志目录都是抄录或改写前代国家书目而成的。例如，《汉志》删节抄录了《七略》，《隋志》参考、改写了《隋大业正御书目录》，《宋史・艺文志》则汇合了《崇文总目》及其它几部宋代的《国史艺文志》而编成。所以，不少散佚的国家书目可以在史志目录中找到材料。

(2)它反映了历朝历代政府对书籍的校勘整理及收藏状况。例如，从国家书目上，可以了解到当时政府组织校书活动的次数、时间、收藏图书的数量。

(3)将历代国家书目作一个综合考察，可以看出古籍出现、流传总的趋势，以及具体到某种古籍的分合、存亡、残缺。

(二)史志目录

史志目录包括正史目录、国史目录、专史目录和补史目录四部分。

所谓“正史”，指的是纪传体史书。清乾隆时“钦定”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为正史，二十四史中有六部包括了书目。这些书目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

国史是指当代人写的当代史，宋朝制度要求在编写国史时也根据国家当时的藏书情况，编写《国史・艺文志》。因此北宋一代有《三朝国史艺文志》，著录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典籍。

有《两朝国史艺文志》，著录仁宗、英宗两朝典籍。

有《四朝国史艺文志》，著录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典籍。三种《国史艺文志》皆以所括朝代为断限，著录皆不重复。

南宋也有《中兴国史艺文志》，著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典籍。

明代学者焦竑在万历年间也写了《国史经籍志》。这些国史目录是在正史目录启发之下做成，反过来又为后来的正史目录提供了依据。这些目录不仅在当代，对后代也有许多实际意义，如焦竑的《国史经籍志》就是如此。

在一些专史中也有目录部分，如郑樵《通志》中的《艺文略》，马端临《文献通考》中的《经籍考》，这些就属于专史目录。

史志目录还包括补史目录。补史目录的出现，是由于二十四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比例较少，总共只有六部。因此，清代以后有关学者纷纷为二十四史中缺少史志目录的史书作补志。随着数量逐渐增多，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书目资料群。下边将清初以来，为二十四史所作的补史目录按朝代先后排列，以反映这一目录群的大体状况。这里罗列的目录，单指自成体例的补史目录，其中也包括一些重作的正史目录，如李正奋的《隋代艺文志》，朱文藻的《宋史艺文志》；但不包括对正史目录的考补、注释、笺证，如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黄虞稷、卢文弨《宋史艺文志补》，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等。大致如下：

1. 补后汉书艺文志四卷　　清·侯康
   附：补侯康后汉书艺文志补　　清·陶宪曾
2. 补续汉书艺文志二卷　　清·钱大昭
3. 后汉艺文志四卷　　清·姚振宗
4. 补后汉书艺文志十卷　　清·顾櫰三
5. 补后汉书艺文志一卷
   附考十卷　　清·曾朴

6. 补三国艺文志四卷	清·侯康
附：补侯康三国艺文志补	清·陶宪曾
7. 三国艺文志	清·姚振宗
8. 补晋书艺文志四卷	清·秦荣光
9. 补晋书艺文志六卷	清·文廷式
10. 补晋书艺文志四卷附录一卷补遗一卷刊误一卷	丁国钧
11. 补晋书经籍志四卷	清·吴士鉴
12. 补晋书艺文志四卷	黄逢元
13. 补南北史艺文志三卷	徐崇
14. 补宋书艺文志一卷	清·王仁俊
15. 补宋书艺文志一卷	聂崇岐
16. 补南齐书艺文志一卷	陈述
17. 补梁书艺文志一卷	清·王仁俊
18. 补后魏书艺文志	李正奋
19. 隋代艺文志一卷	李正奋
20. 南北史合八代史目录	陈汉章
21. 补五代史艺文志一卷	清·顾櫰三
22. 补五代史艺文志一卷	清·宋祖骏
23. 宋史艺文志	朱文藻
24. 西夏艺文志一卷	清·王仁俊
25. 补辽史经籍志一卷	清·厉鹗
26. 补辽史经籍志一卷	清·杨复吉
27. 补辽史艺文志一卷	清·黄任恒
28. 辽艺文志一卷	清·缪荃孙
29. 金史艺文志补录一卷	清·龚显曾

30. 金史艺文志一卷　　清・郑文焯
31. 金史艺文略六卷　　清・孙德谦
32. 补元史艺文志四卷　　清・钱大昕
33. 元史艺文志补　　清・张锦云
34. 四朝经籍志补　　清・吴骞
35. 补辽金元艺文志一卷　　清・黄虞稷 卢文弨
36. 补三史艺文志一卷　　清・金门诏
37. 明史经籍志三卷　　清・傅维麟
38. 明史艺文志五卷　　清・尤侗
39. 明史经籍志一卷　　清・金门诏

补史目录的工作开始于清初黄虞稷。黄虞稷字俞邰，泉州晋江人。其父黄居中曾任明南京国子监丞，家富藏书，构千顷堂收藏数万卷，所以黄虞稷自小便有读书和进行目录学研究的条件。后来，他以明人著述为主，又补录宋末、辽、金、元时著作，撰成《千顷堂书目》。清初成立明史馆时，黄虞稷被推荐入馆参予王鸿绪《明史稿》的编纂，负责《艺文志》的工作。后来王鸿绪删去了黄虞稷《明史艺文志稿》中补录的宋、辽、金、元四朝艺文。乾隆年间，卢文弨从黄虞稷原稿中摘取补录宋、辽、金、元艺文的内容，刊成《宋史艺文志补》与《补辽金元艺文志》各一卷；吴骞则将这部分内容辑为《四朝经籍志补》，这便是清代补史目录工作的第一阶段。补史目录的工作后来又逐渐发展到后汉、三国、晋、南北朝、五代，及至西夏等领域，形成了补史目录的系列。

补史目录与正史目录相比，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一是补史目录往往依靠各代史书、文集、古旧目录及有关文献资料钩沉索引、爬梳采撷，由于时代久远，直接材料的缺乏，因此其真实性和可靠性不如原有的正史目录，有些著录可能是一些未完成的或传闻的

著述，因而利用时要注意考订。二是补史目录所记乃一代著述，例如《补后汉书艺文志》记录的便是东汉人的著作；而正史目录大多是著录一代收藏，如《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便包括了唐人及唐以前的著述，这一点要区分清楚。三是补史目录中有一些目录采用辑录体的方法，将前代有关书籍的考订内容汇集在相关的书名之下，从而提高了研究价值。例如侯康的《补后汉书艺文志》、《补三国艺文志》，运用了乾嘉时期经史考订的成就，将有关考史、注史、校史、辑佚书的序跋等收入他的"自注"之中，给人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四是各种补史目录都在有关的断代史研究及目录学研究中发挥了作用，从各个角度提供了学术价值，但在目录学研究方面，则更注重补辽、金、元三朝的目录，因为这段时期的国家书目或大型私家目录全付阙如，要了解辽、金、元三代的著述情况，这些补史目录便成为主要的参考资料。

商务印书馆曾于 1958 年将黄虞稷、卢文弨、厉鹗、钱大昕等人补辽、金、元的十余种补史目录合刊为《辽金元艺文志》，收三朝典籍一万八千二百五十多种，其中有九千一百多种为各书重复著录，实际著录为九千一百多种。这部合刊本上反映了三朝典籍的状况，书后还有人名、书名索引可供检索。

此外，商务印书馆还曾于 1956 年出版过《唐书经籍艺文合志》。此书采用上下两栏对照的方式，《旧唐书·经籍志》在上，《新唐书·艺文志》在下，新旧二志一并印出。凡二志次序不同，分类有出入，文字有异同之处，以旧志为准，而在新志文中利用清人沈炳震《新旧唐书合钞》中的按语加括号进行注明，还利用了沈炳震对二志所收书的部数与卷数的统计。这部合刊本有利于读者同时利用新旧唐书的史志目录，进行比较考订，了解唐代藏书和著述。

有关的史志目录合刊本还有《八史经籍志》。这部合刊本包括原有的六部正史目录，再加上黄虞稷、卢文弨的《宋史艺文志补》、《补辽金元艺文志》，金门诏的《补三史艺文志》、钱大昕的《补元史

艺文志》等四部补史目录，共十部。由于涉及汉、隋、唐、宋、辽、金、元、明八代，故称“八史经籍志”。这部合刊目录最早由日本人在文政八年(公元1825)编集，我国于光绪四年(公元1878)开始刊刻流传。这种合刊本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可以前后比照，纵观古代典籍的发展情况。

史志目录虽然有若干种类，但无论从编撰形式或内容价值来看，都以正史目录为主，所以，正史目录是史志目录的核心。史志目录中最为优秀的，当属《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虽然史志目录在目录学研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有的学者仍对史志目录持否定的态度。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他生活于《汉志》与《隋志》诞生之后，他在研究史书各志的功用时，认为其中的艺文、经籍志是无用的，“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频互出，何异以水济水，谁能饮之乎?”他还说：“艺文一体，古今是同，详求厥义，未见其可，愚谓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当变其体……唯取当时撰者。”(见《史通·书志篇》)他希望删掉纪传体史书中的艺文一体，实在要保留的话，最好只著录当代的撰著，而不要罗列所有书目，以免与前志重复。清初《明史·艺文志》的编撰就采用了刘知几的这个提法，只著录明代著作而不著录其它藏书。这些提法和作法在史学编撰上当然是一个改革，但是对于古籍目录学的研究来说，史志目录还是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1)它们通过承袭、删抄一些早期目录，为后人保存了古代目录的宝贵资料。另外，有些优秀的史志目录在目录书的编撰体制上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例如刘知几批评过的《隋书·经籍志》便完善了四部分类法的分类体系。(2)绝大部分史志目录全面广泛地著录了古今图书，便于后人了解古籍的流传存佚变化。而如《明史·艺文志》只著录明代著述，恰恰明代又无一部做得较好的国家书目，所以后人不能详细了解到明以前著作在明代的流传存佚情况，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

(三)私家目录

私家目录是指私人编写的目录书。前面所讲到的国家书目、史

志目录，都是反映了某个时期整个社会书籍文化总的情况；虽然史志目录大多是靠录国家书目而成的，但也能全面反映一朝一代的学术概貌。至于私家目录，著录对象则基本上是私人藏书，也有些见识广博、学问精深的学者，将平生所见书籍，尽数著录，如阮孝绪《七录》，但这种情况不多。由于私人藏书毕竟是有限的，因此大多数私家目录著录的内容，不可能说明当时社会学术文化的全貌。由于私人藏书具备对书籍深入研究、认识的有利条件，能够对自己收藏的书籍进行反复校勘、识别，所以私家目录中的许多内容对于考证古代文献的流传存佚、真伪等，比较详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私家藏书的风气，自古就有。古代私人藏书的渊源可以直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孔夫子就是一个大藏书家。西汉孔安国在《尚书序》中说："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遂及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曰："《家语》之孔腾字子襄，藏《尚书》、《论语》于夫子旧堂壁中，而《汉纪·尹敏传》云孔鲋所藏。"《汉书·艺文志》还记录了西汉初年，鲁恭王坏孔子旧宅，从墙壁中得到诗、书、易、礼大量经典的情况。以上记载说明，孔子生前广收典籍，进行整理研究，选编善本，作为教材，施教于三千弟子。他的大批书籍传至八代孙孔腾、孔鲋，为了逃避秦始皇焚书之祸，将书藏于屋壁，到汉武帝时，鲁恭王毁宅出书，又将典籍归于孔安国。如果这段故事是真实的话，那么到孔安国时孔子藏书已传了近四百年，十几代。这样说来，不仅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私人藏书家，而且曲阜孔氏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藏书世家。

春秋战国时期，除孔子藏书外，其他先秦诸子也都有私人的藏书。《墨子·贵义篇》曰："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可见墨子有不少藏书。

《庄子·天下篇》曰："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这是说惠施的博学与其占有较多的书籍相关。由于当时的学者崇尚四方游历讲学，个人的藏书总是装在车子上随身而行以备使用。所以藏书的数量用"车"计算。"五车"的藏书在如今，充其量也不过是五本大厚册子而已，可在当时已是数量惊人了，因此，后世夸示学问高深，常常以"学富五车"称道。

此外，战国时纵横家苏秦也有很多私人藏书。《战国策》说他出游数年，无所作为，大困而归，回家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为言"。于是苏秦"乃夜发书，陈箧数十"，遍观群书后摸索出一套游说君主的本事，最后终于执六国相印，说服六国诸侯形成了合纵联盟。

这种私人藏书的风气，虽经秦代焚书而不断绝，由汉延续至魏晋南北朝。例如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刘德就是一个大藏书家，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汉书》卷五十三)《汉书》说河间献王的藏书几乎和汉朝国家藏书相等，可见他的藏量之多。前边提到的孔子后人孔安国也是汉代有名的藏书家。刘向校书时，多利用私人的藏书，如他在《列子叙录》中提到的，有他自己的藏书，有"参书"等。大史学家司马迁、班固修撰史书时，也多利用了自己家中的藏书。

三国两晋时，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国家藏书锐减，只是有赖于私人藏书，许多典籍才得以流传。据史书记载，三国时，曹魏的王修、王弼，西蜀的向朗是藏书家。西晋时，张华好藏书，"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书，溢于几箧。尝徙居，载书三十乘。"(《晋书》卷三十六)范蔚"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晋书》卷九十一)魏晋南北朝时，私人藏书逐渐增多，载于史籍者众，在此不一一具赘。私人藏书的发展和数量的增

多，导致私人藏书目录的出现。史书中最早记载有私藏目录的藏书家，是南北朝时期梁朝的任昉。《梁书·任昉传》曰："昉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卒多异本。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这里说到了"勘其书目"，可知任昉藏书，自己早就编写了藏书目录。私人藏书而有书目，见于记载的，以此为最早。

同时期的阮孝绪在《七录》序说："凡自宋齐以来，王公搢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见若闻，校之官目，多所遗漏；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这里所称的"名簿"就是目录，可见在任昉之前，宋、齐间私人藏书家，都有他们的私家目录，只是未被史书记载而已。阮孝绪的《七录》便是得益于众多私藏目录，充实完备的。

南朝刘宋王俭《七志》和梁阮孝绪《七录》也属于私家目录，但有别于反映一家收藏的私人藏书目录。这种目录虽是私人撰著，但其著录范围广泛，往往包括了当时社会各阶层官私藏书的情况。所以说，私家目录也可分为两类，一种是由博学者撰著，反映社会各种图书流传状况的私撰目录；一种是私人编撰，反映个人藏书的私藏目录。私家目录以后者为多。隋唐两朝也有私家目录出现，但这时期的私目都已亡佚了。宋代，由于雕版印刷有了发展，书籍数量增多，私人藏书也日益兴盛，清末学者叶昌炽统计北宋至清末著名的藏书家有一千一百余家(《藏书纪事诗》)，宋代藏书家有不少人作了藏书目录，因此宋代私家目录有较显著的发展，保存下来的著名目录有如下三种：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陈振孙撰《直斋书录解题》，尤袤撰《遂初堂书目》。

明代私家藏书较宋代又有所发展，不仅数量多，而且收藏范围也有了扩展，如《百川书志》收录了小说、传奇等一类书籍；《绛云楼书目》则收录了天主教图书等，这都是由于当时社会文化的状况所决定的。明代私家目录据统计有四十一部，现存二十部(见汪辟疆

《目录学研究》)，其中较著名的有：

晁　瑮《宝文堂分类书目》

高　儒《百川书志》

徐　𤊹《红雨楼书目》

周弘祖《古今书刻》

叶　盛《菉竹堂书目》

李如一《得月楼书目》

祁承爜《澹生堂书目》

赵琦美《脉望馆书目》

钱谦益《绛云楼书目》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

清代私家藏书风气更盛，目录学研究一时成为显学。这种风气的形成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经过清初的征战，中国社会有了一个统一安定、和平的环境，社会文化的交流日渐频繁，书籍的流传增多，知识分子有了作学问的条件。第二个原因是清政府通过战争统一全国后，进一步从思想、文化方面加强统治，除了用收买的手段软化有民族思想的知识分子外，另一个办法就是大兴"文字狱"，打击、镇压思想上不肯归附清廷的读书人。因此许多镇书人回避政治，热衷于考证校勘。目录学由于和当时政治联系较少，也成为关心、研究的对象。孙殿起《贩书偶记》中著录清以来的目录书一百五十五种，其中大部是清代私家目录，清人私家目录较重要的，除前边所列的六部清人私家解题目录(钱曾《读书敏求记》、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杨绍和《楹书偶录》、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之外，还有：

毛　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

徐乾学《传是楼书目》

季振宜《季沧苇书目》

杨绍和《海源阁宋元书目》

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

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

在这些传统目录之外，我们前边提到的题跋集目录和读书记目录，都是清人私家目录中学术价值很高的专著。

二、按书目的收录内容区分

按照目录书收录古籍的内容范围可分为综合目录、专科目录、地方目录和特种目录。

（一）综合目录

古籍目录中登录书籍的学科在两种以上的，都属于综合目录。例如以经、史、子、集分类的四部目录，收录的古籍涉及到各个知识分类，这就是综合目录。古籍目录中的综合目录占绝大多数，因为经常论及，就不必在此一一列举。

（二）专科目录

综合目录的目的，在于反映各门各类书籍总的收藏情况，因此要兼收并蓄，综录各科。但是要考查某一学科的源流，追寻某学科的著述，就需要依靠专科目录。因此，专科目录是把某一专门学科有关书籍编制起来的专目。

专科目录的起源是很早的，第一部专科目录的出现比综合目录还要早，这就是汉武帝时由杨仆籍写的《兵录》。《兵录》应该说是第一部专科目录，因为它收录的书籍内容都是讲军事问题的兵书，可惜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自《兵录》以后，古代又有不少专科目录出现。随着各门学科的进步、独立和系统化；同时，也随着目录学日趋繁荣、完善，专科目录在逐渐地增多和发展。总的说来，时代越近，学科分设越细，专科目录也就越多。

专科目录也可区分种类，例如又可分宗教目录、经籍目录、史籍目录、文学目录、艺术目录、金石目录、小学目录、科技目录……许多学科在古籍目录中都有自己的专科目录。下面，择要介绍几种

专科目录。

(1)宗教目录　　主要是指佛经目录和道经目录。佛教和道教是在我国流传久远的两种宗教，有大量的宗教典籍，世称佛经和道经。那么佛、道目录就是专门记录佛、道二家典籍的专科目录。这些目录在学术研究上具有广泛的利用价值，一是佛道经录在目录的编写手法上具有独特、优秀的方法，值得古今目录编撰者学习和参考；二是佛经、道经中包含许多古代历史、文化方面的资料，利用佛道经录可以对这些经典有所了解有所选择。以佛经目录而论，其在目录学的作用不可忽视，近代学者梁启超曾作专文《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论述佛经目录对古代目录学的贡献。他说：

"经录所用方法，有优胜于普通目录之书者数事：一曰历史观念甚发达。凡一书之传评渊源，译人小传、译时、译地，靡不详叙。二曰辨别真伪极严。凡可疑之书，皆详审考证，别存其目。三曰比较甚审。凡一书而同时或先后异译者，辄详为序列，勘其异同得失。在一丛书中抽译一二种，或在一书中抽译一二篇，面别题书名者，皆一一求其出处，分别注明，使学者毋惑。四曰搜采遗逸甚勤：虽已佚之书，亦必存其目以俟采访，令学者得按照某时代之录，面知其书佚于何时。五曰分类极复杂而周备。或以著译时代分，或以书之性质分。"(见《图书馆季刊》第一卷第一期)

最早著录佛教经典的综合目录是西晋荀勗的《中经新簿》，在四部之外，附录了佛教经典。最早的佛经专门目录是东晋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道安十二岁出家，研习经义，他是使佛教摆脱对玄学依附面独立传播的倡导人，也是佛经目录的奠基人。此目作于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公元 374)，它按译者年代次序排列译本，再著录其它佛经，以分辨译本和未译本，反映中土佛学的发展；它把异经和疑经与正经分开著录，以别真伪；还将注经单独开列，以区分经、注。这部佛录已亡佚。

现存最早的佛经目录是梁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十五卷。所

谓出是译出，三藏指经、律、论，记集是记录集合，就是记录中土翻译经、律、论的佛经总目录。僧祐在《梁高僧传》卷十一有传，《梁书》卷五十、《南史》卷七二也有他的事迹，是一代高僧。此书撰成于梁武帝天监年间，著录佛经 2162 部，共 4328 卷。全书体制分缘起——记佛经与译经的起源；名录——记历代出经名目，分十二录，每录又按撰人时代排列；经序——记各经前后序，共 120 篇，还包括一些杂录；列传——载译经人传记，记外国十二人，中国十人。共四部分。其中缘起、经序、列传，是《综理众经目录》所无，由僧祐创立的，而名录的分类和著录的内容也比前者大有增加。

以后各代都撰有佛经目录，其中著名的有隋法经《大隋众经目录》，费长房《开皇三宝录》(《历代三宝记》)，唐释道宣《大唐内典录》和释智昇《开元释教录》，北宋释惟白的《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居士王古的《大藏圣教法宝标目》，明释智旭《阅藏知津》等。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隋代法经的《大隋众经目录》，它在我国佛经目录分类发展史上，较早地建立了一个系统的分类体系。其分类先按佛经内容分为大乘、小乘，再按体裁各分经、律、论，最后又按流传情况各分为一译、异译、失译、别生、疑惑、伪妄六大类。不属于经、律、论三藏的杂书，也按体裁分为抄录、传记、著述，再按地域分为西域、北方。全书从经、律、论起，分三大类，九子目，四十二细目。这个分类体系较准确地概括了佛教的思想体系，并且符合了佛教经典在中国流传的实际情况。在此以后一千三百年间，佛经目录基本按照这一分类体系，只是稍作修改而已。另一部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智旭的《阅藏知津》。中土的佛经发展到明代，由于历年增刊，数量大涨，许多僧徒无法遍阅，“纵有阅者，罕能达其指归”。所以智旭从三十岁起，用二十年时间，读尽所有佛经，撰成《阅藏知津》四十四卷。在此目录中，用各种符号，标明佛经的优、劣、缓、急，以指导僧众阅读，这是一部注重实用，便利初学的佛典目录。

佛教典籍目录除以上所列几部重要的古代目录之外，这里还

要专门提到当代史学家陈垣先生撰写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这是一部以近代史学方法系统研究佛教典籍的目录著作。全书分六卷，主要收录中国人撰述的佛教典籍，包括中土著述的目录、经记、护教、纂集、音义等五类，共录三十五部。每书按著作年代排列，下有提要，论述典籍的书名或略名、异名，卷数异同，版本源流，撰人略历，内容体制，史料价值等。这部目录的学术价值在于既介绍了重要的佛教史籍，又论述了史学研究中对佛教典籍的运用，这是中国目录学研究中有创造性的一部专著。它在目录学方面的具体贡献有如下数端：

其一，以形式多样的解题，分别对各种佛籍的具体情况进行著录，并进行评价。其评述能抓住主要问题作重点论述。例如卷一论《出三藏记集》时，着重分析了该书在目录学上的研究价值，指出："第三方式之经序，为其他经目所未有，可以考知各译经之经过及内容，与后来书录解题、书目提要等用处无异。"并说明这种汇总经序的作法，为后来普通目录书的"辑录体"解题所借鉴，"朱彝尊撰《经义考》，每经录其前序及后跋，即取法于此"。同时还肯定了"经序"中对有关书籍篇目的记载，并举载《弘明集》篇目为例，说："载序之外，复载各卷篇目。幸而《弘明集》今存，不幸其书不存，吾人亦可据此篇目，略知其书之内容为何，此目录学家亟当效法者也。"

其二，重视对佛籍版本的分析，书中对每部佛籍的记载，都要详细分绍版本源流，先条列版本系统，再缕析各本间异同，考订传本的误失。对于各类佛籍的古刻、今刻，籍本、籍本，合刊、单编，刻本、抄本，皆经心营目识之后，一一分绍给读者。《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详述佛籍的版本，还能根据各本的特点，鉴定其版本归属，从而一扫前人在有关版本记载上的混乱和谬误。例如卷三论述释玄应《一切经音义》，就订正了杨守敬《日本访书志》中鉴定玄应书版本的若干错误。

其三，著者以深厚的史学与目录学功底，在书中钩沉索引、考

辨真伪，并对前代各种目录专著的失误辨正极多。例如，梁代《高僧传》一书的作者，历来有两种说法，一为释僧祐，一为释慧皎。《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在卷二的解题中列四个设问对此问题疏通论证，通过四问四答，从正反两方面入手，层层推理，终于解决了佛籍的一宗疑案，使慧皎著《高僧传》一说成为确论。此书对于《四库总目》的订正，更为突出。著者深入考察了《四库总目》释家类的编撰过程，认为《四库总目》在收录有关佛籍时，并非有目的地选择，面是随手拾掇，所以佛籍中最重要的典籍反面被漏收。“如著录《宋高僧传》而不著录《梁高僧传》、《续高僧传》，犹之载《后汉书》而不载《史记》、《汉书》也。又著录《开元释教录》而不著录《出三藏记集》及《历代三宝记》，犹之载《唐书经籍志》而不载《汉志》及《隋志》也。”（《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缘起》）书中对《四库总目》释家类及其他部类的佛籍提要辨误甚多，据粗略统计，共正误二十九条。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还对其他目录书中有关佛籍的记载进行正误补阙。所涉及者，如两唐书《经籍志》、《艺文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后汉书艺文志》，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等。它以详密的考证，将佛教史籍的研究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对道教典籍的著录，最早可推溯到西晋葛洪《抱朴子》卷十九《通览篇》，篇中列举了一些道书的名目、卷数，但这还不是目录。综合目录的记载，是从王俭《七志》附录《道经录》开始的。最早的道藏目录应属刘宋时道士陆静修编撰的《灵宝经目》，但此目已久佚，未能了解其具体情况。梁朝阮孝绪《七录》将道教书收入《仙道录》，分为“经戒、服饵、房中，符图”四类。道教经典在隋唐时有所发展，也有道经目录出现。北宋真宗迷耽道教，于是道教典籍在此期间得到迅速发展，著作佐郎张君房与一批道士将道经镛成四千五百六十五卷，称为《大宋天宫宝藏》，奠定了现存《道藏》的规模。张君房又

辑其精要为《云笈七籤》一百二十二卷，成为道教类书。《道藏》在宋代曾有数次增补刊印。元代忽必烈灭道，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诏焚一切道经及经版，使《道藏》遭到毁灭性破坏。明代英宗时重辑《道藏》，刊成《正统道藏》五千三百零五卷，神宗万历年间又辑《续道藏》一百八十卷，这便是现存《道藏》的内容。

唐宋时期的道经目录由于流传不广，相继亡佚。从郑樵《通志·艺文略》中可看到有唐代《开元道经目录》一卷，宋代张君房编的《大宋天宫宝藏》也有目录，《通志·艺文略》载有《宋明道宫道藏目录》六卷，但这些目录皆不存。现存最早的道经目录是明代天启年间白云观道士白云霁所撰《道藏目录详注》四卷，分道教经典为七部、十二小类，对一些道书作了简单的解题。

总的来说，道经目录的成就比佛经目录相差甚远。

（2）经籍目录　　经籍目录专门著录儒家经典及研究儒家经典的著述，是经学的专科目录。清代朱彝尊撰写的《经义考》三百卷是经籍目录的代表作。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嘉兴县）人。康熙年间，参与修《明史》，晚年居家著述，搜集历代经学书籍，仿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体例，作《经义存亡考》，考订历朝经学典籍，最初只注典籍的存、亡二项，后来改列存、亡、阙、未见四项，故改称《经义考》。首录历代皇帝对儒学经典的御注、敕撰，以下分：

> 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通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群经、四书、逸经、毖纬、拟经、承师、宣讲、立学、刊石、书壁、镂版、著录、通说。

共二十六类，末附家学、自叙。但家学、自叙、宣讲、立学四门之下没有具体内容，可见此书尚未最后完成。《经义考》广泛著录经学典籍，每书前列作者姓氏、书名、卷数，另起一行注明该书流传状况，成“存”、或“佚”、或“阙”、或“未见”。然后辑录原书序、跋，及古今学者论述的材料，让人一览而尽知历来学者对该书内容、学术价

值的分析。有些书朱彝尊自己有所考证的，便附按语于后。此书撰成后，清代有沈廷芳作《续经义考》；翁方纲又作《经义考补正》十二卷，补正一千零八十八条材料。1933年，罗振玉作《经义考目录》八卷，以便读者查检。

(3)史籍目录　　最早专门记载史书的目录，见于《旧唐书·经籍志》著录的唐朝杨松珍《史目》三卷。此目已佚。现存最早的史籍专目是南宋高似孙《史略》六卷。规模最大的史籍目录是清代章学诚的《史籍考》三百卷，但此书今亦不存。章学诚《史籍考》的编撰动机，是在朱彝尊《经义考》启发下产生的，由于该书规模宏大，他唯恐独力难以完成，便向当时的河南巡抚毕沅提出建议，于是毕沅于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延聘洪亮吉、凌廷堪、武亿等学者设局编修，由章学诚主持。此书后因毕沅去官而停顿，但嘉庆三年(公元1798)，又得到浙江巡抚谢启昆的支持，在杭州继续编撰。据王重民先生考证，此时参加编修的还有钱大昭、陈鳣、胡虔、袁钧、张彦曾等人。杭州的编修工作进行了两年，《史籍考》接近完成，但内容仍很粗糙零乱，亟待修饰订正，此时谢启昆又调到广西任巡抚，使这一工作完全停顿下来。一直过了40多年，在道光年间，才由潘锡恩组织一批学者，重加增订，最后定稿。潘锡恩的儿子潘骏文在《校印乾坤正气集跋》中曾说：

> 先公尚有增订《史籍考》一书，亦与斯集同时雠校。系因毕秋帆、谢蕴山两先生原本，为卷三百三十有三。第原书采择未精，颇多复漏。先公因延旌德吕文节、日照许印林(许翰)、仪征刘伯山(刘毓崧)、同邑包孟开(包慎言)诸先生，分类编辑，删繁补缺，仍照朱竹垞《经义考》定为三百卷。而补录存佚之书，视原稿增四分之一，详审顿觉改观。写成清本，待付手民。

遗憾的是咸丰六年(公元1856)潘锡恩家中失火，潘骏文追忆说："清本与藏书同归一炬，并原稿亦不复存。"

《史籍考》虽然全书覆灭，但在章学诚的遗文中仍保留下他的

《论修史籍考要略》，由此可见章学诚在编修《史籍考》中的主要贡献，及他的编撰思想。全文分十五个方面：

一曰古逸宜存。指出古史逸文对于探求史籍原委很有价值，上古时代许多逸文形式看不是史书，但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史籍，应予保存。

二曰家法宜辨。这里主要论述史学源流，分析史籍分类，以便正确规定各类史籍的归属。

三曰剪裁宜法。谈解题内容的剪裁法则，“一书之中，但取精要数语，足以概括全书矣。”主张按语要简明，辑录的序跋论述，也要精选。

四曰逸篇宜采。古逸书宜存，就是古逸书流散在其它文献中的散篇佚文也要采录，以求有补于史学。

五曰嫌名宜辨。古代史籍同书异名，异书同名的情况较多，同此要在标题下注明同异名目，以便稽检。

六曰经部宜通。认为“古无经、史之别”，古代经书与史书并无严格区别，例如“六艺”，虽然已收入朱彝尊《经义考》，但史籍目录也应收入在有关门类中。

七曰子部宜择。子部书中也有与史书相通的内容，应该采择。

八曰集部宜裁。认为“唐人文集，间有纪事”，“宋元以来，文人之集，传记渐多，史学文才，混而为一。”主张从文集中裁出与史学相关的篇章，进行收录。

九曰方志宜选。提出重视方志史学作用的思想，要求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方志著录。

十曰谱牒宜略。认为家谱出自私家撰作，或有掩饰，或编制粗糙，庸劣者多，所以要少收。

十一曰考异宜精。考异要精当，对分歧互见的内容，都应“贱而存之”，以免错漏。

十二曰板刻宜详。主张对版本原委，如原刻、刻者、款识、题跋、

序引、存板、后刻等情况详加著录，以便读者“按录求书，不迷所向”。

十三曰制书宜尊。意指收帝王发布的训示，有关帝王的实录，不分类例，编在卷首，以示尊君。

十四曰禁例宜明。此条遵奉清廷对违碍书籍的禁令，对被禁毁的史书，说明其违碍禁行的缘故。

十五曰采摭宜详。广泛采集各类史籍，并在各书下详细说明存、亡、阙、未见的情况。

《史籍考》全书分制书、纪传、编年、史学、稗史、星历、谱牒、地理、故事、目录、传记、小说十二部，下分五十五目。现存《史籍考总目》保存于《章氏遗书・补录》之中，可见其史籍分类体系。

(4)科技目录　　古代科技目录出现较早的是医籍目录。最早的医籍专目应该称宋代编写的《医经目录》、《大宋本草目》二书(据绍兴年间刊定《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一所载)。可惜此二书已佚。现存最早的医籍书目是明代殷仲春的《医藏书目》，分二十类，收医书三百多种。此外日本文政十年(公元 1827，道光七年)日本人丹故元胤写《医籍考》，也是著录中国古代医籍的重要专目。丹波元胤是日本医生，他继承其父的医术和著书遗愿而撰成此书。全书八十卷，分医经、本草、食治、藏象、诊法、明堂经脉、方论、史传、运气九类，收录我国古代医书三千数百种。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的形式属辑录体。汇集各家序跋、评论、提要，有时再附上目录撰者的一些按语。在书名、卷数、作者之后，仿朱彝尊《经义考》之例，注“存、佚、缺、未见”四项。应该说《医籍考》在当时是收录医书较多、较全面的一部专科目最。因此，陈垣先生曾专为这部目录面东渡日本寻访，经过不少学术界老前辈的努力，《医籍考》于 1935 年在国内影印，广为流传。

清代撰成的自然科学目录有梅文鼎的《勿庵历算书目》、华世芳的《近代畴人著述记》、王景沂的《科学书目提要初编》等。

（三）地方目录

地方目录著录与某一地区相关的书籍，是地方文献目录。地方目录的创始，在北齐、北周之间。刘知几《史通·书志》所举北齐、北周间宋孝王撰《关东风俗传》，书中的《坟籍志》罗列了与关东地区有关的书名、撰者，这是地方目录的先例。但《关东风俗传》一书已佚，现存最早的地方目录，是南宋高似孙《剡录》中的卷五、卷六，这两卷内容著录了与剡（今浙江嵊县）地有关的图书文献。其中有四十六部著作的书名、卷数、撰者，并整篇地抄录了一些简短的诗文。

地方目录的种类总的来说有两类：一类是包含在方志中的艺文志。前边提到的《关东风俗传》和《剡录》的有关内容就是这类地方目录。方志即地方志，这是我国文化遗产中宝贵的财富之一。自宋以后发展很快，各地有府、州、县志，元明清三代还编过全国性的《一统志》，朱士嘉先生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合录》与全国天文史料普查组编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收方志有八千五百多种，但实际数量还不止于此。其内容包罗万象，丰富多彩，能为各门学科的研究提供充足的资料，许多方志中就有艺文志的材料。

另一种类型是独立编撰的地方目录专著，如明代有祁承㸁编的《两浙著作考》，曹学佺编的《蜀中著作记》等。祁书已失传，曹书现也只有残本。清代的地方目录专著有吴庆坻的《杭州艺文志》十卷和孙诒让的《温州经籍志》三十六卷，这些目录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地方目录的著录体例比较散乱，著录的形式有两种，一是按人编次，在人名之下，附上他的著述书目；一是按书编次，只有简单的分类，然后排列书目、卷数、撰者。大部分地方目录没有解题，少数附有解题，如孙诒让的《温州经籍志》，则以辑录体的形式附上解题，并注明存、亡、残、未见四项，这部目录算是地方目录中体例较好的一部。

地方目录不仅可供求书、检书之用，反映地方学术文化发展的

状况，而且还可以借此搜辑、整理地方文献，进而为建立地方文献的体系提供条件。甚至还能从中发掘出重要人物的遗佚著作或非重要人物的有价值著作。因此，地方目录是有待于进一步整理、发掘的资料群。

(四)特种目录

专科目录是记载各学科专门著作的目录，但是，又有一些具有独特性质而又不属于某一学科的著作，如丛书、善本书，甚至个人著作、妇女著作等，为这些著作编著的目录称为特种目录。因此，特种目录是为某一特殊范围的书籍编制的目录。下面择要谈几类特种目录。

(1)丛书目录　　这是在丛书大量出现以后，为人们利用丛书方便而编制的一种目录。丛书是一种总聚群书的形式，编集者把一批他认为必要的书籍汇合成一部大集子，称之为丛书，如《汉魏丛书》、《唐宋丛书》。"丛书"的名称开始于唐朝陆龟蒙的《笠泽丛书》，但陆氏的这部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丛书，是他自己的一部文集。对丛书出现的时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如《四库总目》认为齐梁间出现的《地理书》、《地记》是最早的丛书，钱大昕认为南宋度宗时的《百川学海》是最早的丛书。现存最早、体制比较完备的综合丛书则是南宋俞鼎孙所辑的《儒学警悟》。

丛书在明清两代得到很大的发展，数量激增，估计有三千种左右，《中国丛书综录》不计佛学、新学丛书在内，已著录 2797 种。在这么浩繁的书群中检求一部需要的书，当然很难。于是清朝嘉庆时，顾修首创编制丛书目录，录宋元以来丛书二百六十一种，在各部丛书下著录该丛书所集书籍名称、卷数、撰者，也即著录了丛书子目，这就是《汇刻书目初编》十册，它是第一部丛书目录。此后续编者不断，解放后，上海图书馆集合全国四十一个图书馆藏书所编制的《中国丛书综录》，是体制最完备，最便于利用的一部丛书目录。

（2）善本目录　　古人读书，追求善本。《汉书·河间献王传》记："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这里的"善书"，就是后世所称的"善本"。对于古籍善本的含义标准，古人有许多论述，当今也仍在继续讨论。清末丁丙在《善本书室藏书志》中提到善本书的含义时说到四项：一曰旧刻，指宋元刻本；二曰精刻；三曰旧钞，指精钞影钞；四曰旧校，多指清人精校。这反映了一种对善本书的看法。当然，具体地还要就书籍情况而论，比如孤本、珍稀本，当然也在善本之列。

最早的善本目录，应属明末毛扆所撰《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一卷，所著录的书籍，都是毛氏汲古阁中收藏的精钞本，有宋版影抄、元人手抄及其他旧钞。

清钱曾《读书敏求记》四卷，也是著名的善本目录。此录从他藏书的三千多种中，选出精华六百三十四种进行著录，每书下都有解题，考订书雕刻的年代，授受源流，评判各版本的优劣。

清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一卷，著录宋刻本一百二十种，每书下都有解题。

前边提到丁丙的《善本书室藏书志》也是一部善本目录。清人的善本目录甚多，在此不作一一列举。另外，善本目录因主要是从版本方面论书的善劣，所以它同时也是版本目录，版本目录收书的范围要更广一些，但不一定都是善本。版本目录也属于特种目录，这里不再另述。

（3）辨伪目录　　古书有伪造，就必须辨伪，这是古代目录学家的优良传统。刘向校书，对伪书就注明"依托"，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就在书目之下指明伪作，历代学者都对伪书作了不同程度的考辨。到了清代，疑古辨伪的方法更为审慎严密，出现了一批辨伪著作，而清初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即是一部首开风气的辨伪目录。他在书中对伪书分五种情况：一是全部伪造的，有《古文尚书》等六十种；二是真书中有部分伪作的，有《列子》等十种；三是书不

伪而撰人名伪，有《山海经》等六种；四是书不伪而书名伪，有《春秋繁露》、《东坡志林》二种；五是不能定作者的，有《国语》等四种。

《古今伪书考》辨伪的文字虽太简单，判断有的也不一定准确，但它对清代辨伪的风气有很大的影响，后世不少辨伪著作都受到它的启发，所以它是一部有参考价值的目录。

（4）初学目录　　古籍数量多，类型广，对于初学者来说，是难以入手的。那么究竟最先读哪一种目录呢？这就要有初学目录。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 1847），湖北学政龙启瑞编撰了《经籍举要》，择取诸生所急需精读的书籍，略述其内容得失，指示读法。在经史子集之外，还列有"约束身心"、"扩充学识"、"博通经济"、"文字音韵"、"诗古文词"、"场屋应试"等六类必读之书，这是一部初学目录。清末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也是专为初学者籍制的目录。过去，不少学者就把《书目答问》当作目录学的启蒙读本。所以鲁迅说："我以为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而已集·读书杂谈》）此外，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文中说到鲁迅为当时一名大学生开列十二种必读之书，其中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可见也是把这部目录作为初学目录进行推荐的。

以上分析了古籍目录的各种类型，并着重介绍了各种类型中的代表著作，以求通过这些分析和介绍对各类古籍目录的概况有所反映。

第三章　古籍目录学发展史

叙述古籍目录的发展历史，目的在于介绍历代著名目录学家和目录学名著，分析古代各个历史时期古籍目录学的发展特点及其影响，从而掌握古籍目录学发生发展的规律，了解古籍目录工作的情况和经验，更好地继承古籍目录学丰富的遗产。

对于古代目录学发展阶段的划分有多种方法：汪辟疆先生的《目录学研究》分三段，唐以前之目录，唐宋元明四朝之目录，清代目录。

余嘉锡先生的《目录学发微》则分为周至三国、晋至隋、唐至清三个时期。

罗孟祯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简编》则分为两期。上期为西汉至隋，下期为唐至清。

来新夏的《古典目录学浅说》和北大、武大的《目录学概论》把古代目录学划分为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个时期。本章也准备按照这五个阶段，加上"近现代"，分别阐述古籍目录学的发展史。如此安排的理由有几点：其一，中国古代目录工作的出现虽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但是真正的目录工作是从西汉刘向父子开始的，因此从西汉讲起。其二，至公元1911年清王朝灭亡之前，古代目录事业和目录学研究、发展状况，今天看来基本上是古籍目录工作和古籍目录学研究的发展状况。所以古代目录学史是古籍目录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公元1911年以后，我国目录学进入近现代发展时期，古籍书目的工作和古籍目录学研究也引进了许多新思想和新方法，更具科学性和实用性，与目前的古籍研究

和整理工作联系密切。因此，这段时期，古籍目录工作的成就除在本章最后一节作简要概括外，还要在下一章专门对近现代产生的古籍目录、索引举要介绍。其三，将目录学的古代部分划分为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个阶段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各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特点，这样便于阐述目录学发展变化的社会背景和影响，因此是比较恰当的。古籍目录学在此期的发展阶段自然也应如此划分。

第一节　汉　代

一、西汉的典籍聚集与整理

古籍目录事业是从西汉正式开端的。目录事业的兴起，与书籍的聚集过程有密切的关系。西汉有三次规模较大的求书活动。

第一次是公元前 206 年。秦亡，刘邦率兵进入咸阳城，当时，将士们争先恐后地抢夺金帛财物美女，但刘邦的谋臣萧何却专门收集秦丞相、御史府的“律令图书”，为西汉图书的积累引导了开端（《汉书》卷三十九《萧何传》）。西汉政权建立之后，接受秦朝“禁书”的教训，“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序）使得散失的书籍得到及时的聚集和收藏，为图书的整理工作以及后来的目录工作准备了条件和基础。西汉初创，需要服务于政权建设的一系列文件书籍，因此，“萧何颁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朝仪”（《汉书・文帝纪》下），对西汉初聚集的书籍、文件作了整理，律令、军法、章程、朝仪都是当时急需的书籍材料。这是西汉第一次收集书籍和整理活动，这一次还没来得及对书籍进行分类和编目工作。

汉武帝时期，国家经过七八十年的经济恢复，政治统治趋向稳定，社会生产力大大向前发展，从农业技术的提高，耕种面积的扩大，手工业的进步，城市的兴起，各经济中心间的联系，对外贸易的

增加等方面，都标志着汉武帝时期经济的繁荣。因而司马迁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在此基础上，汉武帝更广开东、西、北三边，扩大版图，开拓西汉的经济市场，密切中原与周边各地区、各民族的联系。在大一统的气象下，汉武帝不仅从政治上、经济上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同时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强烈地反映出这种要求，开始了对西汉以前学术文化的综合、总结工作。一方面，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建议，统一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一方面注意开展图书的征集活动和改进书籍的典藏工作，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志》序)。由于自汉初以来广开献书之路，所以到汉武帝时"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文选·任彦昇为范始兴求立太宰碑》注引《七略》)。这些书分别收藏在皇宫内外六处地方，《七略》曾记载当时是"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汉志》序注引)。对于"积如丘山"的群书，为了适应汉武帝对匈奴及南粤征战的需要，军政杨仆首先整理兵书，同时编制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目录——《兵录》。这是西汉第二次集书和整理的情况。

汉武帝之后，又经过昭、宣、元、成，西汉社会文化和经济实力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昭、宣二帝，采取"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的方法，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武帝以后四朝，逐渐扩大了京师太学学生的数量，元帝时在地方上也设置了官学。到汉成帝，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文化教育事业，于是开始了第三次收集、整理图书的工作。汉成帝河平年间，为进一步搜求书籍，成帝派谒者陈农到全国各地访求遗书。另一方面，河平三年(公元前 26 年)下诏组织人力整理国家藏书。由著名学者刘向负责，带领各种专业人员分工

校书。《汉志序》记载，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最后，又由于刘向、刘歆父子的努力，产生了我国最早的综合目录《别录》和《七略》。

西汉年间的三次聚书、整理活动对于古籍目录的出现和目录学的发生、发展有直接的影响，正是由于书籍的不断积累，才需要整理校勘，需要归类记载，这才有了目录的产生。

二、刘向父子的校书

刘向校书，在中国文化史上，在中国目录学史上都有重大的影响，他为后世的书籍校勘和目录编撰树立了典范。

刘向（公元前77年——前6年），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人（今江苏沛县）。他是西汉时期的经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汉高祖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初为谏议大夫，敢于直言，元帝时曾上书数封，痛论外戚专权之祸，因此两次下狱。汉成帝即位后，又被起用，改名向，升任光禄大夫，受诏领校群书，辛勤工作20年，终年72岁。除《别录》外，还著有《列女传》、《列仙传》、《新序》、《说苑》等著作。

刘歆是刘向最小的儿子。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由于东汉光武帝也叫刘秀，所以史书上对于刘歆的记载都用他的初名而不用改名。刘歆约生于公元前53年，死于公元23年，年轻时由于通诗书能写文章而被皇帝召用。成帝河平三年，与他父亲一同受诏校书，协助刘向掌握全面的工作，对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刘向死后，他袭位为中垒校尉。哀帝即位，大司马王莽推举他为太中大夫，后又升为光禄大夫，很受宠幸，哀帝命他继承父业，领校五经群书，刘歆于是以《别录》为基础，类别群书，撰成《七略》。刘歆在经学研究中力主古文经学，主张将《左传》、《古文尚书》等列于学官，因面受到众儒的攻击，出为太守。王莽篡位后，尊

刘歆为国师，由于王莽夺权声名不好，再加上政治混乱，众叛亲离，于是刘歆又图谋诛莽，不成，更始元年（公元 23 年）自杀。

刘向、刘歆校书工作的开始，缘由于汉初典籍的混乱。汉初的典籍，大都写在竹简和缣帛上。这些材料，以前是不易见到实物的，但是，自 1972 年在山东银雀山出土一批汉简，以及 1973 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一批古代帛书、竹简后，文化界对于竹简、帛书的了解就比较清楚了。从出土的简书、帛书可以看出，汉初传钞的书籍形式和体例是很混乱的，比如说，钞书的来源不一，这就会出现一些不同的传本，在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就有两个不同传本的《老子》；再如，传钞的古书编次前后也不一致，今天流传的《老子》即《道德经》，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的，但马王堆中出土的《老子》却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也就是说，是以《德道经》的形式出现的；另外，也可发现，当时流传的古书，很多没有篇题，不分章节，错字很多，有的书还杂入其他书的篇章节等等。

以上情况说明，汉初流传于社会或保存于朝廷的图书，是一堆丛杂、散乱的传钞本。特别是竹简书，年长日久，编断简散，更是混乱。西汉前、中期，社会物质条件有了改观，文化事业逐步进展，在刘向之前有了两汉收书整理工作，除了前边提到萧何、韩信、张苍、叔孙通、杨仆等人的整理工作外，还有后苍、戴德、戴良对《礼记》的校定，张子乔对《申子》的校定等，但是大多数书籍积蓄于秘府中近二百年仍未经清理校订。这些书籍利用起来很不方便，所以急需有一次全面的校书工作。

从保存下来的《别录》内容，可以看出，刘向等人校书工作的几个方面：一是集中一书各种不同的本子，如校《管子》书，除用秘府藏书之外，还用了太史官府的藏书和其他三种私人藏书，然后互相比较，校出错字和缺漏。二是将残缺的互相补充，重复的删除。例如《晏子叙录》说："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重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

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三是整理编次书的篇章。有的书籍篇章杂乱，前后无序，则要按内容给予重编。如校《说苑》，原来是“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次序”，于是必须“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见刘向《说苑叙录》）。四是对一些篇名、书名杂出的书重定新名。如《战国策》一书，有《战国策书》、《国事》、《短长》等七个名称，后定名为《战国策》。五是将校后的书籍抄成定本，刘向在每篇叙录的结尾，常说到“皆已定，以杀青书，可缮定”。据王重民先生考证，所谓“杀青”，是一种青竹简，这种竹简是用新竹刚做成的，比较容易削改，常用来起草稿，但新竹水分多，容易生蛀虫，不便保存，所以必须誊抄在加工过的竹简上。刘向说：“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太平御览》卷六0六引刘向《别录》）书籍抄在加工过的竹简上，再用丝带或皮带编连起来，就可作保存而不易乱编（见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第19页）。以上五个环节就是刘向、刘歆等人校书的全过程。刘向主持的校书活动是对当时重要文化典籍的一次总结性大整理，也正是因为有这次大规模的校书活动作为基础，才有《别录》、《七略》两部综合目录出现的可能。

三、《别录》与《七略》

通过校书，刘向整理了古籍，也从中了解到各种书籍的状况、篇章以及作者情况，在这个基础上，刘向“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最后形成第一部综合目录《别录》。刘向死后，刘歆继承父业，受命领校群书，并在已有的校书成果及《别录》的基础上，撰成第一部分类综合目录——《七略》。

《别录》是一部有书名、有解题的综合目录，刘向校书时，虽然已有了按学术 类别的分工，对于书籍的分类也应该说有了大致的构想，但他在去世前还来不及对《别录》作详细的分类、条理，组织不甚严密。《七略》则是有书名、有序、有解题的分类目录，组织比较

严密，系统也比较完整。《汉书·刘歆传》说："歆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这是对刘歆最后确立《七略》分类体系的肯定。有关《别录》、《七略》的体例、结构，前文已多次讲述，这里将重点阐述这两部目录在成书、流传中的几个问题及二书的意义。

（一）两书的流传

《别录》、《七略》流传到唐末五代之后，就失传了。宋初的学者看不到这两部目录，因为宋代目录，除《新唐书·艺文志》之外，北宋早期编制的《崇文总目》就不著录了。以后的目录书也都没有著录。《新唐志》虽然成书在《崇文总目》之后，但它的著录内容大部分抄录作于五代的《旧唐志》。因而可以说，宋代《别录》、《七略》已经不存。清代学者为了恢复二书的面貌，作了大量的辑佚工作，对于二书的辑佚有严可均《全汉文》、洪颐煊《问经堂经典集林》、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篇》、张选青《受经堂丛书》、陶濬宣《蓟江馆辑补书》、姚振宗《快阁师石山房丛书》、顾觐光抄本（北京图书馆馆藏）等八种辑本，其中以姚振宗《快阁师石山房丛书》中的辑本为较好。大概《别录》留下来较完整的叙录有《晏子》、《列子》、《孙卿新书》、《韩非子》、《战国策》、《邓析子》、《管子》、《山海经》等八篇叙录，其中《山海经》叙录是刘歆写的。由于《别录》、《七略》早佚，二书全面的著录情况，著录的总卷数，现已不能有确定的结论。好在《七略》虽经《汉书·艺文志》删节、改动，但还是保留了它的概貌。通过《汉志》，可以了解《七略》著录的大致内容。

（二）两书成书的先后

自清代以后，有的学者认为《七略》成书在前，《别录》成书在后，这与一般的看法是绝然不同的。例如清代目录学家姚振宗在《七略别录佚文叙说》、近人程会昌在《目录学丛考》中就持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刘向生前校书没有完成，因面可以推知《别录》也没有成书，《别录》是在《七略》奏进以后，才把刘向撰写的内容别此一

录，汇集而成的。

但是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别录》成书在前，《七略》成书在后。其实，这个问题在梁朝阮孝绪的《七录》叙中早有说明，他说："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辩其谬误，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子歆撮其指要，著为《七略》。"这段话的意思有这么两点：一是说刘向校完书都写一篇叙录，附在书中奏进皇帝，同时又把叙录另抄一份，集中起来成为《别录》一书；二是说刘歆在《别录》的内容中撮其概要，再编成《七略》。这也就是《七略》能在一两年内快速编成的原因。

（三）《别录》与《七略别录》

刘向的《别录》，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上皆著录为《七略别录》，为什么《别录》又称《七略别录》？这两者是否同一部书？后人有各种不同的猜测。

梁启超、姚名达认为《别录》是《七略别录》的通称，就如人们把《太史公书》称为《史记》一样（见梁启超《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溯源篇》）。

章炳麟在《检论》中认为两者是一部书，因为里边包括《七略》的内容，所以称《七略别录》。

清人姚振宗在《七略别录佚文叙说》中则认为《七略》成书在前，《七略》之后别此一录，叫《七略别录》。

总之，各家都认为《别录》与《七略别录》是一部书，但为什么有此别称，意见不一。

最早称《七略别录》的，是《隋书·经籍志》，它在史部簿类中著录："《七略别录》二十卷，刘向撰。《七略》七卷，刘歆撰。"从以上著录看，《七略别录》与《七略》显然是两部书，而且《七略别录》也不会是《别录》与《七略》的合订本，因为在其下注明的作者只有刘向一人。在《隋书·经籍志》之前，《七录》只称《别录》，唐代《别录》的名称也还流行，颜师古注《汉书》引用刘向叙录时，都称《别录》，《晋书

·荀勖传》称《别录》；连《隋书·经籍志》史部·簿录类的小序，也还说："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是否可以认为，唐初称《七略别录》，是人们在书名上加的称呼，用以表示《别录》与《七略》二者的联系，而在内容上与原书并无区别。

（四）《别录》、《七略》的意义

《别录》、《七略》的编撰，对后世有极大的学术影响。

首先是创制了目录编制工作的整套工作程序——从广搜异本，比勘同异，考定是非，到类次归属，撰写书录，编制全目。这套校书编目的程序对后世有深刻的影响，例如《晋书·荀勖传》记载朝廷命荀勖、张华校书编目，就是"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一直到清代编纂《四库全书》，编写《四库总目》，基本上还是沿袭了这套程序。

其次是创立了古籍目录的体例，《别录》、《七略》有关著录、分类的方法，以及小序、解题的形式，都为后世目录书立下范例。在此基础上，形成发展了多种多样的古籍目录，因此《别录》、《七略》是古籍目录的奠基石。

其三，《别录》、《七略》编制过程中的校书经验为后代所继承。后世兴起的校勘学许多内容来自刘向、刘歆的校书经验。搜集众本，比较异同，整理错简，判别正误，这些校勘典籍所必须的程序和内容，在刘向当时都已具备和确定。在刘向所写的叙录中，能根据脱简确定脱文，根据"本"误脱为"半"的情况确定误字通例，可知他对致误原因有初步归纳。又从以"尽"为"进"，以"贤"为"形"，以"先"为"牛"等例证中，也可看到刘向对于形似、同音的误字别字，也有察觉。因此，刘向等人的校书经验及《别录》、《七略》有关的校勘内容，在校勘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第四，《别录》、《七略》中的许多学术观点常常被后代学者利用。例如，班固作《汉书》，就在《贾谊传》、《董仲舒传》、《司马迁传》、《东方朔传》等人物列传中经常引用刘向、刘歆的著录和观点。汉唐

之际的一些学术著作中也可以看到对这两部书内容的引用。

四、东汉的典籍聚求与整理

西汉末，由于王莽篡权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和战乱，图书也受到很大的损失。不少儒士学者，纷纷携带藏书，逃遁山林。东汉光武帝刘秀重定政权以后，注意求访儒雅，并开始“采求阙文，补缀漏逸”等收集图书工作，以恢复国家藏书，于是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策，云集京师”(《后汉书·儒林传序》)，纷纷向政府献书。此外，刘秀又把西汉残存的图书和档案从西安迁运到首都洛阳，“载之两千余两(辆)”(同上)，这是东汉初对图书的聚求。

明帝、章帝时继续向民间求书，搜访典籍，《隋书·经籍志》总序说：“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帙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东汉初年收集到的典籍已将石室、兰台两处藏满，于是又开辟了东观、仁寿阁两处新的藏书库。据《后汉书·儒林传序》记载，此时的藏书“三倍于前”。明、章以后，朝廷收藏的图书仍在继续增长，至和帝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于前。”(《隋书·牛弘传》)东汉典籍的增长，除了民间献交所藏旧籍外，另一重要原因是各种公私著述的不断丰富。

东汉时期对于典籍的整理，虽然规模不比西汉，但次数也不少。见于文献记载的大约有四次。

明帝时，在积累了大批图书以后，开始进行有组织的整理工作，命“傅毅为兰台令史，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通志·职官略》四)对明帝时组织的这次校书活动，梁朝阮孝绪还有另外的记载。他说：

“歆遂总括群篇，奏其《七略》。及后汉兰台犹为书部，又于东观、仁寿闼(阁)撰集新记，校书郎班固、傅毅并典秘籍。”

这段话有这么几层意思，一是班、傅二人负责典籍校理国家藏

书；二是兰台所藏典籍多为西汉所存，故以刘歆《七略》作为藏书目部次典藏；三是东观、仁寿阁收藏为新书，经校理之后，按《七略》的体系，编写新的书目。对这段史实，《隋书·经籍志序》有类似的记载，曰："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从《七录》、《隋志》的记载看，东汉好像编写了国家书目。王重民先生认为是编了新的藏书目：《东观新记》和《仁寿阁新记》，但这两部目是简单的登记性目录（见《中国目录学史论丛》第二十九页）。但来新夏先生认为《七录》所言不是指编写新书目，而是撰集《东观汉记》（见《古典目录学浅说》，第六十六页）。这是东汉较早的一次校书。

安帝永初四年（公元 110 年），"邓太后诏谒者仆射刘珍与校书刘騊駼、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后汉书》卷一百一十）这次校书活动由长乐太仆蔡伦"监典其事"。

顺帝永和元年（公元 136 年）又令伏无忌、黄景等人"校定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后汉书》卷五十六）。

灵帝熹平初年，蔡邕"拜郎中，校书东观"，整理经学典籍，熹平四年（公元 175 年），蔡邕与杨赐、马日磾、张驯、韩说奏请正定五经文字，于是将整理过的儒经刻在石上，立石经于太学门外（《后汉书》卷九十），史称"熹平石经"。

五、班固《汉书·艺文志》

东汉时期对典籍的收藏和整理虽然卓有成效，但是未能传下系统完整的国家书目，东汉一代目录事业的成就，集中表现在班固所撰的《汉书·艺文志》。

（一）《汉书·艺文志》的编撰

班固（公元 32——92 年），字孟坚，扶风（今陕西咸阳）人，是东汉初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和目录学家。班固的父亲班彪专心著

史，写了数十篇传记准备续《史记》，书未成而死。班固继承父业，续写史书，被人告发“私改国史”，结果下狱，后来由于他的弟弟班超多次上书分辩才得出狱。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被召任兰台令史，后为校书郎，典校秘书。两年后他将陆续撰成的《世祖本纪》及有关列传28篇，奏上明帝，受到明帝的赞赏。于是诏令他续修其父未成的史书，历时20余年，写出了《汉书》的大部分内容。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固升为玄武司马。第二年十一月与诸儒会集白虎观，讨论五经同异。这是东汉学术界的一件大事，章帝亲自主持了会议，诸王也都参加讨论。班而以史官兼记录之职，将讨论的情况写成《白虎通义》一书。永元元年（公元89年）班固为中护军，随大将窦宪出征匈奴，大获全胜。窦宪归朝后由擅权被杀，永元四年（公元92年）班固也因此受牵连下狱，最后死于狱中，终年60岁。班固还善于作赋，《西都赋》是汉赋的优秀作品。后人将他的著作辑为《班兰台集》。班固死时，《汉书》的八表与天文志还没写成，由马续及班固之妹班昭完成。

《汉书·艺文志》，是《汉书》的一部分。班固的仲祖班斿博学多才，曾经与刘向一起校中秘书。成帝很器重他的才能，把秘书的副本赏赐给他。这为班固父子撰写《汉书》提供了有利条件。班斿对刘向父子的目录事业有较多的了解，他在世时间较长，班而有可能从班斿那里知道刘向父子的许多事迹。班固对刘向是推崇备至的，他在《汉书》多处提到刘向的校书，他在《汉书·刘向传》中称刘向是“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的人才，对刘向的评价较高。可以说，班固是在刘向、刘歆的影响下，编撰《汉志》、创立史志目录的，因为在《汉书》前的《史记》，并没有目录。从客观条件上看，班固在兰台、东观典掌图书多年，经常使用《七略》校勘典籍，不但熟悉了《七略》，也了解各种图书的状况，因此他能比较准确熟练地改造《七略》，编成《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的编写，是以《七略》为蓝本，进行删节改写

的。《汉书·艺文志序》说得很清楚："今删其要，以备篇籍。"班固继承《别录》、《七略》已有的成果，进行剪裁编次，形成新的目录，以史书记载的形式，反映了西汉一代藏书之盛。

(二)《汉书·艺文志》的体例

《汉志》是类序体目录，分六略三十八小类，全书有总序、各略有大序、各小类大部分有小序(除《诗赋略》五小类外)。著录596家著作，共13269卷。

《汉志》对于书名的著录方法可归纳为四种：

一是先著撰人，后著书名、卷数。如"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基本上都以撰者在前，书名卷数在后。有一特殊情况，就是著录传述者时，先著书名篇卷数后著传人，如"《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

二是著书名、篇卷，而不录撰人。如"《淮南内》二十一篇。"

三是以撰人名或官爵为书名，后系篇卷。如"《陆贾》二十三篇，《太史公》百三十篇。"

四是以撰人和文体作为书名，后附篇卷。如"《屈原赋》二十五篇"，"《高祖歌诗》二篇"等。

《汉志》删除了《七略》的解题，而以附注的形式，在一些书名下，对书籍的状况作简要说明。为什么要删除解题？张舜徽先生认为"《艺文》只是史之一篇，使每书名下而为解题，则卷帙过繁，故只存书目。"(见《汉书艺文志释例》)这种精简的方法，为后来的史志目录所遵循。《汉志》的附注很简短，三言两语，所注重点各不相同，有的注撰人，有的注内容，有的注性质，有的注篇章，有的注真伪，有的注附录，大概是这么六方面。

研究今天的《汉书·艺文志》，发现《汉志》也即《七略》在著录方法上有两种特殊的处理形式，引起了学术界长期的争论，这就是"互著"与"别裁"的方法。所谓互著，是指同一部书在内容上明显地

包含不同学科的知识，于是在不同的部类中重复著录，以便读者有多种利用的途径。这种重复著录的情况，在《七略》原来的著录中，“兵书略”里边就有十部二百七十一篇与其它略的著录重复，班固作《汉书·艺文志》时，将这十部书从“兵书略”中省掉了，但除此之外，《汉志》中仍然存在书名相同而在不同类书中重复出现的情况，例如“诸子略”儒家类著录的《景子》，在“兵书略”兵形势类中又著录；“诸子略”杂家类中著录的《伍子胥》，在“兵书略”兵技巧类中又著录；还有其它十二部书出现这种情况。清人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认为这就是刘向、刘歆的互著，不少学者也同意这种说法。但是，王重民、吕绍虞先生皆否认《七略》、《汉志》中存在互著。王重民先生在《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论述《七略》“兵书略”中重复著录的十部书是著录在其它略类中原书的别行本，因张良、韩信申军法，杨仆纪奏《兵录》时，认为这些书包含有兵家的内容，便收入兵书书库中，任宏校定兵书时，未能与刘向、刘歆取得联系，而重复收入《七略》，因此班固才将这些书从“兵书略”中省去。至于“兵书略”外重复著录的另十四种书，吕绍虞先生在《中国目录学史稿》中专门列表进行比较，说明重复著录的书只是书名同而篇卷数不同，因此不是同书互著而是同名异书。但主张存在互著法的学者认为虽然篇卷数不同，却是同一部书的不同传本。这种“同书不同传本”的说法颇有可疑之处，略辩如下：

其一，刘向、刘歆校书过程是广求异本，经删重复、订讹误、谨编次后确立定本，因此一般情况下不会在《七略》中著录不同的传本，不然还有什么定本可言。即使是由于分工不同、照顾不到，在“兵书略”中有一些别行本录人，但在刘向自己负责的“诸子略”中总不至于收人两个传本吧。因此，“诸子略”中分别录于儒家、杂家的《公孙庄子》，分别录于道家、小说家的《伊尹》、《鬻子》，其实都是同名异书，其它重复著录而班固又未省去的书，大致也是这种情况。

其二，仔细考察现存《汉书·艺文志》的附注内容，也可看出这些重复著录的书虽同名却不同书。例如，著录于道家类的《伊尹》五十一篇下注作者官职为"汤相"，著录于小说家的《伊尹》二十七篇下注："其语浅薄，似依托也。"著录于道家类的《鬻子》二十二篇下注明了作者情况；著录于小说类的《鬻子》十九篇下注："后世所加"。可知名虽相同，书却不同。又如"诸子略"杂家中录《伍子胥》八篇，下注作者情况："名员，春秋时吴将，忠直遇谗死。"而"兵书略"兵形势的《伍子胥》十篇，不注作者，却注有"图一卷"，说明其内容彼此不同。

综上所述，可见王重民、吕绍虞两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至于别裁，章学诚认为《七略》有别裁，王、吕二先生也不同意这种说法。所谓别裁，是指一书中有的篇章内容可归属其它学科门类的，将其单独裁出著录它类，同样是方便读者对一书的多种利用。认为《七略》、《汉志》有别裁的学者，常举的例子是《管子》收于"诸子略"道家类，但《管子》的《弟子职》一篇却单收于"六艺略"孝经类；《七十子所记》收于"六艺略"礼类，但其中的《三朝记》一篇却单收于"六艺略"论语类。以上例子也很难说明《七略》、《汉志》有了别裁之法，因为《弟子职》和《三朝记》很可能早就作为单行本在社会流传，刘向、刘歆收书时便将其作为独立的单本著录了。另外，也可能是同名异文，即名称相同而内容不同。《管子》中有《内业》篇，"诸子略"儒家类中著录的《内业》却有十五篇，下注"不知作书者"，可见此《内业》大概不是彼《内业》。

总之，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将互著、别裁系统地总结为目录著录的重要法则，这是非常可贵的。但是，在其一千多年前的刘歆、班固，则不可能有意识地运用这两种著录方法。

（三）《汉志》对《七略》的改造

《汉志》是删抄《七略》而成的，但并不等于简单地删节抄录，而是有所改造，表现有几点：

(1)对《七略》的著录有增减调整　　这些变动在《汉志》中用“入”、“出入”、“省”等字标明。“入”是《七略》无而新增入的书，如“六艺略”增入刘向《稽疑》一篇，扬雄《苍颉训纂》一篇，杜林《苍颉训纂》一篇，《苍颉故》一篇；“诸子略”增入《扬雄》三十八篇；“诗赋略”增入《扬雄赋》八篇。总共增入刘向、扬雄、杜林三人的著作五十篇。“出入”就是调整归类，如“兵书略”权谋就有“出《司马法》入礼也。”“诸子略”中出《蹴鞠》二十五篇，归入“兵书略”兵技巧。“省”就是减去，“兵家略”的总计说：“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因“兵家略”著录的这十家著作与其它略的著录有重复，故无须保留，将其删除。班固以注明“入”、“出入”、“省”的办法，既修改了《七略》的著录内容，也保留了《七略》原来的面貌，这种求实精神是可取的。

(2)增注亡佚　　西汉藏书经历了王莽时兵火之劫，有不少损失，所存的藏书后来虽经光武帝从长安迁至洛阳，进行保存，同时向民间求书补充，但有些书已无法补救。班固在检查兰台藏书时，对一些书的缺佚情况进行补充说明，如“六艺略”小学类《史籀》十五篇，下注：“建武时亡六篇矣。”说明在东汉初混乱时，造成此书残缺。又如春秋类《夹氏传》十一卷下注：“有录无书”。《隋书·经籍志》在春秋类小序中提到：“王莽之乱，夹氏亡。”可以说明《七略》本有此书，亡佚后再由班固注明的。

(3)引《七略》的文字有所改易　　例如《艺文类聚》卷十二“帝王部”汉武帝条引《七略》总序曰：

> 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

这段文字在《汉书·艺文志》的总序中，有较大的改动。其曰：

>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可以看出，这是班固在《七略》原意上新作的内容，相比《七略》原文，将"广开献书之路"的时间提前至汉初，因高祖时就有萧何的收书，文帝时便已除挟书令，所以更为准确。此外，也补充了像汉武帝"喟然而称"这样较为生动的史实。又如《六艺略序》的有些文字也是改动《七略·辑略》的。《初学记》文部言诗，引《七略》曰：

《诗》以言情，情者信之符也。《书》以断言，断者心之证也。

《汉志》"六艺略"大序则改曰：

《诗》以正言，义之用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断事，信之符言也。

(4)著录的书名也有不同　如"六艺略"易类《淮南道训》在《七略》时原称《易传淮南九师道训》(见《文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注引)。又如《史记正义》引《七略》说："《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而《汉志》"诸子略"儒家则只称书名为《晏子》。

由此可见《汉志》不是简单删抄《七略》，而是有所改造的。

(四)《汉志》的意义

《汉志》是现存最早的目录书，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汉志》开创了根据国家书目编制正史目录的先例。此后，《隋书》、新旧《唐书》、《宋史》、《明史》乃至《清史稿》都编有目录，在正史中留下了一朝藏书或一朝著作的记载。

其次，由于《七略》在唐五代后失传，因此，有关先秦西汉著作的状况，有关周秦间各派学术的渊源及发展，大部分要依据《汉志》的记载。《汉志》为后世的学术研究保存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以上两点是《汉志》的学术意义，由于它是现存最早的古代书目，所以历代学者对它的研究著述很多，首先是唐代颜师古的注，颜氏为《汉书》作注，当然也包括了《艺文志》，主要是解释书名、撰人和内容，许多材料引自《别录》和《七略》。清人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又补充了一些成果。第一部专门研究《汉志》的著作是宋王应麟的《汉书艺文志考证》，此后，还有清人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

《汉书艺文志条理》，刘光贲《前汉书艺文志注》，王仁俊《汉书艺文志考证校补》，康有为《汉书艺文志辩伪》，近人有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姚明辉《汉书艺文志注解》，许本裕《汉书艺文志笺》，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余嘉锡《汉书艺文志索隐》（稿本），张舜徽先生《汉书艺文志释例》（附于《广校雠通义》之后）等。另有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陈国庆所编的《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此书引用古今人论著四五十种，将其中有关《汉书·艺文志》的考释采撷汇编于《汉志》相关内容之下，集各家之言，使用起来颇为方便。

汉代是古代目录事业的正式开端，在此期间出现的国家书目与史志目录，为古籍目录学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包括三国、两晋及南北朝，即公元220—581年三百多年期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争频繁、政局动荡的时代，在兵火劫乱之间，书籍难免要受到损害。但是由于东汉时蔡伦在已有的造纸技术上创造了造纸的新法，纸的使用，对文化典籍的发展，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另外，当时在文学方面有五言诗、乐府诗、文学批评著作，史学方面有起居注、地方志、氏族谱和史注等新体裁的著作的出现；综合性图书如《皇览》等类书的编纂，《文选》、《弘明集》等总集的汇编；宗教方面，外来佛经的译著和本土道教典籍不断增多。这些都对书籍整理和目录和编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再者，各时期的割据势力虽然相互征战，但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也不能完全置文化事业于不顾，因此，此期各个封建王朝，还是继承了汉以来集书校书的遗规，设置典校图书的秘书监，收集书籍，编制国家书目。许多著名学者，如曹魏时的秘书郎郑默，西晋的秘书监荀勗，东晋时的著作郎李充，刘宋的秘书监谢灵运、秘书丞王俭，萧齐的秘书丞王亮、秘书监谢朏，萧梁时秘书监任昉、秘书丞殷钧

等，皆主持过整理图书编制书目的工作，并为此作出贡献。除国家书目外，私家目录也开始出现。这些目录，反映了这一时期书籍流传的状况，在目录方法上也有了改进，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古籍目录的发展。下边分三个方面作介绍和总结。

一、国家书目的编制

（一）三国时期的国家书目

东汉末，西汉积累起来的图书遭受了极大的破坏，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 190 年），董卓挟汉献帝从洛阳迁都长安，《后汉书·儒林传序》曰："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群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籍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才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这里说到典籍的毁坏，前后共有三次。一是迁都时的混乱，二是路途跋涉的遗弃，三是兴平二年（公元 195 年），李傕与郭汜在长安相攻，焚烧宫室时的损失。

三国是魏、蜀、吴三足鼎立的时期，曹魏作为三国中的强者，在它夺取东汉政权之后，曾积极地进行过图书征集编目工作。曹操、曹丕等父子数人，雅好文事，时文人学士多集邺下，著述日盛，再加上多方搜求图书，注意典藏和整理，所以目录工作较有成效。《隋书·经籍志序》概括其事说："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中经》是国家内部藏书目录的意思。郑默（公元 213—281 年）字思元，开封人，经历过曹魏、西晋两朝。在曹魏时任秘书郎，入晋后任东郡太守，光禄勋，在《晋书·郑袤传》中附有他的传记。郑默在当时社会上有名气，主管图书工作中作了比较细致的校勘和分类工作，然后撰成《中经》。这部目录已久佚，很难评论它的内容和成就，但《初学记》卷十二引王隐《晋书》，记述郑默编撰《中经》之后，"中书令虞松谓曰：'而今而后，朱紫别矣。'"图书因此而各有区别，可见《中经》是一部分类目录。此

外，梁朝阮孝绪在《七录序》中说："荀勗因魏《中经》更著《新簿》。"《新簿》将书籍分为四类，如此，则郑默的《中经》很可能是一部以四部分类的国家书目，它对古籍目录的四分法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蜀国偏处西南，但自称是承刘汉正统，所以依照东汉制度，设立东观收藏国家藏书，以郤正为秘书郎，主管书籍。吴据江东，也设有图书的专门机构和人员。孙休时还任命著名学者韦昭为中书郎，"命昭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三国志·吴书》卷二)。可见蜀、吴都做了集书、校书的工作，但是否编制过目录，还有待发掘史料来说明。

根据清人姚振宗《三国艺文志》的辑录，魏、蜀、吴三国时的著述，"并四部及释道，计之约共1122部，4562卷，又1779篇"。约略可补三国时典籍状况。

(二)两晋的国家书目

西晋的统一，使社会经济得到初步稳定，文化也随之得到恢复和发展。因此，图书的征集和典藏工作逐步展开，书籍数量增多，目录事业也取得一定成就，这主要休现在荀勗的目录工作上。

荀勗(公元？—289)字公曾，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是西晋文学家、音乐家、目录学家。初仕魏，入晋后为中书监、秘书监，后任尚书令。据《晋书·荀勗传》及其它材料记载，他在目录事业上，做了几方面的工作。一是与中书令张华合作，"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由于整理的书籍数量很多，荀勗不得不辞去了他负责音乐方面的职务。他在奏报《让乐事表》中曰："臣掌著作，又知秘书，今覆校错误十万余卷。"(见《北堂书钞》卷一百零一引)，可见校书的规模很大。二是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河南汲郡古墓发现一批古代竹简，即汲冢竹书，荀勗对此进行了整理编目，纳人国家藏书。三是编写综合性的国家书目——《中经新簿》。

《中经新簿》正文十六卷，另附佛经二卷，共著录图书1885部，20935卷。(据《古今书最》，此目与阮孝绪《七录序》共保存于唐释

道宣《广弘明集》卷三。)分甲、乙、丙、丁四部,甲部相当于《七略》的"六艺略",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乙部收诸子、数术、兵书等书;丙部收史部书与类书;丁部收诗赋、图赞、汲冢书。《中经新簿》只有书名、卷数、撰人,而无解题、附注、小序,所以《隋书·经籍志》说它"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登记书目的体裁,自此开始。

荀勗及《中经新簿》的成就是,变革了旧的分类体系,建立了四部分类的规制,较好地反映了《七略》成书后三百年内,由于时代变迁、学术发展带来的文化典籍范围的扩大和变化,《中经新薄》著录典籍二万余卷,相比《七略》著录的一万余卷,数量超过了一倍,经过战火洗劫仍能保存下来如此数量的图书,说明东汉至三国二百多年时间内,我国文化典籍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另外,《中经新簿》著录图书的丰富,为东晋到唐代学者考查当时图书的残佚、真伪,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中经新簿》完成后不久,西晋发生争夺皇权的"八王之乱",此后,中国北部的匈奴族首领刘聪率兵攻陷了洛阳、长安,"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隋书·经籍志序》)。荀勗、张华整理过的图书在这些战乱中焚烧、散失殆尽。据梁朝《古今书最》记载,《中经新簿》所录 1885 部书,"一千一百一十九部亡,七百六十部存",损失三分之二。直到东晋初才重新收集图书,并由李充整理编目。

李充字弘度,江夏(今湖北安陆)人。东晋时的学者、书法家和目录学家。历官至中书侍郎,《晋书》中有传。他主持整理图书,并编制了《晋元帝四部书目》。李充整理书籍编目时,所存的图书只有 3014 卷,比起荀勗时编目的存书相差甚多,由于存书数量较少,所以李充编目,"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隋书·经籍志序》)也就是说,他的书目只分四部而立小类。它的四部分类虽是承袭《中经新簿》的方法,但次序有了变更。据阮孝绪《七录》序所记,李充的目录更换了原来乙、丙两部的顺序,即甲部纪经书,乙部纪史书,丙部纪子书,丁部纪集书。李充确定的四部分类次序,一直被

后世沿用，所谓“自尔因循、无所变革”（《隋书·经籍志序》），正说明他在目录事业发展史上的贡献。

此后东晋王朝仍继续进行过图书收集、整理和编目工作。据《续晋阳秋》所记，东晋孝武帝（公元373——396年在位）时，“诏著作郎徐广，校秘阁四部见书，凡三万六千卷。”（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所引）此三万多卷有可能一部分是重抄副本，但总的来说，数量比东晋初年要大大增加。经过十余年的收集整理，东晋义熙四年（公元408年）又编制了《晋义熙四年秘阁四部目录》，但此目撰者及所著录图书总数未见文献记载。

西晋、东晋的两部国家书目著录了当时书籍的状况，并且在目录分类上，完成了四部分类法由创始到建立、确定的全过程，对后世的目录编制有很大的影响。

（三）南北朝的国家书目

南朝指宋、齐、梁、陈四朝，各朝统治的时间虽不甚长，但都对书籍进行过整理和编目。南朝宋武帝在东晋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入关，“收其图书，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隋书·牛弘传》）。此后，典籍渐增，至宋文帝时，命秘书监谢灵运“整理秘阁书，补足阙文”（《宋书·谢灵运传》）。梁朝对图书的收集和整理也是比较突出的，《隋书·经籍志序》记载梁朝承接南齐遗书，“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在整理书籍的过程中，梁朝还注意到对精善本的挑选，有了“正御本”的概念，其意义是指选择精本，剔除复本，作为国家正式藏书，这种做法沿袭到隋代。梁元帝时图书收藏和校勘活动皆达到高潮，颜之推在《观我生赋》自注中记载了当时藏书校书的情况，可作参考。注曰：“王司徒表送秘阁旧事八万卷，乃诏比校，部分为正御、副御、重杂三本。左民尚书周弘正、黄门郎彭僧朗、直省学士王圭、戴陵校经部；左仆射王褒、吏部尚书宗怀正、员外郎颜之推、直学士刘仁英校史部；廷尉卿殷不害、御史中丞王孝纯、中书郎

邓悫、金部郎中徐报校子部；右卫将军庾信、中书郎王固、晋安王文学宗菩业、直省学士周确校集部也。"(《北齐书·颜之推传》)这段材料反映了梁朝藏书数量及其对图书质量的区分，反映了当时校书规模及分工情况，这里还首次提到经史子集四部名称，代替了此前四部分类只称甲乙丙丁的简单说法。

据《古今书最》和《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其它文献的记载皆有出入，不甚可靠，特以二书为准)，南朝四朝所编的国家书目及著录的藏书情况如下：

《宋元嘉八年四部目录》

谢灵运、殷淳撰，著录图书 1564 帙，14582 卷，又有佛经 55 帙，438 卷。

《宋元徽元年秘阁四部书目录》

王俭撰，著录图书 2020 帙，15074 卷。

《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

王亮、谢朏撰，著录图书 2332 帙，18010 卷。

《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

刘孝标、祖暅撰，著录图书 2968 帙，23106 卷。

《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

任昉、殷钧撰，不见有卷帙数记载。《古今书最》曰："秘阁四部书少于文德书，故不录其数也。"

《陈天嘉六年寿安殿四部目录》

《陈德教殿四部目录》

以上二目皆无作者与著录卷数。

以上官修国家书目的情况，说明南朝书目工作的延续性，同时，在著录的图书数量上，由东晋初藏书的三千余卷到梁朝藏书二万余卷这一数量的变化，反映出国家藏书的恢复和发展。

北朝是指与南朝并存，占据北方广大地区的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先是北魏，后又分为北齐和北周，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向汉族统

治者学习统治经验，并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虽然图书目录事业没有显著的发展，但也做了一些征集、整理、编目的工作。

（1）北魏的目录　　北魏早在立国之初，太祖便接受博士李先的建议，让各州郡县"搜索备送"典籍，"太祖于是班制天下，经籍稍集"（《魏书·儒林传》）。北魏孝文帝时，积极推行鲜卑人汉化政策，他命人检查了北魏缺书的情况，编定《魏阙书目录》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让人到南齐去按目借书。迁都洛阳以后，又诏求遗书于天下。北魏宣武帝时，秘书丞孙惠蔚上疏请求征集整理图书，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校书活动。他在疏文中提到秘书丞卢昶曾编一目录，称《甲乙新录》（见《魏书·孙惠蔚传》）。以上两目即是北魏编制的简单目录。

（2）北齐的目录　　北齐在接受东魏、东夏的藏书后，仍有所收集，但图书质量不高。天保七年（公元 556 年）诏令樊逊、高乾和等十一人校定图书，"时秘府书籍纰缪者多"，于是便向邢子才、魏收等"多书之家"借书参校，"凡得别本三千余卷，五经诸史，殆无遗阙"（《北齐书·樊逊传》）。隋朝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说："高氏据有山东，初亦采访，验其本目，残缺犹多。"（《隋书·牛弘传》）可见北齐也曾编制国家书目。

（3）北周的目录　　北周继承两魏的图书，约八千卷左右，以后经过收集，达到万卷。北周也有校书活动，明帝即位后，曾经"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千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周书》卷四）。周武帝灭北齐后"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隋书·经籍志序》）。北周从北齐藏书中选出所需典籍五千卷，连同原有藏书，总量达 15000 卷。唐代封演的《封氏见闻记》卷二曰："后周定目，书也八千。"可知北周初年，大概根据已有图书编过目录。

总的来说，北朝虽然在书籍的整理、编目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都比较简单粗糙，几部目录都未能得到流传，北朝的目录事业要比南朝逊色许多。

二、私家目录的编撰

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私人撰写的书目，宋齐间的私人藏书多备有目录（见阮孝绪《七录》序）。除了个人编写私藏书目外，还有个别见识广博的学者，超出私人藏书的范围，广泛著录流传于社会的各种图书，编制成内容丰富、体例严整的私家目录，这就是王俭编制的《七志》与阮孝绪编制的《七录》。

（一）王俭与《七志》

王俭（公元452--487年），字仲宝，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刘宋秘书丞，王室驸马。后反而辅佐齐高帝即位，任侍中、尚书令、中书监，《南齐书》中有传。由于他在宋齐两朝都是比较活跃的政治人物，又与当时的学者多有交往，有许多门生故吏，所以他能博览公私藏书，有编制目录的优越条件。

宋元徽元年（公元473年）王俭主持撰成《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四卷，同时，他自己修撰的《七志》也在当年完成。《宋书·后废帝纪》曰："元徽元年八月，王俭表上所撰《七志》卅卷。"（《南齐书·王俭传》作四十卷）《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是国家书目，《七志》是私家目录，后者的份量几乎是前者的十倍，而且其成就远远超过了前者，因为它不仅开私人编目之端，而且在目录方法和著录内容上都有较大的贡献。

《七志》虽已亡佚，但根据《隋书·经籍志》及其它文献对《七志》体制的记载，可以了解《七志》的基本概况。《七志》是一部解题目录，除著录书目外，有序，有传录体解题。书目前有九篇条例，据《南齐书·王俭传》记载，《七志》完成后，王俭"上表献之，表辞甚典"，就是说《七志》应有上书表和条例。《七志》在《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均著录为《今书七志》，张舜徽先生在《广校雠略》卷三曰："造书目者止录当代著述始于王俭《七志》。"王重民先生也是如此看法，认为《七志》著录的是今人之书、当代著述

（见《中国目录学史论丛》第五十九页）。它的分类采用七分法，阮孝绪的《七录序》说它"以向、歆虽云《七略》，实有六条，故别立图谱一志，以全七限"。这就是说，《七志》是在《七略》的六分法基础上有所继承和变化，前边的六类如《七略》的六分，又加上图谱一类，此外还附录佛经和道经。应该说《七志》在图书分类的改动上，成就并不显著。比如，当时史书数量已很多，但却未能单立一类，而将图谱独立一类，凑成七分，事出勉强，不尽合理。但是，总的看来，《七志》在古籍目录的发展史上，有几方面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第一，《七志》继承了刘向、刘歆编制目录的优良传统，在书目之外有序，有解题，并且创立了传录体解题的形式，而不像南朝的各种国家书目，只是简单地著录书名。

第二，《七志》是最早出现的私家目录，虽然是私人编撰，但其体例和内容，远远超过了当时官修目录的水平。

第三，虽然在《七志》之前，《中经新簿》曾经附录佛经，但《七志》是最早一同著录佛经、道经著作的综合目录，它的著录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书籍流传的实际情况，扩大了著录范围。

第四，《七志》首创只记录当代著述的先例，开辟了断代目录的道路。从东晋渡江到《七志》完成的170年左右，在此期间，渡江以前的书籍本来所存甚少，又加日渐散亡；但是新的著作却大量出现，刘裕从北朝得来的四千卷图书中，有许多也是北朝人士的新著。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凭空照抄《七略》、《中经新簿》，不如按照当时所见图书的实际情况，著录"今书"。所以《七志》的这一作法，也是符合了当时图书实际的，王俭以后数百年间，《七志》是反映刘宋典籍最有参考价值的目录。一千余年以后，《明史·艺文志》标榜其"去前代之陈编，纪一朝之著述"的作法，其实王俭的《七志》早已尝试了，只不过彼此的出发点各不相同而已。

王俭在目录学研究上的成就，推动了南朝目录事业的进展。

（二）阮孝绪与《七录》

阮孝绪(479—536年),字士宗,河南尉氏人。梁朝的目录学家。阮孝绪及其目录事业与过去的目录学家有很大的不同。从刘向、刘歆到王俭,几乎都有比较显要的政治地位,不仅能尽观国家藏书,私人藏书也很丰富,又有助手协助工作,所以编目比较方便。但阮孝绪却是一名隐逸不仕的"处士",是没有政治地位的普通学者,缺乏许多必要的物质条件。他必须尽量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再加上自己加倍的刻苦努力,所以他对目录事业所作的贡献应该说是更为可贵的。阮孝绪在《七录》的序言中叙述了自己辛勤治学和编目的经过,他说到自己"少爱坟籍,长而弗倦"。读书工作不辞辛苦,"晨光才启,缃囊已散;宵漏既分,绿帙方掩"。他是在广泛披览图书,搜集各种官、私目录之后,"总集众家,更为新录"的。所以他著录的图书既非官藏也非私藏,而是据其所见所闻,对当时社会上各种典籍的广泛著录,其特征则同于后世所谓的"知见书目。"据《古今书最》记载,阮孝绪除《七录》外,还有《文字集略》、《正史删繁》、《高隐传》、《古今世代录》、《序录》、《杂文》、《声纬》等七种著作。

《七录》的体制和具体内容,由于原书久佚,已不能全部了解,但唐僧道宣在《广弘明集》卷三,保存了《七录序》和所附的《古今书最》、从而使后人不仅得知《七录》的编撰意旨和基本情况,还能对梁以前的目录略知轮廓,这两篇著作是古籍目录学研究中的重要参考文献。根据《七录序》及其它文献记载的概括可对《七录》有如下的认识:

《七录》也是一部解题目录,它的解题也属于传录体形式,它的分类体系参考了《七略》和《七志》,但有很大的创新。采用七分法,全录又分内外篇。内篇有经典录,记传录,学兵录,文集录,术技录;外篇有佛法录,仙道录。大部类下分设五十五小类,类目的设立比较合理。全书十二卷,共著录图书44526卷。从有关材料可看出《七录》在参考国家书目时,全面利用了《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

及术数书目录》。《史通·点烦篇》曰："阮孝绪《七录》，书有文德殿者，丹笔写其学。"这说明了《七录》对梁《五部目录》的利用。从《七录》内篇的五部分类上，也可看到它对《五部目录》的模仿。《七录》内篇著录图书 37983 卷，比梁《五部目录》著录 23160 卷多 14877 卷，多余的这部分图书应当是阮孝绪披览私人藏书和私藏目录补充的。

《七录》的主要成就有三个方面：

一是分类体系上有所创新。《七录》的七分法比较合理，不像《七志》的七分那么牵强。它从书籍数量的实际出发，把史书从附庸的地位提到独立部类上，设立了"记传录"。又把佛法录和仙道录纳入七部之中，以集中反映社会上出现较多的佛经、道经。此外，大部之下设立了五十五小类，形成一个较为严整的分类体系，许多小类类目的设立，为后世目录书所承袭。

二是收书甚广。著录 44526 卷图书，较之当时的国家书目《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的 23106 卷要多出近一倍。处于南北朝的动乱时期，阮孝绪在较差的条件下，独立完成这一部搜罗比较完备的目录，确实很不容易，值得肯定。

三是《七录》同《七志》一样，能够继承刘向、刘歆的目录工作传统，撰写解题，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七录》的传录体解题被后世一些典籍所引用，说明了它的价值，同时也为今天的评论提供了依据。

(三)刘杳与《古今四部书目》

刘杳在《梁书·文学传》中有传。传曰："刘杳，字士深，平原人也。……自少至长，多所著述，撰《古今四部书目》五卷行世。"刘杳的这部目录流传不广，除列传记载外，不见别处著录。阮孝绪在《七录序》中曾提到："始述此书，通人平原刘杳从余游，因说其事。杳有志积久，未获操笔，闻余已著鞭，欣然会意，凡所抄集，尽以相与，广其闻见，实有力焉。"这里说到刘杳得知阮孝绪编写《七录》一事，就

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搜集到的材料慷慨相赠，助阮孝绪编成《七录》，阮孝绪盛赞刘杳的帮助"实有力焉"，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刘杳成人之美的情操更体现了学者的胸怀。刘杳后来可能仍继续收集材料，撰成《古今四部书目》这部私家目录，在小范围中流传，否则《梁书·文学传》也无由记载。因此，《古今四部书目》也应在此提及。

三、魏晋南北朝目录事业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火烽起，政权更迭，但是仍有不少目录著作出现，这里除了社会文化需要的原因外，与古代目录学家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从此期各朝的目录事业和问世的目录书来看，这个时期的目录工作具有如下特点值得总结：

(1)四分法与七分法并行时期

这一时期的目录在分类法上，国家书目继承魏晋已来建立确定的四部分类法，以甲乙丙丁统隶各种图书；而私家目录则在汉代《七略》的基础上，有所继承，有所革新，变六分法为七分法，如《七志》和《七录》，其中又以《七录》的分类体系更为合理、严整。四分法与七分法在图书分类上虽各有体系，但也不是毫无联系的。首先，这两种分类法都是在《七略》分类体系上的改进，四分是对六分的压缩，七分是对六分的扩展，因此，它们之间有共同点。比如儒家经典书籍和诗赋文集在四分、六分、七分中都单成一大类。此外，七分与四分本身就有不少相同之处。例如阮孝绪《七录》的内篇分经典录、记传录、学兵录、文集录、术技录。前四录就是四分法的分部，如果再把术技录合并到学兵录之中，那就与四分法没有差异之处了。

不同分类体系的联系共同反映了封建文化的延续性。比如所有的分类法都有"尊经"的特征，将经学著作独立一部，置于首位；各种分类法的差异说明古代目录学家从各个角度对目录方法的研究和贡献，也说明古籍传布的发展变化。

(2)各种类型的目录不断出现

这一时期的目录著作，除国家书目外，出现了新的目录类型，如以《七志》、《七录》为代表的私家目录。私家目录的出现，丰富了古籍目录的内容，反映了民间藏书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国家书目的不足。地方目录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北齐时，宋孝王撰《关东风俗传》，内有《坟籍志》，著录当时当地的著作，创立了方志目录的形式。此外，这一时期专科目录的成就也很突出，例如宗教目录中的佛经目录和道经目录都在此期开始产生。史志目录也有新的著作，东晋末年，袁山松著成了《后汉书》，其中包括《艺文志》，《古今书最》中著录"《后汉艺文志》若干卷"。但是由于东汉一代没有国家书目留存，袁书编成又在东汉后近二百年，经东汉末"初平之乱"、西晋末"永嘉之变"的焚毁，要全面反映东汉典籍已很困难，袁山松只能根据当时所能利用的魏《中经》和西晋《中经新簿》来编写《后汉书·艺文志》，这样必然会有失实。所以梁朝刘昭在注范晔《后汉书》八志序中曰："加艺文以矫前弃，流书只采自新录，初平永嘉，图籍焚丧，尘消烟灭，焉识其限？借东晋之新墟，为东汉之故实，是以学者亦无取焉。"袁氏《后汉书·艺文志》流行不广，连《隋书·经籍志》也不曾据及此书。

(3)佛经目录的突出成就

佛教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通过大月氏的介绍，传入中国，历东汉、三国，逐渐发展起来，随汉译佛经的增多，佛经目录也应运而生。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是最早的佛经目录，产生于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公元374年)，现存最早的佛经目录是释僧祐撰成于梁武帝天监四年至十四年(公元505—515)间的《出三藏记集》。全录15卷，著录佛经2162部，凡4328卷。据统计，此期产生的佛经目录有近四十部(姚名达《中国历代佛经目录所知表》)，但是这些目录大都亡佚。佛经目录的编撰记载了佛经译著在中土流传的情况，同时保存了各时期许多文化史料，更为可贵的是佛经目录的编制方法有相当高的水平，值得一般目录借鉴和参考。

此期佛经目录的产生，推动和影响了后世佛经目录发展。其独特的编撰方法，为古代目录事业增添了光辉。

第三节　隋唐五代

一、隋唐之际的图书搜集和整理

南北朝时期、虽然各朝都有聚书整理的活动，但往往总是由于王朝的覆灭，战乱的破坏，使典籍聚而复散。此期图书的损坏以南朝更为严重，北朝虽也曾有“尔朱荣之乱”，使典籍散落，但北朝本来聚书不多，尔朱荣乱后，又经数十年积累，到北周逊隋时，图书基本保留了下来。南朝图书的散亡主要有三次：南齐东昏侯“永元末，后宫火延秘阁，图书散乱殆尽”(《梁书·王泰传》)。梁朝太清三年(公元548年)，侯景叛乱，攻入京城建康(今南京)，“夜于宫中置酒奏乐，忽闻大火起，众遂惊散，东宫图书数百厨，焚之皆尽”(《三国要略》，《太平御览》卷六一九引)。梁元帝克平侯景，进入建康后，将所存藏书七万多卷移至江陵整理校勘。承圣三年(公元554年)，西魏军队攻入江陵，“帝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宝善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通鉴》卷一六五)。梁朝的图书破坏后，陈朝处于衰微时期，虽然也有图书积累，但数量少，《隋志》说其“遗阙尚多”。

隋的统一后，结束了南北朝分立动乱的局面，为文化的发展扫清了道路。隋朝承接北周的藏书15000卷，隋文帝建国后，又接受当时著名学者牛弘的建议：“分遣使人，搜访善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隋书·经籍志序》)这就大大鼓励了民间的献书，“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同上)。平陈以后，隋又对陈的藏书进行整理，请入抄补残缺。于是，隋炀帝以前，隋的藏书达到三万余卷。隋初集书，以牛弘功劳最著。牛弘(公元544—610年)，字里仁，安定鹑觚人(今甘肃灵台县东北)，隋初任秘书监，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在《隋书》中有传。他上《请开献书之路表》，历叙

图书聚散的历史，分析了图书散失的原因，指出历史上秦始皇焚书、王莽之乱、董卓之乱、八王之乱、侯景之乱和江陵焚书等对书籍的破坏，这就是后世著称的“五厄”论。牛弘奏请搜访民间藏书，悬定赏格，鼓励献书。隋文帝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取得了成效，从黄河流域搜访而得的民间异本充实了隋初的藏书。牛弘在收集、保护、整理书籍的基础上，又将隋初的藏书在开皇四年（公元 584 年）编成书目。他为隋初的图书整理和目录工作作出了贡献，他的《请开献书之路表》，后来成为《隋志》总序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古籍目录学的重要参考文献。

隋炀帝继位以后，图书事业得到很大的发展，图书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还在装帧、典藏、校勘、修撰等方面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措施。如按书的质量分上中下三品，装上不同颜色原料的卷轴以示区别，上品是红色琉璃轴，中品是绀色琉璃轴，下品是黑色琉璃轴。又如增设书库分类藏书，在东都洛阳观文殿东西两厢盖书库藏书，“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又于内通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隋书·经籍志序》）除了东都洛阳有大批藏书外，西京长安都城内的嘉则殿、江都（今扬州）也都有大批的藏书。

隋炀帝时，随着大运河的开凿，政治文化中心逐渐增多，除西京长安外，还有东都洛阳及江都，为了充实各处的藏书，炀帝时还将“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隋书·经籍志序》），以副本书贮藏各地宫室、官府。因此，后世有人认为隋代藏书达三十七万卷之多。如《玉海》卷五十二，有“西京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的记载，唐代杜宝《大业幸江都记》说：“炀帝聚书至三十七万卷，皆焚于广陵。”（《挥麈后录》卷七引）这些文献记载地点不一，皆有可疑之处，但可以看出隋代藏书数量猛增，其中传抄副本占了不少份量。

《通鉴》卷一八二还记载隋炀帝性好读书、著述，令学士修撰新

书，前后二十载未尝暂停，有新书三十一部，万七千卷，新书的修撰也丰富了隋代的文化典籍。

隋炀帝曾令学者柳䛒整理图书，“除其重复猥杂，得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纳于东都修文殿”（见《玉海》卷五十二）。这次整理工作还产生了《隋大业正御书目录》。总之，隋朝统治仅数十年，但仍在图书的收集和整理方面有不少成就，据唐初对隋代遗存典籍的整理情况估计，隋代图书至少有 10 万卷，这些图书虽然在隋末战乱中受到损坏，但仍为唐代典籍的增长打下了基础。

唐初，高祖李渊自太原起兵，攻入长安后，广收典籍。“武德初，有书八万卷”（《新唐书·艺文志序》），就是占领长安后之所得。在统一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之后，又将隋朝藏于东都洛阳的三万多卷书籍用船运回长安，不幸在途中被水淹没，图书损失十之八九。据《隋书·经籍志序》记载，唐初接收隋朝典籍合计 14466 部，89466 卷。唐建国初年，统治者接受令狐德棻“购券遗书”的建议，于是“数年间，群书略备”（《旧唐书·令狐德棻传》）。唐太宗以后，唐朝有四次较大规模的求书、校书活动。

第一次为唐太宗至唐高宗之际。唐太宗时，由魏征、李延寿、敬播等人，利用隋代留下的藏书八万多卷，删除重复，得书 36708 卷，并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太宗以后，继续有集书、校书活动，高宗时，曾令李怀俨、崔行功等人校四部群书，然后抄写成定本（《唐会要》卷三十）。可见太宗至高宗间 40 多年，校书活动没有停止。

第二次为唐玄宗开元至天宝初年。开元初，曾命马怀素、褚无量、元行冲等人相继校书编目，后整理出图书四万多卷，著录于《群书四录》。此后又继续求书校书，到天宝十四年（公元 755）时，国家藏书已达 71485 卷（见《唐会要》卷三十五）。

第三次为唐德宗贞元二、三年间（公元 786—787 年）。由于天宝之际“安史之乱”，“两都覆没，乾文旧籍，亡散殆尽”（《旧唐书·经籍志序》）。书籍损失很多，统治者只好重新“购募”搜求，使图书

又稍有增加。贞元二年与三年，德宗曾先后命秘书监刘太真与秘书少监陈京求书和校书，并编制了目录(《唐会要》卷六十五)。

第四次为唐文宗时期。文宗曾“诏令秘阁搜访遗文，日令添写”(《旧唐书·经籍志序》)，于是“四库之书复全，分藏于十二库”(《新唐书·艺文志序》)。开成初年(公元836年)，书籍的收藏又逐步上升到56476卷(《旧唐书·经籍志序》)。

综上所述，唐代的求书、校书活动是持续不断的，尽管中唐战乱，使图书的收藏受到损失，但求书、校书的活动仍不停止。隋唐之际对图书的整理工作，为各种目录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二、隋唐之际的国家书目

隋朝初年，国家书目有《开皇四年四部目录》四卷，著录书籍三万余卷，由牛弘编制(见《旧唐书·经籍志后序》。《隋志》、两《唐志》著录此目，但不著撰人)。这部目录著录的图书应是北周传隋的15000卷图书，再加上隋初在北方民间搜访到的部分典籍，是否已达到三万余卷，颇有可疑。《隋书·经籍志序》记载，平陈以后，检其所得，又召天下工书之士补续残缺，才达到三万余卷的藏书。又有《开皇八年四部目录》四卷(《隋志》著录，不著撰人)，此目离第一部国家书目不远，且还未平陈，故图书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化。第三部国家书目是《开皇二十年书目》四卷，王劭撰，两《唐志》著录，但未记载其收书情况，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距平陈已有十年，此时南北朝遗存的图书已基本集中起来，中间又历经许善心等学者的整理，这部目录应是炀帝以前图书状况的全面著录，《隋志》云炀帝以前有三万余卷图书，大概是《开皇二十年书目》所反映的。以上目录是国家藏书的登记目录，由于内容比较简略，所以后世流传不广。

隋炀帝时，书籍的储藏甚多，他命柳晉校出正御本37000余卷，并编目成为《隋大业正御书目录》九卷(见《玉海》卷五十二)，这

是隋代最重要的国家书目。它总括了当时的图书概貌，为后来唐初编《隋书·经籍志》提供了重要依据，也在唐初搜访、整理在运输途中被水漂没的洛阳藏书发挥了作用。可惜此目已久佚。

唐建国之初，虽有图书的整理，但未见编成国家书目。唐初的目录工作主要体现在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上。

《新唐书·马怀素传》记载唐玄宗开元初年，马怀素建议整理典籍，编制目录以续王俭《七志》，得到玄宗的支持。于是命马怀素为秘书监，召集各地官吏中的有名学者26人，集中整理图书，进行编目，同时又令褚无量为图书使，"搜采天下遗书，以益阙文"(《新唐书·褚无量传》)，为编目补充新资料。但由于马怀素"不善著述，未能有所绪别"(《新唐书·马怀素传》)，不通目录之学，所以直到他去世，编目工作仍无头绪。开元七年(公元719年)由元行冲总领其事，元行冲名澹，以字行，弘文殿学士。他改变了马怀素原来续王俭《七志》，专载南齐以来典籍的设想，"表请通撰古今书目，名为《群书四录》"(《旧唐书·元行冲传》)。《群书四录》的编写分工非常明确，除元行冲外，又命毋煚、韦述、余钦"总缉部分"即作为总编。以下按四部分为四组：殷践猷、王惬负责经部，韦述、余钦负责史部，毋煚、彦直负责子部，王湾、王仲丘负责集部。他们费三年时间，在开元九年(公元721年)撰成《群书四录》二百卷。根据《旧唐书·经籍志》及其它文献的记载，此目内容宏富，是一部解题目录，包括大小序及各书的解题，分四部四十二小类，其书序和分类皆参考《隋书·经籍志》，全书著录图书2655部，48169卷。《群书四录》二百卷的分量，在古代所有的国家书目中，只有后世的《四库总目》可以与之媲美，因此，它是古代重要的国家书目之一。这部目录的编写历经马怀素、褚无量、元行冲等前后努力，不仅校勘整理了现有藏书，还广搜佚书进行补充，所以它反映了中唐以前图书收集、整理和编目的成就。《群书四录》的编撰过程继承了刘向校书编目的优良传统，由学有专长的学者专门负责，较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同时书有解题，部类有序，也是对《别录》、《七略》作法的弘扬。但是由于这部目录的内容多，编写的时间却很短，仓促成事，所以缺漏不少，参加这部目录编写的毋煚当时就提出了许多意见。由于这部目录久佚，现已无从作出更为详尽的论断。

玄宗开元时的国家书目除《群书四录》外，据宋《崇文总目》著录，还有《开元四库书目》十四卷。玄宗天宝三年(公元 744 年)，由于开元十年以后又续收了不少图书，旧目已不符合藏书的实际情况，于是天宝三年六月，又编写了《见在库书目》，登录四部书 54642 卷。这部目录不断增录到天宝十四年(公元 755 年)，著录图书共 71485 卷(见《唐会要》卷三十五)。这部书目后来成为北宋欧阳修等人修《新唐书·艺文志》的重要参考资料。

"安史之乱"后，国家藏书受到损失，经过重新收集整理，唐德宗贞元六年(公元 787 年)，又将当时聚集的藏书编为《贞元御府群书新录》(见柳宗元《柳柳州集·陈京行状》)。

三、《隋书·经籍志》

《隋志》是《隋书》中的一部分。《隋书》中有志书三十卷，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十志，原单称《五代史志》。由于唐初编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都没有专载典章制度的志书，所以贞观年间，唐太宗下诏将梁、陈、北齐、周、隋五代的典章制度编为《五代史志》，后并入魏征主编的《隋书》，成为各志。《史通·古今正史》曰："初，太宗以梁、陈及齐、周、隋氏并未有书，乃命学士分修，仍使秘书监魏征总知其务……太宗崩后，刊勒始成。其篇章虽编入《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隋书》中的志并不单述隋代，而是包括了梁、陈、北齐、周、隋历朝的典章制度。《隋书·经籍志》更是如此，它不仅包括了梁、陈、齐、周、隋五代官私书目所载图书在唐初的实有情况，而且反映了梁以前许多书籍的流传存亡，它是古籍目录中很有

成就的一部目录。下边从几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隋志》的编者及材料来源

《隋志》的撰著。旧刻本题长孙无忌，但宋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隋书》刊本跋中曰："惟《经籍志》题：侍中郑国公魏征撰。"又曰："《无忌传》：永徽三年始受记监修，疑当时已刊行，无忌因成书而进。"但是天圣间刻本明知长孙无忌可能是因成书面进，面仍以领监人作撰者，题刻书名之下，这就是旧刻题名长孙无忌的由来。《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隋书》各志三十卷，下列撰者十人，只有魏征，并无长孙。毋煚在《古今书录》序中，提到《群书四录》的书序都是借用魏征《隋书·经籍志》的书序。以上记载，皆可说明魏征是《隋书·经籍志》的主要作者，而长孙无忌则与此无涉。

魏征(公元580—643年)字玄成，魏州曲城(今河北馆陶)人。年轻时曾出家为道士，隋末投瓦岗军，跟从李密，后又随窦建德，入唐为李建成太子洗马。"玄武门之变"后，跟随李世民，李世民即位后任秘书监、侍中，后封郑国公。受诏整理国家藏书，主编《隋书》，后又主持《五代史志》(《隋志》)的编写。他敢于犯颜直谏，促成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

据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隋志》的编撰，实际上还有李延寿、敬播二人，《旧唐书·李延寿传》载："贞观中(延寿)……尝受诏与著作佐郎敬播同修《五代史志》。"可见《五代史志》及《经籍志》并非魏征一人所撰，是众手面成，但他有总领其事、最后删定之功。

从《隋书·经籍志》总序，可大致看出它的材料依据。体例上，《隋书·经籍志》受《汉志》、《七志》、《七录》的影响，特别是与《七录》的关系更为明显，如四部下的小类立目，许多是参考借鉴《七录》而成的。它的著录内容，则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隋代的国家书目《隋大业正御书目录》。《隋书·经籍志》总序说："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这说明它是在《隋大业正御书目录》的基础上，参考唐

初所得隋代典籍八万多卷著录隋代存书的。

(二)《隋志》的编写特点

《隋志》按经、史、子、集四部分四十类，著录存书 3127 部，36708 卷；亡书 1064 部，12759 卷。后附佛、道二录。有总序、大序、小序，有附注，是一部类序目录。《隋志》的著录有如下特点：

(1)《隋志》最突出的特点是记存亡残缺　这是在此以前的目录书所未有的。由于《隋书》各志实际上是"五代史志"，要反映刘宋至隋的文化情况，所以《隋志》不仅要著录隋代图书状况，还要著录隋以前南朝的图书状况。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隋志》以著录隋代藏书为基本内容，这是存书的著录。其次，对于隋存实残的图书进行说明，如史部正史类薛莹《后汉纪》六十五卷下注曰："本一百卷梁有，今残缺。"其三，凡是已亡佚的宋梁典籍，则在与其体例内容相近的存书下进行说明，如存书《华阳国志》十二卷，是记载蜀地故实的书籍，于是便将梁代内容与此相近的亡书附注于下，曰："梁有《蜀平记》十卷，《蜀汉伪官故事》一卷，亡。"由此可见《隋志》在组织编排记载亡书上是费了一番苦心的。亡书的记载，通常以"宋有……亡"，"梁有……今亡"的形式出现。从附注情况看，注"梁有今亡"的多，"宋有今亡"的少，可见主要是参考了《七录》，同时也利用了《七志》等其它目录。《隋志》著录的存书、亡书，在每类之后都有小计，先计存书，后计亡书，但数目不甚准确。

(2)《隋志》在四部之后附录佛经、道经两录　但都不著书名，只是统计各小类及总的部数、卷数，然后在序文中叙述佛经与道经的大纲和演变发展情况。《隋志》在四部之外，共著录佛经 1950 部，6198 卷；道经 377 部，1216 卷。

(3)《隋志》对书目的著录采用先书名后撰者的方式　撰者放在附注之中。《隋志》的附注常常针对某个问题作扼要说明，在反映图书基本状况和沿革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注文除介绍撰者、存亡残缺外，还反映图书内容、真伪、别本等几方面的情况。子

部道家类《广成子》十三卷，下注："疑近人作。"如这是辨别真伪。史部地理类《黄图》一卷，下注介绍其内容曰："记三辅宫观、陵庙、明堂、辟雍、郊畤等事。"又有一些在书名下注"梁有……"，但不注今亡。这些注文是在说明此书之外的别本。如子部兵家类《太公兵法》六卷，下注："梁有《太公杂兵法》六卷。"《太公阴谋》一卷下注："梁六卷。梁又有《太公阴谋》三卷，魏武帝解。"这些注文都是说明一书别本。此外也有说明同名异书的，如子部道家类《庄子音》三卷，下注："郭象撰。梁有向秀《庄子音》一卷。"

（三）《隋志》的学术贡献

《隋志》是我国现存第二部最古的目录，它集中了前代目录的许多长处，体例完备，编制方法又具有新的特点，它对古籍目录学的学术贡献，可归纳为几方面：

（1）继承和发展了荀勖和李充的四部分类法　　在历史上第一次以经、史、子、集作为四部名称，概括各部著录的书籍内容性质，对后世公、私目录的编撰有较大影响。

（2）《隋志》首创在目录中注明书籍的存亡残缺　　不仅使人们便于了解五代至唐初书籍的流传散失情况，而且为目录编写树立了典范。这一著录方法为后世许多目录所沿用。

（3）《隋志》是考查唐以前古籍概况的重要目录　　它的序文是研究古籍目录学和唐以前文化发展史的重要文献。

（4）《隋志》是继《汉志》后出现的第二部史志目录　　在体例和著录方法上又有所更新，比《汉志》前进了一步，所以《隋志》的编撰，推动了史志目录的发展，扩大了史志目录的影响。它的编撰体例，大部分为后来的正史目录所承袭。

（四）后世对《隋志》的研究

《隋志》虽然有很多优点，但存在不少遗漏和错误，主要问题是重复和芜杂。这些重复可看出不是有意的互著，有类与类之间的重复，有一类中的重复。芜杂主要表现在图书归类分类不清。所以，

后代有一些学者对《隋志》作了深入的研究，分析它的成就，补正它的错漏。清代学者对《隋志》的研究最为突出，作用较大的有如下三种：

《隋书经籍志考证》十三卷，章宗源撰，章宗源是清乾嘉时期目录学家。此书虽名为全志考证，实则只有史部，原称《隋书经籍志史籍考》，后被其他学者改为今名。

《隋书经籍志考证》五十二卷，姚振宗撰，姚振宗是清后期著名的目录学家，曾汇集所著目录学专著和辑佚书为《快阁师石山房丛书》。考证规模宏大，博搜广征，是考订、整理《隋志》最有成绩的著述。

《隋书经籍志补》四卷，张鹏一撰。此书是对《隋志》著录遗漏的补充。

以上三种皆见于《二十五史补编》。此外还有章学诚的《隋书经籍志考证》，陈逢衡的《隋书经籍志疏证》，洪饴孙的《隋书经籍志考》，康有为的《隋书经籍志纠谬》，明人焦竑在《国史经籍志》后也附有《隋书经籍志纠谬》。

四、私家目录的编撰

隋唐之际私家目录的编制也有很大成就，较重要的有隋·许善心的《七林》，唐·毋煚的《古今书录》，这是著录广泛的私家目录。还有《西斋书目》，即是一部私藏书目。

许善心的《七林》编成于隋开皇十七年(公元597)。《隋书·许善心传》纪叙了许善心编《七林》的事迹，这是关于《七林》的唯一记述。从列传中可知许善心主持过当时的图书整理工作，然后仿效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这样，《七林》可能是一部解题目录，而且采用了《七录》的七分法，著录了隋初书籍的状况。但《七林》流传不广，《隋书·经籍志》没有著录，只是在史部地理类中著录了他的另一著作《方物志》二十卷。

毋煚的《古今书录》编成于唐开元年间。毋煚是唐玄宗时洛阳人，唐代有作为的目录学家。开元初任左补阙，后参加《群书四录》的编撰工作，任修书学士。《群书四录》是一部国家书目，编成于开元九年（公元721），由于成书仓促，所以有不少缺点。毋煚在这部目录编成后，就提出了五点意见，包括采书不全，著录不详，有录无书，分类与书序不允等等（《古今书录》序，见《旧唐书·经籍志》总序）。他对自己当时没能纠正而"追怨良深"，因此发奋努力，自著《古今书录》四十卷。《古今书录》在宋以后亡佚，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仍有记载。它的总序保存在《旧唐书·经籍志》中，从总序可以了解其概况：

《古今书录》是《群书四录》的修订、补充和简化本，它改正了《群书四录》中收书不完备，分类、解题不正确等错误三百余条，又增加著录了书籍六千多卷。

《古今书录》是一部解题目录，但它的序文和解题比《群书四录》简略，所以《群书四录》二百卷，而《古今书录》只有四十卷，尽管后者著录的图书比前者多。《古今书录》分经史子集四部，四十五小类，著录书籍3060部，51852卷。收书亦止于开元年间，但它对《群书四录》之后出现的著作肯定作了补充著录。

《古今书录》的成就超过了《群书四录》，不仅《旧唐书·经籍志》是完全依据《古今书录》抄录，而且也成为宋代一些目录的征引和参考材料。保留在《旧唐志》中的《古今书录序》，是今天古籍目录学研究的重要文献。

吴兢的《西斋书目》一卷，是一部私人藏书目录。吴兢生活的时代与毋煚相同，他也曾参加过《群书四录》的编撰工作，因此对目录编制有一定的见解和才能。两《唐书·吴兢传》说他励志勤学，博通经史，家中藏书很多，所以自己编制了一部藏书目录。《西斋书目》大致在南宋时散亡，据《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与《玉海·艺文》记载，此目著录吴兢家藏书13468卷，分四部五十七小类，

小类的类目比毋煚的《古今书录》还要多一些。因此《西斋书目》在图书著录和分类上都有新的贡献，在唐宋时代是一部具有较高参考价值而普遍流行的私人藏书目录。

另外，据《通志・艺文略》记载，唐代的私人藏书目录还有蒋彧的《新集书目》一卷和杜信的《东斋集籍》二十卷。这些书目虽已亡佚而不知其体制，但同样丰富了唐代目录事业的内容。

唐以后由于军阀割据混战，出现了五代十国（公元 907—960 年）的局面，淮河以北的中原地区相继有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中原地区之外还有十个割据政权存在。此时由于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很不稳定，所以目录事业不甚兴旺，值得一提的是后晋时刘昫编撰了《旧唐书》，其中的史志目录《旧唐书・经籍志》是五代时期最重要的目录。这部目录主要取材毋煚的《古今书录》，但把其中的大小序都删除，首开正史目录没有小序的恶例。《旧唐志》著录唐开元之前图书 51852 卷，与毋煚《古今书录》相同，由于毋录已亡佚，所以《旧唐志》在保存目录学资料方面有显著的作用。

隋唐之际目录事业的发展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在国家藏书登记目录的基础上，修成了《群书四录》这样质量较高的解题目录；二是以《隋书・经籍志》为代表的史志目录，在目录编制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三是私家目录的编写逐步形成风气；四是四部分类法开始占有据主要地位。此外，佛经目录的编撰在此期成就突出，先后产生了《大隋众经目录》、《开皇三宝录》、《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开元内外经录》等重要的佛经目录。

第四节　宋元

一、宋元对图书的收集和整理

唐代藏书，历经五代战乱和各地割据势力的破坏，宋初的藏书，以收集后周原藏书和削平各割据势力所得。宋初设立三馆：昭

文馆、史馆、集贤院以藏书，统称为“崇文院”。宋敏求在《春明退朝录》中曰：“本朝三馆合为一，并在崇文院中。”后在崇文院中又增建秘阁藏书，所以崇文院包括三馆秘阁，即所谓馆阁。北宋初年在统一战争不断进行之中，已经逐步积累起国家藏书。程俱在《麟台故事》卷二曰：“建隆初，三馆有书万二千余卷。乾德元年平荆南，尽收其图书，以实三馆。三年平蜀，遣右拾遗孙逢吉往收其图书，凡得书万三千卷。”乾德四年（公元966年），宋太祖下诏募求亡书曰：“凡进书者，先令史馆点检，须是中所阙，即与收纳，仍送翰林学士院引试，验问吏理，堪任职官者，得具以名闻。”（《宋会要辑稿》，《崇儒》四）开始了全国性征书工作，并且规定了奖励献书的方针。

太宗太平兴国九年（公元984年），诏令三馆以唐《开元四部书目》为准，开列所阙书目，张榜公布，募求遗书。并进一步规定，献书三百卷以上的，通过面试可授官职，三百卷以下的，据卷数多少赏赐金帛。真宗时，除保持以上有关献书的奖励方法外，还进一步规定献书一卷，赏给千钱。（见程俱《麟台故事》卷二）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诏令朱昂、杜镐、刘承珪等人整理校定馆阁所藏图书，编制馆阁书目（见《玉海》卷五十二《咸平馆阁图籍目录》）。此外，“命三馆写四部书二本，置禁中之龙图阁及后苑之太清楼，而玉宸殿、四门殿亦各有书万余卷。”各殿曾整理书籍，编成目录，有《龙图阁书目》七卷，《太清楼书目》四卷，《玉宸殿书目》四卷。真宗时编成的《三朝国史艺文志》，整理著录图书已有39142卷（以上据《宋史·艺文志》）。

经宋初80年持续收集补葺，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诏令张观、宋庠、王尧臣、聂冠卿、郭稹、吕公绰、王洙、刁约、欧阳修等人，对已有图书进行大规模整理，历时七年，校定图书30669卷，编成《崇文总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四）。此后，宋仁宗认为经过删除“讹谬重复”后校定的三万多卷图书，比唐开元年间所藏数量“遗逸尚多”，再令“广献书之路”提高奖励条件，规定“每卷

支绢一匹”，继续求访图书（见程俱《麟台故事》卷二）。

仁宗之后的征书活动一直没有停止，徽宗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校书郎孙觌奏称：“顷访求遗书，《总目》之外凡数百家，几万余卷，请撰次增入《总目》，合为一卷。”于是“诏孙觌及著作郎倪涛校书，汪藻、刘彦适撰次，名曰《秘书总目》。”（《玉海》卷五十二《政和秘书总目》）这是北宋后期一次较大的整理书籍、编次书目的活动。神宗改制以后，崇文院改称秘书省，因此，所编书目名号也作相应改动。由于徽宗时所编《四朝国史艺文志》大致是依《秘书总目》而成，故编《秘书总目》时所增入书籍应为26289卷，这个数目与孙觌所言“凡数百家，几万余卷”也是大致相符的。

总括北宋各朝国史艺文志所载，共藏书73877卷，此数目已超过唐代藏书盛期的71485卷。然而徽宗以后，北宋藏书基本毁于靖康之变，汴京陷落后，图书除被金兵掠去外，其余多焚坏于战火。于是又有南宋时的求书、整理和编目。

高宗继立，未及定都，便已忙于搜书了。李心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正月甲子诏平江府守臣收贺铸家所卖图书，以充三馆。高宗南渡定都临安（今杭州）后，下诏规定献书赏格，征集图书充实四库，除“分官日校”图书外，还设立补写所，补葺遗缺。由于宋收书的及时得力，更由于当时印刷技术的逐步发达，仅45年时间，国家藏书就得到恢复和发展。孝宗淳熙二年（公元1177年）秘书少监陈骙奏请整理图书进行编目，次年编成的《中兴馆阁书目》著录图书已44486卷，比《崇文总目》多13817卷。

又过40余年，国家藏书量继续上升，“四库之外，书复充斥”宁宗泰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又诏秘书丞张攀等续修馆阁书目，补入图书14943卷（以上史实均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序》）。这样南宋藏书总量大致为59429卷，未能超过北宋。宁宗后，南宋图书曾因官殿失火，损失严重。理宗以降，国势每况愈下，国家忙于抵御外敌，无暇顾及典籍，此时南宋图书除了私人著述不断出

现外，国家藏书已无再增。

元朝建国初，由于南宋尚存，统一战争仍在紧张进行，所以无暇文事。直到至元十年（公元 1273 年），统一大势已定，才在大都设立秘书监，开始图书的收集工作。元·姚燧《牧庵集》曾谓："宋社既墟，诏令湖南卢挚藉江南诸郡四库精善书，舨舟至京师，付兴文署。"（姚南菁《援鹑堂笔记》卷十七注）元初统一战争时，由于能注意对一些典籍、刻版的保护，一旦战争平息，就能较好及时地收集。至元十三年（公元 1276 年）攻灭南宋后，元朝便注意对南宋所存图书的收集，《元史·世祖本纪》曰："至元十三年十月丁亥，两浙宣抚使焦友直以临安经籍、图画、阴阳秘书来上。"至元十五年四月，又"以许衡言，遣使至杭州等处取在官书籍版刻至京师。"可见元初已经注意了典籍的收集，并有一定的藏书。元代版刻印刷技术进一步发展，官刻、家刻、坊刻、书院刻书非常兴盛，这也为元代图书的收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元朝时间虽短，但元人著述颇丰，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所载，元人著述有 3142 种。这些著述自然丰富了元代的典籍。但由于元代历时不足百年，来不及对国家藏书进行大规模的整理，因而元代没有正式的国家书目被著录流传下来，只是在至正二年（公元 1342 年）王士点编撰的《秘书监志》中提到至正年间元政府编制过国家书目。另外，《秘书监志》卷六、卷七有《书目》二卷，但这份书目无书名、卷数，只记在库书若干部、若干册，这只是秘书监的一份图书清册，起不到国家书目的作用。

二、《崇文总目》及《中兴馆阁书目》

宋朝的国家书目以仁宗时的《崇文总目》最为著名。这部目录由王尧臣、欧阳修等人于庆历元年（公元 1041）撰成，仁宗赐名为《崇文总目》。全目六十六卷，分四部四十五小类，著录图书 30669 卷。它是一部解题目录，有序、有内容丰富的解题，它的体例为后来的晁公武、陈振孙所效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史部目录类载

《崇文总目》一卷，曰："今此惟六十六卷之目耳，题云绍兴改定。"可见南宋以后《崇文总目》被删去序和解题，只剩一部简目流传下来。现在所留存的《崇文总目》有三种：一是天一阁明钞宋版《崇文总目》一卷，此本应为陈振孙所言"绍兴改定"本；二是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根据《永乐大典》的引文辑出的十二卷本；三是清嘉庆四年（公元1799）钱侗等人又从《欧阳文忠公集》、《玉海》、《文献通考》等书中辑出引文编成的，成书五卷，《补遗》一卷。商务印书馆国学丛书曾收入此本。《崇文总目》的大部分序文保留在欧阳修的《欧阳文忠公集》中，其卷一二四为《崇文总目叙释》，所存序文为经部八篇，史部十二篇，子部十篇。如以原书大小序俱全的话，那么仍缺经部二篇，史部二篇，子部十一篇，集部四篇。《崇文总目》虽然缺失，但它在总括宋初书籍状况，以备后世查验存佚方面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宋徽宗时广泛求书，他爱好文事的兴趣使书籍的收藏增加了二万多卷，政和七年（公元1117）孙觌、汪藻等人将所增书目并入《崇文总目》，编成《秘书总目》，著录书籍1474部，55923卷。《秘书总目》实际上是《崇文总目》的增订本，此目现已亡佚。其所著录图书，是北宋藏书之高峰。

南宋政权建立后，宋高宗又访求遗书，国家藏书得到一些恢复。孝宗时，秘书少监陈骙于淳熙五年（公元1178）编成《中兴馆阁书目》七十卷，分四部五十二小类，著录存书44486卷。到宁宗嘉定数十年间，书籍数量又不断增加，于是，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秘书丞张攀受命编制《中兴馆阁续书目》三十卷，著录图书14943卷。《中兴馆阁书目》、《续目》所载的图书达59429卷。这两部目录反映了南宋时国家的藏书状况，是南宋目录事业重要成就之一。但二目都已亡佚，现存有民国年间赵士炜编的辑佚本，为《中兴馆阁书目辑考》五卷，《中兴馆阁续书目》一卷，据此可了解原书大概。《中兴馆阁书目》虽然说是"仿《崇文总目》类次"，但实际上在小类

上还是有不少变动增设，经部增加二类，史部增加三类，子部增加一类，集部增加一类。从增加的谶讳、经解、谥法、楚辞等类目来看，说明南宋图书与北宋相比有了某些变化，正如马端临所说："盖自绍兴至嘉定承平百载，遗书十出八九，著书立言之士又益众"(《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兴馆阁书目》也是解题目录，今虽残缺，但对了解南宋图书仍有裨益。陈垣先生在《中兴馆阁书目辑考序》中说："此目下及淳熙，有宋一代人文粗具于是，况《宋志》之所由出。《宋志》芜陋，订正史阙，惟兹是赖，不仅考存佚，验异同已也。"

三、宋元间的史志目录

(一)《新唐书·艺文志》与《宋史·艺文志》

《新唐志》是《新唐书》的一部分，由欧阳修编撰，此目在《旧唐志》的基础上，参考了《崇文总目》及当时可见的一些私藏书目，了解了唐人著作的新情况，对《旧唐志》进行了补充，在编撰体例上也有一些改进。《新唐志》分四部四十四小类，共著录图书 79221 卷。《新唐志》优于《旧唐志》有如下几个方面：

(1)《旧唐志》的著录以《古今书录》为断　　所以开元以后一二百年间的唐人著作，全未著录。例如史部中王彦威的《唐典》、蒋义的《大唐宰辅录》等百余种史书没有收录，集部中诗人没有李白、杜甫的诗作，古文家没有韩愈、柳宗元的文集，这作为唐代书目，显然是不足的。《新唐志》在这方面作了重要的补充，增加著录了《旧唐志》不著录的唐人撰述 27127 卷，全面地反映了唐代的学术风貌。

(2)在著录方法上有新的特点　　这就是在书目中分"著录"和"不著录"两部分。"著录"是《旧唐志》收人的著作，"不著录"是欧阳修补充的唐代著述。这种区分有两层意义：一方面指出了新志与旧志的收书范围；另一方面通过"不著录"表明，这是唐代的著作而不是唐代的藏书。这种方法为后来的《宋史·艺文志》所承袭。

(3)改变了书目的著录形式　将作者题于书名卷数之首，再利用附注来说明有关书籍的各种情况，包括介绍作者，成书时代，成书背景，内容形式，书的别名，残缺等。其注作者，往往能涉及字号、里居、甚至官职、家系、仕履。其注成书时代与背景，能以有关史事说明。又如史部杂史类"包谓《河洛春秋》二卷"注云"安禄山、史思明事"，说明内容。子部农家类"《范子计然》十五卷"注云"范蠡问，计然答"，说明图书形式。又如经部春秋类"高重《春秋纂要》四十卷"下注曰："别名《经传要略》"。史部谱牒类"李利涉《唐官姓氏记》五卷"注残缺曰："初，十卷。利涉贬南方，亡其半。"《新唐志》的附注继承了《汉志》、《隋志》的优良传统，以其简明性和必要性提高了该目的参考价值。

《新唐书·艺文志》也存在不少谬误，清人钱大昕在《廿四史考异》中就作了考订，总括起来如著录重出，书名、人名错误，志传互相矛盾，注文前后矛盾等等。但总起来说，《新唐书·艺文志》仍是一部较成功的史志目录，其成就仅次于《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

宋制规定国史也需包括艺文志。这些艺文志大多根据当时的国家书目编成，因而都是解题目录。据《宋史·艺文志》载，北宋有：

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艺文志》，著录图书 3327 部，3942 卷；仁宗、英宗《两朝国史艺文志》，著录图书 1472 部，8446 卷；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艺文志》，著录图书 1906 部，26289 卷。

以上三种艺文志著录各不重复。据《宋史·艺文志》序曰："宋旧史，自太祖至宁宗，为书凡四，志艺文者……"可知南宋应有：

高宗、孝宗、光宗、宁宗《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由于它是根据《中兴馆阁书目》正续二目编成的，所以它著录图书约为 59429 卷。

《宋史·艺文志》是《宋史》的一部分，元托托等人于至正五年(公元 1345 年)编成。在它的总序中提到，其主要材料依据宋代四

种国史艺文志，但是《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只限于宁宗以前南宋百年的藏书，宁宗以后理宗、度宗、恭宗、端宗、帝昺五十余年，国家藏书虽无大幅度增长，但是宋人著述仍绵延不断，于是《宋史·艺文志》学习《新唐书·艺文志》，采用"不著录"的形式补充一些宁宗以后出现的著作。《宋史·艺文志》八卷，分四部四十五小类，著录图书9819部，119972卷。元修《宋史》部帙大，时间短，再加上编史的人员功底不深，主要以宋代国史等材料拼凑而成，又不作通体的检查订正，所以重复颠倒，错漏很多。《宋史》是二十四史中编得较次的一部，《宋志》也不例外。最突出的问题是芜杂重复，因为南宋《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与北宋几种国史文志不同，它的著录有不少是与北宋国史艺文志重复的，但是《宋志》的作者不加考订便照抄照录，自然出现很多不必要的重复。另一问题是归类混乱和错误，如将《史通》归入集部，《通典》、《唐会要》、《五代会要》归人子部，《通鉴纪事本末》隶属史部编年等，皆不讲类例，与书籍内容差之甚远。《宋志》著录的错误也不少，如将颇为流行的《遂初堂书目》著录为《遂安堂书目》，可见粗劣之一斑。因此《四库总目》认为它是正史目录中最为杂乱的一部。总的来说，这部目录确实存在一些缺点，在利用时必须特别注意。

（二）《通志·艺文略》与《文献通考·经籍考》

《通志·艺文略》是郑樵《通志》中"二十略"之一。郑樵生活在南宋初年，面对金兵的掳掠，宋朝政府的无能，他反对宋朝理学家空泛理论的作法，讲求实学，以达到报效国家的目的，所以他有鲜明的"求实"思想。此外，在学术研究中他还有"会通"的原则。他认为对各门学问都必须"通"，才能学而有用，应付万变。在这些思想指导下，他用五六年的时间，将自己数十年的著作汇编成《通志》二百卷。《通志》是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大通史，包括帝纪、皇后、年谱、略、列传等内容。应该说《通志》内容比较庞杂，其中学术价值较大的只在于"二十略"，二十略相等于正史中的志书，专载典章制

度。《艺文略》是其中之一，八卷，原称《群书会记》，分十二部、八十二小类、四百四十二子目，著录图书 10912 部，110972 卷。《通志·艺文略》的特点是：

（1）“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　这是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提出的目标，也是“会通”思想的具体体现。他广泛参考古今、公私目录，凡所知书籍，不管存亡，一概著录。应该说《艺文略》基本达到了“纪百代之有无”的目的。从历史发展的记录来看，《汉志》、《隋志》共著录图书五万多卷，《旧唐志》又著五万多卷，北宋时三部国史艺文志著录七万多卷，删除重复，迄南宋为止，似应与十一万余卷相比不远，可见《艺文略》确实著录了大批宋以前亡佚之书。《艺文略》“广古今而无遗”，特别注意对北宋的著述全面记载，所以它著录的总数与反映两宋收藏、著述的《宋史·艺文志》也相去不远。郑樵力图将百代古今存亡之书会于一目的作法，虽然未能对各书的存亡一一注明，但它系统地揭示了我国从《坟》《典》之启到有宋一代各学科总的文献情况和学术水平，也有利于把握至南宋时我国主要的文化遗产和著述状况。

（2）《通志·艺文略》是一部登记目录　郑樵反对目录中有序和解题，认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他把学术源流的分析放在《校雠略》中，只在个别书目之下有附注。

（3）有严密、新颖的分类体系　他开辟三级分类，创立了许多新的类目。分类体系是《艺文略》最突出的学术贡献。

自然，《通志·艺文略》由于记载浩繁，又是独立创作，所以有记载上的错误，也未能在书目下附注图书的流传存亡状况。在庞大的分类体系中，有些类目的设立仅停留在表面的逻辑分析上，未能真正反映内在的学术流变。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继《通典》、《通志》之后出现的典章制度史书，也称政书。全书三百四十八卷，分二十四门，《经籍考》列第十九。马端临（公元 1254—1323 年），生活于宋末元初。字贵与，号

竹洲，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县)人。父廷鸾，宋末左丞相，对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有丰富的经验，家中藏书也很多，这就为马端临的学术修养准备了优良条件。马端临在宋末中过进士，元初曾任台州儒学教授。《宋元学案》八十九有他的简传。

《文献通考·经籍考》七十六卷，分经、史、子、集四部，五十五小类，是一部解题目录。但大小序皆引自前代目录，解题亦是辑录体解题。

《文献通考·经籍考》最大的特点和贡献在于发明了辑录体解题，这些解题的内容，大致来源于宋《国史艺文志》，晁公武、陈振孙二家私录，《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列传，序跋及笔记，文集中的评论等等。马端临在一些书籍下也发表自己的意见，作为按语放在最后。辑录体解题的好处在于：博采众说于一书之下，可以读一篇解题而了解各家学说，便于比较考证。另外，还起到保存资料的作用，因为被辑录的一些著作后来失传了，但书中的部分内容和文字则通过《经籍考》的辑录体解题保存了下来。后世辑佚宋代著述，有不少便是利用参考《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以目录书为例，如《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直斋书录解题》等，都利用了《经籍考》的辑录体解题。辑录体解题的形式为后世许多目录学家所仿效。

四、私家目录的迭兴

宋代由于雕版印刷的兴盛和文化事业比较发达，所以私人藏书的风气很盛，藏书达数万卷的人不少。宋人周密在《齐东野语》中记载了当时私家藏书的盛况，其中许多藏书家已编有自己的藏书目录，如吴良嗣《籝金堂书目》，沈立《沈谏议书目》，江正《江氏书目》，田镐《田氏书目》，李淑《邯郸图书志》，董逌《广川藏书志》等，见于著录的有近三十种。这些私家目录大部分已经散佚，流传至今并较有影响的是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

题》和尤袤的《遂初堂书目》。

（一）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晁公武（约公元1105—1180年），字子止，澶州清丰（今河南清丰）人，居汴京昭德坊，又称昭德先生，是宋代著名的藏书家和学者。除了撰著《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还著录他的《易诂训传》、《尚书诂训传》、《昭德堂稿》等九种著作。金兵南侵时，公武随父亲入蜀避难。绍兴年间中进士后，成为四川转运使井度的属官。井度，南阳人，在蜀二十多年，家多藏书，后来他把自己的藏书五十箱，全部送给了晁公武。晁连同自己的藏书，除去重复，得书两万多卷。他利用公务之余，反复校勘，在他五十岁左右任荣州（今四川荣县）太守时，撰写提要，编成了《郡斋读书志》，因当时在郡守之任，故曰"郡斋"。

《郡斋读书志》著录图书24500多卷。分四部四十五小类，有总序、大序、小序、解题，是一部解题目录。其各类小序并不单立，而是合并于该小类第一部书的解题中。

这部目录的流传在宋代有两种版本。二十卷本称"衢州本"，南宋淳祐九年（公元1249）由游钧将姚应绩所编的《郡斋读书志》刊于衢州，内容比较丰富。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所采即衢本，但后来流传很少。直到清乾隆时得到钞本，经校勘后才又刊刻流行。

另一个版本称"袁州本"，淳祐九年黎安朝将杜鹏举所编《郡斋读书志》四卷，也即晁氏对井度藏书的提要，称《原志》；外加赵希弁的读书提要一卷，称《附志》，共五卷，刻印于袁州。衢州本印行后，赵希弁发现衢州本多出晁氏自己藏书的提要435种，8245卷，于是赵氏将此又补辑、加刻为《后志》二卷。淳祐十年（公元1250年）袁州本最后刻成，分原志、后志、附志三部分，共七卷。这是一直流传的刊本，《四库全书》中所收即袁州本。

清末王先谦将衢、袁二本合校刊行，以衢本为底本，校袁州本

于衢州本之上，附《附志》于后，仍为二十卷。这是《郡斋读书志》最全面，少错漏的版本。

《郡斋读书志》的学术贡献在于解题内容，它的解题或述作者略历，或论书的要旨，或明学术渊源，或辑遗闻佚事，或辨版本状况，或考证不同学说，它是第一部带有解题的私人藏书目录。也是现有较早的解题目录，它为后人了解宋以前的古籍提供了依据。《郡斋读书志》所著录的古籍至今已亡佚五百余种，因而其解题内容更显得重要。

（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陈振孙（公元1183—？）字伯玉，号直斋，浙江安吉人。50岁以前，长期在江西、福建、浙江等出版事业较兴盛的地方为官。由于他爱好读书，或购置、或借钞，藏书极为丰富。在此基础上，他用数十年时间，仿《郡斋读书志》编成《直斋书录解题》一书。

《直斋书录解题》原有五十六卷，著录图书3096种，51180卷。分经史子集四部，五十三小类，有总序、大序，总序及四部大序已在流传中散佚，也未能辑出。小序全书只有九篇，即“语孟类”、“小学类”、“起居注类”、“时令类”、“农家类”、“阴阳家类”、“音乐类”“诗集类”、“章奏类”。这九个类目有的是陈振孙首创，如“语孟类”、“音乐类”等，有的是他作了与前人不同的改动，因此，他必须专立小序进行说明解释。每书有解题，是一部解题目录。这部目录流传很少，明初亡佚，现在的传本是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共二十二卷，可得其大概。

《直斋书录解题》的贡献在于：第一，全面反映了南宋以前书籍流传的状况，著录的图书总数，接近于南宋国家书目《中兴馆阁书目》与《续目》的数量。第二，首创目录书中“解题”的名称。它的解题言简意赅，涉及的内容广泛，但往往又侧重某一方面，大致论及作者、书的价值、内容、取材、体例、真伪、撰述时间、图书版本等方面。

现存《直斋书录解题》的版本为北京图书馆馆藏元钞本，仅存卷四十七至五十共四卷。现在通行的是四库馆臣的《永乐大典》辑本。公元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直斋书录解题》的点校本，吸取了清人卢文弨的校勘成果，附录了有关研究资料，使用起来较为方便。

《直斋书录解题》与《郡斋读书志》被誉为私家目录中的双璧。

(三)尤袤《遂初堂书目》

尤袤，字延之，无锡人。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宋史》有传。他是一位勤读勤抄，对图书有特殊感情的藏书家。曾对人说，他对书的爱好是"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宋杨万里《遂初堂书目》序)

遂初堂是他的藏书楼号，《遂初堂书目》是他的私藏书目。全目一卷，分四十四小类，小类按四部顺序排列，但不标经、史、子、集。它是一部登记目录，所著录各书，仅录书名、版本，既无卷数，绝大多数也不记作者姓名。《四库总目》认为原来应有卷数、作者，为后来传写者所删削，看来有这种可能。

《遂初堂书目》注重史部的著录，史部著录九百多部书，版本记载也比较集中。其分类有所谓"本朝杂史"、"本朝故事"、"本朝杂传"等，较注意当代史的收集。

《遂初堂书目》是最早的版本目录。它著录一部书时兼载各种版本，如曰："川本《史记》、严州本《史记》"、"吉州本《前汉书》、越州本《前汉书》、湖北本《前汉书》"等。全书所著录当时书籍的版本有二十种左右。反映了宋代版刻的情况，对后世追寻宋刻本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尤目作为版本目录的开端，推动了版本学研究的进展。

五、郑樵对目录学的研究

郑樵(公元1104--1162年)，字渔仲，又称夹漈先生，福建兴

化军(今福建莆田县)人。他是南宋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十六岁开始,在莆田夹漈山下苦读三四十年。他的一生博学多才,著作丰富,有 84 种,但流传下来的仅有 4 种。《通志》二百卷是他最著名的著作,其二十略中的《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反映了他的目录学思想,其中又以《校雠略》最为突出,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目录学理论专著。

《校雠略》共有 21 个论题,69 篇论文,约 7900 多字。对于古籍目录学的各个方面都加以研究,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下面就他对于目录的分类、著录及解题等问题的论述作简要的介绍:

(1)郑樵把图书分类的问题提高到学术高度来论述　提出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著名论点。在他之前的目录学家虽然也重视图书分类的方法,并且进行了许多实践,但都未能认识或未能阐明分类可以辨析学术源流的思想。因此,郑樵的观点是一个贡献。他把自己的这种想法,在《通志·艺文略》中付诸实践,构造了一个周详、创新的分类体系,使图书的归属更接近于合理。

(2)在目录著录方面,他主张通录古今,不漏亡佚、兼录图谱和金石　通录古今是郑樵"会通"思想在目录学上的应用,他不仅侧重于著录今书,对古书也作全面的记载,以求通录。不漏亡佚的目的在于保存书籍名目,便于后人辩章学术,又可提供一条追求亡书的线索。他把目录著录的范围从单纯文字的书籍扩大到图谱和金石,并在《通志》中设立《图谱略》、《金石略》,与《艺文略》的著录相辅相成,使文献资料得到广泛、全面的记载。他的这种论点已被当今的文献学理论和实践所借鉴和利用。这就是广泛利用碑刻、铭文,利用纸以外其它载体上的文字资料。

(3)对目录的解题,他曾提出"泛释无义"的论断　他的这一论断并不是一概反对书录解题,而是反对不顾实际需要而作全面的解题释义。他认为:"有应释者,有不应释者,不可执一概之论。""《旧唐志》一概不释,谓之简;《崇文总目》一概释之,谓之繁。"所以

他在《艺文略》中，只是在一些书目下作了简单的附注。

郑樵在《校雠略》中总结了刘向、刘歆以后一千多年古籍目录工作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并大胆地提出了许多不同于前人的见解。《校雠略》的贡献不在于它的观点是否完全正确，而在于它进行了一番理论的总结和新观点的探索。后世对郑樵的目录学见解和实践毁誉不一，显然他是有"粗疏"(《四库总目》)和"高自称许"(《文献通考》)的一些缺点，但他能独立思考，为古籍目录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他为宋代目录事业所作的杰出贡献，是应该肯定的。

宋元之际目录学的发展具有如下的特点：一是私人藏书目录迅速发展兴盛，为古籍目录学的研究保存了可贵的资料。二是古籍目录学成为专门学科，除北宋《苏魏公谭训》卷四，有"目录之学"的明确概念外，这门专学的研究出现了第一部理论著作——《通志·校雠略》，这是目录学在宋代形成的重要标志。三是各种新类型的目录继续出现，如史志目录中的国史目录和专史目录；如类书目录，王应麟《玉海·艺文》二十八卷；如第一部版本目录《遂初堂书目》；如最早的医籍书目《医经目录》、《大宋本草目》，这些成绩推动了古代目录事业，由五代的缓慢发展时期走向兴盛时期。

第五节　明　清

一、《文渊阁书目》和《新定内阁藏书目录》

明太祖灭元后，大将徐达将元大都的藏书大量运往南京，这些书多是宋元刻本及旧抄。永乐帝迁都北京，又将书一百柜运回来，再遣官四出购书，增加库藏。《明史》卷九十六记载："明太祖定元都，大将军将图籍致之南京。复诏求四方遗书，设秘书丞，寻改翰林典籍以掌之。永乐四年，上御便殿，阅书史，问文渊阁藏书。解缙对以尚多阙略。帝曰：'士庶家稍有余资，尚欲积书，况朝廷乎？'遂命

礼部尚书郑赐，遣使访购；惟其所欲与之，勿较值。”可见明初对图书的收集，也是不遗余力，不计较购书价钱，志在必得。明正统六年（公元1441）由大学士杨士奇等人编成国家书目《文渊阁书目》，杨士奇（公元1365——1444年），名寓，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明初建文帝时，被推荐至翰林院任编修官，参加《太宗实录》的编撰。永乐年间进翰林学士，后升为左春坊大学士。仁宗时为少师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宣宗、英宗时为宰辅，长期执政。除《文渊阁书目》外，还有《历代名臣奏议》、《东里全集》等编著。

《文渊阁书目》，《四库全书》本为四卷，《读画斋丛书》本为二十卷。该目编排方法较为奇特，按《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晨宿列张，寒来暑往”前二十字分类排号，又按五十橱度藏。每个字号之下又分有小类，其类次顺序与收藏情况大致如下：天字五橱为国朝，即明朝皇帝御勅、实录等。地字四橱为易、书、诗、春秋、周礼、仪礼、礼记。玄字一橱为礼书、乐书、诸经总类。黄字三橱为四书、性理、经济。宇字六橱为史 。宿字二橱为史附、史杂。洪字一橱为子书。荒字一橱为子杂、子附。日字三橱为文集。月字二橱为诗词。盈字六橱为类书。昃字一橱为韵书、姓氏。晨字二橱为法帖、画谱，附诸谱。宿字一橱为政书、刑书、兵法、算法。列字二橱为阴阳、医书、农圃。张字一橱为道书。寒字二橱为佛书。来字一橱为古今志，附杂志。暑字三橱为旧志。往字三橱为新志。从以上顺序排列看，前十一个字号的小类基本按四部顺序排列，其后则无序。类目的设立也与原四部体系有较大差别，这些情况是对四部分类法的改变，但这种改变不能自成体系，显得比较混乱。

《文渊阁书目》的著录内容非常简略，无解题、小序，也不录作者、卷数，只在书名下注册数，或注有“阙”、“残缺”、“完全”等情况。所以《四库总目》认为它是“当时阁中存记册籍”，是一个帐本，不是书目著作。但《文渊阁书目》毕竟记载了一代藏书，共著录图书7256部，42600多册，有些图书流传至清代已经散失，所以《四库总

目》曰："惟藉此编之存，尚得略见一代秘书之名数，则亦考古所不废也。"(以上见《四库总目》史部目录类)《文渊阁书目》虽然在目录编制方法上潦草疏陋，无多贡献，但其著录内容反映了古代文化典籍流传在明代前期的大致情况，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明朝继《文渊阁书目》之后，又编制了国家书目约十种之多(见《千顷堂书目》)，但大都不能全面反映明国家藏书的情况。其中著录较全面、体例相对较好的是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由中书舍人张萱等人编制的《新定内阁藏书目录》八卷。全目分十八部，下不设小类，著录书名、作者，书的全、缺，有的书注明卷数，有的书有简略的解题。体例仍不够完善，但稍胜《文渊阁书目》，也是明代较重要的国家书目。今流传有《適园丛书》本。

以上两部明代国家书目，均属于登记目录。

二、《四库全书总目》

清兵入关后，继承了明朝大部分藏书，其中包括已经残缺，但仍属卷帙浩繁的《永乐大典》。康熙以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基本稳定，于是清廷开始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进行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工作，从康熙到乾隆数十年间，皇宫内武英殿雕刻御制钦定书籍已达146种，康熙时还编成了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10000卷。乾隆时，清廷又开始了编集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72)乾隆帝弘历下令搜求图书，第二年成立"四库馆"，开始编修《四库全书》，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编成，历时十年。《四库全书》的图书来源，在《四库总目》各书书名下都有附注，总括起来，大致一是勅撰本，即清初至乾隆时，钦勅编撰的图书。二是内库本，来自皇室收藏，收入全书的有327种、存目的有420种。三是《永乐大典》本，共有515种。四是各省采进本，由各省总督、巡抚进献，采书最多为浙江，共4601种，56955卷，其次为江苏。五是私人进献书，由江南著名藏书家进献，如范氏天一阁、钱氏

述古堂、徐氏传是楼等，凡献五百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一百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最初抄写四部，分藏北京皇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文溯阁，承德文津阁。后又抄三部，分藏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这后三阁允许读书人入内阅看、抄录。后文源阁之书毁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江浙三阁在清军与太平军交战中焚毁大半，只存文澜阁半部，后经补全，藏于浙江省图书馆。文渊阁本在台湾。文津阁本藏北图。文溯阁本在"九·一八"事变时，被日寇掠出，战后收回，贮于沈阳，1966年移存甘肃省图书馆。编集《四库全书》时，由于卷帙浩繁，进展较缓，部头太大又不易阅读，所以中途曾命馆臣荟萃精华，于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编成《四库全书荟要》，收书464种，分装12000册，藏于宫内坤宁宫御花园内的摛藻堂。后又抄一部，贮于长春园含经堂的味腴书室。摛藻堂的一部与圆明园的全书同毁于英法联军，另一部现贮于台湾。《四库全书》曾由商务印书馆于1935年选印部分书籍，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80年代，台湾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影印流行。公元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台湾影印本再为影印刊行。

《四库全书》内容极为广泛，起到了整理与保存我国古籍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清政府在征集、编修全书的过程中，"寓禁于征"，对于不利于清朝的著作进行销毁、删节或窜改，据不完全统计，全毁、抽毁的书籍达三千余种，禁毁总数在十万部以上。

《四库全书总目》在编集《四库全书》时撰成，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国家书目，下边将其概况作简要介绍。

（一）《总目》的编撰、刊行

《总目》于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开始编撰，在开始编修《全书》时，就规定对新征收的书籍编写提要。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完成初稿，对《全书》所收书的提要称"著录"，不收书的提要称"存目"。此后十多年，随着《全书》的不

断抽换补充，对《总目》的初稿也有过几次增改。其间，又编了简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简目》删去序、提要、存目，只有一些附注，于乾隆四十九年（公元 1784）由馆臣赵怀玉将《简目》抄出来，在杭州刻印，这是《简目》最早在民间流传的版本。

乾隆五十八年（公元 1793），《总目》正式在武英殿刊版印行。由开始编撰到印行历时 20 年。

乾隆六十年（公元 1795）由阮元、谢启昆等官员主持，将分藏南北七阁的《总目》武英殿刻本在浙江翻刻，从此才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传。

公元 1965 年中华书局印行的《四库总目》，是目前使用起来最为方便的版本。全书有索引，书后附有《四库撤毁书提要》和《四库未收书提要》两种。

公元 1957 年《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重新排印出版。

《四库总目》的编撰是众手成书，第一步由四库馆的三百多名馆臣书写提要；再由学有专长的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翁方纲、朱筠、姚鼐等人分管各部专责；最后由博闻强记的总纂官纪昀整理加工，编定全书。因此，《四库总目》虽以乾隆的第六子永瑢领衔编撰，实际上是由纪昀总其成的。纪昀（公元 1724—1805 年）字晓岚，一字春帆，乾隆十九年进士，由翰林官至礼部尚书。

（二）《总目》的体例

《总目》二百卷，书前有“凡例”20 则，规定了全书的体例。全书按经、史、子、集分四部，44 小类，69 子目，共收书 10254 部，172860 卷。分“著录”3461 部，79309 卷；“存目”6793 部，93551 卷。它是一部解题目录，解题的内容详细、全面。

（三）《总目》的学术价值

《总目》著录介绍了大量的古籍，这些书籍基本上包括了清乾隆以前特别是元代以前中国古代主要的著作。

《总目》的序和提要简炼严密，论述了古代的学术源流，各书的作者事迹，文字异同，内容正误，价值高低，考证非常精详，有许多正确的论证。它是对 18 世纪以前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一次大总结，许多学术观点值得借鉴。

《总目》的分类体系和编撰体例达到古代目录的高水平。它的分类体系和编撰体例影响并推动了清代直至近代目录事业的迅速发展。

许多学者对《总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张之洞说："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辅轩语》）这句话足以说明《总目》的价值。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总目》在加强封建专制主义方面也发挥了它的作用，例如有些评论出于政治需要而不是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有的提要过于专断。如对李贽的《藏书》、《续藏书》横加指责，认为"罪不容诛，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行简牍。"又如对明代王洙所作《宋史质》的评论则近于谩骂，指此书为"狂吠"，责曰："自有史籍以来，未有病狂丧心如此人者。其书可焚，其版可斧。"（以上皆见《四库总目》史部别史类存目）因此鲁迅说读《四库简目》"要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同时，《总目》本身在学术问题上也有一些失误，如著录不讲版本，有的不究史源，有的图书归类不妥，有的记载出现讹谬等等。

（四）与《总目》有关的著述

后来与《总目》有关的著述，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其著录作补充，如：

（1）《四库撤毁书提要》　有九种书的提要，原准备编入四库，后又撤除。于是馆臣把提要抄录流传。

（2）《四库未收书提要》　清阮元征集四库未收书 170 种，并请人写出各书提要。

以上两种著述附于公元 1965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总目》之后。

(3)《清代禁毁书目》附《补遗》　　清姚觐元编，收书三千余种，可见当时摧毁文化的情况。

(4)《清代禁书知见录》　　孙殿起编，记被四库馆查禁，而后来仍能见到的书籍。以上两种禁书书目可相互参照。

(5)《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二十卷　　清邵懿辰编，此目注明《四库全书》所收书的各种版本，及版本的优劣，是一部版本目录。

另一方面的著述是纠正《总目》的误失，如：

(1)《四库提要辨证》二十四卷　　余嘉锡撰，全书 491 篇，考证精细。

(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六十卷　　胡玉缙、王欣夫辑，此书将清人及近人著作中有关订正《总目》的内容辑录成书，共订正书籍 2300 多种。

三、《书目答问》

(一)关于《书目答问》的作者

《书目答问》是张之洞在四川任学政时，主持编写的一部初学目录，光绪二年(公元 1876 年)刊行。刊行之后，对于此书作者，曾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认为是缪荃孙代编，特别是清末学者叶德辉力主此说。对于这个问题，缪荃孙本人说法也较含糊。最初在《四库全书简目标注序》中说张之洞编《书目答问》，“我随同助理”；但在宣统三年写的《艺风老人年谱》中又说，光绪元年，张之洞命撰《书目答问》四卷。所以有关撰者的疑案，一段时间内没能确定。后来陈垣先生作《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一文，专门考证这个问题。陈垣先生买有一批书信，其中有一信是光绪二年(公元 1876 年)，张之洞给王懿荣的，信中叙编书事极详，并请王懿荣将《书目答问》一部转赠缪荃孙，“嘱其订正”，再转达缪的意见。陈老经多方考证，指出此目为张之洞主编，缪荃孙助理，使这个问题有了定论。后来柴

德赓先生在《书目答问补正序》中，又对这个问题作了考辨，支持了陈垣先生的看法。

张之洞（公元1837——1909年），字孝达、香涛，直隶（河北）南皮人。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任四川等地学政，历任两湖、两广、两江总督，至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职，是清末政府的重要官员。张之洞编《书目答问》的目的在于指示治学门径，解决初学者"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这两个重要问题。

（二）《书目答问》的体例及其贡献

张之洞的编书目的决定了这部目录的举要性质。这就是驭繁就简，选举推荐中国古籍中最重要的书籍，同时还要介绍这些书的最好版本。

《书目答问》五卷，收书2200多种，其中为《四库全书》所收的书的占7/10，《四库》未收之书约占3/10。

《书目答问》采用五分法，分经、史、子、集、丛书五部，五部下又分三十六小类，有的小类还分出子目。正文后有两个附录，一是"别录"，附录一些初学读本；二是"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介绍清代学术人物，《书目答问》的体裁属于登记目录，书名下都有附注，介绍作者，书籍版本，有的还有简要评论，有益于指导治学。

《书目答问》的贡献在于它是一部非常实用的古籍初学书目。通过慎择约取的著录以及附注中对版本的介绍、对治学门径的指导，扼要地指示了中国古代的书籍与学术源流。因此鲁迅认为如果要搞旧学，可以依靠张之洞《书目答问》去摸索（《而已集·读书杂谈》）。此外，《书目答问》在分类法上也有所突破，在四部之外增设了"丛书"一部，符合了清代图书发展的实际情况。这种大部类的分类方法，为现在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借鉴。在小类的分类上，也注意区分不同的学术流派，体现了郑樵关于"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目录思想，这一点是许多目录书所不能做到的。

（三）对《书目答问》的补订

《书目答问》刊行后，翻印本、重刻本有数十种，也有许多学者对《书目答问》的错漏作了订正。如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在贵阳刊刻的王秉恩校刊本（贵阳本）就对原书作了较大的改动。

最重要的补订工作是公元1933年出版的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补正》使《书目答问》的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它补充了原书刊刻后五十多年来学术界整理、研究古籍的著作1200种，又订正了原书中一些书名、作者、卷数、版本的错漏近百处。凡以上订补内容以“补”字引出。因此，《书目答问补正》一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范希曾作补正时，未能参考光绪五年刊刻的贵阳本，所以有些内容贵阳本已经补正的，范希曾仍沿误漏，未能改正。

范希曾（公元1899——1930年），字耒研，江苏淮阴人，南京高师毕业，公元1927年进人南京国学图书馆从师柳诒徵，并开始作《书目答问》的补正工作，31岁去世。

公元1963年中华书局重印了《书目答问补正》，并根据柴德赓先生《记贵阳本书目答问兼论答问补正》一文，校改了范书因未利用贵阳本而遗留的错漏。

公元1979年袁行云先生发表《书目答问和范希曾的补正》一文（见《社会科学战线》1979·1），也对范本作了一些校订。

公元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书目答问补正》的点校本，利用起来比较方便。

四、明清私藏目录概况

明清之际是私家藏书最为兴盛的时期，据清代学者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记载，明代藏书家有427人，清代藏书家近500人，不少藏书家有私藏目录，特别是清代，目录学成为“显学”，私藏目录更为普遍，因此这里不可能一一介绍各家私藏目录的情况，拟以集中分析的办法，阐述明清私家目录的成就和特点。

(一)、明代私藏目录概况

据汪辟疆先生《目录学研究》统计，已知的明代私藏目录有41种，现存20种，由于明代私藏目录历经清代的变迁，许多私藏目录在流传中亡佚，得不到妥善保存，但可以肯定地说，明代私藏目录是要大大超过以上数量的。

从著录内容上看，明代私藏目录在著录内容上已有很大突破，主要体现在广泛记载原来被封建士大夫认为"末流"、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类书籍。如徐𤊹《红雨楼书目》收元明杂剧和传奇就达140种之多；又如高儒《百川书志》在史志的野史类、外史类、小史类，晁瑮《宝文堂书目》在学杂类、乐府类都收入了大批元明话本、小说、杂剧和传奇，为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线索。明万历年间藏书家赵琦美不仅在《脉望馆书目》中著录了一批戏曲、小说作品，还手抄手校元明杂剧242种，编成《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这批宝贵的文学遗产经清代藏书家钱曾、黄丕烈等人的传递，后由当代著名学者郑振铎先生整理抢救，终于保存下来，成为我国戏剧史研究的主要资料。

明代私藏目录在体例上往往打破旧的格局，进行了各种改进和探索。如在分类方法上，许多私藏目录不按四部分类的旧法，而自立类目，有些按四部分类的目录，也在四部以下新增小类，自成体系。在著录方法上的改进以祁承㸁《澹生堂书目》最为突出。祁承㸁字尔光，号夷度，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万历年间进士。他是明代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著有《澹生堂藏书约》，详细论述书籍的收藏方法，私藏图书达10万余卷。他的《澹生堂书目》采用表格形式著录图书，眉目清楚。书目中附有《庚申整书略例》，专门阐述书籍的分类和著录方法，是目录学理论的重要文献，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论述了"互著"与"别裁"的著录方法。祁承㸁将"互著"的方法称作"互"。他说：

一曰互。互者，互见于四部之中也。作者既非一途，立言

亦多旁及。有以一时之著述，而倏尔谈经，倏尔论政；有以一人之成书，而或以摭古，或以征今。将安所取衷乎？故同一书也，而于此则为本类，于彼亦为应收；同一类也，收其半于前，有不得不归其半于后。如《皇明诏制》，制书也，国史之中固不可遗，而诏制之中亦所应入。如《五伦全书》，敕纂也，既不敢不尊王而入制书，亦不可不从类而入纂训……故往往有一书而彼此互见者，同集而名类各分者，正为此也。

至于"别裁"，他称作"通"。也作了专门的分析：

一曰通。通者，流通于四部之内也。事有繁于古而简于今，书有备于前而略于后。……如欧阳公之《易童子问》、王荆公之《卦名解》、曾南丰之《洪范传》，皆有别本，而今仅见于文集之中。惟各摘其目，列之本类，使穷经者知所考求，此皆因少以会多者也。……凡若此类，今皆悉为分载。特明注原在某之内，以便简阅，是亦收藏家一捷法也。

祁承㸁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互著"、"别裁"的办法与功用，而且在《澹生堂书目》的著录中也实践了以上两种方法，他是中国目录学史上从理论和实践自觉运用"互著"、"别裁"方法的第一人。有的学者以为以上二法或肇始于刘向、刘歆，或首创于马端临，皆无实据说明他们的自觉运用。惟祁承㸁才是深刻认识与自觉运用者，而清代章学诚在全面总结"互著"、"别裁"二法时，却只字未提祁承㸁及其《澹生堂书目》，实在是莫大的缺憾。

（二）清代私藏目录概况

清代私藏目录的内容与数量又要大大超越明代私藏目录。清代私藏目录有多少种呢？孙殿起《贩书偶记》正续编著录清以来各种目录书 155 种，但实际上，仅清代私藏目录就要超过这个数字，据近年来搜寻所知，清代私人藏书目录的总数可达三百余种，这是一个庞大的目录资料群。这批数量众多、形式各异、内容丰富的私藏目录，在清代书目著作中，无疑是一支生力军。它们对于清代目

录学的研究，乃至对于清代各个文化领域的研究，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

清代私藏目录的成就首先在于著录范围的广泛。由于清代雕版印刷业的空前发达，为藏书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藏书校勘风气的流行，促使许多藏书家不遗余力地搜罗异本秘籍，他们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穷乡僻壤，日积月累的结果，使很多藏书家的藏书量达万卷以上，有的甚至蓄书数万卷、数十万卷。如郁松年的宜稼堂及清季杨绍和、瞿镛、陆心源、丁丙等四大藏书家，他们的藏书量都在 20 万卷左右。而清代号称恢宏博大的国家书目《四库总目》也仅收书 17 万卷。在丰富的藏书基础上，私藏目录有可能部次群书，著录大量的古籍。例如钱曾《也是园藏书目》、徐乾学《传是楼书目》、汪宪《振绮堂书目》，著录图书都有三千多种；而丁丙的《八千卷楼书目》则著录八千多种图书，这个数目比之《四库总目》著录三千多种，存目六千多种也相去不远了。另外，藏书家们生活于民间，他们可以通过购买、借阅、传抄、转换等流通手段得到奇书异本，从这个角度上看，许多稀世典籍更容易反映在私藏目录中。例如，藏书家黄丕烈从访问购得并在目录中著录的元朝《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就为《四库总目》及多数书目所阙载，在当时也鲜有人知。这种例子可以举出很多。

清代私藏目录的学术价值还在于记录了许多版本、校勘内容。清人出于朴学"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往往重视追求古书之真，这就引起藏书家对书籍版本及其授受源流的重视，版本学的专门研究在私藏目录中得到深入的发展，许多私藏目录对于书籍版本的先后，篇第的多寡，音训的异同，字画的增损，授受的源流，乃至行幅、装潢状况都有详细记载。这些内容对于后人考辨古籍，了解古书的版本、流传，都是极好的资料。私藏目录由于著录的是作者自己的藏书，书主唯恐贻笑他人，往往用心仔细，甘愿投注大量心力。他们"凡所校定，必参稽善本，证以它书，即友朋后进之片言，亦择

善而从之"(钱大昕《卢氏群书拾补序》)。此外,由于作者利用自己的藏书,使用方便,可以反复钻研,有的书甚至校订三遍四遍,因此对书籍状况了如指掌,所发议论也言之有物,非泛泛空谈。这种条件是官修目录之众手成书、期限仓促、往往敷衍了事的状况所不能相比的。

清代私藏目录在图书分类和编著体例的革新上成就显著。首先是根据学术发展与图书情况,改造旧的分类方法,创造新的分类体系。有清一代,绵延两千年的封建文化显露出颓败的症候,而商品经济的繁荣,各种书籍的流通,西方文明的输入,都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凡此种种,都在知识的准备上为这一时期的文化人进行历史反思提供了可能性。他们有所觉悟,并开始在各自领域中对一些旧的内容进行了冲击,在目录学领域里,私藏目录大量地改变了"四部"分类的格局,采取了种种新的分类方式。如清初钱曾编制的三部目录,都取消了四部区分,而将原属于二级类目的小类直接上升为一级类目,这种作法有利于把属于自然科学与技术工艺方面的"医书"、"天文"、"农家"、"营造"、"鸟兽"、"数术"等书,提高到与经史同等的地位,以便引起人们的注意。此外,如徐乾学《传是楼书目》,仿造明《文渊阁书目》的作法,以《千字文》的顺序排号,一号一橱,共列56橱。孙从添《上善堂书目》为了突出版本目录的特点,干脆以书籍的版本分类,列宋版、元版、名人钞本、影宋钞本、旧钞本、校本等六类。孙星衍的《孙氏祠堂书目》则创立十二分法的分类体系。这些作法,都在当时目录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清末学者叶德辉称赞孙星衍的分类方法是"通《汉略》、《隋志》之郮,变《崇文》、《文渊》之例,体近著述,语者不仅以书目重之。"(《郋园读书志·书目答问》)

私藏目录的分类体系还善于根据学术发展、学科分立及各类书籍增多的实际,将分类等级向纵深处发展。不少私藏目录纷纷出现三级、四级类目。如汪宪《振绮堂书目》,在一级类目史部下有二

级类目 17 个；二级类目“传记”下，又分出帝妃、大事、杂记、杂说、臣传等五目；三级类目“臣传”下，又分宰辅、公卿、名臣、忠臣、儒林、高士、善行、杂传、年谱、人物、杂录、外戚、女范、怪异等四级类目 14 个。虽然其中有的类目设立不尽合理，但这种作法是符合社会文化发展需要的。

清代私藏目录在图书分类和著录时，还能实事求是地反映清代“西学东渐”的实际情况，清末徐树兰《古越藏书楼书目》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此目将古今中外图书统一分类立目，设学部和政部两大部，学部分 24 类，其中有关新学的类目如生理学、物理学、天文算学、中外各派哲学等；政部也分 24 类，其中有关新学的类目如外史、外交、教育、军政、法律、工业、美术等。二级类目下又有 332 子目，子目更具创新，设立了许多新学图书的类名。新书籍、新学术、新潮流是改变图书分类法的基本条件，清代私藏目录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在图书分类和实际著录中反映学术文化的变迁，这是文化意识上的进步，其成就加快了古典目录学向近代目录学转变的进程。

此外，题跋集目录的出现也是清代私藏目录在编著体例上的创新。这种目录体裁形式灵活自如，可以大容量地收纳撰者对书籍考证的材料，所以学术价值要比一般的登记目录高。

综上所述，清代私藏目录的学术价值足可观，它作为一个丰富的资料库，可以作如下几方面的开发和利用：

第一，可利用私藏目录中对书籍状况的大量介绍，考辨现存古籍的版本状况，了解现存古籍的授受源流，掌握有关古籍篇目的分合问题，考证阙疑，解决问题。

第二，官修目录存在不少误漏，就是堪称佳作的《四库总目》也存在许多错误，再加上由于文化专制的原因，有大量禁毁书不予登载，这些情况以前学者虽作过考订，但仍可依据私藏目录作进一步的补正。

第三，把握清代私藏目录在目录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有助于全面了解清代目录学领域的学术成就。

第四，利用计算机，开展对清代私藏目录记载的全面考察，并参考官修目录的内容，可以掌握清代书籍流传的总体情况与数量，这将对清代文化史，乃至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和总结都是大有裨益的。西方学者有人利用书目学的统计方法，分析各种书籍的流向和传播范围，用以阐述某个时代精英文化和俗文化的大致状况，这些作法值得借鉴。

第五，在利用私藏目录，大量掌握清代古籍流传情况的基础上，对照现存古籍，可以了解清以来古书散佚失传的情况，并为追寻亡佚之书，提供某些线索。

总之，对清代私藏目录的利用、发掘的前景是乐观的，这项工作目前还做得很不够。窃以为，当务之急在于及时开展对清代私藏目录的收集和整理，例如可利用计算机快速编排、整理、检索的优势，编制《清代私藏目录著录古籍总目》，在此基础上作各项专题研究，庶几可以创获非浅。

五、章学诚的目录学研究

章学诚（公元 1738—1801 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他是清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评论家和目录学家。章学诚的一生仕途坎坷，从二十多岁起，连续参加科考七次，都未能中举，四十多岁才中了进士，但没有做官。所以数十年间，迫于衣食，服务于地方官僚阶层，郁郁不得志。他的许多学术思想，生前不甚为人知。死后一百多年，《章氏遗书》才得到刊行，他的学术观点才被人重视。他一生主持编写过许多地方志，对地方志的编撰有系统的研究，还编写过《史籍考》。《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二书，是他的代表作。前者阐述了史学理论，后者则集中反映了他的目录学思想。《校雠通义》的目录学理论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章学诚第一次明确地指出目录的任务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就是要从揭示书籍的内容着手，把书籍、目录和学术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他主张作目录要继承《七略》有序、有解题的作法，但是序和解题都要围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中心来进行，这就能避免郑樵所批评的“泛释无义”的缺陷。

他进一步阐述了“互著”、“别裁”在分类著录中的辅助作用。分析了“互著”、“别裁”的使用方法及二者的同异。这两种著录方法虽然在明代祁承㸁的《澹生堂书目》中就首先运用和进行了讨论，但认识还不够深刻。章学诚对“互著”、“别裁”的精辟论述，最终使这两种方法确立为目录的著录原则。

在分类法上，他认为分类应根据学术的变迁及书籍情况而变更，七分变为四分，这是社会文化和书籍发展变化的需要，而对于四分法不能适应学术流变的情况，也要及时进行补救。

他还极力主张编制索引，以此为工具，揭高校勘古籍的效率。他阐述了编制索引的一些具体方法，这是在理论上提出了目录为学术研究服务的新课题。

章学诚是古代末期杰出的目录学家，他的目录学研究继承和发展了郑樵的理论，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他的目录学思想可以认为是近代目录学思想的先躯。

明清之际的目录事业，除了以上所讲的几个方面外，还产生了大批专科目录，如《史籍考》、《经义考》、《小学考》及一些医学书目、科技书目。在史志目录的编撰上，还有明代焦竑的《国史经籍志》，清代所作的《明史·艺文志》及清代学者编制的许多补史目录。总之，明清两代的目录事业，是我国古代目录工作与研究的顶峰，其各方面的成就，为近现代目录学的发展准备了丰富的资料和经验。

第六节　近　现　代

清王朝灭亡后至公元1949年以前，是我国近代目录学的发展期；公元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是我国现代目录学的发展期。

随着近代文化的发展，西方图书馆学、目录学研究方法的引进，极大地推动了近代目录学的进步。自公元1910年京师图书馆建立以后，各地图书馆相继设立，公元1918年全国有二百多个，到公元1936年发展到五千多个。近代图书馆运动的兴起，促使目录工作向多样化发展变化。近代目录事业不仅有目录学的研究，还有书目的编纂，近代图书馆的目录咨询服务，大专院校的目录学课程教育，目录的管理和协调工作等等。目录资料的范围也大大扩展，不仅有书目，而且有索引、文摘、书评等。目录的载体也出现多种形式，如书本式、卡片式、期刊式、附录式等等。

新中国建立后，目录学这门古老的学科紧跟社会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突飞猛进，据不完全统计，仅公元1949年至1966年，编制的各种书目、索引就达6450多种，是公元1949年以前历代编制书目、索引1600多种的4倍。新中国建立了国家书目工作体系，开展了联合目录活动，各种以文摘、索引、题录相结合的文献检索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推荐目录、导读目录、科学参考目录、地方文献目录、个人著述目录都在不断发展。近代以来出现的目录收藏管理、目录情报服务、目录学教学与研究达到新的水平。随着国际交流的频繁和深入，目录工作的标准化、自动化也在逐步实现。随着科学文化的高速进展，目录学为适应各学科的需要，也为了吸收新的科学成果，出现了分化与组合的倾向，如专科目录学中的古籍目录学、文学目录学、医学目录学等等，如边缘学科中的书目计量学、比较目录学等等，相继产生。目录工作正朝着自动化、数学化、情报化、新的分化组合等方向迈进。

在近现代目录事业中，古典目录学的研究得到长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姚名达、余嘉锡、王重民、来新夏等先生对古代目录学史的研究成果上。古籍目录、索引的编制，成就突出，以下分别进行简要的概括。

一、古籍目录编制的进展

近现代古籍目录编制工作的进展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新中国建立以前出现的一批国学举要书目。如公元1923年胡适编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曰："用历史的线索为国学天然的系统，而其书目顺序，也就是下手的法门。"该书分工具书、思想史、文学史三大类。梁启超对胡适所编的书目很不满意，于是自己在当年也编了一个《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全书分五大类，每书下有简要解题与读法，附录有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包括四书五经、五子、七史、七集，共有二十八种，曰："若藏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人矣。"继胡适、梁启超以后，国学举要书目不断出现，成为一个系统。如：

李　笠《国学用书撰要》
支伟成《国学用书类述》
曹功济《国学用书举要》
陈伯英《国学书目举要》
张文治《国学治要》
杨济沧《治国学门径书》
陈钟凡《治国学书目》
邵祖平《国学导读》
吕思勉《经史解题》
钱基博《四书解题及其读法》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普及古代文史知识，指导阅读，出了一批举要介绍性书籍，以史学古籍的介绍为多，如张舜徽的《中国历

史要籍介绍》(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5 年),柴德赓的《史籍举要》(北京出版社 1982 年),王树民的《史部要籍解题》(中华书局 1981 年),李宗邺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文学方面有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 年编辑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题解》,李树兰编著的《中国文学古籍博览》(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二是各图书馆编写的古籍善本书目。如公元 1933 年赵万里编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1934 年梁格编的《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中文古书分类目录》,1935 年出版的《浙江省立图书馆善书书目》,1936 年出版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等。1949 年以后,各省市图书馆、各高等院校图书馆相继编写馆藏古籍善本书目,其中以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籍善本书目为精粹。1949 年以后,国家政府主管部门还发挥社会主义集体合作的优势,组织编撰大型古籍联合目录,如 1959 年联合全国 41 家图书馆馆藏丛书编成的《中国丛书综录》,如 1986 年联合全国 781 个图书馆与收藏单位所藏古籍善本编成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都是工程浩大,收录广博,前所未有的。另外,根据《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 267 期(1993、2)报道,国家已组织全国各方面专家着手编写《中国古籍总目提要》,预计于 2000 年完成,该目以傅璇琮任主编,初步确定采用四部分类法,著录古籍以 1911 年为下限。这将是我国最大的一部古籍解题目录,它将全面整理、阐明传世的中国古籍的具体状况,展示当代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最新水平。这项划时代文化工程的完成,将为古籍目录事业的发展树起新的里程碑。

三是书业目录,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世界书局等曾排印或影印了大批古籍,与此同时,编印了一些相应的古籍目录或索引。如公元 1922 年孙毓修的《四部丛刊书录》,介绍了《四部丛刊》所收古籍版本。公元 1936 年中华书局

的《四部备要书目提要》，在每书之下有作者小传、述略和卷目等介绍。公元 1935 年商务印书馆的《丛书集成初编目录》，分类编排了所收的 4100 种子目，注明其所属丛书，目录前还有各丛书的提要。公元 1936 年还出版了孙殿起的《贩书偶记》。此外，当时北平的古旧书店大都有书业目录刊行，介绍所经营的古籍，如《文芸阁书目》、《修绠堂书目》、《文奎堂书目》、《通学斋书目》、《三友堂书目》等等。

四是个人知见书目的编撰。如公元 1932 年出版的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公元 1933 年又出版了他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解放以后，中华书局于公元 1983 年出版傅增湘的《藏园群书经眼录》，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王重民的《中国善本书提要》。还有一些目录学家总括古代目录著作，编制了一批书目之书目，如公元 1920 年周贞亮、李之鼎出版了《书目举要》，收汉至清末各种目录 270 余种。后来陈钟凡补作《书目举要补》，补录 150 余种。公元 1928 年邵瑞彭、阎树善等又出版了《书目长编》，收录 1300 多种。又有何多源的《中国目录要籍解题》、项士元的《中国目录考》等等。

近现代古籍目录除上述几项成就之外，古籍专科目录也有大的发展。例如，近代目录学发展时期，有公元 1924 年毛雝的《中国农学书目汇编》；公元 1926 年裘仲曼的《中国算学书目汇编》，著录算学书约 1000 种；公元 1932 年吕绍虞的《中国教育书目汇编》，著录教育典籍 1800 多种；公元 1933 年陆达节的《历代兵书目录》，著录兵书 1300 余种。这些目录著录的图书多数或全部为古籍。现代目录学发展期撰著的专科古籍目录更多，主要的书目如公元 1957 年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著录古代农书 420 多种，并有提要评介。公元 1959 年北京图书馆的《中国古农书联合书目》，收录 620 多种。公元 1961 年北京图书馆、中医研究院的《中国图书联合目录》，著录医书绝大部分为中医古籍。另外，还有北京图书馆的《有

关古建筑资料目录》、中国戏曲研究院的《中国古典戏曲总录》、中国音乐学院的《中国古代音乐书目》、虞复的《历代中国画学著述目录》等等。

二、古籍索引的兴起

索引也称"引得",在古代称为"备检"、"通检"。索引是收一种或多种书刊中的具体内容,如词语、人名、地名、事件、篇目、主题等,按照一定的方式编排,并指明出处的检索工具。

索引的出现并不算晚,来新夏先生认为最早的索引是宋代的《群书备检》(见《古典目录学浅说》第 34 页)。钱亚新先生认为当以明代张士佩所编《洪武正韵玉键》为最早,这是对《洪武正韵》所收各字的分类索引;而明末傅山编的《两汉书姓名韵》,则编录《汉书》、《后汉书》中纪、传、志等所见人名,按洪武正韵的顺序排列,指示所在篇名等(见《古籍索引概论》序)。

清代学者对索引的编制作了更为深入的探讨,索引的数量逐步增多,乾嘉学者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内篇一还对索引的编制理论作了探索。他说:

> 窃以典籍浩繁,闻见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无遗,况其下乎?以谓校雠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名、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于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之总类。至校书之时,遇有疑似之处,即名而求其编韵,因韵而检其本书,参互错综,即可得其至是。

在以上论述中,章学诚涉及了索引编制的若干主要问题,如对人名、地名、官阶、书目等关键内容的揭示;如注明出处篇第与"一见再见",全面检索的原则;如指出索引的功用等等。章学诚不仅在理论上阐述索引的编制,自己也身体力行,编撰《历代纪元韵览》、

《明史列传人名韵编》等。

古籍索引虽然出现于古代，但其编制活动的兴盛却在近现代古籍目录学的发展时期。公元1925年，何炳松率先发表《拟编中国旧籍索引例议》，提出整理四部群籍，先编各部古籍索引，再依次扩充，汇成《四部索引》的宏大设想。此后林语堂于1926年发表《图书索引之新法》；钱亚新于1929年发表《杂志于索引》，公元1930年又出版专著《索引与索引法》；洪业也在公元1932年出版理论专著《引得说》。这些都是在理论和方法上对编制一般索引与古籍索引的全面探讨。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和目录学家投入了编纂古籍索引的实践活动。如公元1929年秋，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率领全家，以一年半时间编成了《十三经索引》。此外，公元1930年以后先后出版的还有王重民、杨殿珣的《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钱亚新的《太平御览索引》，吕绍虞、于震寰的《册府元龟索引》，顾颉刚的《尚书通检》，邓元鼎、王默君的《宋元学案人名索引》，杨殿珣的《石刻题跋索引》，开明书店的《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商务印书馆的《十通索引》、《佩文韵府索引》等等。

这一时期，我国专业的古籍索引机构也出现了。公元1930年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建立并开始工作，在1931至1942年和1947至1950年两个阶段，共编制各种古籍索引64种，其中附印原文的23种，不附原文的41种，中法汉学研究所（公元1948年后改称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在1943年至1950年间，编制了14种古籍索引。

约略统计，近代古籍目录学发展期所编制的古籍索引有100余种。

公元1949年以后，古籍索引的编制工作迅速发展和广泛普及，许多整理重印的古籍都附有索引，如《全唐诗》、《全宋词》、《金元散曲》、《文苑英华》等等。

此外，这一时期还重印了一批1949年以前出版的古籍索引，

以适应学术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的需要。

在新编纂出版的索引中，出现了一批影响大、价值高的古籍索引，如公元1959年陈乃乾的《清代碑传文通检》，1962年上海图书馆的《中国丛书综录》，1963年朱士嘉的《宋元方志传记索引》，1979年陆峻岭的《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1980年朱保炯、谢沛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1982年傅璇琮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等。

公元1981年，中央关于加强古籍整理的指示下达之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进入了新高潮，许多大型古籍索引的编纂工作已全面展开，如对全唐文、全宋文、全元文、全明文、宋诗总集、明诗总集、清诗总集的索引工作正在进行，有些已取得成果。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运用电子计算机编制古籍索引的手段已经取得初步的经验和成绩，正在逐步完善和推广。

新中国成立以后，古籍索引工作不仅在编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理论总结和研究上也有大批论著产生，公元1984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潘树广的《古籍索引概论》，是校为突出的理论专著。该书回顾了我国古籍索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对古籍目录的基本结构、类别、功用、使用方法等进行了具体介绍，并就古籍索引的编纂方法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书后附有中国及日、美、英、法、澳大利亚等国所编中国古籍索引550多种。古籍索引知识也得到普及，主要表现在高校中有关文科工具书使用法的课程，以及《文科工具书简介》等著述对古籍索引的介绍。

古籍索引作为古籍目录学的新兴领域，硕果累累，成就显著，从现有的古籍索引来看，可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一)字词句索引

这种索引把古籍中的字、词、句子作为著录和索引单位，供读者查寻所需的资料。

顾颉刚的《尚书通检》是以字为索引单位的字词句索引。

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所编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汉书及补注综合引得》、《后汉书及注释综合引得》、《三国志及裴注综合引得》，周钟灵的《韩非子索引》等，都属于以词为索引单位的字词句索引。

叶圣陶的《十三经索引》，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的《周易引得》、《春秋经传引得》、《毛诗引得》，属于以句为索引单位的字词句索引。

（二）专名索引

这种索引把古籍中的人名、地名、物名以及其他名词作为著录和索引单位，以备人们查检。

例如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的《白虎通引得》、《说苑引得》、《世说新语引得》、《容斋随笔五集综合引得》、《水经注引得》等，凡书中人名、地名、物名，包括书名等专名一一著录，作为索引单位，这是综合性的专名索引。

还有一些专门检索人名的专名索引，如钟华的《史记人名索引》，魏连科的《汉书人名索引》，李裕民的《后汉书人名索引》，高秀芳的《三国志人名索引》，曾贻芬、崔文印的《辽史人名索引》，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的《二十五史人名索引》等等。此外，又有一批专门检索古籍中人物传记资料的专名索引，如《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等。

还有以古籍中的地名为检索对象的专名索引，如王天良的《三国志地名索引》，日本荒木敏一的《资治通鉴胡注地名索引》等等。

（三）书目篇目索引

书目篇目索引是指引读者寻找有关古籍的重要工具。这种索引以书名、篇目为著录、索引单位，有的还包括作者的索引，以此向人们提供检索的途径。

例如段书安的《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

的《文选注引书引得》，陈乃乾的《四库全书总目索引》是书目索引。解放后整理出版的许多古籍目录，在书后也常常附有该书的书目索引。有的书目索引则不仅可检索书目，也可检索作者，如燕京大学引得纂处的《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上海图书馆的《中国丛书综录》第三册，中华书局附在《四库全书总目》后的《四库全书总目书名及著者姓名索引》等，皆可查书名又可查作者的出处。

属于篇目索引的，如王重民、杨殿珣的《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陆峻岭的《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又如中华书局编的《文选篇目及著者索引》、《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则既可查篇目又可查作者姓名。

综上所述，大批古籍索引的产生，为充分揭示古籍内容，为研究和利用古籍提供了方便。古籍索引的兴起促进了近现代古籍目录事业的繁荣，推动了古籍目录学的发展。

第四章　近现代古籍目录、索引举要

近现代许多目录学家和图书工作者，在研究和整理古籍的过程中，编制了大批古籍目录和索引，这些目录和索引无论在内容和体例上都比较科学与合理，对于古籍的检索、揭示和利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为了更好地了解、利用近现代古籍目录学的成果，本章对此期产生的古籍目录、索引举要介绍。由于篇幅所限，学识所限，所举不一定恰当，仅供参考。

第一节　综合性古籍目录、索引

《贩书偶记》二十卷

孙殿起编，1936年初版，中华书局1959年重版。登记目录，按四库分类法编次，书名下著录卷数、作者、刻印者、版本、刊刻年月等。凡《四库总目》著录者一概不录，凡收入丛书者也不著录，只录单刻本。因此，该目可看作是《四库总目》的续编。全书共编录古籍一万余部。

《贩书偶记续编》二十卷

孙殿起、雷梦水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全书体例仿照正编，著录清代著作六千余部。

《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十三册

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出版。1925年，日本以退还我国的“庚子赔款”为经费，在北平成立“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聘请中国学者85人，编撰《四库全书总目》以外的古籍提要，得提要稿

30000余篇，抗战胜利后，书稿被带到日本，后台湾商务印书馆据日本油印提要稿10070篇排印，全书十三册，前十二册为正文，第十三册为索引。所收书籍，皆《四库全书》不收、未收或《四库全书》以后所出之典籍，除个别新书外，绝大部分为古籍。收书数量10070种，是《四库全书》的三倍，接近于《四库总目》著录与存目总数10268种。另外，据《人民日报》1993年8月18日报道，中国科学院古籍组经十余年努力，终于将前辈学者原编3.3万余篇典籍提要全部付梓，题为《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字数1800多万，是台湾商务印书馆编印本的3倍。目前已由中华书局出版"经部"上下二册，240余万字，全书预计于1998年出齐。

《中国善本书提要》

王重民撰，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王重民（公元1903——1975年），北京大学教授，我国现代目录学奠基者之一。曾任北京图书馆代馆长，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此目录撰成于1949年，收录原藏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古籍4200多种，这些古籍皆作者经眼考订后，再撰写出提要，故非泛泛而论者可比。解题目录，按四部分类，每书下有提要，主要记版本特征，并对作者、出版者、刻工等有详细考证。附有《书目索引》、《撰校刊刻人名索引》、《刻书铺号索引》三种。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编，顾廷龙任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起出版。1978年4月，遵照周恩来总理生前的指示，成立了有关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领导机构，并开始了全国古籍善本普查工作。1980年5月，普查工作告一段落，在北京正式开始了善本书目的总编工作。1986年出版经部目录，其它各部也已完成，正以初稿形式向各地征询意见，然后陆续出版。这是我国现存古籍善本总汇，是我国最大的古籍善本联合目录，全书收录全国782个藏书机构的汉文古籍善本6万余种，13万部。全书分经、史、子、

集、丛书五部，每书著录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属于登记目录。

《中国丛书综录》三册

上海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全书收录国内41所图书馆所藏历代丛书2797种，包括古籍38891种。全书三册，第一册为《总目分类目录》，有"汇编"、"类编"两部分。"汇编"按丛书编集方法分为杂纂、辑佚、郡邑、氏族、独撰五类，"类编"按四部分类。书后附《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及《丛书书名索引》，尤以前者作用巨大，给读者提供了许多方便，近些年来由于某些藏书单位的门户之见，故在各大型工具书之后，已难得有这种"收藏情况表"出现。本册可查各丛书的内容，及其收藏单位。第二册为《子目分类目录》，将全书所收古籍按四部分类体系编排，在每部古籍下注明归属哪些丛书。本册可按部类查检某种古籍的大致情况及其所属丛书。第三册为《子目书名索引》和《子目著者索引》，按四角号码排列，附有笔画检字和拼音检字。本册专供查检第二册丛书子目。

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82年重版此书时，订正了原版的一些错误，并在《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中，补充了黑龙江省图书馆等六所图书馆的收藏情况。此外，还有三种丛书目录可供参考，以补充《中国丛书综录》的不足。一是阳海清编的《中国丛书综录补正》，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出版，对《综录》有所补订，并附有《补遗》和《丛书异名索引》。二是施廷镛主编的《中国丛书目录及子目索引汇编》，南京大学图书馆、历史系1982年印行。此书增补《综录》未收丛书977种，但其中有一批西学丛书和台湾新编丛书。三是庄荣芳编的《丛书总目续编》，台北市德浩书局1974年出版，收录台湾1949年以后出版的丛书683种，其中新编246种，重印423种。

《藏园群书经眼录》十九卷

傅增湘撰，傅熹年整理，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全书分装5册。本书原名《藏园经眼录》，原稿40余册，现存38册，著录自藏及

国内、日本经眼善本，共5000余种。其孙傅熹年以现存原稿为主，参考傅增湘的其它撰述，整理为《藏园群书经眼录》十九卷，按四部分类，经部二卷，史部四卷，子部五卷，集部八卷，收入各种善本4500余种。解题目录，每书先著录书名、卷数，下以小字标作者和存卷，提要述书的版本、版式、版刻时代、序跋、牌记、后人题跋、藏印及傅氏自己的评论，最后以小字注该书收藏者和傅氏观书的时间地点。

《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八卷

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编，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北京图书馆前后有三部善本书目，1933年赵万里曾编有《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收录1933年以前该馆所藏古籍善本3796部。1935年、1936年，赵孝孟又先后编成《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乙编》和《乙编续目》，著录赵万里未收的其它善本2666部。1959年出版的善本书目可看成是丙编，收入1937年以后陆续入藏的善本古籍11348种。前后三目共著录17800余部。《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按四部分类，每书著录书名、卷数、作者、版本、批校、题跋、捐赠情况。每书附有索书号。

《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五卷

上海图书馆1957年编印。全书按经、史、子、集、丛书五部分类，收录1956年以前入藏的古籍善本2470种，以集部为多。每书著录书名、卷数、著者时代与姓名、刊刻年代、刻书地点与刻书人等。

《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二册

北京大学图书馆1958年编印。本书收录馆藏清乾隆以前古籍善本7800余种，分经、史、子、集、丛书五类。分上下二册，上册为经、史，下册为子、集与丛书。每书著录书名、卷数、作者、版本，标明索书号码。书后有“书名索引”。此外，北京大学图书馆在1956年还曾编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著录北京大学所购清末

李盛铎藏书，共有古籍9087种，58385册。编排体例类似本馆善本书目，凡属善本，顶格排列，并有“口”记号，普通本则低格排列。每书下标有索书号码。

《古籍目录》

国家版本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收录1949年至1976年整理出版的各类古籍，包括“五四”以后对古籍加工整理的著作、古籍的新注、今译和选本，以及从古籍中选编或摘录的资料书。登记目录，每书著录书名、作者、册数、字数、印数等。

《古籍整理编目》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著录1949年至1981年整理出版的古籍1556种，全书按年编排，书名下注作者、整理者、出版者及出版时间等，属于登记目录。此外，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还编有内部刊物《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是了解古籍整理、研究新情况的重要材料。

《同书异名通检》

杜信孚编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1979年重版增订。该书将历代同书异名的古籍分别著录，标明书名、作者、版本、异名等四项内容，一书数名皆分别立目，达6000多条。全书按书名首字笔画排列，设有“检字目录”。

198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杜信孚等人编的《同名异书通检》，列4000条左右。分别著录同名异书的作者及其籍贯、卷数、版本等情况。全书按书名首字笔画检索。

《四部丛刊书目》

孙毓修编，商务印书馆1922年出版。本书为配套《四部丛刊》初编而作，随初编刊附。《四部丛刊》是近人张元济编辑的古籍丛书，分初编、续编、三编，精选宋元以来善本古籍，包括影印宋元旧刻、明清精刻精钞和手稿等，用照相制版影印出版。此书录为解题目录，它著录《四部丛刊》初编所收各书的书名、卷数、作者、版本来

源、版式、收藏图记等。按四部分类，每部又各以时代先后顺序排列。共收书 323 种，8548 卷，它详细记载了各种古籍的版本情况，为版本研究提供了资料，也为读者了解宋元旧刻的状况提供了方便。

《四部备要书目提要》

中华书局编印，1936 年出版。《四部备要》是中华书局编辑的古籍丛书，收书 360 种，多为古籍中较重要的著作，底本多经清代学者整理，以聚珍仿宋版刊行。本提要专供查检了解《四部备要》所收各书，解题目录。全书按四部分类排列，每书附有作者小传，然后或照录《四库总目》有关提要，或另撰"本书述略"，简介内容，记载卷目。

《丛书集成初编目录》

上海古籍书社编印。《丛书集成初编》是商务印书馆于 1935 年开始编辑出版的古籍丛书，精选 100 种丛书汇编而成，剔除重复，共收书 4107 种，分印 4000 册。由于抗战爆发，实际上只印行 3467 册，收书 3111 种，约 2 万卷。本目录将《丛书集成初编》所收书分类编排，在书名下注明作者、卷数及所属丛书，书后有四角号码书名索引及未出书名索引。中华书局于 1983 年修订重印。

《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

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 1933 年编辑印行，中华书局 1960 年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缩版影印。所收有原史志七种，即《汉书》、《隋书》、两《唐书》、《宋史》、《明史》、《清史稿》的艺文志、经籍志；补史目录八种，即《后汉书艺文志》、《三国艺文志》、《补晋书艺文志》、《补五代史艺文志》、《宋史艺文志补》、《补辽金元艺文志》、《补三史艺文志》、《补元史艺文志》；禁毁书目四种：《禁书总目》、《全毁书目》、《抽毁书目》、《违碍书目》；还有征访书目《征访明季遗书目》。以上 20 种目录中的作者和书名皆一一立目，读者可从作者或书名两种途径查到出处。这种引得可检索我国从先秦至清末主

要古籍的情况。

第二节　专用性古籍目录、索引

《中国地方志综录》

朱士嘉编，商务印书馆 1958 年出版，1962 年出版修订本。著录方志 7413 种，109143 卷。登记目录，注明书名、卷数、撰者、版本、编撰时间、收藏单位等情况。各地方志按省排列，省以下按《清一统志》各府、州、县的次序排列。

此外，还有全国天文史料普查组编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 1985 年出版。此书据朱士嘉书，收集全国 29 省 192 个藏书机构所藏方志编制而成，台湾省方志采自《台湾公藏方志目录》，收录方志 8200 多种。

《中国历代年谱总录》

杨殿珣编，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0 年出版。收录历代年谱及类如年谱的编年、年纪、述略、系年、著述编年等 3015 种，反映谱主 1829 人，附录参考书及有关资料 277 条。收入年限截止 1979 年，但所收以古代年谱为主。书后附"待访年谱简目"、"谱主姓名别号索引"。此后编者又有《续录》，载于《文献》杂志总十三辑，但所收为近现代人物年谱。李裕民有《中国历代年谱总录补正》，发表于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艺文》第二辑。

《历代妇女著作考》

胡文楷撰，上海商各印书馆 1957 年印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补订后出版。全书按朝代编次，每书著录书名、卷数、作者及其时代、出处和存佚状况。存书注明版本、刊刻年代等。每一书下，附作者小传，记载姓名、字号、籍贯、父名、夫名。附有"历代妇女著作考引用书目"、"历代妇女著作考书名索引"。

《伪书通考》

张心徵编著，商务印书馆 1957 年出版。全书分经、史、子、集、道藏、佛藏六部，考辨古籍 1104 种。以书名为纲，全录或节录前人考辨文字，皆注出处，编著考辨以按语形式附于最后。书后有作者索引、书名索引。又有郑良树编著的《续伪书通考》，台湾学生书局 1984 年出版。

《十通索引》

"十通"包括唐・杜佑《通典》，宋・郑樵《通志》，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此称"三通"；清乾隆时，集唐、宋、元、明典制，编成《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通称"续三通"；又汇集清朝典制，编成《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通称"清三通"；清末刘锦藻作《清朝续文献通考》，将清朝典制续记至宣统三年。以上是记载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系列典志体史书，所记史实上起黄帝，下迄宣统。本索引由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编印出版。分为两大系统，一是四角号码检字索引，凡"十通"所载的制度名物、篇章节目，都作为一专名立条，注明所属何书，所见页码及栏目。二是分类索引，分三编。第一编为三通典分类目录，第二编为三通志分类目录，第三编为四通考分类目录。

《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

张忱石、吴树平编，中华书局 1980 年出版，该索引以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点校本编制，收录二十四史纪传人物，也包括附传和《史记》的"世家"。人名下除注明点校本册数、页码外，还注明卷数，因而也适用于其它版本的"二十四史"。

另外，与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点校本配套，各史人名索引皆已编齐出版，如《史记人名索引》，《汉书人名索引》等等，以备查检各史出现的人名。

《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

傅璇琮主编，中华书局 1982 年出版。该索引收入唐五代各类人物近 3 万人，采用各种传记资料 83 种，分"字号索引"、"人名索

引”两个系列，可以互相对照，条目下分注资料所在书编号、简称、卷册数与页码。书后有“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引用书表”。

《宋人传记资料索引》

昌彼得编，台北鼎文书局1974—1976年出版，1977—1980年增订本，中华书局1989年重印。本书是在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和日本《宋人传记索引》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所收材料比前两种更多，仅宋人文集便有350余家，收录宋人达15000余人。人物事迹较为完备者，附有小传。全书共6册，前五册为正文，第六册为别名、字号、谥号索引。

《元人传记索引》

王德毅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1982年出版，中华书局1987年重印。该书收集宋末元人诗文集、总集、笔记、明初及清人部分文集，史传、方志、目录、类书、金石等有关资料700余种，收录元人17000多人。事迹完备者附有小传。全书5册，前四册为索引正文，第五册为“元人别名字号封谥索引”。第一册还附有“引用书目”，著录所用资料书名、作者、卷数、版本等情况。

《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

《辽金元传记三十种综合引得》

《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

《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

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编印。各引得皆按“中国字庋撷法”排列，书前附有拉丁字母“拼音检字”及“笔画检字”。宋代传记引得和明代传记引得分“字号引得”和“姓名引得”两部分，辽金元传记引得和清代传记引得则只有姓名引得。以上四种引得中华书局曾于1959年重印；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四种引得合为一册，缩印为大三十二开本出版；1987年中华书局又以十六开本重印。

《二十史朔闰表》(附西历、回历)

陈垣撰。北京大学研究所1925年印行，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

修订增补本。本书以中历为主，对照西历、回历。从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公元2000年。朔闰表书眉顶端标明每一年干支，下面依次排列历代帝王及其年号年份，每年下排列十二月，每月仅标朔日即初一的干支，并注明相应的公元年、月、日。如某年有闰月，同样加以注明闰月月份、朔日及西历。再下一格注明回历每年一月一日是中历几月几日，回历闰年则在岁首标一黑点辨明。最后一栏是考证与注解。书前有“年号通检”。书后有“日曜表”，可查所收日期的每一天为星期几。

《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

陆峻岭编，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全书收入文集170种，其中元人别集151种，总集3种，另有涉及元代史事的明初别集16种。文集篇目按内容分为三大部分：一是人物传记，又分为男子、妇女、释道、有姓无名者四小类，各类以姓氏笔画为序。二是史事典制，这部分的类目参照元《经世大典》、《元典章》二书的类目而定。三是艺文杂撰，类目参照《四库总目》的有关类目设立。书前附有《文集目录》和《文集作者索引》。

《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

王重民、杨殿珣编，北平图书馆1935年初版，中华书局1965年重版。收录清代学者文集440种，其中别集428种，总集12种。所收文集的篇目根据内容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学术文之部，按经、史、子、集区分，下又分小类。比如想要查找清人对医学方面的研究，就可从“子部·医学类”中查到哪些文集、某卷某页有这方面的材料。如“医学类·杂论”中有：

医药说　　俞樾宾萌集补编1/13a

表明俞樾《医药说》在其《宾萌集补编》的卷一第十三页上。有的索引在篇目下还注有小字，指示该篇主要内容，如“史部·目录类”中有一条：

复孙渊如观察　论史籍考

谢启昆　　树经堂文集 4/1a

篇名《复孙渊如观察》后就有小注"论史籍考"数字说明这封信札的主要内容。

第二大部分是传记文之部，又分有碑传、赠序、寿序、哀祭、赞颂、杂类等小类，各类再有传记人物的姓名索引。

第三部分为杂文之部，下又分书启、碑记、赋、杂文四类，各类下又分小类。

全书前有《所收文集目录》、《所收文集提要》、《文集著者索引》。

《重订曲海总目》

清黄文旸原编，无名氏重订，管廷芬校录。收于《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七册，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年出版。全书分"元人杂剧"、"明人杂剧"、"国朝杂剧"、"元人传奇"、"明人传奇"、"国朝传奇"六类。收入剧目 1050 余条。后附焦循《曲考》所补 72 种。以作家为纲，姓名下列其著作剧目，剧目下有附注，说明作者情况、剧目异名等等。

此外又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出版的《曲海总目提要》四十六卷，清黄文旸撰，董康辑补。共收入元、明、清杂剧传奇 684 种，介绍剧情梗概，考证故事来源，简介作者情况。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北婴的《曲海总目提要补编》，补剧目提要 72 篇，补正剧作者材料 249 条。

《中医图书联合目录》

北京图书馆、中医研究院 1961 年编印。全书联合国内 59 家图书馆馆藏，著录中医典籍 7661 种，其中大部分为中医古籍。分 17 类，最后一类"工具书"中的"书目与索引"收录了各种中医典籍目录，为读者提供进一步检索的途径，值得重视。据悉，中医研究院依据 30 年来积累的材料，将补录一批中医古籍，对此目进行增订重版。

《中国农学书录》

王毓瑚编，中华书局 1957 年初版，农业出版社 1964 年出版，1979 年重印。本书收录我国古代农书及有关农学著作 376 种，依成书年代先后编排，是一部解题目录。每书提要对作者情况，成书年代，主要内容都有介绍和考订。书后附“分类索引”、“书名索引”、“著者索引”三种。

《中国兵书知见录》

许保林编，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出版。该书收录 1911 年以前中国古代兵书及以后对兵书古籍的影印、翻刻、研究、注释、翻译等加工著作。对不知存亡或已亡佚的兵书，列入存目。共收书 3380 部，23503 卷。包括存书 2308 部，18567 卷；存目 1072 部，4936 卷。按朝代分 15 部分，最后一部分“民国以后兵书研究”便是收录对古代兵书的研究加工著作。每书注明书名、卷数、作者、版本、藏处，包括校注情况等等。

《中国古代音乐书目》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编，人民音乐出版社 1961 年出版。本书收录我国古代鸦片战争（公元 1840 年）前的音乐古籍 1400 种。分为存见、待访、散佚三大部，各部之下又分有小类。对现存的音乐古籍著录较详，包括书名、卷数、作者、出版年代、版本、藏处等等。书后附有书名索引。

《中国古代科技要籍简介》

麦群忠、魏以成编，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出版。收录介绍我国古代鸦片战争（公元 1840 年）以前较为突出的科技书籍 150 种。分为数学、理化、技术、综合、天文历法、生物农业、医学药物等七大类。解题目录，解题内容包括评介作者、成书时代、主要内容、学术价值、历史地位、书的流传等各方面。书后附有主要参考文献。

《二十五种经藏目录对照考释》

蔡运辰编，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3 年出版。这是大型佛经

综合目录。收入刻藏目录18种，专书目录7种。以《大正藏》为第一著录，其他各藏为第二著录，即注明《大正藏》此经又在其它某藏某函，最下有备考，注经名、译人、卷数之差异等等。

第五章　古籍目录学的实践与运用

古籍目录学的实践与运用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从狭义上讲，它是古籍整理工作的基础学科，可以肯定，不掌握古籍目录学，在古籍整理工作中将是寸步难行的。从广义上讲，古籍目录学是探索、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宝藏的"金钥匙"，它不仅可以使专业研究人员在学术研究中凭借古籍目录的指引，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对于一般文史爱好者的读书、治学也有重要的辅助作用。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应该说，古籍目录学便是帮助人们顺利开展工作与学习的利器。它的实践与运用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节　了解古籍的各种状况

古籍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是古籍目录，古籍目录是著录、揭示、反映古籍的工具，因此古籍目录学最基本的功能是帮助人们了解古籍的各种状况。

一、掌握历代典籍的发展轨迹

历代编制的书目基本上反映了各朝各代政府收藏的书籍数量，是比较完备的书目资料。因此，可以从中看到某一时代整理书籍的状况，看到某一时代书籍收藏的概貌，也可以把握中国古代书籍的发展过程。例如，公元前5年，刘向父子奉旨把天禄阁、石渠阁等汉朝的国家藏书作了一次大清理，著录在《别录》、《七略》中，流

传下来的《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的图书总数是13000余卷。此后，由于三国战乱，图书有所损失，经过一段时期的积累，西晋时的秘书监荀勗对秘阁藏书做了一次整理，据他所编的目录《中经新簿》著录，可知当时藏书为29945卷；东晋时，书籍受损，政府藏书减少，南朝刘宋元嘉八年（公元431），秘书监谢灵运受命整理书籍，从他编的《元嘉八年四部目录》中可看到，国家藏书又有64582卷；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梁元帝时，江陵（梁朝京都）的国家藏书已达70000卷；隋朝统一全国之后，非常重视收集图书，因此数量逐渐增多，到唐初编写《隋书・经籍志》时，收录图书已有89666卷。此后，历经战乱、统一，图书有增有减，但总的趋势还是不断增加的，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托托主持修《宋史》，《宋史・艺文志》中著录书籍119972卷；到明清两代，典籍门类庞杂，内容广博丰富，数量大增，为空前未有，仅《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国家掌握的书籍便有172860卷。从以上一连串的数字可以看出，随着古代文化的进步和积累，各种书籍的数量也不断地增多，虽然其中有不少战乱、水火的祸害，但是古代典籍总是以旺盛的生命力，保持不断发展、增加的总趋势。

二、掌握现存古籍的状况

中国古代典籍卷帙浩繁，种类繁多，有人曾统计过，公元1911年以前出版的古籍有18万种，230多万卷（苑柏华《从统计数字看中国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图书情报工作》1981・1）。大量的古籍在世代流传中，除了自然消亡以外，还惨遭人为的战火浩劫。隋代牛弘曾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总结了典籍遭受人为损坏的“五厄”，这便是秦始皇的焚书、西汉末的王莽之乱、东汉末的董卓之乱、西晋时的八王之乱、南朝时的侯景之乱。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总结了“十厄”，除以上所述“五厄”外，又有隋末毁于杨广、唐中毁于安史、唐末毁于五代战乱、北宋毁于靖康之变、南宋毁

于元兵入侵等破坏。明代之后，古籍又曾经历数次浩劫，第一次是清修《四库全书》时，乾隆皇帝对于一切违碍清廷的图籍，尽行销毁，孙殿起在《清代禁书知见录》的序言中说："据《禁书总目》、《掌故丛编》、《办理四库全书档案》诸书考之，在于销毁之例者，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种类数量几与四库收书相埒。"第二次是鸦片战争时期，各国列强入侵中国的焚毁和掠夺，例如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焚烧藏于圆明园文源阁的《四库全书》，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焚毁藏于翰林院的《永乐大典》。此外，在列强入侵之际，有大批珍贵古籍被盗外流，如敦煌所藏经卷便有17000多卷被盗。第三次大的破坏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据不完全统计，由于日军飞机的轰炸及日军战火的烧毁，我国当时损失图书馆2118座，图书一千万册以上，仅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烧毁当时居全国之冠的东方图书馆，就损失图书51万8千册。除以上三次大破坏之外，"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古籍受"破四旧"的冲击，也有不少损失。

我国古籍虽然经受这么多次的损失，但是一方面由于我国历代出版印刷业的发达，一方面由于藏书家及全体人民的爱护，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对于古籍的整理和收藏措施，使得大批古籍仍然保存下来。那么，我国现存古籍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呢？这个问题可以运用古籍目录学的知识来解决。正如陈垣先生所说："目录书就像一个帐本，打开帐本，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著作概况，可以了然。"（《与毕业同学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中国青年》1961.16）有的学者也曾利用古籍目录作过这方面的统计，如方厚枢先生在《从目录学入手》一文中，估计我国古籍存有七八万种（《光明日报》1963.3.6）。杨殿珣先生在《谈谈古籍和古籍分类》一文中，估计现有古籍有十五万种左右（《北图通讯》1979.1.）。顺着杨先生的思路，再补充其它一些古籍目录的资料，可以将现存古籍的大致数量统计如下：

(1)、《中国丛书综录》收入古籍38891种。施廷镛主编《中国丛书目录及子目索引汇编》增补前者未收丛书977种，包括古籍约1万种。

(2)、孙殿起的《贩书偶记》收《四库全书》以后单刻古籍1万余种，其《贩书偶记续编》收入6千种。

(3)、佛经约3千多种（据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第39页），道经约1千多部，合约5千种。

(4)、《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收入方志8千余种。

(5)、《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收入医古书近8千种。

(6)、毛雝《中国农书目录汇编》著录古农书2千多种。

(7)、《首都图书馆藏中国小说书目初编（五四以前部分）》著录古旧小说4千余种，《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著录4千多种，《中国俗曲总目稿》著录6千多种，再加上家谱、佛道之外的宗教书，各种合计约2万种。

(8)、碑帖、舆图约1万种。

(9)、兄弟民族语文图书及其他约1万种。

此外，还有未收入《中国丛书综录》等丛书目录的古籍单刻本，因无明显依据，没有估算在内，总之，现存古籍不会少于12万种。

以上讲的是古籍目录学对于掌握现存古籍总数的运用，对具体某一部古籍，许多古籍目录的记录资料上，都能反映出各种古籍的作者生平、撰述意旨、内容简要、存亡残整、版本优劣和学术价值高低等等。至于开展古籍整理工作，则要完全依靠古籍目录作前期的准备工作。一般来说，刚接触一部古籍，在对其作者、时代、卷数都不甚明瞭时，可先查阅《四库全书总目》、《中国丛书综录》和即将出齐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大型综合目录。了解其成书年代之后，再从与其年代接近的古籍目录查起，顺序往下爬梳，由此可掌握该书的基本概况。如吉书时点校司马光《稽古录》（点校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已知该书完成于北宋，即以南宋陈

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查起，发现该书最早的版刻起于潭本、越本两大源流，两本一为二十卷本，一为十六卷本。又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掌握了该书的组成内容与编撰情况。再从明人序跋和清人李希圣《雁影斋读书记》中了解到《稽古录》在明清时越本已经亡佚，只有潭本传刻流传的情况和原委。再从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馆藏目录摸清现存《稽古录》的 11 种版本，考核比较，选出其中的最佳版本作为底本，这样才能顺利地开展点校整理工作(以上参见吉书时《稽古录点校前言》)。

三、掌握对古籍的简单著录

在古籍目录学的实践中了解古籍的各种状况，还包括掌握对古籍进行简单著录的方法，这也是收集、整理古籍所必备的知识。

著录，就是按照一定的方式和方法把一部古籍的内容和形式特征记录下来。著录古籍，按照古籍目录传统的方法，再结合近代我国图书馆编目工作的实践经验，主要包括著录书名、著者、版本、稽核、附注、提要等项目。以下分别作扼要的说明。

(一) 书 名 项

书名项的著录内容包括书名和卷数。

著录书名一般根据正文卷端所题的书名进行记录。例如有一部清初的小说，封面题“小青传”，正文卷端题“新镌绣像集咏楼”，版心刻“集咏楼”。那么，应该著录书名为《新镌绣像集咏楼》。为什么不根据封面的书名呢?因为古代刻书常常喜欢请人题写书名，或请名人，或请师友，这样的题签往往与作者的原书名不太一致，甚至有较大出入。另一种情况是封面最容易脱落，重换封面时常常会有意或无意地改动了书名。这是封面书名不够可靠的两种情况。而正文卷端书名，是作者定稿后所署，最符合作者的原意。在著录正文卷端书名时也要注意，有些书是将篇名标于上方，书名标于下方的，如“周本纪第四，史记四”，著录时则应以卷端下方所题的书

名为准，不可误录篇名。

此外，书名前有时带有钦定、御纂、新刊、绣像、增广等冠词，或者带有皇朝、国朝、圣朝、昭代等对当朝的称呼，或带有胜国、胜朝等对前朝的称呼，一般都应照录，不可删略。

著录古籍卷数是书名项的另一内容，可依照书名之后的卷数照录。有些书卷首、卷末、补遗、附录等独立成卷，应依次记录，不要合计。如：

《文体明辨》六十一卷卷首一卷目录六卷

附录十四卷附录目录二卷

（二）著 者 项

包括记录著者时代、著者姓名和著作方式。著者时代和著者姓名将有助于读者从时代背景和风气、作者的生平和思想等方面去加深书籍的理解。著录著者姓名也要以卷端标识为主；有的书卷端无标识，则要从封面或其它部位寻找。古籍中题作者姓名时，常常在姓名前加有官职、封爵或籍贯，在名后加有字号等，均应删除，只记姓名。

古籍的著作方式很多，如撰、编、注、校、修、订、增、续等等。要依据原书所题进行著录。一书如有原著、订、注、补等多人多种方式的，应该一一著录。例如：

《毛诗正义》四十卷，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

（三）版 本 项

版本项著录的具体内容包括出版时间、出版地点、出版者和版本类别。古籍的刊刻年份就是出版时间，书中如不题出版年份，则可参考序跋的年代。古籍刊刻时间往往用年号纪年或干支纪年，应加注公元纪年，如“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刻本”，应著录为“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4年）刻本”。古籍如是重刻、翻刻、影印本，则将后刻印时间著录在前，原刻时间在后。如曰：

《秋涧先生大全集》一百卷附录一卷

元·王恽撰

民国八年(公元191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据明弘治十一年刻本影印。

出版地和出版者的著录要求反映刻书所在地,刊刻的个人或书店、机关。如"长洲顾秀野草堂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等等。

古籍版本的类型较多,著录时也应说明,如刻本、活字本、石印、影印、抄本等。

(四)稽核项

这部分著录的目的在于全面反映本书形式上所具有的各种特征,以便收藏与阅读时能确认这部古籍。稽核项记录包括书的册、函数,书的附图、附表数量,装帧形式及其它重要标志。装帧形式指注明线装以外的特殊形式,如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等。其它的特殊标志范围较广,如用红色印刷的朱印本,用两色以上印刷的套印本,特殊的纸张、字体,重要的名人题签、藏书家印记等。例如:

《吕敬夫诗集》五卷、《鹤亭唱和》一卷

元·吕诚撰

清钞本,有清·丁丙跋及"季振宜小印"、"陈仲鱼图缘"、"简庄艺文"、"海宁陈鳣观"诸印。

《陶渊明集》

晋·陶潜撰

清同治间刻本

四册一函,四色套印,正文墨色,版框蓝色,注文绿色,圈点红色。

稽核项内容较多,范围很广,要注意抓住最有特征的进行著录,不必面面俱到,过于繁琐。

(五)、附　注

这项内容是对书名、著者、版本、稽核等项的说明和补充。如注

书的异名、作者的疑义、版本的行款、书内所附录的其它内容等。

（六）提 要 项

撰写书目提要是古代目录工作的优良传统，提要的内容包括介绍作者、书的内容与思想、版本源流、学术价值等等。《四库全书总目》的提要作得比较全面、详尽，在体例和方法上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可以向它学习。但《四库全书总目》毕竟是一部封建时代产生的目录，时代不同了，今天作古籍提要，应该有新的眼光，对古籍的思想内容的评判和利用应有新的标准，要善于恰当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古籍，客观评价古代学术思想的价值及其局限性。

第二节　认识古籍的版本

版本学的兴起始于古籍目录。目录书专记版本情况始于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当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对书籍的版本有了记载。明清的善本书目对古籍版本的记载逐步详细，著录方式也渐成规范。特别是清初钱曾《读书敏求记》，乾隆时官修的《天禄琳琅书目》，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求古居宋本书录》等，更是从版本的款式、字体、刻工、纸张、避讳，以及序跋、牌记、题记、批校、藏书印章等方面广泛记录古籍的版本特征，深入进行版本的鉴别和源流考订，从面丰富了版本研究的内容，形成了版本之学。

清末，从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开始，版本学才从古籍目录学中独立出来，出现了大批版本学专著和专门研究版本的学术论文。但是，二者仍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古籍目录学为版本学研究提供了大批原始资料，版本学研究的成果又为古籍目录的著录增添了新的内容，因此，对古籍版本的认识、鉴别和源流考订，是实践和运用古籍目录学的一个广阔领域。

一、古籍的外形结构与版式

为了恰当地运用古籍目录了解、考订古籍版本，必须认识古籍的外形结构与版式。

古籍的外形结构指装订成册后的书籍形态。古籍的装帧方式经历了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等阶段，最后出现了装订较为坚固，翻阅较为方便的线装书。流传至今的古籍绝大部分是线装本，因此这里主要分析线装书的外形结构。它主要由以下各部分组成：

书衣——古书装订成册后，在外面覆上一层纸，起保护作用，这层纸一般比较厚实，有的还用色纸，又称书皮、护封。

书签——是贴在书衣上的题签，写有书名。

书首——书本上方的侧部，又称书头。

书根——书本下方的侧部。书根上常印有书名或篇卷名，以便收藏者寻检，又称书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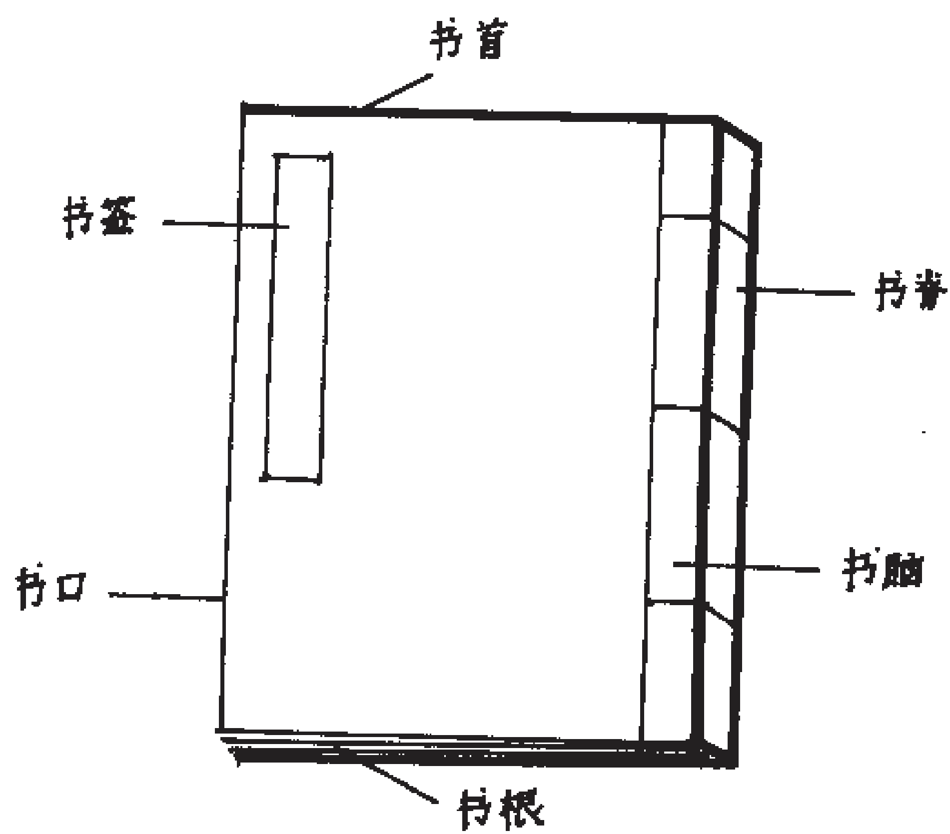
书脊——书本装订线的侧部，又称书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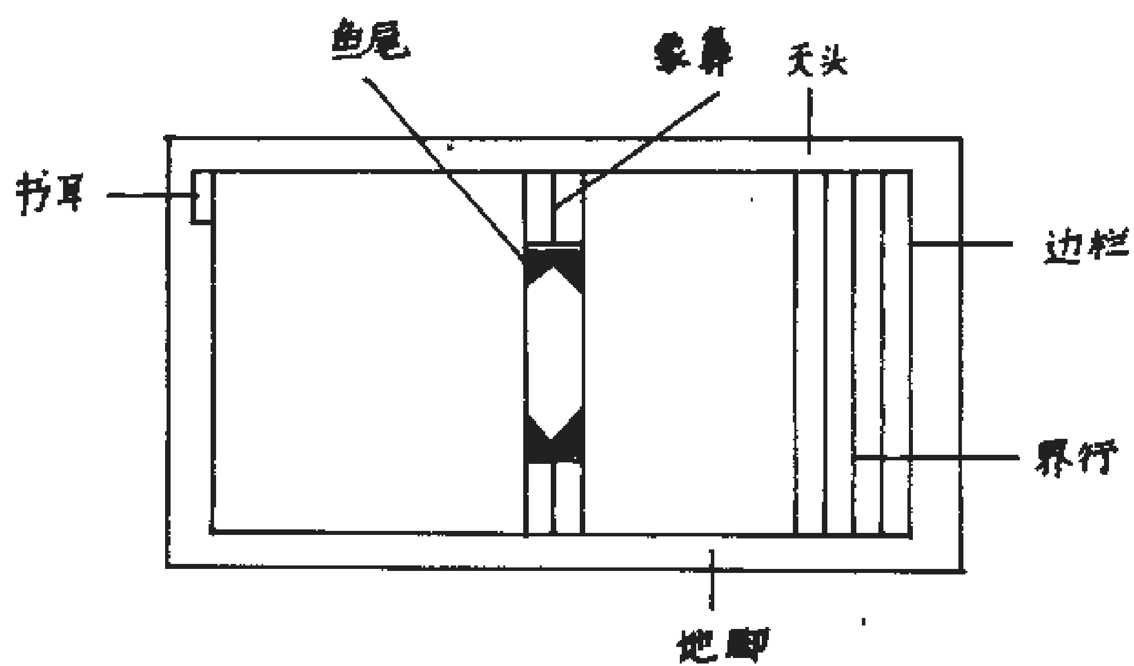
书脑——书本正面的装订线部分。

书口——与书脊相对的部分，即可以翻开书页的一端。

封面——书衣内的首页，用以题写书名、作者、出版处等，又称书名页、封页、内封面。

古籍的版式指线装书每一单页的格式。雕版的一版相当于书的一页，装订成册后一页有前后（上下）两面，一面即半页。每一单页所占的面积称“版面”，版面四周用直线框围刻字的方框称“版框”或“边栏”。边栏的上下左右直线分称为上栏、下栏、左栏、右栏。边栏为单线叫单边，双线叫双边。版内分行的直线叫“界行”或“界格”。版内不分界行的叫“白文”。版面的行数和每行的字数叫“行款”或“行格”。著录行款字数时，有的以每页计算，有的以半页计算。版面的高广（长宽）有一定的尺寸，有时在目录中也进行著录。


书首
书签
书背
书口
书脑
书根


鱼尾
象鼻
天头
书耳
边栏
界行
地脚

版面上非刻字的区域，上方称“天头”，下方称“地脚”。边栏外的左上角或右上角有一小框，叫“书耳”或“耳子”，框内多记篇名或书名简称。版面中间有一窄行叫“版心”，也叫“中缝”，为对折书页所用，版心上常刻有书名、卷数、页码、刻工姓名、本页字数等。为了折叠方便，版口上端或上下两端刻有“鱼尾”和“象鼻”，作为对折的标记。刻有一个鱼尾的叫单鱼尾，刻有上下两个的称双鱼尾，甚至还有三鱼尾；只有单线构成的鱼尾称白鱼尾，用墨填黑的称黑鱼尾，中空而填花的称花鱼尾。鱼尾上下到版框有一条黑线，这就是象鼻。此处空白无线的称白口，有细黑线的称细黑口或小黑口，粗黑线或此处填黑的称阔黑口或大黑口。

二、版本的名称

我国大量的古籍由于刻印和抄写的时间、地区、单位的不同，由于刻印方法和质量的不同，出现了许多版本形式，因而古籍目录中也就有了各种不同的版本名称。每个版本名称都代表着某种版本的形式特征和内容特色。可以按不同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将版本名称划分为多种类别。

我国古籍主要是用雕版印刷，如以时代区分，则可分为唐五代刻本、宋、元、明、清刻本。

如按刻印者来分，有官刻本、书院刻本、私刻本、仿刻本。官刻本又有监本、经厂本、殿本、内府本，如北宋监本、南宋监本、元兴文署本、明南监本、明北监本、清武英殿本等。地方官府也有刻本，如宋公使库刻本、临安府刻本、元建康路刻本。书院有官办、私办，也常有刻本，元代书院刻本较有代表性，有名的如杭州西湖书院刻本。私刻本有的以姓氏代称，有的以堂号代称，如毛刻本、滂喜斋刻本。坊刻本则有书铺、书肆等名称，如南宋“临安府棚北大街陈宅书籍铺”，元代“叶氏广勤堂”等。

如按刻印地区分，又有四川蜀本、浙江浙本、福建闽本、平阳平

水本，此外还有国外刻印的日本本、高丽本。如宋刻《周礼》蜀本，日本刻本《论语集解》等等。

按书籍内容的增减、评注等情况分，则有增订本、删节本、足本、残本、校本、批点本、注本、译本等。

按刻书制版的情况分，有刻本、原刻本、精刻本、写刻本、翻刻本、活字本等，活字本又分为泥活字、磁活字、木活字、铜活字、锡活字等。如明铜活字本《墨子》，明华燧会通馆的锡活字本《宋诸臣奏议》，清代泰安徐氏以磁活字刊印《周易说略》等，至于木活字本则较普遍，清代《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38 种，都是木活字印本。

以版式、印色、字体区分，又有巾箱本、两节本（书页分上下二栏）、三节本、朱印本、蓝印本、套色本、大字本、小字本等等。

以版本质量区分，又有通行本、精刻本、写刻本、百衲本、邋遢本。写刻本指由作者或书法家书写后上版刻印的本子，如清代林佶写刻的《渔洋精华录》、《尧峰文钞》、《古夫于亭稿》、《午亭文稿》，就是这种刻本的佼佼者。百衲本指从不同书版中选择较佳部分拼凑印成的书本，因其补缀很多，故号称"百衲"，如《百衲本二十四史》、《百衲本资治通鉴》。邋遢本指书版模糊漫漶，不够清楚，如南宋蜀本眉山《七史》。此外，还有一些对珍贵版本的称呼，如善本、秘本、珍本、孤本等等。

对于非雕版印刷的本子，则有抄本、写本、稿本、拓本、石印本、影印本、铅印本等名称。

总之，版本的名称甚多，它们从各类版本特征交叉反映古籍的情况。一部古籍往往具备几方面的版本特征，如有的目录书著录云"《周礼》，宋残蜀大字本"，既反映其刊刻时代，又交代了刻书地区、字体大小、完缺情况。因此了解一部古籍的版本时，最好要具体全面地掌握其各种特点。

三、通过古籍目录鉴别版本

如何鉴别古籍版本，古今版本学家根据历史传统和长期经眼识别的经验，总结了一系列的方法。比如：

(1)、根据书名页、序跋、牌记的内容来鉴别。这些内容常常反映出刊刻年月，出版单位或出版者，版本源流等等，是鉴别版本的重要依据和基本材料。

(2)、根据古籍的纸张、墨色、字体、装帧方式来鉴别。例如从字体上说，宋至明中叶以前常用楷书雕刻，宋代字体尚欧阳询体，后来尚用颜真卿、柳公权体；元代和明代前期尚赵孟頫体。明中叶以后，字体逐步形成一种横轻竖重、形体方整的所谓宋体字，一直沿习至清代。当然，这样的分析只是大概而言，各代版刻字体往往形式多样，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去判断。比如清代刻书，除了宋体字外，也有许多楷书、行书的写体字刻本。

(3)、根据书名冠词来识别。古籍正式书名之前往往冠有一些朝代、官爵、地名等冠词，如"圣宋"、"皇元"、"大明"、"皇清"、"国朝"、"皇朝"、"昭代"、"胜朝"等等，可以帮助识别。另外有些官名、地名为某朝所特有，也可资鉴别所用。

(4)、根据书中避讳进行鉴别。古书中对帝王的避讳常用缺字、缺笔，用同音、近音字代替的方法。有些刻本还避家讳，但这种情况较少，各朝各代避讳的字眼不同，这便可利用来辨别版本的时代。两宋皆注重避讳，元代与明代前期不注意，清代刻书又特别注意避讳。各朝避讳字，可看陈垣先生《史讳举例》卷八。另外，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论》书后所附"宋至清历代纪元暨帝讳简表"对各朝讳字列举甚详，也可参考。

(5)、根据古籍中的刻工姓名进行辨别。有些古籍在版心下端或卷末常刻有刻工的姓名，考订这些刻工的生平即可知刻本的年代。有一些学者专门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出现一些可喜的成

果，可供利用。如日本汉学家长泽规矩也的《宋元刊本刻工表》列有宋代刻工 1500 多人，元代刻工 750 多人，此表收于汉译本《书志学》中。我国学者王肇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出版的《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收录更为广博，共收宋元善本书 370 种，刊工凡 4500 人。此外，魏隐儒的《古籍版本鉴定丛谈》书后也附有"宋至清各代部分刻本所见刻工及写画工姓名简表"。

(6)、从古籍版式特点去鉴别。观察各代刻本版式中鱼尾、象鼻的不同特点，是鉴别刊刻时代的一种手段。此外，古籍的行款字数也可作为区别刻本年代的证据之一。清末江标辑有《宋元行格表》二卷，可以参阅。

(7)、藏书家印记也是鉴别依据。藏书家的藏书印章有多种类型，其中有一种鉴赏章，常常表达藏书者对古籍质量、版刻年代的判断鉴别意见，如称"宋本"、"甲"、"神品"等，可供鉴别时参考利用。一般的藏书印章，也可为进一步识别版本情况提供线索。

以上谈到的是经眼古籍时，从鉴别对象中寻找版本特点的种种证据；此外，还要重视鉴别对象以外的文献记载材料，提高审识的准确性。比如近代以来，出现了一些古籍书影、图录，它们突出实物验证的效果，从历代版刻中选有代表性的原书样本进行复制，汇订成集，专供鉴审版本时对照比较，是鉴定版本的有效工具。这些材料如清末杨守敬的《留真谱》，公元 1922 年常熟瞿启甲影印的《铁琴铜剑楼宋元本书影》，1941 年潘承弼、顾廷龙合编的《明代版本图录初编》，1960 年赵万里主编的《中国版刻图录》等，是较为重要的。又如商务印书馆编的《四部丛刊》，都是用宋元明清善本影印的，仅初编就收有宋本 45 种，金本 2 种，元本 19 种及其它大批明清善本，也可利用来观察比较。

利用鉴别对象以外的文献记载来审定版本，最重要的还在于利用古籍目录。在有的情况下，古籍目录的记载，会成为版本鉴别的根本依据。古籍目录对于版本鉴别的作用在于：

(1)、考辨一部古籍的原刻、重刻、存佚、完缺、流传过程，无不依据目录记载得以了解。清代大藏书家黄丕烈鉴定古籍版本时，就常常翻阅《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读书敏求记》、《四库总目》等古籍目录。比如他曾收到一部子书《乙巳占》十卷，已知朱彝尊在《曝书亭集》中曾指出这部书的七卷本并非完书，那么十卷本是定本吗？他又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及钱曾《读书敏求记》，皆著录为十卷，钱曾还曰："始自《天象》，终于《风气》，凡十卷。"对照所收之书正好吻合，于是才下结论确定十卷本为足本（见《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三）。

(2)、当鉴别的古籍有所残缺，提供不出版本依据时，也应从古籍目录中了解。戴南海在《版本学概论》中举例说，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有《春秋四传》三十八卷，半页八行，行十七字，白口左右白边。由于该书缺序文及正文第一，也无牌记可考，无从考定版本年代。于是查《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见著录为"明吉澄校刊本"；《天一阁书目》也著为"明吉澄校刊"。取吉澄的另一刻本《礼记集说》对照，版式、字数、纸张、墨色等皆相同，因此将鉴别对象确定为"明吉澄刻本"。

(3)、在点校整理古籍的工作中，手中虽然掌握了个别情况已明的版本，但为了摸清该书其它版本的状况，以便选择最佳版本作为工作底本，这时也需要通过古籍目录的著录进行普查。前边已提到吉书时点校《稽古录》时寻求版本源流、选用工作本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4)、古籍目录记录了前人研究古籍版本的大量成果，为今天的版本认识和版本考订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一方面，目前各图书馆的馆藏古籍目录基本著录了所藏古籍的版本状况，这就为借阅者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如果未能从馆藏目录得到版本方面的著录，或者是由于其它情况需要我们对版本进行识别，那么，在我们对古书作初步鉴定后，最好要查阅一批古籍目录，验证结论，寻求

旁证，如果目录记载与结论不同，则要重新考订，以求弄清是非。

古籍目录不仅记载版本鉴别的结果，有些还详载目录学家考辨版本的过程及识别版本的经验，这些都是可贵的版本学知识，值得吸取和借鉴。比如清代版本目录学家黄丕烈是乾嘉时著名的藏书家，经他鉴别收藏的宋刻本达200种以上，他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是一部特殊体裁的题跋集目录，书中有关版本学的内容俯拾皆是，多为后人所借鉴。比如他大量利用宋讳来鉴别宋代刻本，在掌握宋刻避讳的普遍规律外，还总结了利用宋讳识别宋刻的一些特例。如卷五跋《浣花集》曰："此实系宋版，卷中'徵'、'祯'、'玄'、'树'避此四字；而'玄'、'树'有不尽避者，宋版时或有此。"这是指出宋刻书中对某些讳字有严有松的现象。又如宋刻《说苑》，黄丕烈所见有三，一为南宋孝宗前刻本，一为孝宗时刻本即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载之本，一为咸淳一年重刻本。他在卷三《说苑》跋文中，解答了有人对咸淳本不避孝宗讳的疑问，曰："仁和孙志祖跋云：晁氏《郡斋读书志》叙《说苑》篇目，避孝宗讳，易'敬慎'为'法诫'，而此本不易，以为疑。余谓此疑咸淳本之出孝宗后尔，何亦不避？岂知重刻之者。特翻旧本，故遇'慎'字间缺末笔。若余所得本，并不避'慎'，则刻较先矣。"孝宗前的宋刻，自然不避孝宗名讳；孝宗时刻本，避"慎"字极严；咸淳时离孝宗已隔三代近百年，所以重刻时便又不避孝宗名讳了。这是利用孝宗讳字，区别初刻、原刻、重刻三个不同时期的宋本《说苑》。

一般多以为宋刻本版心为白口或细黑口，但是也有特殊情况，黄丕烈在跋宋刻《新定续志》时就说："启包见版口阔而黑，视之则《新定续志》也，心疑为非宋刻。""余所藏《中兴馆阁录续录》中有咸淳时补版，皆似此纸墨款式，间有阔黑口者，可知宋刻书非定白口或细黑也。"

他还常常通过观察古书的纸质来鉴定宋刻，如卷三跋《图画见闻》曰："爰揭去旧时背纸，见原楮皆罗纹阔帘而横印者，始信宋刻

宋印。"宋代刊书有些是以纸背印行的，黄丕烈在卷五跋《北山小集》中说："书友胡益谦持《北山小集》示余，欲一决其为宋版与否。余开卷指示纸背曰，此书宋刻宋印，子不知宋本，独不见其纸为宋时册子乎？"宋时纸张厚实、故两面皆可印刷，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宋代纸张供应不甚充足，所以有些书用旧册籍的背面印制。正如黄丕烈所说的："宋版本纸背多字迹，盖宋时废纸亦贵也。"

《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不仅对宋刻书的鉴别有独到的见解，对元刻、明铜活字本、手抄本的识别方法也时作论述，读来让人深有启发。仅以此书为例，便可说明古籍目录中对版本知识的记载有多么丰富，足资借鉴。因此，运用古籍目录学知识，发掘、利用古籍目录中分析版本的记载，是鉴别版本的重要途径。

第三节　为考辨古籍提供线索

中国的古籍，由于流传年代长久，会因为许多人为的原因，出现阙佚、散落、卷数分合、作者姓名不清、书的真假不分等问题。各个学科的研究者、古籍整理工作者要想从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得到一些正确的材料，第一步工作就必须开展对古籍的考辨，弄清有关古籍原来的真实面目，才有可能进入实质性的研究和整理。对古籍的考辨除了通过考古发掘、利用金石铭文，利用历史事实进行考订等途径外，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利用目录学的方法来考辨古书。这方面工作前人已经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余嘉锡先生在《目录学发微》中总结了目录学在考辨古籍中的六种功用，一曰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伪；二曰用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三曰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四曰因目录访求缺佚；五曰以目录考亡佚之书；六曰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现以余先生之论述，结合笔者管见所及，将这项工作归纳如下：

一、利用古籍目录辨古书的真伪

古代文献中，特别是较早的古籍中，有一部分书是后人伪造的，如果不能辨识清楚，就谈不上对古籍的进一步整理研究，因此辨伪是研究整理古籍的重要工作之一。那么，古书中为什么会有伪书呢？这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假托古人、名人以传其书，以行其道。如《易经》托名伏羲，《本草》托名神农；《医经》托名黄帝，《礼书》托名周公。二是每逢统治者下诏求书，说明献书有赏，便有士大夫投机取巧，以伪书牟取名利。如隋文帝时，刘炫乘牛弘购求天下遗书的机会，造伪书百余卷而领赏（《北史·刘炫传》）。三是为了抬高自己，伪造一部古书以证明学术观点与自己相同。如三国时曹魏的王肃伪造《孔子家语》，来为他在《圣证论》中提出的经说提供依据。四是为了贬低别人，为对方伪造一部质量很次的书，以证明对方的荒谬。如《周秦行纪》是李德裕的门客所撰，反托名牛僧儒作，以诬牛氏（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古代伪书出现的情况很多，因此，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篇而已。"（《孟子·尽心篇》）

清末学者叶德辉说："鉴别之道，必先目录学始。"（《藏书十约》）古人经常利用古籍目录书来辨别伪书。例如，汉代对于东方朔这个人物传说很多，对于他的著作传说也很多，那么，他的著述确实有哪些呢？班固《汉书·东方朔传》曰："朔之文辞，此二篇最善（指《答客难》、《外有先生论》）。其余有《封泰山》、《责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谋》、《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赋腊》、八言、七言上下、《从公孙弘借车》，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世所传它事皆非也。"班固根据刘向《别录》所载，断定以上篇目是真作，而当时流传东方朔的其他著作，由于刘向没有登载，便是伪书。又如《四库总目》在考辨题名为宋·岳珂的《索湖诗稿》时，认为"宋以来公私书目悉不著录，不知其所自来，珂序亦无年月"。从这些线索出发，进一步分析

该书的文字风格和内容史实，终于将它列为伪书。这种考辨伪书的办法就是以前代古籍目录的著录为依据，看看是否曾经著录，如无著录的证据，则可疑为伪书。正如梁启超所说："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

此外，有些古籍目录中已有考辨伪书的记载，而这些书仍然存世，便很值得怀疑。《汉书·艺文志》中就对一些书籍注明"依托"，如已指明《鬻子》二十二篇为后人假托(《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类)，则今本《鬻子》十四篇，仍不可信。《隋书·经籍志》、《四库总目》也对一些书籍的真伪作出说明，这都是考辨伪书的有力的依据。

有些古籍前志著录，后志不载，而隔代又重新出现，其真实程度也颇可疑。如《汉书·艺文志》著录《关尹子》九篇，《隋书·经籍志》不载，说明此书可能在六朝时亡佚，隋朝时不见，再看记载唐代典籍的两唐志也不记载，而宋初又重新出现，这种后出的《关尹子》便可能是伪造的。

总之，辨伪工作极其复杂，依靠古籍目录只是一个方面，还要结合其它方法一起考察，明人胡应麟《四部正讹》中有辨伪八法，近人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也提出了辨伪十二公例，值得参考运用。此外，清代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今人张心徵的《伪书通考》、郑良树的《续伪书通考》都是辨伪的重要工具书。

二、利用古籍目录考古书的分合

古籍在流传的过程中，卷数经常发生变化，有时是数篇合为一篇，有时又是一篇分为数篇。因此，古人往往利用目录书来考证书籍原来的篇章与卷数分合，以了解古书的原来面貌。例如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引了汉朝郑玄《三礼目录》的一段内容，说："名曰《乐记》者，以其记乐之义。此于《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合为一篇，谓

有《乐本》,有《乐情》,有《乐化》,有《乐象》,有《宾牟贾》,有《师乙》,有《魏文侯》。今虽合此,略有分焉。"这是根据郑玄的《三礼目录》,说明《小戴礼记》中的《乐记》是由原来十一篇合为一篇的,并评列了十一篇的篇目,使后人了解了它的分合。

三、利用古籍目录定古书的性质

古籍目录素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这种功能是通过它的小序和部次分类体现出来的。古人常常利用目录来了解古书的学术源流和性质。例如《南史·陆澄传》记述陆澄与当时著名的目录学家王俭讨论《孝经》一书的性质。陆澄说:"(郑)玄自序所注众书,亦无《孝经》。且为小学类,不宜列在帝典。"王俭答曰:"仆以此书明百行之首,实人伦所先。《七略》、《艺文》并陈之六艺,不与《苍颉》、《凡将》之流也。"陆澄认为《孝经》没有郑玄的注释,属于小学类书籍,不应列入群经。王俭反对这个意见,并以《七略》、《汉书·艺文志》的部类为证,主张应列入经典,确立《孝经》的地位。

此外,有些书从书名上很容易对书的内容性质造成误会,但注意书的类属,则可了解其主旨大意。如《春秋经传类对赋》看似经解书,《皇极经世书》看似经学总义,但二书在《四库总目》中前者归于类书,后者归于术数,有鉴于此,便不会将此二书误以为经学著述。

四、利用古籍目录追踪散佚古书

由于战争或其它各种原因,古书经常是与代俱增亦与代俱亡。像《隋志》收录汉代之书,还不足《汉志》的十分之二;《唐志》收录隋代之书,亦仅是《隋志》的十分之六七。所以,历代统治者在社会稍为稳定之后,便有求书之举,希望把流散的图书赶紧收集起来,以免亡佚。这种求书活动,往往需要借助前代的目录记载。如《隋书·牛弘传》记牛弘上《请开献书之路表》,他鉴于当时图书阙失较多,奏请依照梁朝各书目,访求旧籍。唐初收集隋代遗书,也是利用

隋朝的《大业正御书目》进行搜求整理的。这便是利用目录书追求遗书的办法。

近代以来，许多学者还常常利用古籍目录在海外访求，寻求世间罕见的孤本和善本。例如清代黎庶昌编的《古逸丛书》，许多就是他和杨守敬在日本访求到的流散在外的中国古籍。40年代，现代目录学家王重民先生也利用古籍目录，在欧美各大图书馆，找到了一批珍贵古籍。

有些古籍确实亡佚，那么，通过古籍目录，了解亡佚古书的情况，也可帮助后来学者大致掌握前人在某个领域中的研究成果；或者提供线索，为研究指引方向和思路。此外，通过一些解题目录，更可进一步考察佚书的编撰思想和主要内容。我国现存最早的解题目录是宋代的《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这两部目录著录的古籍有些已经亡佚了，但通过解题的介绍，仍可大概了解书的内容和有关情况。因此，《四库总目》在评价《直斋书录解题》时说："古书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

五、利用古籍目录考书名同异

中国古代文化历史悠久，先贤圣哲辈出不穷，著述如林，因此难免出现同书异名或同名异书的情况。历史上就有九家内容不一的《史记音义》，12家内容不一的《汉书音义》，18家《晋书》等等。这些同名异书的例子，需要借助目录书分辨同一书名，不同的作者和内容。比如，打开《新唐书·艺文志》，你就可以看到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编撰的《老子道德真经注》19种。但是由于目录书的分别著录，你自然就可分别这些同名书的差异了。

再说同书异名，如《红楼梦》，原名《石头记》，又叫《金玉缘》；《老子》一书，又叫《道德真经》或者《老子道德真经》；《列子》一书，又叫《冲虚至德真经》等等。这种情况，皆可通过有关目录提要的说明，或通过几部目录书的对照，从产生时代、作者、版本源流、主要

内容上找出相同处，以确定一书多名。

杜信孚等先生正是总结了以目录书查书名同异的办法，并结合实物考核，编成了《同书异名通检》和《同名异书通检》两部工具书，这是很有价值的。当然，这两部工具书也不可能网罗无遗，所以还要随时注意对原始目录的查检。

第四节　指示治学与研究门径

我国古代学者都非常讲究治学之道，认为治学宜得门径，得门而入，事半功倍。中国的古编文献浩如烟海，初学者总会遇到一个从何入手的问题。唐代目录学家毋煚认为，如果没有分类编次、叙明源流的目录书，读书人要想求知，就如“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不亦劳乎！不亦弊乎！”如有了目录书的指导，便可“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故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以传后来，不愈其已。”（《古今书录序》，见《旧唐书·经籍志》）可见为读者指引读书治学的门径，辅导读书是古代目录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古代目录书指示门径的作用具体体现在小序、解题和附注上，许多解题目录都在解题中对书籍的学术价值和地位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评论，对于读书和治学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有的目录书还在一种书或一类书之后附一短语，涉及书的用途，指示门径，如《书目答问》就有“此书最便”，“此类各书为读正史之资粮”等等小注，这些注言可以使读者从中得到有用的提示。我们今天利用古籍目录阅读古书，仍要注意利用这方面的材料。

由于目录学知识和目录书具有帮助读书治学的作用，因此历代学者对目录学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从刘向以来，许多著名的学者都参与了目录书的纂集工作和目录学的研究工作。清代学者对目录学的重视，尤为突出，他们把目录学提高到显学的地位。有清

一代，不但有大批的目录书问世，而且学者重视利用目录书指导治学的风气更为浓厚。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一首条就标举目录学的重要性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

在这里他强调了目录学是读书入门之学，首要之学。因为面对浩繁文献，初学者自然会有望洋兴叹之感，只有解决了读书从何下手，阅读的先急后缓问题，学问才能有所进展。

清代学者金榜也曾指出了解目录书的重要性，他说："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这段话以《汉书·艺文志》为例，说明不了解书目，就不可能选读古今图书，收到较好的读书效果。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了目录学对于研究、著述的指导作用。

那么，古入为什么把目录书的重要性提到这样的高度呢？一方面，由于古代科举考试内容的限制，特别是明清以来八股文的束缚，诸生囿于应付科考的狭小知识范围，对于其它领域的书籍接触甚少，因此需要目录书 这位"特殊的老师"来指示门径；另一方面，由于封建教育的局限性与某些封建文人的自我封闭，因而不少学者只顾自己苦读深思，然后著书立说，少有治学经验之谈，此所谓"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金·元好问《论诗》）。这样，许多学子依靠自己的摸索去乱读书，在精力上确实是很大的浪费。因此清人王鸣盛又说："凡读书最切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十七史商榷》卷七）这是很有道理的。

直至近代，许多学者治学，还是靠着目录书入门的。史学大师陈垣先生在谈他的读书经验时说："我读书是自己摸索出来的，没有得到老师指导。"那么他的读书经验是什么呢？就是靠目录书（见《中国青年》1961 年第 16 期）。陈垣先生是广东新会入，小时候在乡间私塾念书，接触面很窄，除了经书外就是教人应考的八股文、试帖之类。13 岁那年（光绪十九年，公元 1893 年），广东闹瘟疫，私

塾闭馆，他无意间在学馆冯老师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书目答问》，翻看之后，喜出望外。在这部目录书里，除了经书外，他又看到了史部、子部、集部等书籍的情况，大大开扩了眼界。在休学一年时间里，他按着《书目答问》的提示，借书、访书、买书、读书，丰富了文史方面的知识，他后来回忆说这一年的自学，胜过书馆好几年。从《书目答问》入手，他进而研究《四库简明目录》和《四库总目提要》。公元1913年，陈垣先生以众议员的身份定居北京后，经常到京师图书馆阅读《四库全书》，每天往返路程要花费三四个小时，在前后10年的时间里，他将这部包括三千多种古籍的大丛书作了全面的了解和研究，不仅熟读了大量古籍，而且写出了《四库书目考异》五卷，《四库全书纂修始末》一卷等研究《四库全书》的著作。从此，为他今后的文史研究打下了坚实深厚的研究基础（以上内容引自《励耘书屋问学记》，刘乃和先生《书屋而今号励耘》、《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二文）。

著名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的文史研究也是从目录学入手的。他在回忆自己的治学过程时谈到，16岁时注《吴越春秋》，由于材料不足，对学问之事茫然失据，后来读《书目答问》，又顺着《书目答问》的指引，求购《四库总目提要》。17岁购得之，于是"大喜，穷日夜读之不厌"。后来，他到北京辅仁大学任教授，教学著述之中，时时不忘利用《四库总目提要》。因此他说："余之略知学问门径，实受《提要》之赐。"由于运用日久，研究日深，也就常常发现《总目》中误漏可疑之处，于是便随时"陈书考证"，"笔之上方"，前后积50年之心得，终于纂成《四库提要辨证》四大册，为考订《四库总目》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以上参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自序）。

古代和近代，由于教育的相对落后，信息的闭塞，目录书成为读书人读书治学的唯一指南，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就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信息量猛增的今天，要学习、认识、研究古代文化遗产，也仍然离不开古籍目录学的指导。特别是文史学科的研究者，

必须了解古籍目录学，了解记载本学科文献资料的古籍目录究竟有几种，范围与质量如何，应掌握这些目录的编制体例，熟悉这些书目的使用方法，以便利用起来得心应手，不致造成漏失。只有如此，才能充分掌握和利用本学科所需要的研究资料；同时，也才能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避免走弯路和重复劳动，从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批判继承，有所创新。

对于一般的文史爱好者来说，粗知古籍目录学，将有助于了解我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同时掌握运用什么方式、在什么书籍中，准确快捷地获取所需的知识。

当代科技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的运用，文献资料的输入、整序与终端显示，为资料检索和信息的传递展示了广阔前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普通目录学与古籍目录学的没落，相反，昭示着目录学学科的研究与运用将有一个更大的飞跃，因为只有在目录学的正确指导下，才能统筹编排计算机的程序和严密运算，达到书目、文献资料检索的有效目的。要言之，古籍目录学、普通目录学的实践和运用是大有作为的。

第五节　古籍目录学的总结、改造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 40 多年以来，古籍目录学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仅以古代目录学史的研究来看，至 1989 年，便已出版专著 6 部，发表论文 580 篇。此外，还有大批古籍目录、古籍索引问世。这些研究专著与书目、索引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批判地继承了我国目录学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经验，吸取了国外目录学的先进技术和方法，为古籍目录学的研究开拓了可喜的局面。当然，古籍目录学的发展也是曲折的，在其前进过程中曾经受过严重的干扰。因此，从总的情况分析，我国古籍目录学的研究及其书目工作实践与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需要还有一定的距离，特别

是与现代人文科学的迅速发展很不相称，这种差距和不适应状况应该看作是古籍目录学继续开拓、不断前进的动力。

一、继承古籍目录学的丰富遗产

古籍目录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它有悠久的历史、优良的传统和丰富的遗产。推动古籍目录学发展的首要工作，应该是做好对其文化遗产的总结和继承工作。毛泽东同志对于清理古代文化，继承历史遗产曾有精辟的论述。他说：

> 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新民主主义论》)。
>
>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这些论述对于继承古籍目录学的丰富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本学科对于古代书目工作，目录学研究的成果虽已作过大量的总结工作，但还有一些材料没有整理发掘，还有一些工作未能进行。

比如，古代书目资料掘粗略统计有数百种之多，是否可以从中挑选出大部分书目，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删除重复，存亡共录，编成《中国古代著述总汇》或《中国古代著述总汇索引》一类的成果。或形成大部巨帙，或因篇帙浩繁，也可以计算机磁盘的形式提供检索。以利于全面反映我国古代著述总貌及各学科、各流派的学术源流、发展轨迹，为人文科学的深入研究提供最全面的资料检索和参照系统。这项工作工程浩大，但是我们知道，30 年代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依靠手工操作，就已完成了《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

的编纂；再往前推，南宋时的郑樵作《通志·艺文略》时，独力无助，偏居一隅，仍有“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的宏愿，相信当今在计算机先进技术的配合下，由各条战线的研究者通力合作，这项宏大而有益的工程是可以完成的。

对古代目录资料的开发和利用，还包括一些以前未能引起足够重视的领域。比如，古代文人有写读书札记和题跋的习尚，古代目录有以题跋集、读书记形式出现的独特体裁，这一点在前文已予总结。这些题跋集或读书记有由作者自编，也有后人代编，有些材料目前已经点校整理，如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瞿士良编辑整理的《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等。但是，仍有一批有用的专集未及整理，例举之，如顾广圻的《思适斋书跋》、陆心源的《仪顾堂题跋》、《仪顾堂续跋》等等；如洪颐煊的《读书丛录》、卢文弨的《钟山札记》、《龙城札记》等等。而且，更多的题跋、读书札记还散布在文集中或各种古籍的书前书后。这批材料亟需整理，或依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的辑录方法，广泛收集题跋、札记，系于书名之下；或依题跋、读书记的作者结集；或依研究专题结集；或按馆藏古籍题跋分类辑录。总之，应该把这些揭示古籍各种状况，考订古籍有关问题，反映读书心得的宝贵资料充分利用起来。

方志目录、书业目录也是应该深入挖掘的目录资料群。方志目录常可考查一地人士及与当地相关人物的著述状况，常可补充大型目录之不足，甚至可补苴名家之佚文。古旧书业目录时有一些罕见古籍出现，郑振铎先生生前就很注意对这类目录的搜集，以期了解有关古籍的流通情况。古籍目录学的研究，今后应加强对以上两类目录的重视。

小序和解题是我国古代目录工作的优良传统，是我国书目区别于外国书目的显著特点，是体现我国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形式，因而值得当今古籍目录编纂工作借鉴。但是，

当代编写的古籍目录，基本上已经没有小序这种内容结构了，有解题的也很少，而且多数解题是用来介绍书籍版本、流传情况的，对于书籍的内容主旨、学术评价等较少论及，这种现象值得注意。诚然，并非所有的古籍目录都必须有小序或解题，但是有些大型目录最好应该有小序、解题的形式，特别是应该注意运用小序的形式，以便充分揭示各类古籍的学术源流变迁和承继。古籍目录学还有待于深入探讨新形势下小序和解题在书目工作中的具体运用，特别要研究如何利用当代科学研究的成果，从批判继承的角度，正确分析古代学术流变和各种古籍的学术价值，写好具有时代精神的古籍目录小序与解题。

二、变革和创新是古籍目录学继续发展的源泉

古籍目录学的变革和创新是永保其旺盛生命力的源泉。清代史学家赵翼写过两首绝句，诗曰："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入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瓯北诗抄》)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揭示了一切知识系统不断追求变革、创新发展的深刻哲理。古籍目录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既要发扬传统，又要有所创新。比如古代目录学史的研究在我国已有深厚的基础，如何在此基础上有更大的突破呢？彭斐章、谢灼华两先生曾揭出应"把目录学史的研究逐步深入到学说史的研究，使目录学内容更加深化"(《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4.6)。这种对目录学史研究方法有所创新的建议，是非常中肯的。探讨目录学学说史的发展，要注意分析重要目录的编撰思想，分析著名目录学家的学术观点，从而说明这些思想观点在学说史上的意义和影响。目录学史的研究，还可以探索如何将目录学史的发展放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去考察，这方面，王重民先生在《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已经作了可贵的尝试，但似乎还应进一步加强。不仅要说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

的进步对目录事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还应说明目录工作的成就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作用，在学术文化发展史上产生的作用。当然这些作用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这便需要有客观的分析。

古籍目录学研究还应开拓新的领域。当前“文化学”的研究方兴未艾，日趋深入，但是美中不足者，有些文化学研究内容失于空泛，缺乏脚踏实地的依据和论证。书籍是历史文化遗产的主要载体，一朝一代一地的文化典籍往往最能反映当时当地的人文风尚和知识体系。因此，书目研究应和文化学研究结合起来，运用书目计量学及比较目录学等方法，从书籍的流传范围、数量、流向等，作出一些参数值的描述，以便为考察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文化结构、价值体系、风气流变等提供依据。例如，我国近代史时期，是西学东渐，中西两大类型的文化相互斗争，相互影响渗透，渐趋融合的特殊时期。古籍目录学研究可以通过当时的古籍目录、新学书目及一些新旧兼容的书目对书籍流传情况的记载，进行定量描述和定性分析，比较新学、旧学各自的流行强度、范围，相互影响、渗透及融合的状况，从一个侧面去揭示中国近代文化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总之，利用书目记载反映文化传播的状况，为文化学的深入研究开辟道路，是古籍目录学和普通目录学改造发展的一条途径。

古籍目录学研究的革新还应加强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吸收，特别是对于电子计算机的运用。国外在 60 年代已经开始采用电子计算机来编制索引和文摘。1967 年，美国研制成功机读目录 MARC Ⅰ，这一成果的发明，使书目编制和服务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产生了大批书目自动化系统，促使了联合编目工作的发展，达到了书目资源共享的目的。目前许多国家已经用 MARC Ⅰ 技术，开展了国际化的合作编目，以便互相利用彼此的编目成果。在书目服务方面，许多国家还利用 MARC 磁带建立了

书目数据库，利用计算机联网，形成服务网络，开展范围广泛、迅速快捷的书目情报服务，如美国系统发展公司（SDC）的ORBIT联机系统，每天便可提供214万条文献线索。计算机的联网现已打破国家和地区的限制，跨越国界，形成了国际性的书目情报服务网络。目前世界上这种检索系统已有100多个，最大的检索系统是DIALOG系统，我国的联机检索用户基本上使用此系统的文献资料。在我国，运用计算机进行编目工作和书目服务已有了可喜的进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国内在运用计算机进行古籍检索方面，也有了突出的成绩。例如江苏中医研究院和南京部队总医院在完成了对《金匮要略》等四部医古籍的整理后，建立了数据库和编制程序，完成了历代中医名家名著治疗经验的检索系统。哈尔滨师大、黑龙江电子研究所建立的《史记》检索系统，通过C语言、汇编语言和多层次覆盖技术，形成了57万多字的语料库，从而达到对《史记》一书字、词、句的排序、检索、统计的步频，可为《史记》研究者提供多种服务。深圳大学把《全唐诗》输入电脑，建立了《全唐诗》检索系统，该系统有全面检索《全唐诗》的题目、作者、诗句，以及检索《全唐诗》中任何一个字出现的次数和所在位置等功能。又如东北师大运用计算机，成功编制了《贞观政要》的主题索引等。另外，从1992年起，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已同美国研究图书馆组织（R. L. G.）联合编制中文古籍善本书机读目录，目前该系统正与国内其它图书馆联系，输入更多的古籍目录，一旦编目完成，便可通过计算机联网，检索了解国内及北美有关图书馆所藏中文古籍的状况。总的来说，我国目前已初步实现了书目、索引、文摘编排的机械化和书目服务的自动化，但是还不够普及。古籍目录学研究在这方面应探讨如何在古籍编目、索引和检索工作中对计算机技术的广泛运用。此外，还要发扬中国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注重探索如何运用计算机技术揭示书目内容的文化功能，为文化史的研究增添新内容。

三、应该注意研究国外目录学的新成就

为了使古籍目录学的研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应该注重研究国外目录学的新成就，取长补短。以日本为例，日本的“书志学”研究有专门的刊物和研究会，每年在其他刊物上发表这方面的论文也不少，有许多是专门研究中国古籍和中国古籍目录的，因此必须及时地将这些成果介绍进来，以便参考利用。此外，还要组织人力研究日本的中国古籍目录学研究。本世纪以来，日本汉学界在这方面作出了重大的成就，编制了大批中国古籍目录和索引，据粗略统计已有200多种。其中尤以古籍索引种类更为繁多，古籍目录中较为重要的如长泽规矩也的《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阿部隆一的《中国访书志》，尾武的《古今图书集成引用书目录稿》，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等等。对于这些成果，我们必须及时进行总结，引为借鉴。

古籍目录学的发展方向除了总结继承原有的传统和书目文献遗产，开拓、创造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外，还应不断建设、完善包括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应用方法等部分在内的学科体系。一位外国哲学家曾经指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新的完备的理论重新说明旧概念、旧内容时，我们的收获总会比单纯重复旧东西更多。旧东西在新概念系统里获得了新内容，新系统对旧东西、业已熟知的东西的解释往往是新发现的开端。”（[德]G·克劳斯《从哲学看控制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中译本，第16页）因此，古籍目录学学科体系的完善，将会促使本学科的研究产生突进和飞跃。

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科学方法论的不断产生，普通目录学研究已出现了一系列边缘学科，如书目计量学、比较目录学、目录控制论、书目系统论等。古籍目录学也应探讨如何吸收这些边缘学科的研究方法，丰富本学科的方法论内容，使学科的研究循着更为科

学、准确、便捷的道路前进。

我国古籍目录学的研究有巨大的潜力，除了古籍整理研究及图书馆学等专业工作者外，一方面，图书馆古籍部工作者为了服务读者的需要，必须进行古籍目录的编制，关心古籍目录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从使用古籍目录、寻检有关文献的角度，也关心古籍目录学研究与成果。因此，推动古籍目录学的研究和发展的重任，不仅局限于专业工作者，还有强大的同盟军。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了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繁荣，愿一切热爱古籍目录学的同志、同行们，互相支持、努力耕耘，让这块古老而充满生机的园地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附录一

古籍目录图书分类沿革表

书目	部类													
七略*	(一)六艺略	1 易	2 书	3 诗	4 礼	5 乐	6 春秋		7 论语	8 孝经		9 小学		
七录	(一)经典录	1 易	2 尚书	3 诗	4 礼	5 乐	6 春秋		7 论语	8 孝经		9 小学	(五)术技录	2 谶纬
隋书经籍志	(一)经部	1 易	2 书	3 诗	4 礼	5 乐	6 春秋		8 论语	7 孝经		10 小学		9 谶纬
古今书录*	(一)经部	1 易	2 书	3 诗	4 礼	5 乐	6 春秋	10 经解	8 论语	7 孝经	11 诂训	12 小学		9 谶纬
新唐书艺文志	(一)经部	1 易	2 书	3 诗	4 礼	5 乐	6 春秋	10 经解	8 论语	7 孝经		11 小学		9 谶纬
崇文总目	(一)经部	1 易	2 书	3 诗	4 礼	5 乐	6 春秋		8 论语	7 孝经		9 小学		

书目	部类												
郡斋读书志	（一）经部		1易	2书	3诗	4礼	5乐	6春秋	9经解	8论语	7孝经	10小学	
遂初堂书目	（一）经部	1经总类	2周易	3尚书	4诗	5礼	6乐	7春秋		8论语	附孝经孟子	9小学	
直斋书录解题	（一）经部		1易	2书	3诗	4礼	18子部音乐	5春秋	8经解	7语孟	6孝经	10小学	9谶纬
宋史艺文志	（一）经部		1易	2书	3诗	4礼	5乐	6春秋	9经解	8论语	7孝经	10小学	
明史艺文志	（一）经部		1易	2书	3诗	4礼	5乐	6春秋	8诸经	9四书	7孝经	10小学	
四库全书总目	（一）经部		1易	2书	3诗	4礼	9乐	5春秋	7五经总义	8四书	6孝经	10小学	

书目	部类															
七略	(一)六艺略															
七录	(二)纪传录	1 国史	2 注历	3 旧事	4 职官	5 仪典	6 法制	7 伪史	8 杂传	9 鬼神	10 地理	11 谱状	12 簿录			
隋书经籍志	(二)史部	1 正史	2 古史	6 旧事	7 职官	8 仪注	9 刑法	4 霸史	10 杂传	附鬼神	11 地理	12 谱系	13 簿录	3 杂史	5 起居注	
古今书录	(二)史部	1 正史	2 古史	6 旧事	7 职官	8 仪注	9 刑法	4 霸史	10 杂传		11 地理	12 谱系	13 略录	3 杂史	5 起居注	
新唐书艺文志	(二)史部	1 正史	2 编年	6 故事	7 职官	9 仪注	10 刑法	3 伪史	8 杂传记		13 地理	12 谱牒	11 目录	4 杂史	5 起居注	
崇文总目	(二)史部	1 正史	2 编年		6 职官	7 仪注	8 刑法	5 伪史	12 传记	11 岁时	9 地理	10 氏族	13 目录	4 杂史		3 实录

书目	部类			
郡斋读书志	(二)史部	1正史 2编年 7职官 8仪注 9刑法 5伪史 11传记		10地理 12谱牒 13目录 4杂史 3实录 6史评
遂初堂书目*	(二)史部	1正史 2编年 4故事 12职官 13仪注 14刑法 6伪史 5杂传	集部 2章奏	18地理 15姓氏 17目录 3杂史 11实录 7国史 10史学
直斋书录解题	(二)史部	1正史 3编年 8典故 9职官 10礼注 13法令 6伪史 12传记 5诏令	集部 6章奏	11时令 16地理 14谱牒 15目录 2别史 7杂史 4起居注
宋史艺文志	(二)史部	1正史 2编年 5故事 6职官 8仪注 9刑法 13霸史 7传记		12地理 11谱牒 10目录 3别史 4史钞
明史艺文志	(二)史部	1正史 附编年 4故事 5职官 6仪注 7刑法 8传记		9地理 10谱牒 2杂史 3史钞
四库全书总目	(二)史部	1正史 2编年 12职官 13政书 9载记 7传记 6诏令 奏议		10时令 11地理 14目录 4别史 5杂史 15史评 8史钞 3纪事本末

书目	部类															
七略	(二)诸子略	1儒	2道	3阴阳	4法	5名	6墨	7纵横	8杂	9农	10小说	(五)兵书略	1兵杂谋	2兵形势	3阴阳	4兵技巧
七录	(三)子兵录	1儒	2道	3阴阳	4法	5名	6墨	7纵横	8杂	9农	10小说	11兵家				
隋经籍书志	(三)子部	1儒	2道		3法	4名	5墨	6纵横	7杂	8农	9小说	10兵				
古今书录	(三)子部	1儒家	2道家		3法家	4名家	5墨家	6纵横家	7杂家	8农家	9小说家	10兵法				
新唐书艺文志	(三)子部	1儒家	2道家		3法家	4名家	5墨家	6纵横家	7杂家	8农家	9小说家	12兵书				
崇文总目	(三)子部	1儒家	2道家		3法家	4名家	5墨家	6纵横家	7杂家	8农家	9小说家	10兵书				

书目	部类											
郡斋读书志	（三）子部	1儒家	2道家		3法家	4名家	5墨家	6纵横家	7杂家	8农家	9小说家	11兵家
遂初堂书目	（三）子部	1儒家	3道家						2杂家	5农家	8小说家	6兵书
直斋书录解题	（三）子部	1儒家	2道家	14阴阳家	3法家	4名家	5墨家	6纵横家	8杂家	7农家	9小说家	12兵书
宋史艺文志	（三）子部	1儒家	2道家		3法家	4名家	5墨家	6纵横家	8杂家	7农家	9小说家	14兵书
明史艺文志	（三）子部	1儒家	11道家					2杂家	附名法墨纵横	3农家	4小说家	5兵书
四库全书总目	（三）子部	1儒家	14道家 附道书		3法家				10杂家	4农家	12小说家	2兵家

书目	部类	
七略	（五）术数略	1天文 2历谱 3五行 4蓍龟 5杂占 6形法
	（六）方技略	1医经 2经方 4神仙 3房中
七录	（五）术技录	1天文 3历算 4五行 5卜筮 6杂占 7形法 10杂艺 8医经 9经方
	（七）仙道录	1经戒 2服饵 3符图 4房中
	（六）佛法录	1戒律 2禅律 3智慧 4疑似 5论记
隋经籍书志	（三）子部	11天文 12历算 13五行 14医方
	附道经	1经戒 2服饵 3符图 4房中
	附佛经	1经 2律 3论
古今书录	（三）子部	11天文 12历数 13五行 14医方
新唐书艺文志	（三）子部	10天文 11历算 13五行 14杂艺 16明堂经脉 17医术 15类书
崇文总目	（三）子部	16天文 17历数 18五行 15卜筮 12算术 占书 20艺术 14医书 13道书 19释书 11类书

书目	部类								
郡斋读书志	（三）子部	10 天文历数		16 杂艺	14 医书	13 神仙	15 释书		12 类书
遂初堂书目	（三）子部	7 数学		9 杂艺	12 医书		4 释家	10 谱录	11 类书
直斋书录解题	（三）子部	13 历算	15 16 卜筮 形法	19 杂艺	17 医家	10 神仙	11 释家		20 类书
宋史艺文志	（三）子部	10 13 天文 历算	11 12 五行 蓍龟	15 杂艺	17 医书				16 类书
明史艺文志	（三）子部	6 7 天文 历数	8 五行			9 艺术 附医书	12 释家		10 类书
四库全书总目	（三）子部	6 天文算法	7 数术	8 艺术	5 医家		13 释家	9 谱录	11 类书

书目	部类								
七略	(四)诗赋略	5 歌诗	1 赋（屈原等）	2 赋（陆贾等）	3 赋（荀卿等）	4 杂赋，			
七录	(四)文集录		1 楚辞				2 别集	3 总集	4 杂文
隋书经籍志	(四)集部		1 楚辞				2 别集	3 总集	
古今书录	(四)集部		1 楚辞				2 别集	3 总集	
新唐书艺文志	(四)集部		1 楚辞				2 别集	3 总集	
崇文总目	(四)集部						2 别集	1 总集	3 文史

书目	部类						
郡斋读书志	(四)集部		1 楚辞		2 别集	3 总集	
遂初堂书目	(四)集部	5 乐曲			1 别集	3 总集	4 文史
直斋书录解题	(四)集部	5 歌辞	1 楚辞	4 诗集	3 别集	2 总集	7 文史
宋史艺文志	(四)集部		1 楚部		2 别集	3 总集	4 文史
明史艺文志	(四)集部				1 别集	2 总集	3 文史
四库全书总目	(四)集部	5 词曲	1 楚辞		2 别集	3 总集	4 诗文评

△为使各目相同部类纵行比较，本表打乱各目原部类次序，代以数字标明。汉字数字表示原大部顺序，阿拉伯数字表示原小类顺序。

※《七略》类目中省辑略。《古今书录》类目与《旧唐书·经籍志》同。《遂初堂书目》史部又有“8 本朝杂史”、“9. 本朝故事”、“10. 本朝杂传”。

新图书分类法类目

一、人大法（17 大类）

（1）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2）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附宗教、无神论（3）社会科学、政治（4）经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政策（5）国防、军事（6）国家与法、法律（7）文化、教育（8）艺术（9）语言文字学（10）文学（11）历史、革命史（12）地理、经济地理（13）自然科学（14）医药、卫生（15）工程、技术（16）农艺、畜牧、水产（17）综合参考

二、中小型表（21 大类）

（A）马克思列宁主义（B）哲学（C）社会科学（总论）（D）历史（E）经济（F）政治、社会生活（G）法律（H）军事（I）文化、教育（J）语言文字（K）文学（L）艺术（M）宗教、无神论（N）自然科学总论（P）数理科学和化学（Q）地质、地理科学（R）生物科学（S）医药、卫生（T）农业技术（（U）—（Y）工业技术（Z）综合性图书

三、科图法（25 大类）

（00）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10）哲学（20）社会科学（总论）（21）历史、历史学（27）经济、经济学（31）政治、

社会生活（34）法律、法学（36）军事、军事学（37）文化、科学、教育、体育（41）语言、文字学（42）文学（48）艺术（49）无神论、宗教学（50）自然科学（总论）（51）数学（52）力学（53）物理学（54）化学（55）天文学（56）地质、地理科学（58）生物科学（61）医药、卫生（65）农业科学（71）技术科学（90）综合性图书

四、武大法（26 大类）

（A）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B）哲学附无神论、宗教（C）社会科学总论（D）经济、政治经济学（E）政治、社会生活（F）国家与法、法律（G）国防、军事（H）文化、教育、体育（I）语言文字（J）文学（K）艺术（L）历史、革命史（M）自然科学总论（N）数学（ND）力学（O）物理学及其应用（P）化学和化工（PD）晶体学（Q）天文学（QD）气象学（R）地质、地理科学（S）生物学（T）医药、卫生（U）农业科学（V）工业与工程（Z）综合性图书

五、大型法（21 大类）

（A）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B）哲学（C）社会科学总论（D）历史、历史科学（E）经济、经济科学（F）共产主义运动与组织、劳动人民的社会政治组织（G）国家与法（H）军事、军事科学（J）文化教育（K）语言文字学（L）文学（M）艺术（N）自然科学总论（O）数理科学与化学（P）地球科学（Q）生物科学（R）医药科学（S）农业科学（T/X）工业科学（Y）交通运输（Z）综合性图书

六、中图法（22 大类）

（A）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B）哲学（C）社

会科学总论（D）政治、法律（E）军事（F）经济（G）文化、科学、教育、体育（H）语言文字（I）文学（J）艺术（K）历史、地理（N）自然科学总论（O）数理科学与化学（P）天文学、地球科学（Q）生物科学（R）医药、卫生（S）农业科学（T）工业技术（U）交通运输（V）航空、航天（X）环境科学（Z）综合性图书

主要参考书目

《中国目录学史》，姚名达，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版。

《目录学发微》，余嘉锡，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中国目录学史论丛》，王重民，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中国目录学史稿》，吕绍虞，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4 年版。

《古典目录学浅说》，来新夏，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目录学概论》，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目录学概论》编写组，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目录学》，徐召勋，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

《中国古代目录学简编》，罗孟祯，重庆出版社 1983 年版。

《目录学纲要》，曹慕樊，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中国历史书籍目录学》，陈秉才、王锦贵，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4 年版

《中国历史文献学》，张家璠、黄宝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中国历史文献学》，杨燕起、高国抗，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

《版本学概论》，戴南海，巴蜀书社 1989 年版。

《古籍版本学概论》，严佐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图书分类学》，白国应，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5 年版。

《古籍索引概论》，潘树广，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4 年版。

《图书馆古籍编目》，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目录学论文选》,李万健、赖茂生,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5 年版。

《目录学文献学论文选》,彭斐章、谢灼华,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

《文史工具书词典》,祝鸿熹、洪湛侯,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后　　记

这部小小的书稿，由我数年来教学的讲义删改增补而成。1982年，我作为研究生，就读于著名文献学家刘乃和先生门下，研习历史文献学，并对古典目录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数年间，先生耳提面命，谆谆教诲，将我一步步引入目录学的学术殿堂。研究生毕业后，先生又将我推上讲台，为研究生及各类研修生讲授"古籍目录学"。在教学的实践中，我逐步认识到，古籍目录学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它与普通目录学、古典目录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首先，古籍目录学是普通目录学的分支，它以普通目录学的理论为指导，但是，又要体现它对古籍目录的集中研究，及其在古籍整理工作中的应用性。其次，古籍目录学与古典目录学也不相同，虽然它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古代目录和古代目录工作，但它不以1911年为限，既研究古代目录，也研究近现代产生的各种古籍目录和索引。也就是说，古代目录工作早已结束，留待古典目录学去研究总结；而古籍目录工作正方兴未艾。因此，古籍目录学要不断总结古籍目录工作的发展规律及其最新成就；同时，还应根据现代科学技术飞速进展所提供的条件，根据传统文化研究与古籍整理不断深入的需要，尽可能地为古籍目录工作的发展提出建设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意见。这就是古籍目录学所必须具备的鲜明特点。

有句古话叫做"知易行难"。对于我来说，知之未必真，行又何其难。这部书稿虽然力图贯彻以上对古籍目录学学科特点的有关认识，但限于学力和时间，书中多有浅尝辄止之憾，至于疏漏之处，更是在所难免。因此，本书只是引玉之砖，我期待着其它更为科学

的、充实的古籍目录学著作问世，并竭诚欢迎学者、读者们对此书的批评匡正。

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基础极为深厚，本书是在前辈学者众多研究成果的母体中产生的，对于当代学者专家的论著也多有引用，限于篇幅，未能一一注明出处，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本书由讲义到书稿，全过程一直得到刘乃和先生的指导，先生还不辞辛苦地为这部不起眼的小书题签作序；王酉梅、倪晓健二先生先后对此书的大纲和写作提出不少宝贵意见，中州古籍出版社的陈协琹先生不仅大力支持本书的出版，同时热心指导全书的修改。借此机会，谨向所有扶持帮助我的前辈、师长和朋友，致以衷心的敬意和感谢！

周少川

1993. 10